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6

清代卷（上）

朱赛虹　曹凤祥　刘兰肖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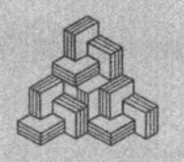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6

清代卷（上）

朱赛虹 曹凤祥 刘兰肖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上）/朱赛虹，曹凤祥，刘兰肖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68－1788－2

Ⅰ．中…　Ⅱ．①朱…②曹…③刘…　Ⅲ．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清代　Ⅳ．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913 号

责任编辑／毕　磊　武　斌
责任印制／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 vip. sina. 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26　彩页 4
字　　数／374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小 引

清王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和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它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是中国悠久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明末，政府腐败，居住在辽东的女真族崛起，建立与中央对抗的地方政权后金（后改为清）。公元1644年，清统治者借助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军事力量，夺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成果，入主中原，建立起封建专制统治。在这一过程中，连年用兵，东征西讨，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祸患。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不懈的努力，清政府在中国辽阔的版图内，使经济、文化逐步恢复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统一的国家里，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经过上百年的拼搏和奋斗，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被史学家赞誉的“康乾盛世”。然而，清前期的社会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导致清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衰败和危机。至乾隆晚期，各族人民起义武装反抗不断，其中白莲教起义遍及七省，清朝前期的统治也由盛极而衰。

清前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表现在出版事业方面，其发展状况、出版思想、出版内容、出版机构、出版技术、出版管理、版式特点、行款字体、装帧形制等方面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章　清前期出版业发展的社会背景

清前期的历史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止，共197年。从清朝的兴衰来看，我们可以把清前期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在全国的统治逐渐巩固。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处在剧变之中，持续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的急剧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要求人们对各种现实问题做出回答。第二阶段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朝开始出现盛世。在这一阶段，清朝在全国的统治趋向稳定，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朝统治者稽古右文，发展文化。同时，又打击具有民族意识的汉族士人，迭兴文字狱。很多文人、学子受到迫害和摧残，大量典籍被毁坏，思想、文化界万马齐喑；社会下层的农民、奴婢、手工业者和商人反抗、斗争的呼声不断。这种呼声极大地震动着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戴震、曹雪芹等思想家、文学家拿起巨笔，对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理学进行批判，并断言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灭亡。第三阶段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清朝统治出现危机和衰败的征兆。在这一阶段，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把其触角伸向中国，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统治已经出现衰微。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考据学派无法解决。

于是，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经世致用之学受到学者的青睐。

与历史和学术的发展相对应，清前期也是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史上的恢复、发展和兴盛时期。出版活动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在清前期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典籍出版规模、典籍出版数量、典籍印刷的质量以及典籍的装帧设计都举世罕见。清朝前期出版事业恢复、发展和兴盛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要从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去探究和考察。

第一节　政治环境与经济概况

清朝建立以后，在政治军事上执行了许多实现统一和巩固政权的政策，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出现了康雍乾的鼎盛局面。政治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为出版事业的发展、兴盛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

一、政治环境

(一) 统一与稳定全国政局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并定都北京。清兵初入关时，为了稳定政权，清政府曾颁行一些安民措施。如为明崇祯帝发丧；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明朱姓诸王，亦仍保留王爵；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剿饷，尽行蠲免；礼俗衣冠暂用明制，汉人薙发与否，听从其便等等。这样的政策对争取中原地区汉族的人心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两年之后清政府开始强制推行一些民族压迫政策，主要有“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五事，[1] 此外，在战争中还多次发生屠城之事。这种政策的实行，在清初的社会大背景下加剧了社会和民族矛盾。各种反清势力的活动也不断持续，如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余部、明朝贵族所建各南明小朝廷等。但是清军最终镇压了各种反清势力，并且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1】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三年十月乙酉。

康熙初年，南方的“三藩”割据江南数省，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三藩”即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在帮助清朝镇压农民军和南明各政权中扩大了实力的“三藩”，各自割据一方，势力日强，成为清中央政府的巨大隐患。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发动叛乱，广西将军孙延龄、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叛乱，迅速地占领了广西和福建。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占据广州，响应叛乱。一时“东西南北，在在鼎沸”，[1] 史称“三藩”之乱。“三藩”之乱延续了八年，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并影响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康熙帝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取得了平叛斗争的胜利。

【1】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一，《平定三逆述略》。

台湾是中国的宝岛，但是它曾经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郑成功驱逐了荷兰殖民统治者，收复了台湾。郑成功病死后，其子郑经割据台湾，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郑经和耿精忠勾结，参加“三藩”叛乱。郑经死后，其诸子内讧，台湾政局混乱。台湾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安全和统一，解决台湾问题势在必行。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康熙帝命福建总督姚启圣同水师提督施琅率军渡海作战，攻占澎湖，郑氏集团惊恐万状，“莫不解体”，[2] 最后，兵败降清。清政府统一台湾后，设置台湾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三县，另设道员一人，兼管厦门地方，隶属于福建省。台湾复归清朝的管辖。收复台湾，保卫了东南海域，阻止了西方殖民者的骚扰，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2】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上。

准噶尔贵族噶尔丹勾结沙皇俄国，发动叛乱。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率军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深入到内蒙的乌朱穆沁，打败了清朝的驻军。随后，乘胜南下，逼近距京师仅有700里的乌兰布通（内蒙克什克腾旗）。为了国家的安全，康熙帝亲自率师出兵塞外，指挥各路大军向乌兰布通进发，打败了噶尔丹的叛军，取得了乌兰布通之役的胜利。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与蒙古各部落首领于多伦会盟，进一步发展了清朝中央政

府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巩固了北部边防。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夏，噶尔丹再次对喀尔喀蒙古发动进攻，又一次点燃了叛乱的战火。康熙帝又率军亲征，在昭莫多打败噶尔丹，昭莫多之战基本上歼灭了叛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噶尔丹的分裂势力，取得了平叛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噶尔丹败逃后，继续策划分裂祖国的叛乱，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率军亲赴宁夏，在清军压境的情况下，"噶尔丹败窜，部众离散，仰药死"。[1]（图1）

康熙晚年，准噶尔首领策旺阿喇布坦趁西藏内部政局的变化，派兵袭击哈密，进兵西藏，杀死拉藏汗，进据拉萨，攻掠布达拉宫，造成西藏局势的混乱。清政府出兵西藏，驱逐了准噶尔叛军。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在西宁府周围的南川、西川和北川点燃叛乱的战火，雍正帝经过熟思详审，认为准噶尔割据政权的存在"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为国家之隐忧"，[2]派兵"捣其不备"，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统一了青海广大的地区。

【1】《西陲总统事略》，卷一，《初定伊犁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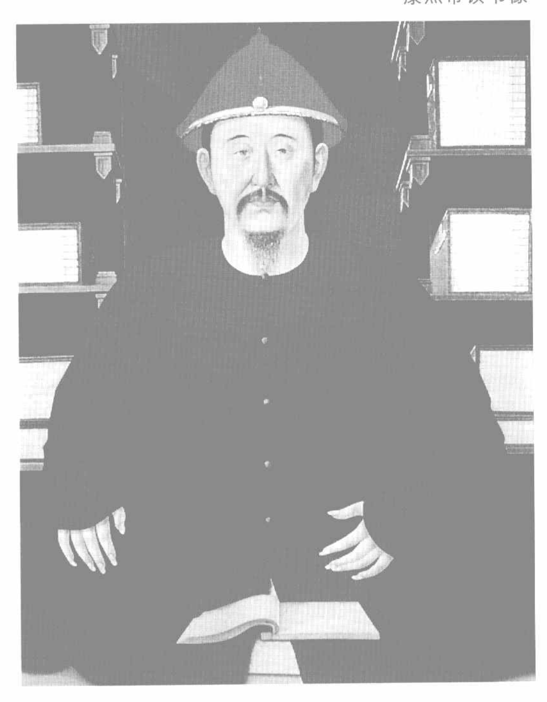
【2】《清世宗实录》，卷七八。

【3】《西域闻见录》，卷五，《西陲纪事本末》。

【4】《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

乾隆帝即位后，两次对西北用兵，准噶尔割据分子"望尘请降"，[3]清政府在彻底平定了准噶尔贵族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后，又平定了南疆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平定叛乱后，清政府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实行军府统治，设伊犁将军镇守新疆。并在当地驻兵、屯田，乾隆帝"派往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兵丁，已至一万数千"。[4]

图1
康熙帝读书像



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通过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和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抗击沙俄入侵等同外部侵略势力和内部分裂割据势力的一系列重大斗争，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国家。乾隆时期，

清朝的疆域西到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北到唐努乌梁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东到东海，东南到台湾诸岛屿，南到南沙群岛，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规模。

（二）巩固中央集权

在进行军事斗争以统一政权的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来巩固中央集权。

首先，完善中央政府的各种政治制度。清初沿袭明代的内阁，仍以内阁作为政府的中枢机构，并承袭明代的票拟制度。在内阁之外，又设议政王大臣会议，皆由满族大臣组成，凡军国机要重务都不经过内阁票拟，而径由议政王大臣会议策划方案，最后由皇帝裁决。康熙时又有南书房，凡一切特颁诏旨，皆由南书房翰林撰拟，内阁之权更分。到雍正年间，清廷又普遍推行奏折制度，凡属密办之事，皆令官员使用奏折直达皇帝，由皇帝亲自批答，发还奏人付诸执行。由此许多题本变成例行公事，已无机要可言，内阁之权力遂大为削弱。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军机处以后，一切军国大政皆由军机处办理，内阁不过徒拥虚名而已。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中央机构又有各部院衙门，分掌各方面事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又有都察院，作为监察机关。有大理寺，作为审理刑狱的机关。理藩院是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机关，也掌管一部分外交事务。凡与俄罗斯交涉事宜，皆归理藩院办理。内务府是掌管皇帝家务的机关，其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由满洲贵族王公大臣担任。内务府的职权很广，凡宫廷的典礼、祭祀、库藏、财用、服御、赏赐、建造、供应、刑律等事，皆统于总管大臣。内务府的设立，为清代首创，是对历代皇帝家务管理制度的改革。

其次是建立完善的地方和边疆统治制度。在地方机构方面，分省、道、府、县四级。另外又有厅、州，或直属布政使司管辖，其地位如府；或属府管辖，其地位如县。清前期在边疆地区也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统治制度。如在内外蒙古地区，均实行札萨克制，即盟旗制度；在青海地区，设办事大臣一人，驻甘肃西宁府（今青海西宁市），专掌青海之军政；在新疆地区，设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今霍城东南），又设参赞大臣为辅，总理天山南北路之军事、政治、边防诸务；雍正五年（1727年），设西藏办事大臣驻拉萨，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等等。

综上所述，清前期的统治者采取各种政策巩固了中央集权，使社会保持了长时期的稳定局面，为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经济状况

清初，经过长期的战乱和厮杀，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广大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到处是荒凉的景象。“荒田连陌千顷，其多者以里数计”。[1] 面对严酷的现实，顺治帝吸取了历史上汉族统治的经验，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实行了“薄赋敛”的政策，顺治三年（1646年）又谕令户部：“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2] 并责成地方抚按，严格查核地方田亩，编纂《赋役全书》。顺治十一年（1654年），下令停收苏、杭等地的赋役。

康熙初年，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康熙帝实行蠲免政策，“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3] 他还招集流亡人口，开垦荒田，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康熙帝亲政后，又施行了重要的农业政策——更名田。他用“圣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这种做法有利于无地或少地的劳动人民。他还奖励农业生产，鼓励人们

【1】《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八。

【2】《清世祖实录》，卷五七。

【3】《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大面积垦荒。为了解决频发的黄河水患问题，任用靳辅治理黄河。这些措施，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恢复、发展的良好效果。自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1]

【1】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书》,《清经世文编》，卷二八。

雍正帝即位后，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使地丁合一。这一举措废除了人头税，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乾隆帝即位后，实行减免赋税、招集流亡、开荒的政策。在其前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治理黄河、淮河水患，兴修水利，推广高产作物，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康熙帝、乾隆帝还实行恢复、发展手工业的政策。康熙帝将“班匠银”摊入地亩征收，手工业工人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证。乾隆时期，废除匠籍。从此，手工业者的人身获得了自由。这一政策有利于发挥手工业者的才智和创造力，促进了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随着手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商业出现繁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大小城镇和农村市场日益增多，农产品商品化。到乾隆时期，北京、汉口、广州、佛山、杭州、江宁、苏州、杭州、镇江、无锡等发展成了繁荣的商城，全国普遍出现了丰裕的景象，社会由凋敝转向了繁荣。这是清前期出版业发展与繁荣的经济基础。

第二节　专制统治与文化政策

清朝入关，虽然用武力镇压了人民的反抗，但是，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依然存在，对清初的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清初的统治者认识到，只有消弭人民的反清情绪，维系民心，才能巩固封建政权。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诸帝深知“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为此，逐步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把争取士人作为施政的基本方针。对士人采取了恩威并施的两手政策，既优容和拉拢，又加以压制和迫害，在思想文化领域实施了一些重大举措。

一、宣扬儒家思想

顺治元年（1644年），御史曹溶就提出优恤死节之士，以鼓励风化。顺治帝采纳其意见。此外，尊崇孔子，宣扬儒家思想，以之为其政治服务。康熙、雍正和乾隆等几朝帝王通过给孔子上尊号，亲自到曲阜致祭等活动，确定儒家思想为治国思想。康熙帝制定、颁布"圣谕十六条"：一、敦孝悌，以重人伦；二、笃宗族，以昭雍睦；三、和乡党，以息争讼；四、重农桑，以足衣食；五、尚节俭，以惜财用；六、隆学校，以端士习；七、黜异端，以崇正学；八、讲法律，以儆愚顽；九、明礼让，以厚风俗；十、务本业，以定民志；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十二、息诬告，以全良善；十三、戒窝逃，以免株连；十四、完钱粮，以省催科；十五、联保甲，以弭盗贼；十六、解仇忿，以重身命。[1] 这十六条充分体现了其利用儒家学说维护统治的思想。雍正帝则在向全国颁发的《圣谕广训》中对"圣谕十六条"加以解释和推阐。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命内府刊刻《大礼记注》，五年（1727年）刊印《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八年（1730年）刊印《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以此宣扬儒家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念，巩固封建秩序，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这些举措对汉族士人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影响，增加了他们对朝廷的好感。

【1】《清世祖实录》，卷三四。

二、大力兴学取士

为了扩大清政权的统治基础，争取汉族士人的归心，顺治帝提出，"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2]。顺治二年（1645年），顺治帝沿袭明朝的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康熙帝亲政后，提出"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储养之源，由于学校"[3]，推动各地的学校建设。康熙十二年（1673年）颁谕举荐山林隐逸之士；康熙十七年（1678年）在原有正科之外，特设博学鸿词科，吸收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汉族士人。同时还增加"经济特科"和"孝廉方正科"等科举科目，并在诏书中说明"崇儒

【2】《清世祖实录》，卷三四。

【3】《清世祖实录》，卷九一。

重道，培养人才……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1]。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录取的名额，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巩固。清初大臣范文程说："治天下在于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2] 科举考试使读书者有出仕之望，吸引了汉族士人，泯灭了他们的反清意识。汉族士人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封建王朝的拥护者，国家统一的维护者。

【1】《圣祖实录》，卷四四。

【2】《圣祖实录》，卷七一。

三、推崇程朱理学

清前期的几代皇帝都熟读经书，特别是程朱理学。康熙帝认为，"发挥圣道者，莫详于有宋诸儒"，[3] 他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亲自撰写《性理精义》，并诏令李光地审校。李光地崇尚朱熹之学，因而得到康熙帝的赏识。康熙帝任用他为翰林学士，编辑《朱子大全》、《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书籍。李光地死后，入祀贤良祠。此外，康熙帝特意把朱熹从孔庙中的圣贤之列提升到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他说："朕以为孔孟之后，有俾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4] 因此，他倡导读经，推崇程朱理学，"以此为化民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5] 康熙重用一批理学名臣，提倡尊孔读经，使士人潜心于程朱理学。这批理学名臣在阐述义理、宣传理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性理大全序》。

【4】《圣祖实录》，卷二四九。

【5】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日讲四书解义序》。

四、重视文化建设

康熙帝曾经说："治天下者，莫亟于正民心，厚风俗"，因此，就要开办学校。"学校者，教化所从出"。[6] 他命傅达礼主持将《大学衍义》、《春秋》、《易经》、《孝经》、《孔子家语》、《劝善要言》等古代典籍翻译为满文，并刊刻、颁发。雍正帝同样重视文化建设，多次诏令各州县修志。雍正七年（1729年）复诏各省修通志，又诏颁各省府州县60年修一次的命令，因此，全国各府、州、县几无不修志。乾隆帝不仅继承其祖、父之志，修志多达100种，而且还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整

【6】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七，《学校论》。

理活动。同时，为了笼络汉族士人，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之意，他还鼓励著述、刻书。他网罗大批汉族士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地搜集、编纂、注释、刊刻和出版古代典籍。

《清史稿·艺文志》载：

> 清起东陲，太宗设文馆，命达海等翻译经史，复改国史、秘书、弘文三院，编纂国史，收藏书籍，文教始兴。世祖入定中原，命冯铨等议修《明史》，复诏求遗书。圣祖继统，诏举博学鸿儒，修经史，纂图书，稽古右文，润色鸿业，海内彬彬向风焉。高宗继试鸿词，博采遗籍，特命辑修《四库全书》……又别辑《永乐大典》三百八十五种，交武英殿以聚珍版印行。……阮元既补《四库》未收书四百五十四种，复刊《经解》一千四百十二卷，王先谦又刊《续经解》一千三百十五卷，而各省督抚，广修方志。郡邑典章，粲然大备……而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奇书秘宝，考古所资，其有裨于学术者尤多，实集古今未有之盛焉。[1]

[1]《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五，志一百二十、艺文一。

五、厉行文化专制

清朝入主中原后，汉族士人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和反抗专制统治的思想并没有泯灭，为此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对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严厉的控制，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主要表现在迭兴文字狱和销毁、禁止出版不利于其专制统治的书籍等方面。

（一）迭兴文字狱

文字狱是专制皇帝以文字作品定罪，在文化、思想方面采取的非人道的极端残暴的措施。

“清初禁网尚疏，有志著作之人，裒集明代史实，并不甚知

有忌讳”。[1] 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因文字触怒统治者而获罪的狱案数量极多，有人统计，仅仅乾隆朝文字狱总数就在一百三十起以上。[2]

[1] 孟森:《书明史钞略》,《明清史论著集刊》,141页，中华书局。

[2] 谢苍霖、万芳珍:《三千年文祸》,457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

首开先例的是康熙二年（1663年）庄廷鑨《明史》案。浙江乌程县富户庄廷鑨羡慕左丘明著述《国语》，用重金买到同乡朱国桢编过的《明史》遗稿，延请了一些学者补编崇祯朝及南明史实，并刊刻出版。书中对清帝先世不加尊号，并以南明王朝为正统。这些内容被人发现后，康熙帝兴起空前的大狱。庄廷鑨已死，被挖坟开棺戮尸，庄氏一门十五岁以上男子全部斩决，为其书作序、刻书、贩书的人，甚至购买、收藏、阅读此书的人也不能幸免,史载：“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3]

[3]《明清史资料》下册,14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庄廷鑨《明史》案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戴名世是安徽桐城名士，精通经史，“尝遍访遗书，网罗故老传闻，欲以成一家之言”。[4] 当他读到方孝标《滇黔纪闻》时，参考他书撰南明人物传记。康熙四十年（1701年），其门人选择其中一部分，与戴氏其他文章合刻为《南山集偶钞》。康熙五十年（171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当时已任翰林院编修的戴名世“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经查，集中记述南明史事，用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九卿会审后，认为“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5] 康熙帝盛怒之下，定狱十分严厉。但是，不久他改变了态度。次年降谕，戴名世从宽免凌迟，即处斩。书版烧毁，其他的人也从轻发落。

[4]《〈戴名世集〉传记资料》;萧穆:《戴忧庵先生事略》。

[5]《明清史资料》下册,14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雍正六年（1728年），又发生了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这一文字狱案缘起于清初士人对满族贵族统治不满，曾静派其学生张熙对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反，岳钟琪向雍正帝密报了这一情况。雍正帝随即下令搜捕曾静、张熙及其家属、亲友、门人等，被捕的涉案人员供出系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因此追查到吕留良。此时，吕留良早已亡故，其子吕葆中也已去世。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下旨将已死的吕留良父子、严鸿建等人开棺鞭尸示

众，妻妾女眷发配为奴，男子六岁以上的全部斩决，财产入官。不久，又命释放曾静、张熙，并下令编辑此案的“上谕”，同时附以曾静口供等，编成《大义觉迷录》出版，颁发全国。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对吕留良门生严鸿逵戮尸枭示，将严氏一门成年男丁全数斩决，严鸿逵门生沈在宽凌迟处死，嫡属按律治罪，吕留良门生黄补斋、车鼎丰等也全部处死，亲属给功臣之家为奴。由此可见吕留良一案所株连的人数之广。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新昌县举人王锡侯没有考中进士，编《字贯》一书，想以此提高声望。其同乡王泷南以《字贯》篡改《康熙字典》为名，向官府举报。江西巡抚海成受理此案后，认为该书按部首编排，序文凡例上书写康熙、雍正的名讳，构成攻击御撰书籍之罪。并以此汇报给乾隆帝。乾隆帝览奏后认为王锡侯“实属大逆不法”。[1] 结果王锡侯被处死刑，其全家受到株连，《字贯》一书的书版被销毁。

“自《字贯》之狱兴，有清一代无敢复言《字书》者，桂、段诸家，以治经不能不识字，则尽力于许书，以避时忌。”[2] 文字狱除了用来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外，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雍正帝就以文字为借口，打击政敌。他说：“大凡匪类之为害世道生民，或托名斯文，或藉口著述”，“所以除贼犹易，除匪甚难”。[3] 在他看来，以著述文字蛊惑民心的“匪类”比“贼”对国家的危害更大。这就为扩大文字狱的打击面埋下了伏笔。清初的文字狱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毁禁书籍

与文字狱相联系，清朝皇帝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之另一重要手段是毁禁书籍。

明清易代，满族贵族统治，有些汉族士人以笔做刀枪，在著述中表露了一些反清的思想，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恐惧和不安。为了加强专制主义统治，严禁违禁书籍出版。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朝均多次重申对刻印“淫词小说戏曲”的禁令。据俞

【1】《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四三。

【2】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581页，中华书局。

【3】《雍正朱批谕旨》，第九册，5587页。

正燮《癸巳存稿》载：

> 其小说之禁，顺治九年（1652年）题准，琐语淫词，通行严禁。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议准，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地方官严禁。五十三年（1714年）年四月，九卿议定，坊肆小说淫词，严查禁绝，板与书尽销毁，违者治罪，印者流，卖者徙。乾隆元年（1736年）覆准，淫辞秽说，叠架盈箱，列肆租赁，限文到三日销毁；官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降二级调用。嘉庆七年（1802年），禁坊肆不经小说，此后不准再行编造。……十八年（1813年）十月，又禁止淫词小说。[1]

[1]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演义小说》。

乾隆五年（1740年）重修律例，最后，编成了一部较完整的《大清律例》出版发行。《大清律例》内也有禁止坊肆印卖淫词小说的条款：

> 民坊肆市卖一切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不准借端出首讹诈。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颁布谕旨，下达禁书之令，并追究地方查禁不严之责："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

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1] 这一道禁书令，通行全国，销毁了大量珍贵的书籍。与此明令禁止相呼应，乾隆帝还利用编纂《四库全书》在民间征收书籍的机会，销毁书籍3 100多种，151 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禁毁之举对中国古代的书籍造成了极大的破坏。[2]

[1]《高宗实录》，卷九六四。

[2]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三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综上所述，清初统治者实行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大力宣扬儒家思想，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考试科目和录取名额，推崇程朱理学，缓和了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与清政府的对立情绪和民族矛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对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部分汉族士人转变政治立场，开始为清朝效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授予翰林院官员，负责、参与了清政府的文化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统治者振兴文教事业、奖励著述、组织编纂、整理图书的文化建设举措，发挥了知识分子的群体智慧，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保存了大量中国的文化典籍。

另一方面，清统治者迭兴文字狱，销毁大量书籍，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对进行反清复明斗争的文人进行残酷的压制和迫害，限制了学术自由，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扼杀了进步思想，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大破坏。很多学者为此三缄其口。私人出版不敢触及时讳，有的避害趋利，将出版的一些书籍深藏家中，不敢拿出来示人，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出版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第三节　出版业全面发展

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历代统治者对文化、出版事业都非常重视，清朝也不例外。尽管清初的统治者迭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打击，但是他们又利用科举、编撰、刻书来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因此，清前期出版事业比明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出版书籍的数量、规模和质量上都明显地超过了前代，是

中国书籍出版的盛世。

一、完整的刻书体系

清前期的出版机构继承并弘扬了两宋以来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虽然这三大系统出版机构的性质迥然有别、出版宗旨各异，但共同营造了清前期的出版格局，为清前期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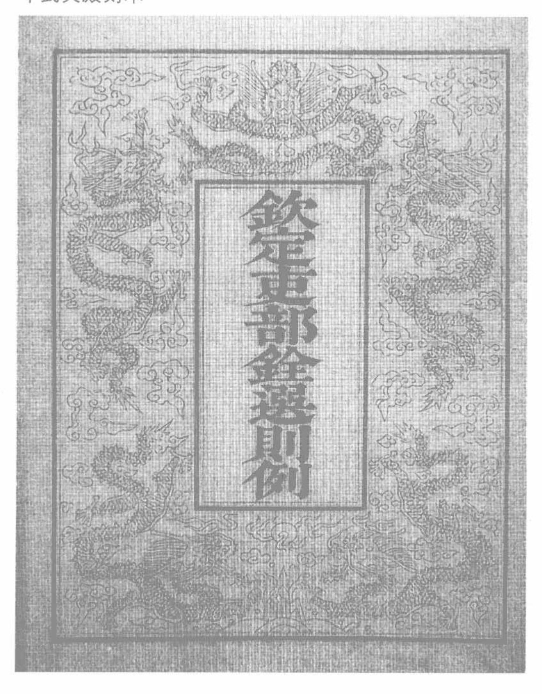
官刻主要集中在内府即武英殿。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武英殿刻书达到极盛。根据统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内府刻的钦定诸书有：经部类27种、953卷；史部类79种、5 738卷；子部类32种、12 479卷；集部类19种、3 410卷，共计157种、22 580卷。[1] 又据陶湘《殿本书目》统计，清代殿本共520种，其中刻书最多的是乾隆朝，计308种，种数几占清代殿本种数的60%，其次为雍正、康熙二朝，分别为72、56种，均超过10%，三朝合计436种，占总数的83.7%，其盛况显而易见。[2] “殿本书的共同特点是刻工精细，纸墨精良，不少品种采用上等开化纸，部分书版多色套印，美轮美奂，享有盛誉。”[3] 但是，从嘉庆年间开始，武英殿刻书每况愈下，其刊刻的殿本在校勘质量、刊刻数量等方面都不及前朝了。（图2）

【1】冯天瑜：《中华文化史》，855页。

【2】转引自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33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3】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1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图2
《钦定吏部铨选则例》，雍正年武英殿刻本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谕江南织造曹寅在扬州天宁寺设立扬州书局，主持扬州书局的校勘古籍等事，承刻了《全唐诗》、《御定历代赋汇》、《御定全唐诗录》、《佩文斋书画谱》等多种书籍，扬州书局刻书，字体隽秀，印制精良。

地方官刻有府、州、县学、儒学、书院刻书，地方官府刻书主要是刻印地方志和殿本书籍，也刻少量其他书籍，其刻书曾经出现质量不佳的状况。为了改变地方

刻书出现的问题，雍正、乾隆曾谕各省布政司主持刻书，明令士子可以从事出版业，但是，最初收效甚微。

各省书院刻书。清初，福建巡抚张伯行（1652—1725）创建鳌峰书院，在福州一带聘师招生，他在书院内设正谊堂编刻教材。由他主持出版的《正谊堂全书》是一部集宋、清学术之大成的丛书，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刊竣，共收书55种。所收文章起自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下至清儒汤斌、陆陇其等人的著作，反映了自宋至清理学发展的成就。在编辑过程中，张伯行延揽一批学者参加整理校订工作，务求精审。该书刊行后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张伯行的倡导下，地方各省书院刻书出现空前盛况。此外，在修志热潮中，省、府、州、县都刻过地方志。

私人刻书。根据孙奇逢《日谱》所载，康熙初年，私人刻书禁令极严。后来何时解禁未详。“三百年来，刻书之多，超乎前代。考证校雠之学至乾嘉而极盛，校刻之书，多精审可靠”。[1] 私人刻书解禁后，刻书盛极一时，他们刻的书大都是自写的书稿或先贤的诗歌、散文。其中一部分家刻，质量上乘。

坊刻。是手工业作坊以赢利为目的的出版形式。清前期“称得上名坊，公认为善本的书坊及其所刻书自是寥寥无几”。[2] 书坊刻书，是一种通过交易获取赢利的经营行为，所以首先要树立品牌，考虑所刻书能否适应市场，吸引读者；其次是千方百计设法降低成本。这样书坊在面临市场竞争压力的同时，自身内部所积聚的的创新动力也被激发出来。[3]

清前期的书坊以北京为中心。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4] 还有老二酉堂。北京的五柳居、三槐堂刻书上百种。除北京外，其他的主要分布在南京、苏州、扬州、上海和广州一带。这些书坊有的经营数百年，出版了许多精品书籍。特别是席氏扫叶山房，该书坊的刻工们校勘精审，名不虚传。刻印的书籍数量极大。其印刷的经、史、子、集、笔记小说等书籍质量上乘。席氏扫叶山房发展得很快，其印刷、出版的书籍行销全国各地。据

【1】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黄镇伟：《坊刻本》，5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4】孙殿起：《琉璃厂小志》，3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933年《扫叶山房书目》统计，席氏扫叶山房出书达2 000种，出书数量之多，销路之广，首屈一指。

到了乾隆年间，浙江、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坊刻发达。清初，四川刻书毁于战火。江西书商从浙江、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区贩运图书到成都批发、零售，在民间销售量极大，盛况空前。坊刻的戏曲、小说、医学、佛经、农书等多数质量精良，但也有的质量粗劣，粗制滥造。

刻书机构中还有宗教寺院，雍正十三年（1735年）刊刻佛经汉文《大藏经》，总共724函。包括《续藏》，7 168卷。乾隆三年刻成。有的刻印单本佛经，有的刻印大部头佛藏。外来的传教士在北京、山西、杭州等地也设有刻书机构。

整个清前期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主流，各具特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刻书体系。

二、丰富的出版内容

在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清前期有很多的突破。杨家骆统计“明代著作共有14 024部、218 029卷，清代著作126 649部、170万卷”。[1] 这些数字说明了清代著述远远超过明代。

经部书籍，出版了很多校勘、注释、阐明经义的书籍。康熙时编的《日讲四书解义》和《性理精义》、《朱子全书》、《通志堂经解》反映了清前期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史部的书籍除了编撰《明史》之外，还刊刻了《续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以及其他各种体裁的书籍。清帝谕令编撰《大清一统志》，还多次颁发谕令，编纂地方志，各级地方政府都遵旨承办。修志规模、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前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理论日益成熟，在方志编纂理论的指导下，出现了编撰方志的全盛时期。全国性的一统志，以及地方性的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等层出不穷，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传世的清代总志和地方府州县等志有4 889种，加上其他志书，有清一代所修的志书当在5 000种以上，约占历代全国方志总数的70%~80%。除官修志书

【1】杨家骆：《中国古今著作名数之统计》，《新中华》复刊，第4卷第7期，1946年。

外，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还私修乡镇村里等志。据统计，仅江苏一省就有120多种。清前期还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分列门类、纲目，把各类古籍按类摘录，汇编而成。在子部书籍中，科技图书的编撰也很丰富。在医学方面，乾隆时编撰了《医学精粹》、《医林改错》；天文方面有《高厚蒙求》；数学方面，雍正时编撰有《梅氏丛书》、嘉庆时编撰有《数学五种》、《翠微山房数学》，精微深奥，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学者们还翻译、编撰了《历象考成》、《历象考成后编》、《数理精蕴》等多种国外的科学著作。集部中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长生殿》、《桃花扇》等著名的小说和戏剧。

图书的品类和体式都有新发展。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改变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按照经学、小说、诸子、天文、地理、史学、金石书画等十二大类划分。十二大类下再划分细目，在分类法上前进了一大步。《四库全书总目》也改变四部分类法，对细目类增加了新细目，如在史部增加史评类。改动部类的安排，合并细类。该总目四部，四十四类，各类明晰，细密的目录，表明图书品种繁多，形式丰富，这种变化从类书、丛书选本上就能明显地看出。清前期出版类书有一百四十多部，各种类型的丛书丰富多彩，实为前代所不及。

三、多样的刻书工艺

清前期刻书字体和明末相比没有变化。字形变长，细粗对比明显，还有明末硬体的风格。从康熙朝开始，出现两种刻书字体并存的情况：一种是软体，或称为写体，另一种是硬体，即仿宋体。这种仿宋体与明代的宋体相比发生了变化。从道光朝开始，字体缺乏生气，显得僵化、死板。

（一）就刻书的版式和字体，李致忠先生做了生动的描述："从版式上讲，没有什么显著特征。仍沿前明旧的格调。特别是有些官刻的书，顺治时《资政要览》、《内则衍义》，是大字宽栏，行格疏滞，字体瘦长，行狭字细，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白口，

双鱼尾，后来武英殿所刻之书，一般开本较大，版式铺陈，印纸莹洁，装潢也很考究。许多坊刻、家刻也不少旧店新张，流风宛在。”[1] 至于清代刻书的字体，清初尚沿前明旧习，至康熙时便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所谓馆阁体，具有舒展圆秀、笔势精神的灵气，嘉庆朝，又变成为团头团脑、呆滞乏神的样子。[2]

（二）就刻书的装帧而言，“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3] 线装书籍装订时，从折叠、打孔、截纸到缝线都有具体的规定。要求程序严格，讲究装订的考究、严密。

（三）就刻书的纸张而言，清前期印刷书籍的纸张种类很多。主要有开化纸、榜纸、棉纸、竹纸、毛边纸及竹连纸。武英殿刻书主要用上乘的开化纸、榜纸，开化纸用桑皮做原料精制加工而成。嘉庆、道光朝，使用开化榜纸。一般书坊主要用竹纸和毛边纸印刷书籍。

遍览清前期出版的书籍，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其字体、版式、装帧等无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印刷工艺方面，也有新的突破。

清前期武英殿刻书的印刷形式多种多样，采用铜活字、木活字、彩色套印等各种方法。雕版印刷从单一字版发展为图文共版。插图由单色发展为套色。在刊刻工艺上十分讲究，精写上版，工整娟秀，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康、乾“殿本”极其精致，刻工技艺高超，用上乘宣纸，彩色套印。多种制作方式的结合，反映了图书制作整体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图书制作形式的时代特色。

清前期，印刷工艺方面已经广泛使用木活字、铜活字和泥活字印刷，因此提高了印刷效率。

四、广泛的图书流通

清前期图书流通方式呈现多元性，这是由当时流通领域的形势所决定的。“到清代，封建社会的图书流通已达到发展的顶点，

【1】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119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2】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119－121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孙庆增：《藏书纪要·装订》。

进入了饱和状态。”[1] 官刻、坊刻和家刻各有不同的流通渠道：殿版书主要用于皇帝赏赐臣子，以示恩宠，或者由皇帝直接下令，将图书派人下发。官刻本的流通主要通过各级官署和官办学校来实现。家刻、坊刻者主要通过市场流通，书商们将所刻印的书籍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坐贾、行商贩卖图书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

清前期的图书市场增加，书市竞争日趋激烈，图书贸易范围扩大。从事长途贩运的行商，车运船装，沿着便捷的陆路或水路，把书籍运销到全国各地。北京的琉璃厂书肆林立，大小书肆近百家，是文人出入最频繁的地方。书籍的地区差价引发了大批量的图书流动，不少书商由苏州、杭州向北京贩运书籍，以获厚利，“是时，浙江书贾，奔辏辇下”。[2] 尤其科考之年，更是销售的旺季。还有些商人将书运到周边国家和地区销售；那一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有了版权意识，在销售的书籍上印着统一的标志，防范盗版。

[1] 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3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五、阶段性的发展脉络

根据清前期出版业的发展规律，这一时期的出版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出不同的出版特点。

（一）清初的出版情况

入关之前，清政府便注意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组织人员翻译刊刻了《四书》、《三国演义》。入关之初，清统治者就把明代的经厂刻书处继承下来，并派专人主持刻书。因此，这个时期清代的官府刻书仍然保留了前明的风格，皆白纸、黑口，长方字体、横细竖粗。由于这个时期的当务之急是镇压各地的反清武装斗争，清朝政府不能以更多的财力投入出版事业，因此，这个时期的内府刻书数量很少，而且内容多数是教化人民的《劝善恒言》和讲究统治策略的《资政要览》之类的典籍。

清初，由于社会动乱，除常熟毛氏汲古阁所刻诸书之外，较著名的有纳兰容若的《通志堂经解》、吴之振的《辑宋诗钞》、黄

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等书。著名学者吕留良、徐乾学也刻印了一些质量较好的书。但总的看来，私家刻书人数少，刻书数量也不多。

（二）康熙时期的出版情况

康熙十二年（1673年），朝廷为了适应官府刻书事业的发展，设置了武英殿修书处。刻书数量比顺治时期成倍增长。据陶湘《殿版书目》所载资料统计，顺治一朝，内府刻书仅16种、97卷，康熙时增到56种，5 596卷。在刻书风格上也一扫明末校勘不精、混浊板滞的刻书陋习，而非常讲究刻书质量，无论用纸、字体皆精，世称“康版”。这种精写精刻的风气，不仅树立了清代武英殿刻书中写、校、刻、印皆佳的风范，对后世的刻书事业也有很大影响。

在内府刻书的影响和带动下，地方官府的刻书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各地州、府、县学和书院的刻书机构普遍恢复，有的地区刻书机构规模相当庞大，甚至还承担部分为内府刻板的任务。

（三）雍、乾时期的出版情况

雍、乾时期，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因而官刻图书事业达到全盛时期。就数量而言，雍、乾两朝共刻书380种、26 982卷，分别占清代刻印种数和卷数的73%和51%。就刻印技术而言，也较之康熙时期有新的提高。用铜活字和木活字分别印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其中的代表。刊印工艺的进步表明这一时期的官刻图书进入了全盛时期。《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行后，金简将印书的全过程及积累的经验写成《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分别条款并附插图、详细说明。此后，各地的官私刻书者竞相仿效，对当时和以后的出版事业影响很大。

这一时期的坊刻也得到长足发展。江南地区的南京和苏、扬二州的坊刻事业继续发展，全国各地也出现了大量的刊刻和销售图书的坊肆。坊刻进一步扩大和各书坊间不同程度的分工，不但标志着坊刻图书的兴盛，而且对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乾隆中叶以后，私人出版业也急剧发展，涌现出大量

的刻书名家，如阮元、张海鹏、鲍廷博等等。

（四）嘉、道时期的出版情况

嘉、道时期，清政府在政治、经济上开始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作为官刻图书机构，武英殿刻书大量减少。据陶湘《殿版书目》记载，嘉庆一朝刊刻殿本书籍29种，道光一朝刊刻殿本书籍12种，两朝总合不及乾隆朝的七分之一。在刊刻质量上，如《八旗通志》等，无论字体、纸墨、校勘等，都显然不及前朝。钦定之书尚且如此，其他书籍更可想而知。总之，此时的出版业已经不及康乾盛世。

第二章　清前期中央官署的图书编纂

清朝入关之前，满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相对落后，但在历史赐予的机遇中，其贵族集团成了中国最高统治者，因而在初期不可避免地遭到汉族和其他民族在武力上和思想上的强烈反抗。清统治者一方面用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努力学习和仿从汉文化，采取一系列迎合知识分子的“文治”政策予以钳制和疏导，诸如开科取士，高扬“稽古右文”的旗号，宣扬文治，提倡程朱理学，大兴出版事业，组织大批知识分子为朝廷编书，等等，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清朝统治和文化发展的氛围。

第一节　中央官署编修机构

入关之前，文事初兴，清政府尚无专门的修书机构，相关事务由政务机构附带办理。如开设有书房，内设秀才数名，既助其读书，又兼掌文墨之事，包括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等汉文书籍。[1] 太宗皇太极时期，设有文馆，馆中人员分掌翻译汉字书籍和记注本朝政事。[2] 后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其中内国史院职掌编纂《实录》等修史事务。[3] 崇德年间，纂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敕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等书籍。[4]

顺治初年，纂修《实录》、《圣训》、《明史》等，专设史馆，

【1】《清史列传》，卷四。

【2】《清史稿》，卷三。

【3】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一，内阁一。

【4】《东华录》，康熙四十五年。

仍隶属于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年），内三院改为内阁，编纂书籍仍是其重要职责。其时复成为独立机构的翰林院的官员也以编纂校勘为职业，凡遇敕撰书史，例得参与。此后几年中，又成立了几个相关机构：一为内翻书房，或称翻书房、内书房、书房，其主要职责是翻译经史著作和《起居注》；二为南书房，又称南斋，编纂书籍亦是职责之一；三为尚书房，又称阿哥书房、皇子书堂、上斋等，道光时改为尚书房，本为皇子皇孙读书之所，但其教读人员如总师傅、师傅等，也编书或参与编书。[1]

【1】沈原：《清代宫廷修书机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论文集》。

一、各类书馆的设立

从清代内阁、军机处、国史馆、宗人府等机构的有关档案中，可知自康熙朝以后，随着修书活动的开展，各种专门书馆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开办。它们或为常设，或为临时设置。临时设置的修书各馆，又分为例开、特开等类，以清前期至中期居多。先后开设过的书馆，可分为如下三大类：

常设书馆　指常开不闭、持续不断进行纂修活动的书馆。如国史馆和起居注馆。两馆所修史书都有持续性，这决定了它们后来成为常设性修史机构。

清统治者继承了“隔代修史”的悠久传统，专门设立了国史馆。初为临时机构，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为纂修天命、天聪（崇德）、顺治三朝历史，正式设立“三朝国史馆”，[2] 持续了20多年。雍正初年，又开馆纂修有功任事诸臣列传，[3] 并持续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修天命至雍正五朝本纪和排纂表、志、列传，成书后闭馆。[4] 乾隆三十年（1765年）六月，为重修国史列传，国史馆复开，[5] 遂成为常设机构。国史馆的地点初设于熙和门西南，后移至东华门内稍北，[6] 馆舍南向，旁边列有书库，即恭修实录及会典处。[7] 国史馆的内部机构，道光以前，设有翻译股、纂修股、满纂修房、汉纂修房、书库等；光绪、宣统年间，设有承发房、长编处、奏议处、文移处（分满、汉、蒙古）、蒙古表传处、十四志处、四传处、回一传处、大臣传处、满堂、

【2】《东华录》，康熙四十五年。

【3】《世宗实录》，卷十三，雍正元年十一月戊子。

【4】《高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五，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壬申。

【5】《高宗实录》，卷七百六十九，乾隆三十年六月丁卯。

【6】［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十三，17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7】《清宫述闻》，卷三。

蒙古堂、书库等。清代的国史馆，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式设立，到宣统三年（1911年）被北洋政府接管，200多年间，国史馆先后纂修各朝纪、志、传、表及《大清一统志》、《皇清奏议》等史籍40余种。[1]

清代起居注的纂修是中国一千多年封建社会起居注纂修活动的延续和总结。清在入关前就已经开始设官记注清太宗皇太极的起居和本朝政事。清入关后，顺治十一年（1655年）便有官员奏请设立起居注官："今宜仿古制，特设记注官置诸左右。"[2] 但是清代正式设立起居注官自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3]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一度裁撤，[4] 雍正元年（1723年）复设，[5] 直至清末。起居注馆的地点在太和门西庑，[6] 设满洲记注官四人，都以日讲官兼摄。又有满、汉主事共三员，汉军主事一员，满文、汉文、汉军笔帖式各四员。[7] 凡皇帝临朝及举行各种典礼，起居注官均须随侍皇帝左右，回馆后即将所见所闻记录于册，以备编纂时查考。此外，起居注馆还要随时收录各衙门的档册及有关公文的副本。自设立起居注馆至宣统朝，起居注的纂修尽管在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曾一度中断，但基本上历朝相因，形成了大量的起居注册，保存也较完整。与历代起居注和清代其他史籍如实录、圣训、方略等的纂修相比，清代起居注的纂修独具特色。第一，纂修起居注的时间距事件发生的时间最为接近，基本上可以说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第二，起居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起居注官侍值时的所见所闻和当时各衙门的有关档册。与实录等史籍相比，其材料来源更为直接。第三，起居注尽管记言记事往往流于琐碎，且有时文字不够通畅，但它不仅保留了许多口语，文字也很少修饰，记注内容与事实最为接近，且成书后封存铁柜，不再轻易更动，因此比实录等史籍更为原始可靠。再加之其中有一些其他史籍不载或载之不详的内容，更增加了它补充史书记载所缺、考证史事讹误的重要价值。

此外，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康熙年间开设的方略馆，原为例开，后成为常设书馆。《方略》的编纂始于康熙，而方略馆的设

[1] 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史学集刊》2002年4期。

[2]《世祖实录》，卷八九，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圣祖实录》，卷三十六，康熙十年八月十六日。

[4]《康熙起居注》五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壬子。

[5]《世宗实录》，卷六，雍正元年四月乙丑。

[6]［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十一，14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7]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五十五《起居注》。

置则始于乾隆间。最早建议编纂《方略》的是福建道御史戴王缙。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时值平定三藩之乱不久，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到："比年以来，凡系用兵诏命密旨，征剿机宜，并应编辑成书，以垂不朽。"[1] 在此建议之下，康熙帝敕撰《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为清代第一部官修《方略》。自此，康熙、雍正两朝，一直有人在编《方略》，但并没有固定的编纂制度，往往是书成馆撤人散。直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军机大臣、大学士来保等人奉敕编纂《平定金川方略》，诏准于隆宗门外、武英殿后、咸安宫左设方略馆。至此，方略馆遂成常设修史机构，延至清末，前后实际存在了162年。自康熙迄于光绪，清代官修《方略》凡25部，计有康熙朝5部，乾隆朝11部，嘉庆朝3部，道光朝1部，同治朝2部，光绪朝3部。[2] 清代《方略》不仅史料价值很高，而且内容丰富，且又偏重现实政治，为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较为系统的专题史料。

【1】《圣祖实录》，卷一〇四，中华书局，1986年。

【2】姚继荣：《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

例开书馆 指每到一定时期即开办的书馆，如实录馆、圣训馆等。"实录"是古代编年体文献之一，最早产生于南朝萧梁时期。自唐代开始，前朝皇帝去世，后嗣之君即诏令史官为先君撰修《实录》。此后，历代皆视《实录》为必备之作。明、清两代专设有实录馆，清代不仅由大臣主持纂修，还要由皇帝御审"钦定"。《清实录》包括《满洲实录》和太祖至德宗11朝《实录》，主要依据上谕、朱批奏折、起居注及其他原始档案纂成，内容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对外关系以及天象变异等各个方面，详尽记载了清代近300年的用人行政和朝章国政，成为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资料。《圣训》则是帝王的训谕、诏令，例行的作法是将皇帝的诏谕，依其内容分目、摘录，纂辑成书，相当于语录。清代《圣训》，自太祖高皇帝至穆宗毅皇帝，计10种，多由新帝为故帝敕辑。清帝修史，以《实录》为经，以《圣训》为纬，于编年见因时之宜，于分类见随时之要。前者以彰帝王功德之源，后者以昭贻谋之大。清统治者认为，它们都是"致治之权舆，万年之鸿宝"，[3] 具有深远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因

【3】《清世祖实录·御制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此，有清一代，除末帝溥仪外，都修纂了《实录》和《圣训》。《圣训》于修成后刊刻颁发，用以教训臣民，是今天研究清史的珍贵资料。

除实录馆、圣训馆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例开之馆。如玉牒馆，专修帝王谱系、历数之书，由宗人府纂修，自顺治十三年(1656年)首次开馆修《玉牒》，到清朝灭亡，持续不断，先后修《玉牒》27次。通常每届10年开馆1次，续修《玉牒》。每次开馆，任命正副总裁，设总校、提调、纂修、收掌、誊录、续修，牒成闭馆，以维持满族和爱新觉罗家族崇高的政治地位。以帝系为统、长幼为序，分别宗室、觉罗各支派男女。有直格、横格大档与直格、横格小档之分。直格档竖排记载，内容详细，记有宗支、房次、封职、姓名、生卒年月日时以及母妻姓氏、公主所适人之姓氏等；横隔档横排记载，内容简单，只记宗支、房次、辈序等。又如律例馆、则例馆，定期开馆以修各部院的律例、则例。每3至5年开馆为小修，每10年开馆称大修。律例馆、则例馆，每朝皆定期开办，书成闭馆。这些史馆的设立，编修了大量的档案史籍，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特开书馆 指专为纂修某一书、史而开设的书馆，书成即撤，不再重开。从顺治至乾隆朝的一百多年间，先后开设过特开书馆数十个，如明史馆、三通馆、续三通馆、三礼馆、经史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馆、明纪纲目馆、同文志馆、通鉴纲目馆、通鉴辑览馆、八旗上谕馆、孝经馆、春秋馆、律吕正义馆、图书集成馆、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荟要处、藏经馆（经咒馆）、清字经馆、朱批谕旨馆、医宗金鉴馆、全唐文馆、文颖馆等等。还有一种介于特开与例开之间的书馆，如曾开设过五次的会典馆等。从清廷书馆数量之多，已足证敕修活动之兴盛。如三通馆，系乾隆年间因编撰《皇朝通典》、《皇朝通志》和《皇朝文献通考》而开设的。（图3、图4）

通典卷第三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三
鄉黨 土斷 版籍並附 ○上古 周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昔黄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鬬訟之心弭既牧之於

乾隆十二年校刊　食貨三

文獻通考卷第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田賦考一
歷代田賦之制
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白壤 無塊曰壤 厥田惟中中 田第五 厥賦上上錯 賦第一錯謂雜出第二之賦 兖州厥土黑墳 色黑而墳起 厥田惟中下 第六 厥賦貞 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州相當 作十有三載乃同 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 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 第三 厥賦中上 第四 徐州厥土赤埴墳 土黏曰埴 厥田惟上中 第二 厥賦中中 第五 揚州厥土惟塗泥 地泉濕

乾隆十二年校刊　田賦一

图3（左）
《通典》，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

图4（右）
《文献通考》，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

二、书馆的人员组成和管理

每个书馆，皆配备一定数量的、级别不同的编纂官员，分别负责编纂及事务性工作。其官职和职责主要有以下数种：

（一）总裁、副总裁。一般各设二人至多人不等，由皇帝特简。多由皇室郡王、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兼任，或派充。其官衔、品级很高，往往是皇帝最信任的朝廷重臣。他们代表书馆向皇帝请旨、上表进书、题请议叙修书人员等等，并对书馆传达修书任务、期限，批审有关规章或转递文件等，起着沟通上下的作用。

（二）提调。主管修书的具体事务。如馆中人员的调配、纂修功课的敦促、与其他机关的文书往来等人事、业务、经费等一应杂事。

（三）总纂、纂修。负责撰写书籍，多由纂修写成，再交由

总纂删定、改正。但各书馆额定不一，总纂人数较少，纂修人数较多。

（四）协修。由官阶较低、具备撰修才能的人担任。一般无定额，视需要增减。可向内阁、翰林院等衙门咨取，或以招考方式录取。

（五）收掌。负责书籍、文献的保管和收发。

（六）校对、翻译、誊录。校对负责书稿文字的校勘、校订，翻译负责满、汉文字的对译，誊录负责抄录所修书籍和有关资料。

（七）供事。经办各种具体繁杂事务，如登记考勤、记录功课、登载各种文档等。

每一职位，分别设满、汉官员，以便分掌满、汉文本。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各级官员时有随时调任的情况，校对、收掌、誊录、供事等人员亦处于经常流动的状态。由于各书的规模大小不一，故各书馆人员数量都不相同。少则十几、几十，多则数百。四库馆堪称最大规模的书馆，在编任职人数多达360余人，仅正总裁就有16名。如果将同时开办的各书馆的官员加在一起，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它说明清廷在书籍纂修方面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由于清廷纂修项目繁多，一个得力的、有才干的官员，会连续兼任多种书籍的编纂。如乾嘉时“通达政体、遇事有为”的满洲官员英和，先后主持纂修或参与编修书籍20余种：有《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四库全书》、《高宗实录》、《钦定春秋左传读本》等等。（图5）自嘉庆元年26岁开始，至道光三年53岁时止，以其盛年为朝廷修书效力甚多。编纂官员都是“经术湛深、长于编纂者”，[1] 或由“学

【1】[清]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刻本《大清会典则例》卷前，来保等奏疏。

图5
《钦定春秋左传读本》，道光二年武英殿刻本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一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傳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魯周公國今曲阜。惠公孝公子。宋今商邱子宋姓。孟長也。聲諡也。諸侯娶元妃其媵姪娣八人。元妃卒。則長姪娣繼室。仲子手文曰爲魯夫人。魯古作衣。文似之。隱公立桓爲惠公太子而已攝位以奉之。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是謂先經以始事也。
道光二年 隱公 一

问淹贯、熟习掌故，而且识见通敏、行走勤慎之员”[1]经办。如各部则例一般由本衙从进士、举、贡内拣选供事、笔帖式若干名承办，[2]也是“谙练”[3]或“贤能司员”，[4]以保证纂修质量。

众多的书馆和纂修项目，都依赖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来作保证。这一机制是在纂修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按期开馆。如各部则例已届限满时，往往由各该部奏请“恳恩俯准开馆”，[5]以便纂辑刊刻，颁行遵守。

（二）严加考勤。书馆规定纂办人员按时到馆。如乾隆年间规定：“在馆办事宜有成规也。按开馆修书，搜罗经籍，召集儒臣，俾会聚有地，商榷有时，蒐讨有籍。所以心志齐，体裁一，而成功易也。若各分卷帙于私家，纂辑到馆之日不过聚谈数刻而散，则功分于应酬，事延于间阔限宽，相习因循，时迫必草率成就，舛讹疏漏有由来也。”[6]如嘉庆年间续修会典时“敕令总裁官遵照乾隆十二年原议，督率纂修官每日进馆，辰入申出，既集益于观摩，兼易稽其勤惰。固不得急遽凌躐，致启草率之端，更不可间断因循，徒蹈虚縻之弊”。[7]

（三）勤于考课。赶办之法还在于“勤考课”，“考课密则勤惰易稽，功效日见”。具体作法是以十日为一卯，“将纂修各员修得若干条若干卷，令提调、总纂登簿注明，一月具报各总裁一次，（各总裁积至）三月奏报一次，俾各纂修知有稽核，自不敢间断因循以致旷功”。[8]同时，规定“满洲誊录每人每日缮写八百五十字，汉誊录缮写一千五百字，校对各官每人每日校对二十五篇。纂修等官功课，由各该馆总裁酌定”。[9]

（四）自备资斧，勒限完成。每项纂修任务几乎都是“上紧赶办，勒限完竣”。[10]如各书卷帙、增补内容多寡不同，纂修时间各有不同。乾隆三十三年以前所修《大清律例》“俱系定限十个月”，[11]有的“勒限半年”完成，[12]多数则例是“勒限一年完竣，俾得及时颁发，一体遵循”，“应需纸张、饭食等项照旧令。该供事等自行备办，仍不支给公费。如果依限完竣，始终勤奋，

【1】[清]光绪十年《钦定工部则例》卷前，光绪八年二月十四日工部奏疏。

【2】[清]内府修各部则例卷前，奏疏。

【3】[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本《钦定吏部则例》卷前，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永贵等奏疏。

【4】[清]乾隆七年武英殿刻本《钦定吏部则例》卷前，乾隆四年二月初五日张廷玉等奏疏。

【5】[清]嘉庆十二年吏部刻本《钦定吏部则例》卷前，嘉庆十年六月初三日吏部奏疏。

【6】[清]乾隆二十九武英殿刻本《大清会典·凡例》。

【7】[清]嘉庆二十三年武英殿刻本《大清会典事例》，嘉庆六年十月初三日王杰等奏疏。

【8】[清]顺治四年内府刻本《大清律集解附例》。

【9】[清]光绪二十五年铅印本《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五，《内阁·稽察上谕事件》。

【10】[清]道光二十二年武英殿刻本《钦定回疆则例》卷前，理藩院奏疏。

【11】[清]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本《大清律例》卷前，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刘统勋奏疏。

【12】[清]嘉庆十二年吏部刻本《钦定吏部则例》卷前，嘉庆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庆桂等奏疏。

俟清、汉全书进呈后，可否量与议叙”。[1] 遇到应行改纂各条款，头绪繁多，应补之例未备，近年变通试办事宜还需博考折中等复杂情况，往往需要奏请展限，延至二年或三年才能完成。而如果逾期未竣，有时则要给予处分。像《大清会典》因事涉中央各部门，修纂年限较长：康熙本用了6年，雍正本用了9年，乾隆本前后用了19年。[2] “倘不勒限赶办，势必旷日持久，难于蒇事。《会典》为朝野遵守之书，更非若他书纂辑，尚可宽以为期”。[3]

【1】[清]乾隆六年武英殿刻三十三年增修本《钦定大清律例》卷前，凡例。

【2】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300–305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3】[清]乾隆四十五年礼部刻本《钦定科场条例》卷前，德保奏疏。

（五）奖惩并行。编纂官员既为兼任之职，其纂修书籍的业绩便成为其政绩的组成部分。每次纂修事竣之后，如果纂办官员勤勉无误，始终不懈，则请予议叙，以示鼓励。奖赏一般是赏赐实物或提升职务，如道光二年（1822年），英和奉敕编辑《养正书屋全集定本》，恭进样本时，获赏缂丝蟒袍一袭、宝蓝洋呢一版，次年刻成后，又获赏缂丝蟒袍一袭，大卷绸缎各一连。惩罚的方式有记过、罚俸、降职、革职等。如乾隆二十一年《大清会典》初稿完成，大学士等奏请将纂修各官分别交部议叙，乾隆帝则认为，“纂修会典已逾数载，复经展限两次，迟缓已甚，且每次所进书内屡有序次舛错、行文纰缪之处，必经朕逐条指示，亲加改正，始克成书。总裁官自无可议叙。即纂修各员给予议叙之处，亦属有忝。其提调、收掌、翻译、誊录、供事等照常办事，非职任分修者可比，著交照例议叙”。[4] 《续通志》一书，逾期未能办竣，亦未上奏展限，“著将该纂修交部照例议处，其总裁等未能催督，并著一并察议”。[5] 再如乾隆末年，乾隆帝阅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时，发现错谬、空白，甚至违碍之处甚多，（图6）遂严惩所有纂办各员，其中总校官陆费墀被罚赔南三阁所有面页装订、木匠刻字等费用，甚至死后还被没收家产，责罚甚为严厉。除奖惩制度外，还有考勤登记，及每日额定功课等各项管理制度。

【4】《高宗实录》，卷514，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己酉，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本，总第24册，236页。

【5】《高宗实录》，卷1211，乾隆四十九年七月癸酉，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本，总第15册，502页。

总之，上有皇帝的严密控制和督责，下有对参纂人员的任免、奖惩和考核等具体规定，一切都按照严格的程序办理，既保证了工作的紧张和有序，也保证了书籍编纂的质量和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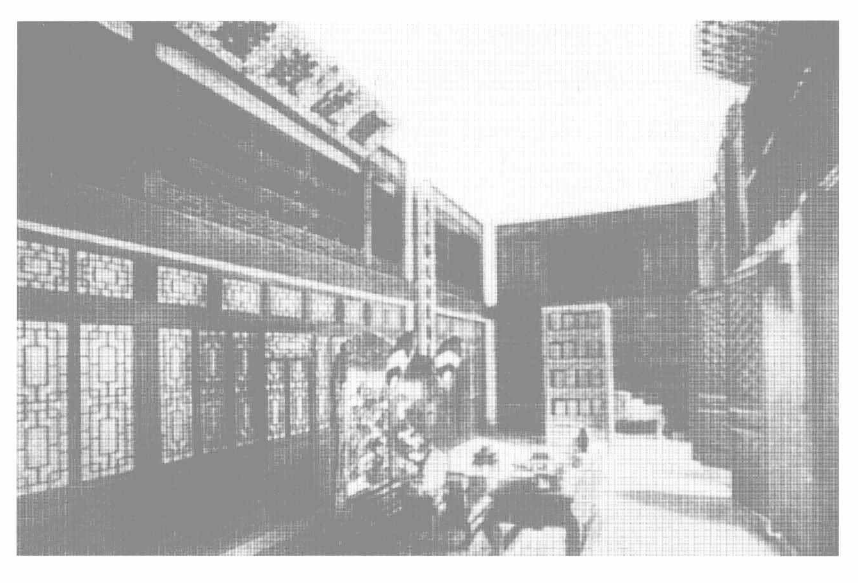


图6
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书楼

尤其是“自备资斧、竣后议叙”等项，更可减少办事官员的依赖性和惰性，持久地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直至纂修工作完成。

第二节　中央官署出版物的内容及其文化贡献

清代是历代文化积淀最为丰厚的时期，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总结的大趋势，古籍整理工作由此全面开展，在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其特点是以古代语言文字学的成就为核心，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编纂、考证等全面开花，硕果累累，[1] 有很多是总结性的大部头著作。据学者统计，这一时期的著作数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达126 649部、170万卷。[2] 就政府方面而言，整理古代群籍一直是书籍编刊活动中未曾中断过的重要方面，同时，又编撰了大量新著。最高统治者以文化活动为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活动得到空前强化。

【1】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第七章,第一节,864页,中华书局,1994年。

【2】王余光:《中国文献史》,第一卷,49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一、古籍整理与出版

（一）　校勘、辨伪与考证

清代的校勘已成为专门学问，盛极一时。乾隆年间，大规模

地校理古书，采用辨伪、校勘等实证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恢复古书的原始面貌和内容的真实性。各种方法既紧密相连，又有所不同。有的书只做一项，有的书兼做两项或多项。

1. 经史著作的校刊

乾隆初年，为表彰学术，重刊前代经史。选任大臣校正“十三经”、“二十四史”和“三通”等，刊为善本。[1] 此期的工作主要是校勘文字的讹、错、衍、脱。其代表作有：

[1]《国朝宫史》，卷三十五，66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7年。

(1)《十三经注疏》

以明代北监本为底本，又做了一些更动和加工，如：改《周易兼易》为《周易注疏》，将各经书名统称为“注疏”；将底本中原无音义的《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分别增加陆德明或孙奭的音义，为各经正文和注文加上句读，使学者开卷了然；将“注”、“音义”和“疏”等注解名称用与经文相反的黑地白字标识，以便于阅读；考证文字异同，附于每卷之末。（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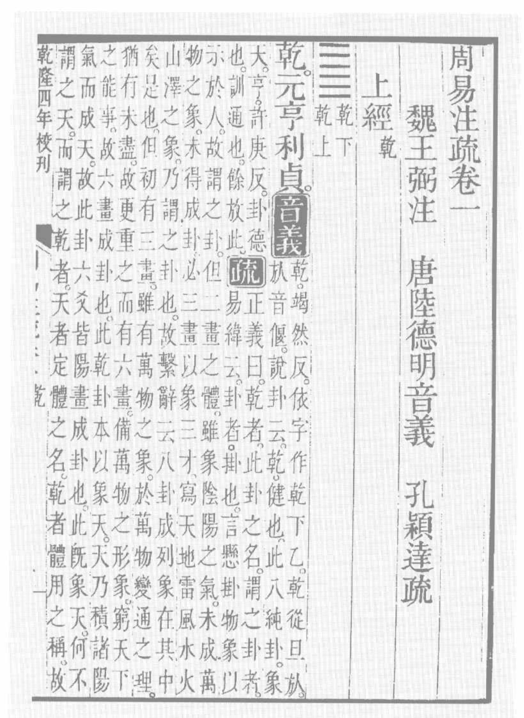

周易注疏卷一
魏王弼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上經　乾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音義］乾竭然反依字作乾下乙乾從旦㫃㫃音偃說卦云乾健也此八純卦象大亨許庚反卦德也訓通也餘放此［疏］正義曰乾者此卦之名謂之卦者易緯云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但二畫之體雖象陰陽之氣未成萬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畫以象三才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也故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但初有三畫雖有萬物之象於萬物變通之理猶有未盡故更重之而有六畫備萬物之形象窮天下之能事故六畫成卦也此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
乾隆四年校刊

图7
《十三经注疏》，乾隆四年至十二年武英殿刻本

由于当时参照的版本不多，且有些典籍底本选用有待商榷，况且又是集体编书，诸臣敷衍，导致各经考证比较简略，其影响和作用均在嘉庆时阮元据宋刻本详细校勘的《十三经注疏》之下。

(2)《二十四史》

亦以明北监本做底本，校改了明监本大量讹误，对史事做了一些订正，并补其缺失。自《元史》以上皆有考证。

《考证》皆附于各史每卷之末，即武英殿本《二十二史考证》515条，间有质疑。这是清代学者古史丛考的代表性著述，内尤以《史记》、《汉书》等前几史为善。如明监本《史记》将刘宋裴骃、唐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合一，附刻于正文之下，附刻的注文多有删削，旧注渐失，形成缺漏。

表一　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一览

书名、卷数	责　任　者
周易注疏十三卷	魏王弼注　唐陆德明音义　孔颖达疏
周易略例一卷	魏王弼撰　唐邢寿注　陆德明音义
尚书注疏十九卷	汉孔安国传　唐陆德明音义　孔颖达疏
毛诗注疏三十卷毛诗谱一卷	汉毛亨传　郑玄笺　唐陆德明音义　孔颖达疏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	汉郑玄注　唐陆德明音义　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十七卷	汉郑玄注　唐陆德明音义　孔颖达疏
礼记注疏六十三卷	汉郑玄注　唐陆德明音义　孔颖达疏
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	晋杜预注　唐陆德明音义　孔颖达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	汉何休注　唐陆德明音义　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	晋范宁集解　唐陆德明音义　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	魏何晏集解　唐陆德明音义　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九卷	唐玄宗李隆基注　陆德明音义　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十一卷	晋郭璞注　唐陆德明音义　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	汉赵岐注　宋孙奭音义并疏

表二　武英殿刻二十四史一览

书名、卷数	责　任　者
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　刘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
史记补一卷	唐司马贞撰注　清张照考证
前汉书一百卷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　清陈浩　齐召南等考证
后汉书九十卷 志三十卷	刘宋范晔撰　唐李贤注 晋司马彪撰　梁刘昭注　清陈浩　齐召南考证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晋陈寿撰　刘宋裴松之注　清李龙官等考证
晋书一百三十卷 音义三卷	唐房玄龄等撰 唐何超撰　清孙人龙等考证
宋书一百卷	梁沈约撰　清万承仓等考证
南齐书五十九卷	梁萧子显撰　清王祖庚等考证
梁书五十六卷	唐姚思廉撰　清孙人隆等考证
陈书三十六卷	唐姚思廉撰　清孙人隆等考证
魏书一百十四卷	北齐魏收撰　清孙人隆等考证
北齐书五十卷	唐李百药撰　清姚范等考证

续　表

书名、卷数	责　任　者
周书五十卷	唐令狐德棻等撰　清金文淳等考证
隋书八十五卷	唐魏征等撰　清张映斗等考证
南史八十卷	唐李延寿撰　清陈浩等考证
北史一百卷	唐李延寿撰　清孙人隆等考证
旧唐书二百卷	后晋刘昫撰　清沈德潜等考证
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释音二十五卷	宋欧阳修　宋祁等撰 宋董冲撰　清沈德潜等考证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	宋薛居正等撰　清邵晋涵等考证
五代史七十四卷	宋欧阳修撰　徐无党注　清孙人隆等考证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目录三卷	元脱脱等撰　清林蒲封等考证
辽史一百十六卷	元脱脱等撰　清陈浩等考证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元脱脱等撰　清王会汾等考证
元史二百十卷目录二卷	明宋濂等撰　清王祖庚等考证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录四卷	清张廷玉等撰

此次重新校勘，辑残补缺，仅三家注文就辑补千余条，比监本约增加十分之六，并对体例加以统一。

这次校正工作，是继监本《二十一史》、汲古阁本《十七史》之后又一次整理正史，殿本一时博得"校刻精审"之美誉，成为当时的"标准本"，尤其是此次校印，纳入《旧唐书》和新修成的《明史》，又增收了由《永乐大典》辑出的《旧五代史》，首次编成《二十四史》。因而在古文献学史、版本史上均占有一席地位。尽管这套史学丛书存在着篡改史文、[1] 未能广集古本校勘[2] 等严重缺陷，但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瑕不掩瑜，其特殊的历史功绩应予充分肯定。至今仍与其他系统的《二十四史》并行，大有裨于学术。

【1】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

【2】《军机处录副奏折》文教类，乾隆四年方苞奏折。

2. 进呈书籍的校阅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纂修官们对各地进呈的万余种书籍作了认真的校阅和整理。主要有三项内容：

（1）版本的鉴别、比较。“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1]

【1】《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2）辨伪。对一些“鱼目混珠，猝难究诘”之书，加以辨证，收入存目；对一些本属伪书，或“掇拾残剩，真赝相参”者，但因流传已久，多为读书人引为故实，也加以辨别而录存之。

（3）考证。对作者情况、书的得失、文字增删及篇帙分合等详加考证，以正本清源。这些考证成果，原附于各书之末，后乾隆帝谕“另为编次，与《总目提要》一体付聚珍版排刊流传”。[2]此即《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一百卷。这些校勘成果的水平很高，以后的不少版本，有的在疏证上比殿本更为详尽，但在校勘的成就方面，基本上维持在殿本的水平。

【2】《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谕。

（二）文献的辑补

1. 辑佚

考据学的兴盛和《全唐诗》、《四库全书》的编纂，开创了官府组织辑佚活动的先例，从而改变了仅有私家辑佚一途的局面。以成果而论，乾隆年间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的佚书最富，并且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永乐大典》引用书目达七八千种，而且绝大部分后已不传，因而成为蕴藏极富的辑佚渊薮。对于《大典》的辑校工作，既是编修《四库全书》的一个重要起因，又是作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开展起来的。乾隆帝对此始终十分重视，亲自定夺所有辑出书籍应刊、应抄或应删各项名目。应刊之书，立即付梓，并连同应抄书籍一起编入《四库全书》，共389种，还有127种录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中，合共516种。[3]其中，经部书79种，史部书79种，子部书173种，集部书185种。所辑各书又分三种情况：一是佚书，共448种；二是未佚而辑出的书，共42种；三是据《永乐大典》校补的书，共26种。

【3】赵万里：《〈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北平北海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三、四号，1929年。

应刊各书都是辑佚书中“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4]属辑书中之精华，即合刊在《武英殿聚珍版

【4】《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谕。

丛书》中的汉唐以来稀见的名家撰著的四部之书，约80余种。

【1】本表选自赵万里《〈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并有所改易。书名后有*号者系据《永乐大典》校补之本。

表三 《武英殿聚珍版书》中辑自《永乐大典》之佚书目[1]

部别	书名、卷数	责任者
经部	易纬八种十二卷	汉郑玄注
经部	汉官旧仪二卷补遗一卷	汉卫宏撰
经部	魏郑公谏续录二卷	元翟思忠撰
经部	帝范四卷	唐太宗李世民撰
经部	周易口诀义六卷	唐史征撰
经部	易说六卷	宋司马光撰
经部	易原八卷	宋程大昌撰
经部	易象意言一卷	宋蔡渊撰
经部	尚书详解二十六卷 *	宋夏僎撰
经部	融堂书解二十卷	宋钱时撰
经部	禹贡指南四卷	宋毛晃撰
经部	禹贡说断四卷 *	宋傅寅撰
经部	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卷	宋戴溪撰
经部	契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	宋袁燮撰
经部	仪礼集释三十卷	宋李如圭撰
经部	仪礼释宫一卷	宋李如圭撰
经部	仪礼识误三卷	宋张淳撰
经部	春秋释例十五卷	晋杜预撰
经部	春秋传说例一卷	宋刘敞撰
经部	春秋集注四十卷	宋高闶撰
经部	春秋考十六卷	宋叶梦得撰
经部	春秋辨疑四卷	宋萧楚撰
经部	春秋繁露十七卷 *	汉董仲舒撰
经部	法言注十三卷 *	汉扬雄撰 晋郭璞注
史部	五代史纂误三卷	宋吴缜撰
史部	东观汉纪二十四卷	汉刘珍撰
史部	邺中记一卷	晋陆翙撰

续 表

部别	书名、卷数	责 任 者
史部	蛮书十卷	唐樊绰撰
史部	水经注四十卷 *	后魏郦道元撰
史部	岭表录异三卷	唐刘恂撰
史部	麟台故事五卷	宋程俱撰
史部	宋朝事实二十卷	宋李攸撰
史部	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	宋陈振孙撰
子部	傅子一卷	晋傅玄撰
子部	明本释三卷	宋刘荀撰
子部	项氏家说十二卷	宋项安世撰
子部	农桑辑要七卷	元至元十年官撰
子部	苏沈良方八卷	宋苏轼、沈括撰
子部	周髀算经二卷附唐李籍音义一卷 *	北周甄鸾述 汉赵君卿注 唐李淳风释
子部	九章算术九卷附唐李籍音义一卷	晋刘徽述 唐李淳风释
子部	海岛算经一卷	晋刘徽撰 唐李淳风注
子部	孙子算经三卷	北周甄鸾述 唐李淳风注
子部	五曹算经五卷 *	北周甄鸾述 唐李淳风注
子部	五经算术二卷	北周甄鸾述 唐李淳风注
子部	夏侯阳算经三卷	隋夏侯阳撰
子部	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	宋岳珂撰
子部	墨法集要一卷	明沈继孙撰
子部	云谷杂记四卷	宋张淏撰
子部	瓮牖闲评八卷	宋袁文撰
子部	考古质疑六卷末一卷	宋叶大庆撰
子部	涧泉日记三卷	宋韩淲撰
子部	敬斋古今黈 八卷	元李冶撰
子部	唐语林八卷 *	宋王谠撰
子部	文子缵义十二卷	宋杜道坚撰
集部	南阳集六卷	宋赵湘撰

续　表

部别	书名、卷数	责 任 者
集部	宋元宪集三十六卷	宋宋庠撰
集部	宋景文集六十二卷	宋宋祁撰
集部	文恭集四十卷	宋胡宿撰
集部	祠部集三十五卷	宋强至撰
集部	华阳集四十卷	宋王珪撰
集部	公是集五十四卷	宋刘敞撰
集部	彭城集四十卷	宋刘攽撰
集部	净德集三十八卷	宋吕陶撰
集部	忠肃集二十卷	宋刘挚撰
集部	陶山集十六卷	宋陆佃撰
集部	学易集八卷	宋刘跂撰
集部	西台集二十卷	宋毕仲游撰
集部	浮沚集九卷	宋周行己撰
集部	昆陵集十六卷	宋张守撰
集部	浮溪集三十二卷	宋汪藻撰
集部	茶山集八卷	宋曾几撰
集部	雪山集十六卷	宋王质撰
集部	乾道稿二卷　淳熙稿廿卷　章泉稿五卷	宋赵蕃撰
集部	止堂集十八卷	宋彭龟年撰
集部	絜斋集二十四卷	宋袁燮撰
集部	南涧甲乙稿二十二卷	宋韩元吉撰
集部	蒙斋集二十卷	宋袁甫撰
集部	耻堂存稿八卷	宋高斯德撰
集部	拙轩集六卷	金王寂撰
集部	金渊集六卷	元仇远撰
集部	牧庵集三十六卷	元姚燧撰
集部	岁寒堂诗话二卷	宋张戒撰
集部	浩然斋雅谈三卷	宋周密撰

当时的辑佚方法，无论稽考或缀合，都更加严密、科学和成熟，对《永乐大典》本身的讹误也同时进行了校勘和辨伪。如被公认为最好的一种是由邵晋涵主持纂辑的《旧五代史》，其中《梁太祖纪》原帙已缺，将散见于《永乐大典》各韵者一一辑录排纂，又将《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百余种书中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逐条校对辑补，又据行文书法恢复原书体例；《后妃列传》、《宗室列传》等的残阙亦据诸书采补，共得一百五十卷，达到恢复原书面貌十之八九的良好效果，丰富了《永乐大典》辑佚本的内容。

虽然就整体来说，《大典》中还有重要佚书漏辑，有的辑本未免阙略，所辑各书也有不少字句伪误和条目漏辑等缺陷，但是，数百种珍贵古书亡而复传，其成就仍属卓著辉煌！如汉刘珍等《东观汉纪》为我国最早的官修史书，可以补正《后汉书》阙失之处颇多。其他比较重要的如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宋吴缜的《五代史纂误》、李攸的《宋朝事实》、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韩淲的《涧泉日记》、元姚燧的《牧庵集》等等，均借此得以广泛流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于东南五省，准所在锓木通行，遂成为所谓“外聚珍本”的底本。虽然“外聚珍本”翻刻质量不及“内聚珍本”精良，但是同样为保存典籍和弘扬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现存《大典》卷帙已不足当时的二十九分之一，更见此次辑佚活动对古典文献保存之功巨大！清代四库馆臣对《大典》的辑佚，开了广泛裒辑佚书的风气，所以乾隆朝以后，清代辑佚学得以较快地发展，成为学术界的一种风气，出现了多种辑佚的汇补之作。

2. 补阙

在考据学发达的乾嘉时期，学者们将历史文献学上勾稽、考据的功力用之于史籍内容的补充，一时补作历代正史表、志蔚成风气，熊方所作《补后汉书年表》是“殿本”中唯一的一部补表之作。它是在前人史书的基础上，据《后汉书》、仿《汉书》义例稍加变通撰成，补《后汉书》中没有的《同姓王侯表》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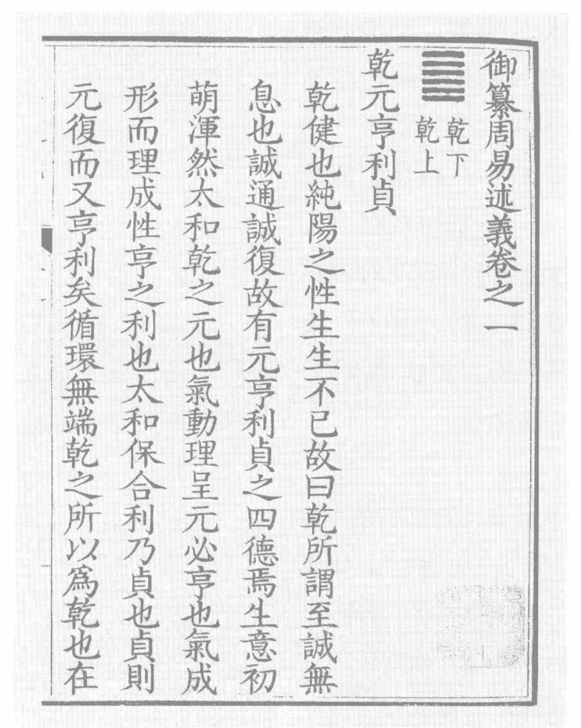
《异姓王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四库全书总目》赞其“经纬周密，叙次井然”，论之颇详。此书有裨于史学，但取材不广。此外，清诸以敦《熊氏后汉书年表补校补》、钱大昭《后汉书补表》，皆为后出转精之作。

（三）文献的解释

1. 注释

注释主要用于消除古今文字间沟通的障碍。清代提倡程朱理学，注释书籍以经籍为主，康熙帝尤为热衷，大力阐扬孔孟之道，对朱熹推崇备至，特命儒臣重修明永乐时编纂的《性理大全》，又修成《御纂朱子全书》等，颁发各省作为教材。康熙至乾隆诸帝还不断举办经筵日讲活动，令儒臣为其进讲经史文学、天德王道、修齐之理，并将进讲教材纂刻成书，自《日讲易经解义》起，《书经》、《春秋》、《四书》、《礼记》各经亦依式刊颁（满、汉文本），形成了“殿本”中的“日讲”系列，以资治道。此类释文，重点在讲述经文的微言大义，有明显的为政治服务的倾向，与专对儒生的重训诂、音义的注释方法迥异。《书经》、《诗经》、《春秋》“传说汇纂”三书，均以斟酌持平的态度，汇辑诸家解释的精华，加上编撰者的见解，以“案”的形式附后。康熙对学术的开明态度，为清代经学的繁盛发展，开了良好先例。在三书的基础上再加上《御纂周易折中》、《钦定周官义疏》、《钦定仪礼义疏》、《钦定礼记义疏》四书，合称“御纂七经”。乾隆时所撰的《御纂周易述义》、《御纂诗义折中》、《御纂春秋直解》三部经解著作，后人称为“乾隆三经”。（图8）

图8
《御纂周易述义》，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



御纂周易述義卷之一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純陽之性生生不已故曰乾所謂至誠無息也誠通誠復故有元亨利貞之四德焉生意初萌渾然太和乾之元也氣動理呈元必亨也氣成形而理成性亨之利也太和保合利乃貞也貞則元復而又亨利矣循環無端乾之所以爲乾也在

综观经解各书，逐篇逐节地训解，语句浅近，又将经文、注文和训讲之文

加以区别，颇便于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初学者。加上内府各书流传广泛，对经学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

2. 翻译

翻译主要用以消除异种文字间沟通的障碍。新兴的清政权，礼乐未备，其施治对象又是具有比较发达的文化和众多人口的群体，必须应时顺势，学习和掌握汉文化。根据社会交往中的优势扩散原理，文化越是先进，文明程度越高，越容易得到传播和扩散，自然要优先被选择，反之亦然。此外，受民族心理、民族优越感和自尊心的驱使，也要弘扬民族文化，维护祖宗制度，这也需要吸收、利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汉文化学术成果。加速满族文化的繁荣与进步，翻译汉籍无疑是一条最便捷、有效的途径。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是能收“人耕我获”之效，大大减少知识重新创造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从而尽快缩短与先进文化的距离。因此，大量的汉文著作被译成满文及其他文字，这是清内府翻译工作的一大特点。

随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统治的需要，译书品种不断增加。由于怀柔蒙古、安定西藏等政策的推行，在满文之外又增译和刊刻蒙、藏等文种的书籍。清廷各衙署都配备有翻译和通事，内阁、军机处、理藩院等还设有专门翻译机构，将孔孟经书和程朱理学著作及《六韬》、《三略》、《素书》、《三国演义》等书籍陆续译成汉文。清代所修历朝《实录》、《圣训》、《本纪》，以及《大清会典》、《大清律例》、各部《则例》等书，必须以满、汉两种或满、蒙、汉三种文字并存。

据初步统计，清内府付刊的满文译著有208种：[1] 经部22种，史部112种，子部71种，集部3种，含满汉及满蒙汉等多种文字合璧本，以汉、满对译的作品居多。其中，清以前经史典籍如《御制翻译四书》、《辽史》等书有20余种。其余以当朝新修史书为主。清王朝被推翻后，满文失去了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应用范围急剧缩小。各种民族文字的古籍，是研究各民族语言学、翻译学的珍贵文献。(图9)

【1】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附录二，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图9
《御制翻译春秋》，乾隆四十九年内府刻满文本

表四　清内府翻译古代典籍一览

书名	卷数	刊刻时间	文种
辽史	八卷	顺治三年	满文
金史	九卷	顺治三年	满文
元史	十四卷	顺治三年	满文
三国演义	二十四卷	顺治七年	满文
诗经	二十卷	顺治十一年	满文
大学衍义	四十三卷	康熙十一年	满文
大学衍义	四十三卷	康熙十一年	满汉合璧
小学合解（《小学集注》）	六卷	雍正五年	满汉合璧
小学合解	六卷	雍正五年	满文
孝经集注（《孝经合解》）	一卷	雍正五年	满文
诗经	二十卷	雍正十一年	满文
御制翻译孝经	一卷	乾隆年	满汉合璧

续 表

书 名	卷 数	刊刻时间	文 种
御制翻译四书	六卷	乾隆六年	满 文
御制翻译四书	六卷	乾隆二十年	满汉合璧
御制翻译书经（《御制翻译书经集传》）	六卷	乾隆二十五年	满汉合璧
御制翻译四书	六卷	乾隆二十六年	满汉合璧
御制翻译周易	四卷	乾隆三十一年	满汉合璧
御制翻译诗经	八卷	乾隆三十三年	满汉合璧
御制翻译礼记	三十卷	乾隆五十九年	满汉合璧
御制翻译春秋	六十四卷纲领一卷	乾隆五十九年	满汉合璧
御制翻译孝经	一卷	咸丰六年	满汉合璧
大学衍义	四十三卷	咸丰六年	满汉合璧

译书在当时还有另一重作用：满文属拼音文字，对外国传教士来说，学习满文比读方块汉字要容易一些，只需不太长的时间，就可以依靠满文译本使用汉语书籍。所以，满文译书是当时外国传教士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中介，促进了满汉及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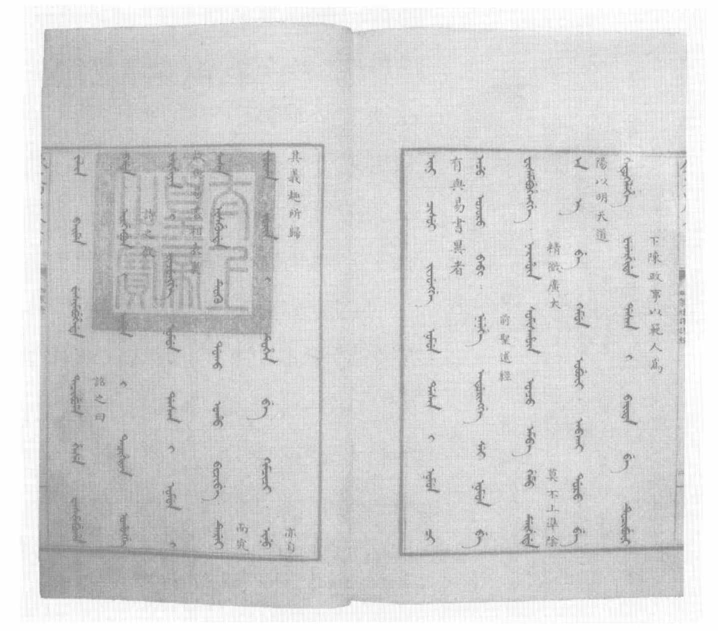


图10
清四库全书抄本《御制翻译诗经》

（四）文献的整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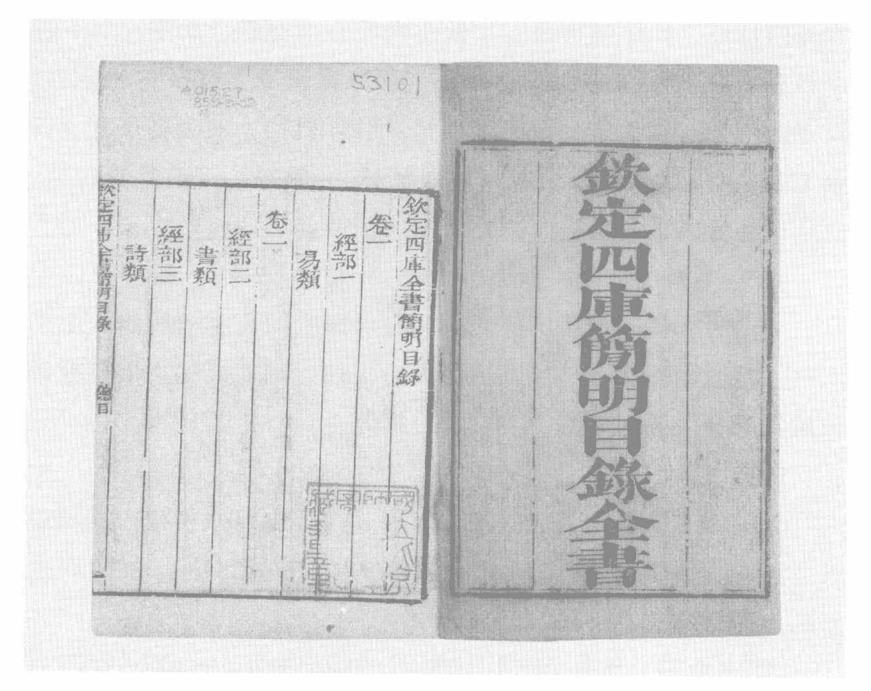
将文献的无序状态变成有序，是为整序工作，整序的方法主要是编制书目。目录之书，不外著录与编排。如何著录、著录哪些内容、采用何种体例虽是方法和技术上的问题，其中却蕴含着编制者的目录学思想和学术造诣，并由此显现目录学成果的学术价值。

清代敕编的目录成果也

有不少，如史志目录有《明史·艺文志》，“续三通”中的《经籍考》、《艺文略》、《经籍志》，类书中的有关部分如《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等。官修目录中最具有目录学意义的，一是综合性解题目录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是版本目录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四库全书总目》是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产生的，它继承了此前各代的目录学成就，主要特点有：其一，收录品种丰富。该目所收之书分“著录”和“存目”两类：前者三千余种，后者六千余种，合共万余种，先秦至清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基本包括在内，反映了清代盛世皇室藏书的丰富；其二，分类体系严谨。根据学术发展和图书出版情况，共设置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从而确立了条理分明的部目、类目、子目三级分类体系；其三，提要编写方式新颖、全面。将汉代以来出现的叙录、传录、辑录等各式提要融为一体，形成了新的提要形式，从一书的作者情况、版本源流、典籍要旨、文字增删、篇帙分合，到该书得失、众说异同等等，都加以详细介绍和评价；其四，提要之外，又设大序、小序，论述各门学术的发展史。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阐述其渊源流变，评论学术门户之争的是非，解释四部分类的原则，以挈纲领；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具体陈述学术流派演变，本类中书籍取舍及设立子目的理由，以析条目；遇有言犹未尽之处，则于子目或每书下附加案语补述。因此，它是系统总结中国传统学术的巨著，代表了18世纪中国学术界的最高学术成就和水平，对后世学子的读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图11）

《天禄琳琅书目》为提要体版本目录，前、后两编共著录了千余部善本书，均为内廷藏书之精华。在著录与编排方面新意迭出：其一，著录项目有书名、函册、提要、印章和阙补等内容。书目收载藏书印，标明藏书印的文字种类、形状、印色和位置各项，是借鉴了书画目录的作法，不仅以前书目未见有如此记载，其后亦未有如此详尽，堪称编制体例中的一大创举。“函册”和“阙补”等项也是创新之处，尤其是“阙补”一项，在《前编》中


欽定四庫簡明目錄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卷一
經部一
易類
卷二
經部二
書類
經部三
詩類

图11
乾隆写本《钦定四库简明目录全书》

就占了近三分之一，是一项比较艰苦的工作；其二，提要内容自成体例："首举篇目，次详考证，次订鉴藏，次胪阙补"；其三，编排体例以版本时代为纲，分为宋版、金版、宋钞、元版、明版等类；同时代者再依经、史、子、集分类序列。版本类型之下，"同一书而两椠均工，同一刻而两印俱妙者俱从并收"，[1] 突出了版本目录的特点。《天禄琳琅书目》是在钱曾《读书敏求记》等善本书目的影响下出现的我国第一部官修版本目录。其解题之详备，成为完善版本目录体例的重要之作，因而是版本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虽然考证方面不无错误，但在同类目录中仍属集大成之作，不失为了解宋元明旧刻旧抄古籍和宋元明图书出版及流传情况的重要参考工具。

以上两种书目都继承了此前同类目录之长，又加以创新，显示出相当的学术功力；况且皆出于"敕撰"，有着无上的权威性，以致于对其后的同类目录产生了广泛持久的示范效应，出现了众多受到其影响的成果。所以，二者同为承先启后的典型范例。

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等大量出现，禁书、金石、书画等都编

[1]《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凡例，清乾隆年内府朱格精抄本。

有专门目录。如排架目录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分架图》等，进书目录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江苏采辑遗书目录》，禁书目录有四库全书馆编定的《全毁书目·抽毁书目》，书画目录有《石渠宝笈》，佛道书画目录有《秘殿珠林》，等等，可谓异彩纷呈，只是这些目录多未付梓。

（五）文献的汇编、摘编、续编

清代的文献基础居历代之冠，可供撷取的内容较明修《永乐大典》时增加许多，又加上皇帝大力提倡，因而汇编类书籍获得长足发展。主要有丛书、类书、总集等。

1. 丛书

清代的丛书接续明代进一步发展，内容亦日益精粹。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乾隆年间纂修的百科性丛书——《四库全书》。（图12）

《四库全书》按照西汉以来沿用的四部分类法编纂，类目是按照封建正统观念设立的，选书也是以有利于封建统治教条的标准“钦定”的。据文渊阁本统计，共收书3 400多种，18世纪后期以前的中国历代主要著作基本被囊括殆尽，装为36 300余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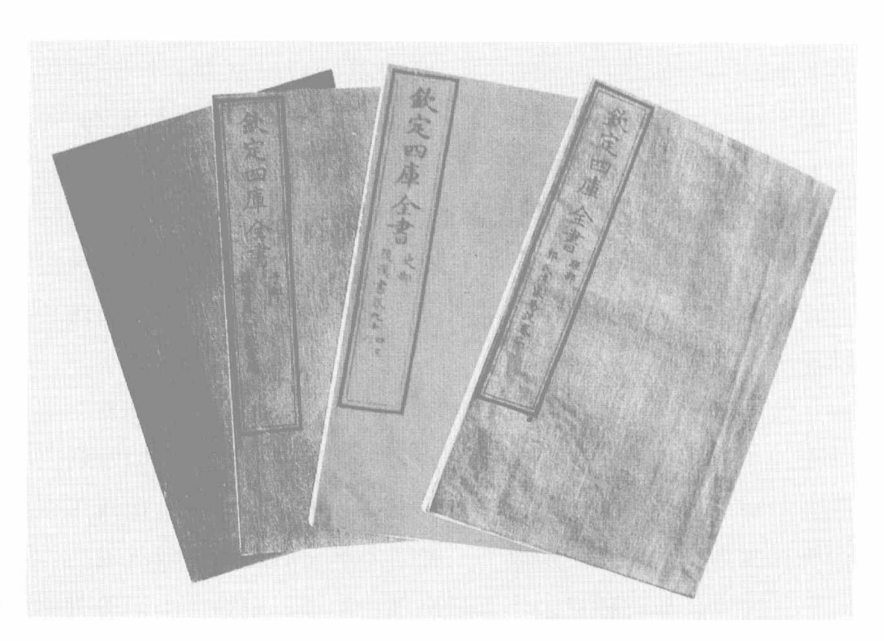


图12
《四库全书》

由于这部书卷帙浩繁，而且乾隆帝的计划只在南北七阁储7部，若全部刻版印刷，耗费甚巨，因此只有抄写本存世。此项活动持续了10年，参其事者达4 400余人。尽管抄写的复本有限，但仍发挥出重要的传播交流的作用。南三阁中的3部书允许广大的士子到阁阅览甚至抄写，翰林院有一部“存贮底本”，或称“副本”，也允许抄阅。因此成为当地的文献中心和实际上的官办图书馆，为促进典籍和文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起到了与雕印出版的书籍殊途同归的传播作用，乾隆帝“嘉惠艺林，启牖后学”的意愿终于实现，这是“南三阁”书的历史意义所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对保存历史文献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但在编纂的过程中，对于很多野史、逸闻及不符合正统思想的“离经叛道”的书籍又采取了各种禁毁的措施，因而又是一次文化上的空前的浩劫。

《四库全书》的内容极为丰富。类目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

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各类人物的著作。

2. 类书

官修类书以《古今图书集成》最为著名，也是一部达万卷之巨的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类书。编修工作历时7年，清雍正四年成书。其中征引的各类古书约25 000卷，多将原书整部、整篇或整段抄入，不加改动删节，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门类，大量宋、元、明古籍皆借此以存。即使为现存之书，亦时有与今本不同之本，总字数达1.6亿，很多内容为历代类书所不及。该书取材谨严，门类精当，编排颇有条理，先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和经济6汇编，汇编下分设32典，典下再分6 109部，三级类目逐级展开。在每部之下，又视情况分列汇考、总论、图、表、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精详周密，以简驭繁。许多资料还一一注明书名、篇名，极便于核查诗文语句和典故出处，找寻各种事物的系统材料，还可据以考证史事、校勘古籍，成为新的辑佚渊薮。其用途极为广泛，能检一得百，故有“康熙百科全书”之誉。

专门性类书如《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分类字锦》、《渊鉴类函》等，皆以征引弘富见长。如《渊鉴类函》，康熙帝认为明俞安期所编《唐类函》采集诗文故事间有脱漏，且不及宋以后之书，遂命儒臣更博采《太平御览》、《玉海》、《山堂考索》等17部类书及总集、子、史等明嘉靖以前古籍，依照《唐类函》的体例，增其所无，详其所略而成。《佩文韵府》一书，则因康熙帝以元阴时夫《韵府群玉》和凌稚隆《五车韵瑞》等书引据未能详确，遂命廷臣博考群籍，大加增补而成。所收材料有经、史、子和元明以前的若干诗文集，历时8年完成。（图13）



图13
《分类字锦》，康熙六十一年武英殿刻本

表五　清内府纂辑类书一览

书　名	编辑者	刊刻年代	卷　数
渊鉴类函	清张英等	康熙四十九年	四百五十卷　目录四卷
韵府拾遗	清张廷玉　汪灏等	康熙五十九年	一百零六卷
佩文韵府	清张玉书　蔡升元等	康熙五十年	四百四十四卷 拾遗一百一十二卷
分类字锦	清何焯　陈鹏年等	康熙六十一年	六十四卷
古今图书集成	清蒋廷锡　陈梦雷等	雍正四年	一万卷　目录四十卷
子史精华	清允禄　吴襄等	雍正五年	一百六十卷
骈字类编	清沈宗敬等	雍正六年	二百四十卷
佩文诗韵	清张玉书　蔡升元等		五卷
佩文诗韵删注	清张玉书　蔡升元等		五卷

3. 诗文总集

上述汇编类的书籍，往往是编纂、辑佚和校订诸项工作并行。以《全唐诗》来说，它是以明胡震亨所编《唐音统签》和清初季振宜据钱谦益旧稿补订编撰的《唐诗》为底本，与社会上一

表六　清内府纂辑总集一览

书名、卷数	编纂人	刊刻时间
古文渊鉴六十四卷	清圣祖玄烨选　徐乾学等辑并注	康熙二十四年
御定历代赋汇正集一百四十卷 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 补遗二十二卷目录三卷	清陈元龙等辑　圣祖玄烨御定	康熙四十五年
御定全唐诗录一百卷	清徐倬、徐元正编	康熙四十五年
全唐诗九百卷目录十二卷	清曹寅、彭定求等辑	康熙四十六年
御选历代诗馀一百二十卷	清圣祖玄烨选 沈辰垣、王奕清等辑	康熙四十六年
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	清张玉书等编 圣祖玄烨御定	康熙四十六年
钦定历代题画诗类一百二十卷	清陈邦彦辑	康熙四十六年
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三百二卷 首二卷姓名爵里十三卷	清张豫章等辑	康熙四十八年
历朝闺雅十二卷	清揆叙等编	康熙年
御定全金诗增补中州集 七十二卷首二卷	金元好问编　清郭元釪补辑	康熙五十年
御选唐诗三十二卷目录三卷	清圣祖玄烨辑陈廷敬等辑注	康熙五十二年
古文约选不分卷	清允礼、方苞辑	雍正十一年
悦心集四卷	清世宗胤禛辑	雍正四年
御选唐宋文醇五十八卷	清高宗弘历选、允禄等辑	乾隆三年
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目录二卷	清弘昼、梁诗正等编	乾隆十六年
钦定全唐文一千卷首四卷	清董诰等编	嘉庆二十三年

些通行的唐诗选本“参互校勘”，[1] 并“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二千二百余人”，[2] 遂使“唐三百年诗人菁华，咸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3] 对于字句异同，篇章之互见，多有校注，还更正了他书一些误收误属的舛错。这部书虽有漏收、误收，或张冠李戴、作家作品重出、诗题误标、小传小注谬误、编次不当等不足，后人已有补遗之作多种，如清朱彝尊《〈全唐诗〉未备书目》，近人刘师培《读〈全唐诗〉书后》，王重民《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补〈全唐诗〉》和《补〈全唐诗〉拾遗》等等，但它仍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广的全

[1]《全唐诗》卷首，《御制全唐诗序》。

[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

[3]《全唐诗》卷首，《御制全唐诗序》。

面反映唐诗面貌的诗歌总集。不仅有助于文学的发展，而且对于研究唐代文化、历史乃至于政治、经济等都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再如《全唐文》，是在清内府旧藏缮本《唐文》160册的基础上，参辑《四库全书》中的唐文别集，抄撮《文苑英华》、《古文苑》、《唐文粹》、《崇古文诀》、《文章辨体汇选》等多种总集，又钩稽《永乐大典》中的单篇残段，广搜史子杂家记载和金石碑刻资料而成。

综上，清代官方对古代文献的整理成果，就总体而言，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都很高，为后世提供了一笔宝贵而又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深入发掘、研究和利用。

二、新著的出版

清沿明制，书籍编撰的体裁和形式亦多因袭前代，同时根据本朝的需要又有新的拓展。以下择要分而述之。

（一）书籍编撰体裁的因袭与创新

1. 纪传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官修正史，它的修撰是清前期的重要事件之一。所用资料极富，笔法、体例精当，本纪、列传务求详备、客观，在体例上也作了变通和创新。如创立《七卿年表》，特设《阉党传》、《土司传》，《历志》附以插图等，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明代社会的特点，更为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和边疆等方面的状况。乾隆四年（1739年）由武英殿首次刻印。此后，又对全书的纲领——本纪部分逐一考核增修，改动了一些蒙古语名词称谓的汉字译音，增益了一些史实，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将《明史本纪》单独刻行。由于《明史》集中了以万斯同、王鸿绪为代表的康、雍两朝众多著名学者的智慧和心血，又有清初学者私撰明史的成果作为基础，前后经历了90余年的纂辑过程，因而它是继《史记》、《汉书》等前几史之后最受好评的一部史籍。但随着“钦定”《明史》的刊行，私家修史之风戛然而止，[1] 这是文化专制

【1】黄爱平：《〈明史〉纂修与清初史学——兼论万斯同、王鸿绪在〈明史〉纂修中的作用》，《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

导致的必然后果之一。

2. 诏令奏议

诏令类主要有各朝的《圣训》，从太祖高皇帝至穆宗毅皇帝，计10种，由新帝为故帝汇辑。将皇帝的诏谕，依内容加以分类、摘录，纂辑成书后颁布于世，用以教训臣民。《圣训》涉及的领域很广，如圣祖玄烨敕撰的《太祖高皇帝圣训》，分敬天、圣教、论治道、训诸王、训群臣、经国、任大臣、用人、求直言、兴文治、崇教化、勤劳、节俭、慎刑、恤下、辑人心、通下情、明法令、鉴古、赏功、昭信、诫逸乐、谨嗜好等门类，凡26目，92条。[1]《圣训》是语录体，对于研究满族上层统治者的伦理道德、哲学思想、治国策略及清朝历史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1]《太祖高皇帝圣训》，清太祖努尔哈赤撰，清圣训馆臣编，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清帝的谕旨有《世宗上谕内阁》、《世宗上谕八旗》、《上谕翰詹科道》、《上谕儒释道三教》、《上谕旗务议覆》和雍正《朱批谕旨》等，尤以后者最为重要：书中收录有钦差大臣和地方文武官员共225人的奏折约7 000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的重要事件，是雍正朝政务活动的重要记录和原始档案，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许多真实情况，有些甚至是《世宗实录》和其他清代官书所未录的，所以是异常宝贵的资料。将此书与雍正帝的《上谕内阁》和《上谕八旗》等书参照，能全面了解雍正的政治措施。乾隆帝敕编有《御选明臣奏议》，主要选取关系明代得失者，重点在明中叶以后，所选不限于名臣，只要所言切中利病，不以人废言，作为清朝统治的借鉴。书中保留了许多珍贵资料，对研究明史有重要参考作用。

3. 政书

专详典章制度的政书，现存者以清代官修最多。不仅品种较前拓展，且多数又屡经续修，以致数量骤增。与此相应，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首次在史部设立“政书类”，也体现出清帝对于政书体裁的偏重。在本朝典制文献几近空白的情况下，以前各代的政书成果正提供了诸多参考。

清统治者首先仿编的是通典类的"三通"。高宗诏开三通馆，将私修史籍改由官方接续纂办，书名前亦相应加"钦定"二字，产生出"续三通"、"皇朝三通"等一系列仿续之作。因三书性质相近，某些部分出现了重复，故有学者认为贪大求全，专从形式着眼，以至叠床架屋，以凑足九通之数，[1] 若稍加仔细对照、分析，却并不尽然。每书的体例和类目据清制而有所损益和变革，其间还做了大量的补缺纠谬、广搜博采、删繁汰冗等工作。其概况如表七。

断代类的仿编之书，有《大清律例》和《大清会典》等书。清朝入关后的立法活动，以《大清律例》的制订为代表。这部法典是以《大明律》为蓝本，上承《唐律》的基本内容而制订的，又屡经实际运用和修订，成为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它由律和例两部分组成，律为正文，例为所附条例。律、例并行，以例为准。由于规定律文作为成法，要求子孙世守，不再修改，后来就

表七 "九通"概况及内容增益一览[2]

书名	卷数	纂修人	成书年代	起迄年代	内容梗概
通典	二〇〇	唐杜佑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	上古至唐天宝之末	分食货，选举，职官，礼，兵，兵刑，州郡和边防八典。
通志	二〇〇	宋郑樵	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	二十略自上古至唐，纪传及谱自三皇至隋	分本纪，世家，年谱，二十略和列传等五部分，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
文献通考	三四八	元马端临	元成宗大德元年	上古至南宋光宗	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考。
钦定续通典	一五〇	嵇璜等	清乾隆四十九年	唐至德元年至明末	析《兵典》为兵、刑两典。

[1] 韩仲民:《中国书籍编纂史稿》,282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

[2] 本表据"续三通"、"皇朝三通"凡例,《四库全书总目》、《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合编，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历史卷》(该书编委会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 等相关资料编制。

续　表

书名	卷数	纂修人	成书年代	起讫年代	内容梗概
钦定续通志	六四〇	嵇璜等	清乾隆五十年	二十五略自五代至明末；纪传自唐初至元末	缺《世家》、《年谱》两类，二十略内容有所增补。《列传》增孔氏后裔、贰臣、奸臣、叛臣、逆臣等传，删并游侠、刺客、滑稽、货殖等传。《氏族略》详辑未有专门记载的辽、金、元三朝氏族；《六书略》详记蒙古字音、字体等；《七音略》详述合声切音之法；《天文略》弥补了《通志》只载丹元子步天歌而不详推步法之不足；《艺文略》增记作者爵里；《图谱略》细作分类，详记南宋以来各代图谱；《金石略》详载撰者、年代、地点；补《昆虫草木略》等。
钦定续文献通考	二五〇	嵇璜等	清乾隆四十九年	宋宁宗以后至明末	析"郊社考"为郊社、群祀二考；析"宗庙考"为宗庙、群庙二考，凡二十六考。
钦定皇朝通典	一〇〇	嵇璜等	清乾隆五十二年	清天命元年至乾隆五十年	《食货典》删榷酤、算缗；《礼典》删封禅等；《兵典》专记八旗军事制度；《州郡典》原以九州统叙历代沿革，改以《大清一统志》为标准。
钦定皇朝通志	一二六	嵇璜等	清乾隆五十二年	清天命元年至乾隆五十年	省《本纪》、《列传》、《世家》、《年谱》，存二十略。《氏族略》记八旗氏族；《金石略》仅收钦定或敕撰之作；《六书略》记满、蒙、藏、托忒、维吾尔语等多种文字；《七音略》以汉、满、蒙、回、梵音翻切等。
皇朝文献通考	三〇〇	嵇璜等	清乾隆五十二年	清开国一六一六年至乾隆五十年	《田赋考》增八旗田制；《钱币考》增银色银值、回部普尔钱；《户口考》增八旗壮丁；《土贡考》增外藩；《学校考》增八旗官学；《宗庙考》增崇奉圣容之礼；《封建考》增蒙古王公等；《市籴考》删均输、和买、和籴；《选举考》删童子科；《兵考》删车战等。

只能以条例来补充和修正法律的不足。条例为了更适合实用，数量日益增多。如清初《大清律》附例文459条，[1] 雍正三年（1725年）为815条[2]，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增至1 456条，[3] 嘉庆六年（1801年）为1 604条，[4] 道光时递增为1 853条，[5] 同治九年（1870年）则达到1 892条。[6]

《大清会典》集历代行政法典之大成，以官统事，记载清政府中央机构的职掌和功能。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明会典》的影响，却比其更为严谨，内容也远比《唐会典》、《明会典》丰富。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曾五修《大清会典》，每次都有很大变动，后3次的体例都作了根本性改动。雍正本二百五十卷，较康熙本增加八十八卷；乾隆本分编为《会典》一百卷、《则例》一百八十卷，以典为经，以例为纬，事例具体叙述沿革损益和变动情况；嘉庆本除《会典》八十卷、《事例》猛增至九百二十卷外，还将图绘部分从《会典》中分离出来，从114幅增至1 430幅，编为一百三十二卷，数量增加了12.54倍。内容包括坛庙、銮舆、仪仗、武备、天文、器皿、舆地等图像，用以说明清代的典礼、文物、制度；到光绪朝重修时，已增为《会典》一百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图》二百七十卷的巨帙，基本上总括了以前诸本的内容，是中国封建行政法典的最后形态。

4. 地理

清代沿袭元、明两代的作法，敕修全国性总志《大清一统志》。自康熙十二年（1673年）至嘉庆年间，曾数次下令全国各省编修志书，为《大清一统志》提供资料。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后，又经乾隆中期续修和嘉庆时再修。该书以行政区划为纲，分述各省，条目清楚。引征档案、官书、文集、方志等，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考核精审，体例亦更趋成熟。随着《大清一统志》的修纂，掀起数次修志高潮。县有县志，府有府志，省有通志，从京师、直隶、盛京以下各府州县几乎都有，编纂成果达5 000余种，约占历代所修方志总数的70%~80%。有的志书重修了数次，如《苏州府志》、《常熟县志》等，均一修再修。

【1】《大清律集解附例》，清顺治四年内府刻本。

【2】转引自黄卓越、桑思奋主编《中国大书典》，396页，中国书店，1994年。

【3】《钦定大清律例》凡例，清乾隆六年武英殿刻三十三年增修本。

【4】《大清律例》凡例，清乾隆五十五年武英殿刻嘉庆七年增修本。

【5】《大清律例》凡例，清乾隆五十五年武英殿刻，嘉庆、道光五年、二十七年递修本。

【6】转引自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合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195页，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舆图名作中，应首先提到《皇舆全览图》。康熙朝以前，中国虽有地图却没有施经、纬度，“或山川经络不分，或州县方隅易位。自古至今，迄无定论”。[1] 为此，康熙帝便酝酿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测绘地图的计划，组织包括皇子在内的中外测绘人员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地理大测量，历时11年，接着便编制了著名的地图集《皇舆全览图》。这集地图前有总图一幅，后为各省分图。除新疆外，关内十五省及关外满蒙之地，皆经准确测定。东抵大海，西至藏、回，“关门塞口、海汛江防、村堡戍台、驿亭津镇，其间扼冲据险、环卫交通，荒远不遗，纤细毕载”。[2] 这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最准确的地图。在制作过程中，第一次实地测绘了珠穆朗玛峰的地理位置，全图采用地图理论为基础的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是我国最早使用新法绘制的一幅中国地图，对研究我国的疆域沿革有重大的价值。“这样伟大的工作，这样广袤大国地图的绘制，在地理舆图志的研究方面，可为一空前的事件。不只当时欧洲从来就没见过，就是直到今日，东方地图之绘制及书版，都还是用这份图作根据，其不同处也只是在一些微小地点加以修正而已。”[3] 有学者考证，雍正四年（1726年）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的260张图即是根据此图制绘的，乾隆朝《大清会典》的图亦是根据此图而制绘的。[4] 乾隆朝的《皇舆全图》除增加了后来补测的新疆外，其余全部照旧，此后直至民国初年，虽有多次测绘，但都不如康熙时的全面。

5. 别集

古代帝王喜作诗属文者不少，但像清帝那样几乎人人书怀成习、编刻成集并成为系列，则属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清入关后的10位皇帝中，顺治至光绪9位均有诗文集行世，有的是一次编就，有的则是分时段陆续纂成。经200余年积累，清代御制诗文总数达千卷之多。其中，御制诗约47 000余首，御制文约5 600余篇。

【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三。

【2】《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三。

【3】〔德〕傅吾康撰，胡隽吟译：《评康熙皇帝皇舆全览图研究》，《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676页。

【4】福克斯：《康熙皇舆全览图研究》，辅仁大学。

表八　清代御制诗文集一览

书　名	集、卷、目	编　者	刊刻年代
万寿诗（30 首）	一卷	未著编者	顺治十三年
清圣祖御制文（文 3 525 篇；诗 1 146 余首）	一集四十卷总目五卷 二集五十卷总目六卷 三集五十卷总目六卷 四集三十六卷总目四卷	张玉书等	康熙五十年 雍正十年
清世宗御制文（文 185 篇；诗 540 余）	三十卷目录四卷	允　禄等	乾隆三年
清高宗御制文（1 396 篇）	初集三十卷目录二卷 二集四十四卷 三集十六卷 余集二卷	于敏中等	乾隆二十九年 乾隆五十一年 乾隆六十年 嘉庆五年
清高宗御制诗（42 550 余首）	初集四十四卷目录四卷 二集九十卷目录十卷 三集一百卷目录二十卷 四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 五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 余集二十卷目录三卷	蒋　溥等 于敏中等 梁国治等 王　杰等 彭元瑞等	乾隆十四年 乾隆二十四年 乾隆三十六年 乾隆四十八年 乾隆六十年 嘉庆五年
清仁宗御制文（238 篇）	初集十卷 二集十四卷 余集二卷	庆　桂等 董　浩等	嘉庆十年 嘉庆二十年 道光年
清仁宗御制诗（11 760 余首）	初集四十八卷目录六卷 二集六十四卷目录八卷 三集六十四卷目录四卷 余集六卷	庆　桂等 托　津等	嘉庆八年 嘉庆十六年 嘉庆二十四年 道光年
清宣宗御制文（127 篇）	初集十卷 余集六卷	曹振镛等	道光十一年 咸丰年
清宣宗御制诗（1 999 余首）	初集二十四卷目录四卷 余集十二卷目录二卷	曹振镛等	道光九年 咸丰年
清文宗御制诗文（文 32 篇；诗 373 首）	文集二卷诗集八卷	许寿彭等	咸丰年
清穆宗御制诗文（文 247 篇；诗 321 首）	文集十卷诗集六卷	李鸿藻等	光绪年
清德宗御制文（文 187 篇）	四卷（或不分卷）	未著编者	未付梓，仅有抄本
清德宗御制诗（诗 345 首）	不分卷	未著编者	未付梓，仅有抄本

附 清帝即位前之诗文集

书名	卷目篇（首）	编者	刊刻年代
乐善堂全集定本	三十卷目录一卷 文152篇；诗1 030首	蒋溥等重编	乾隆二十三年
味余书室全集定本	四十卷目录四卷随笔二卷 文百余篇；诗3 200余首；随笔52则	朱珪 庆桂等	嘉庆五年
养正书屋全集定本	四十卷目录四卷 文171篇；诗2 165首	英 和等	道光二年

如果说，清宫编刻的其他书籍多反映了帝王意志的话，那么，每个皇帝的诗文集，则集中体现了帝王的思想和志趣。

（二）书籍体裁与题材的拓展

1. 纪事本末

清代官修史书以新创修的专史纪事本末最为发达。"每次军功告蒇，及遇有政事之大者，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皆由馆承办"。[1] 方略类似军事史，其写法采用编年体，分年系月，源源本本地交待事件的全部过程，内容包括皇帝谕旨、大臣奏报和有关庆功筵宴、艺文等。因是一事一书，又被视为纪事本末体。清代所完成的方略有数种。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所编《平定三逆方略》是此类书的第一部，但未付刻，收入《四库全书》。清内府印行过17种方略（包括铅印），详情见表九。（图14、图15）

[1]《钦定大清会典》，卷三，办理军机处·方略馆，53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影印，1986年。

表九 清内府刊印方略一览

书名	编撰者	刊刻年代	说明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清温达等	康熙四十七年	记平噶尔丹
平定金川方略	清来保等	乾隆十七年	记平金川沙罗奔
平定准噶尔方略	清傅恒等	乾隆三十五年	记平准噶尔部
平定两金川方略	清阿桂等	乾隆四十六年	记平大小金川索诺木僧格桑
钦定兰州纪略	清阿桂等	乾隆四十六年	记平回族马明心起义
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	清舒赫德等	乾隆四十六年	记平山东王伦起义

续 表

书　名	编撰者	刊刻年代	说　　明
皇清开国方略	清阿桂等	乾隆五十一年	
钦定平定台湾纪略		乾隆五十三年	记平定林爽文起义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	清托津等	乾隆六十年	记平林清·李文成起义
钦定廓尔喀纪略		乾隆六十年	记征战廓尔喀
钦定平苗纪略	清鄂辉等	嘉庆年	记平苗族起义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清庆桂等	嘉庆十五年	记平白莲教起义
钦定平定回疆剿捦逆裔方略	清曹振镛等	道光十年	记平回族张格尔起义
钦定剿平捻匪方略	清奕䜣等	同治十一年	记平捻军起义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	清奕䜣等	同治十一年	记平太平天国起义
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	清奕䜣等	光绪二十二年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暨贵州苗匪纪略	清奕䜣等	光绪二十二年	

图14（左）
《皇清开国方略》，乾隆五十一年武英殿刻本

图15（右）
《钦定平定回疆剿捦逆裔方略》，道光十年武英殿刻本

皇清開國方畧卷一
太祖高皇帝 癸未年至丙戌年
癸未年夏五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初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
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哷城主阿太章京
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
率遼陽廣寧兵二路進成梁圍古哷城遼陽副
將圍沙濟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

欽定平定回疆勦捦逆裔方略卷之一
嘉慶二十五年秋九月庚申
命伊犂將軍慶祥馳赴喀什噶爾捦捕逆裔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慶祥曰據斌靜等奏圖舒克塔
什卡倫外之沖巴噶什愛曼布魯特比蘇蘭奇串
通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滋事賊衆約有三百餘
人業將圖舒克塔什卡倫官兵殺傷並將伊斯里

有的方略并非单纯的军事史，乾隆时所撰《平定准噶尔方略》一书，内容宏富，其中于西北地域、民族多有考证，与《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相对照，足供考史者参考。由于方略详述事件的缘起，并详陈事件的经过和结果等，可供详细了解事件的全过程，故多富于史料价值。但是官修方略为了炫耀武功，对失误与不利之处多加掩饰，乃至篡改，[1] 从而影响其史料价值的真实性。这是官修书籍的又一弊端。

【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叙录》,212页;《清太宗汉文实录初纂本与重修本的比较》,218页,载《清代史料论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

2. 民族史书

作为巩固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措施，满清统治者非常注重编纂本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乾隆帝发起编纂的民族史专著《满洲源流考》，是清代关于满族历史源流方面最有权威和代表性的专著之一。全书共分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门，它的编纂对满族人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统一也有很大意义。清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建立与蒙古族少数民族的联盟，以壮大满族的实力，所刻《蒙古源流》一书即是以明代为主的蒙古编年史，内容可补《明史·鞑靼传》的不足。

3. 则例与民族法规

清廷在仿袭前代政书的基础上，又编纂了行政法、民族法、边疆地区法等等，新增若干部门或专门的细则，即书名中有“则例”二字的一系列书籍。当时的中央各部、院，无不编有则例，而且各个部、院之下，还有分司或专门性的则例。如吏部有《吏部处分则例》、《吏部铨选则例》、《吏部验封司则例》、《吏部稽勋司则例》等；户部有《户部旗务则例》、《户部鼓铸则例》、《户部军需则例》、《户部漕运全书》、《赋役全书》；兵部有《兵部处分则例》、《兵部武场条例》、《督抚则例》、《兵部军需则例》、《八旗则例》等。特殊性的规例有《钦定台规》、《科场条例》、《金吾事例》、《皇子事例》等，少数民族法规有《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等，大大丰富了政书的品种和内容。众多的则例分工细密，互为补充。乾隆一朝，新增品种最多，数量超过了其他各朝之总和。

多数部门则例都经过数次续修，以确保其时效性和可操作性。其中，“会典”、“则例”和律例皆定期续修，五年小修一次，又五年大修一次。[1] 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后，各部则例十年纂修一次。[2] 每朝相沿不辍，直至清末，以适应典制的变化。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如《钦定学政全书》，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后，经礼部议准，统以10年为期续加纂辑刊发一次。如果10年内例案增改不多，则继续延长，甚至出现续修间隔长达70年的情况。[3] 无论按时续修，还是因故延迟数十年，前后各本的内容都是接续的，构成相互衔接、较为完整的文本系统。续修不仅仅是增补。《大清律例》的续修大致包括修改、修并、续纂、删除四项内容。[4] 随着不断续修，内容一般会依次递增。

部分品种是从某部则例中分化出来的，如清初创修《中枢政考》时，各分八旗、绿营两部分，并附处分条例，头绪纷乱，嘉庆十八年续修时，奉旨删去《处分条例》而另行纂辑，并成为定制。[5] 后来的管理全国军务的兵部则例，包括《中枢政考》、《八旗则例》、《处分则例》、《军器则例》、《武场条例》等多种，内容各有侧重，互为参照执行。分化出来的则例虽然冠以新名，实为续修的结果。

新增则例品种的繁多，一方面说明乾、嘉时期的典制建设已经趋于系统和完善；另一方面说明政书的编纂已经制度化，各部对于政书体裁的运用，已经达到熟稔有加的程度。

4. 民族文字图书

清定满语为国语，故满语又称清语。清统一全国后，为适应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也为便于八旗子弟学习满文，由官方组织人力编纂了大量的满文字书、词书。康熙十二年（1673年），命编《御制清文鉴》，经过35年的努力，始得告成。该书虽然未能将各地的满语方言全部厘定和统一，但保持了官方通行的书面满语的规范与纯正。不仅便利于当时的流通与应用，而且造福后世。两年后，又命修《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

【1】《钦定中枢政考》卷前，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五年兵部奏疏，清道光五年兵部刻本。

【2】《钦定礼部则例》卷前，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德保奏疏，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增修三十八年本。

【3】［清］光绪十年《钦定工部则例》卷前，光绪八年二月十四日工部奏疏。

【4】《钦定大清刑律》卷前，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沈家本奏疏，清宣统二年七月铅印本。

【5】《钦定中枢政考》卷前，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五年兵部奏疏，清道光五年兵部刻本。

乾隆时期，为了解决满文著述和翻译中使用词语混乱的现象，曾对满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通过上谕规范满文，同时相继完成两体、三体和四体《清文鉴》，以及《清文汇书》、《清文补汇》、《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实录内摘出旧清语》等大量满语规范化工具书的梓行，从而使满文的发展进入到较高的阶段。乾隆中叶编纂的举世闻名的《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一部满、汉、蒙、藏、维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大词典，共收词条18 000余，内容丰富；乾隆时期还编了另一种“五体字书”即《满蒙汉藏嘉戎文合璧字书》，嘉戎语即今四川西部藏族所用方言，这部书对研究藏语方言，颇有价值。这些民族文字辞书是以上各族文化的缩影，也是清代统治者对民族文化的贡献之一。为了解决满文著述和翻译中用语混乱的问题，乾隆时还对满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理，后称整理前的满语为“旧清语”，整理后的满语为“新清语”，编纂了大量满语规范化的工具书，如《清汉对音字式》、《御制清文鉴》等，后者不断增进其他语种，衍化成两体、三体、四体等系列工具书，最后才形成满、汉、蒙、维、藏五种文字对照的大辞典——《五体清文鉴》，象征着清代民族团结的巩固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其他如《四书》、《五经》、史传、方略、政书、历书、诗文、佛经、语言文字、工具书等，皆同时刊行汉、满或蒙、藏文本。

5. 佛经

清帝崇佛，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敕译、写刻了不少佛经。佛教传入已久，其理论学说已为社会各界众多人士所接受，统治者顺应这一大势，既借助佛教理论的影响和威力，以之作为强化其政治统治的思想工具之一，同时又摈除对己不利的部分，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态度，寓政治目的于佛经的编刊之中。（图16）

在佛经编刊方面，以雍正、乾隆二帝最为热衷。从其编选的有关佛学的多种书籍、御制序文及有关谕旨中，可见其对佛教的认识、爱憎见解及对佛经内容删汰取舍“意趣”之所在。特别是

雍正帝，运用佛教来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倾向非常明显，下列佛释书籍多数是雍正朝刻本，如《二十八经同函》、《御选语录》、《御制序文》、《御录经海一滴》、《圆通妙智大觉禅师语录》、《御制拣魔辨异录》以及针对民间的《径山藏》刻印的《清藏》，都显露出雍正企图在宗教领域和思想领域内芟除异己，消弭其中的反清思想，强化对各族人民的统治的政治用心。对《龙藏经》，增入明清时期著名僧人语录、杂著，雍正帝选录的《御选语录》、《御录宗镜大纲》等，撤出《出三藏纪集》、《佛祖统纪》等重要典籍。印成后，乾隆帝还再三下令撤毁其中“违禁”的内容，甚至对已经颁赐给各地

宗鏡錄卷一　并序
宋慧日永明妙圓正修智覺禪師延壽集
伏以眞源湛寂覺海澄清絶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心成業識之由爲覺明之咎因明起照見分俄興隨照立塵相分安布如鏡現像頓起根身次則隨想而世界成差後則因智而憎愛不等從此遺眞失性執相徇名積滯著之情塵結相續之識浪鎖眞覺於夢夜沉迷三界之中瞽智眼於昏衢匍匐九居之內遂乃縻業繫之苦喪解脫之門於無身中受身向無趣中立趣約依處則分二十五有論

图16
《宗镜录》，雍正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表十　清内府编刊佛经一览[1]

书　名	译　者	刊　刻　时　间
《大藏经》		清康熙年内府刻蒙文本
《甘珠尔》	清圣祖玄烨敕译	清康熙三十九年内府刻藏文本
《圣祖御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清圣祖玄烨书	清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御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唐释玄奘译 清圣祖玄烨书	清康熙六十一年内府刻本
《丹珠尔》	清圣祖玄烨敕译	清雍正年内府刻藏文本
《四体翻译心经》	清圣祖玄烨敕译	清雍正年内府刻本
《圆通妙智大觉禅师语录二十卷》	清释行音撰 实力、实惠编	清雍正五年内府刻本
《御选宝筏精华附金屑一撮》	清世宗胤禛选	清雍正十一年武英殿刻本
《大藏经御制序文》	清世宗胤禛撰并书	清雍正十一年武英殿刻本
《万善同归集》	宋释延寿撰	清雍正十一年武英殿刻本
《御选语录》	清世宗胤禛选	清雍正十一年内府刻本

[1] 本表主要依据《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编，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目录》(台北故宫博物院编，1986年出版)等资料整理。

续　表

书　名	译　者	刊　刻　时　间
《宗镜录附音释》	宋释延寿撰 清释超海等校	清雍正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御录宗镜大纲》	清世宗胤禛录	清雍正十二年武英殿刻本
《重订教乘法数》	明园瀞辑 清胤禛重订	清雍正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教乘法数摘要》	清世宗胤禛辑录	清雍正年内府刻本
《御录经海一滴》	清世宗胤禛辑	清雍正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御制谏魔辨异录》	清世宗胤禛撰	清雍正年内府刻本
《翻译名义集选》	宋释法云撰 世宗胤禛选	清雍正年内府刻本
《永明心赋注》	宋释延寿撰 明赵古蟾注	清雍正十一年武英殿刻本
《妙圆正修智觉永明寿禅师心赋选注》	宋释延寿撰 明赵古蟾注 清世宗胤禛选注	清雍正年武英殿刻朱墨套印本
《二十八经同函》		清雍正十四年内府刻本
《龙藏经》	清允昼 释超盛等编	清雍正十四年至乾隆三年内府刻本
《吉祥偈》	清高宗弘历译	清乾隆年武英殿刻满文本
《大悲心忏》	宋释知礼撰 清张若霭书	清乾隆十年武英殿刻本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唐释玄奘译	清乾隆三十二年武英殿刻本
《御制翻译名义集》	宋释法云编 清高宗弘历译	清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满汉蒙藏合璧本
《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	宋释法贤译	清乾隆三十六年武英殿刻本
《大藏经全咒》		清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刻满汉蒙西番合璧本
《四体翻译楞严经》	清允禄、章嘉国师等编译	清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刻满汉蒙土伯忒合璧本
《清文翻译全藏经》	清高宗弘历译	清乾隆五十五年武英殿刻朱印满文本
《御译大云轮请雨经》	清高宗弘历译	清乾隆年武英殿刻满汉蒙藏合璧本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清乾隆年武英殿刻满汉合璧本

寺院的经卷也严令查剿，送京销毁，因而这部《龙藏》较明刻诸藏有着更浓重的“钦定”色彩。

6.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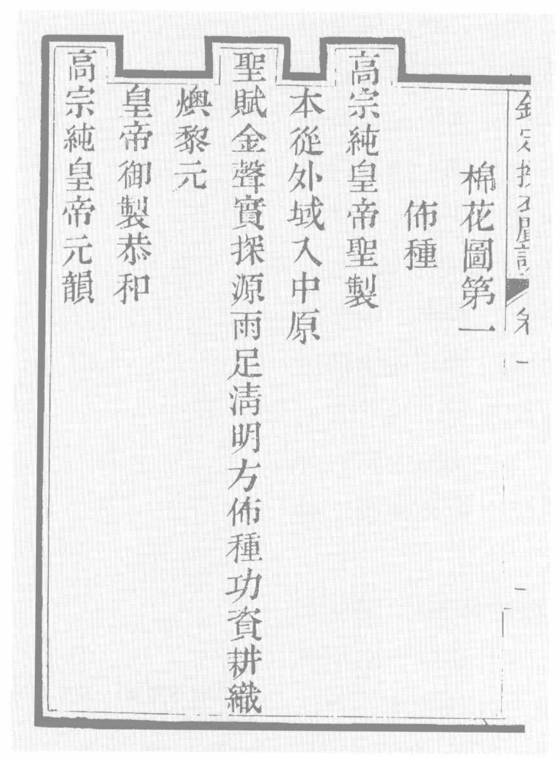
清内府编刻的书籍涵盖了经、史、子、集各个部类。除以上

群列者外，单部的、有价值的书籍还有很多。比如，在汉语辞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康熙字典》。在康熙帝看来，清初通行明梅膺祚的《字汇》有疏舛之弊，而张自烈的《正字通》又比较芜杂，以前各代所编字书亦鲜能精当美备，均不足为据。随着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南北音声各异，经传音义繁杂玄妙，于是令张廷玉、陈廷敬等30余人纂修了这部博采众家之长的汉文字典。书中共收单字49 000多个，包括很多僻字、奇字、俗字，收字数量超过以往任何字书。同时，注重分析汉字结构，并对每字的不同注音、义项、引例等都旁罗博证，“无一义之不详，无一音之不备”，凡古籍所载务使包括无遗。它继承了《说文解字》以降历代字书的优点，问世以后流传极为广泛，至今仍是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

再如有“数学百科全书”之称的《御制数理精蕴》，是康熙帝核定的数学著作。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五卷曰“立纲明体”，包括数理本原、河图、洛书、周髀经解、几何原本、算法原本；下编四十卷曰“分条制用”，包括首部、线部、面部、体部、末部，大体按算术、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代数分类论述。附录数学表四种八卷，依次为八线表、对数阐微表、对数表、八线对数表，还有西方计算尺的知识。既有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又有清初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贯中西之异同而辨定古今之长短，涉及当时数学的各个分支。稍后，将这部书与天文历法著作《历象考成》和音乐著作《律吕正义》合编为一部科学巨著——《御制律历渊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巨大影响。(图17)



图17
《御制数理精蕴》，康熙年铜活字印本



棉花圖第一
佈種
高宗純皇帝聖製
本從外域入中原
聖賦金聲實探源雨足清明方佈種功資耕織
煥黎元
皇帝御製恭和
高宗純皇帝元韻

图18
《钦定授衣广训》，嘉庆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此外，还有很多富有价值的书籍，如总结清以前历代救灾活动的《钦定康济录》；述嘉峪关至新疆全境地理志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有关黄河真源的图说、表解、质实、证古、辨讹、纪事等的比较系统的资料书《钦定河源纪略》；研究清朝100多年间全国水患和治理黄、淮、运河等水利工程的重要史料《南河成案》及《南河成案续编》；反映乾隆全盛时期境内各民族和域外与清王朝有交往的国家和民族的地区特征、人物衣冠状貌的《皇清职贡图》；辑录明以前1 800多种书中的书画艺术资料的《佩文斋书画谱》；汇编植物谱志的全书《佩文斋广群芳谱》；有关植棉和棉纺织的图谱《钦定授衣广训》（图18）；集历代农书之大成的《钦定授时通考》；汇集整理了15种传统医书并对其基本理论和临床经验加以总结、被太医院指定为医学教科书的《御纂医宗金鉴》；收录了1 529件铜器并附摹图和款识的雕印精良的图谱《西清古鉴》等等，因篇幅限制，不能一一尽述。它们都综合了当时各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需要不断地整理、认识和研究。

三、敕修书籍的主要特点

综上所述，官方编纂的书籍，在选题、旨趣、资料范围、功能等方面都与民间出版的书籍显著不同，有突出的庙堂特色。

（一）官修书籍中的帝王意志

这一特点首先从内府书籍的名称上反映出来，书名冠有“钦定”、“御纂”、“御批”、“御撰”、“御制”、“御定”、“御录”、“御选”、“御注”等字样者，不胜枚举。笔者据《清代内府刻书目录

解题》初步统计：清代内府印行的1 311种书籍中，“钦定”276种；“御定”1种；“御制”82种；“御纂”11种；“御批”4种；“御注”5种；“御撰”2种；“御览”1种；“御书”2种；“御录”2种；“御选”8种；“御译”1种；“御论”3种；“钦颁”2种，总计411种。包括经学、史学、志乘、字书、目录、类书等多种类目。这一数字仅仅是书名中明确标出以上字样的书籍数量，远不能说明这就是“钦定”、“御纂”的范围。实际上，其余没有标明“钦定”之类字样的书籍，也都是秉承皇帝的旨意编刊的，如《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是乾隆帝命儒臣校刻的；《平定两金川方略》、《皇清开国方略》和《西域同文志》等书也是皇帝敕编或敕撰的；还有私人刻书进呈“御览”、书版归入内府的，如康熙时徐焯编辑的《全唐诗录》，是康熙赐帑刊版；康熙时还购入马骕《绎史》的书版，由内府印行；[1] 还有《南巡盛典》、《幸鲁盛典》等书，也是由臣工疏请，得到皇帝的“恩准”后纂辑而成的。遍观内府诸书，有哪一部不是经过皇帝审定就能够付刊呢?在整个编刻过程中，皇帝都要对书籍进行批点、评论，还就书籍的内容增删、体例编排、材料取舍等颁发敕旨，而且每书编纂的组织、纂修人员的任命和遴选，乃至具体的刊刻、装潢等事宜均需按皇帝“旨意”进行。儒臣们奉敕参与其事，均极为尽职尽责，不敢稍有怠慢，否则即会遭到罚俸或治罪。[2]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书名前有没有“钦定”之类的字样，清朝统治者对于所有书籍编刊的控制是同样严密的。

【1】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

【2】《军机处录副奏折》、《武英殿修书处档》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有的书冠以“御制”，却未必真的是“御制”，清高宗五集御制诗，加上《乐善堂全集》中皇子时代的诗作及去世后刊行的《御制诗余集》，总数达3万余首。其诗作之多，无人可以比拟，令人怀疑这些诗作之所出。对此，皇帝本人并不讳言，申明其“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然而，这些诗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即使是他人代笔之作，也理应是经过乾隆帝审定的。各种“御制”之作，是帝王志趣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康、雍、乾三帝，不但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和诗人。其诗作题材

广泛，内容极为丰富，举凡创业、守成、筹边固疆、南巡北狩、察吏安民、编定群书、听政批折、祭礼筵宴、游览山河、品评书画等文治武功之事无不入诗，其行之所至、情之所至、思之所至和兴之所至无不吟咏，且多写实之作，与时政密切相关，其笔触涉及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学术、宗教、艺术、边疆、民族、社会风情、宫廷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重要领域。“诗以证史”，由于皇帝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加上不少诗作附有详细的序文及诗注，或详述事实，或诠解典故，或说明诗意、介绍背景等，是皇帝各个时期生活、思想和心态的写照，为其他文献所不载，因此也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图19）

内府书籍的编刊是在帝王的严密控制之下，然而每个皇帝的个人兴趣、爱好和政治方针有所不同，这种个人的好尚或志趣便以帝王的权威和意志直接纳入出版选题，以官方认可或官修的形式出版、发行，由朝廷自上而下地向全社会推广，进而成为一个时代书籍编刊的倾向或热点。由此又会产生几种结果：当帝王个人志趣与社会的需求或潮流相一致时，会出现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反之，则会带来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图19
［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嘉庆五年武英殿刻本



书籍是思想文化的载体，清帝为了巩固统治，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地编书、校书、刻书等“文治”活动来标榜自己的文化功绩；另一方面，借聚书、访书之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违碍悖逆”之书，又对保存下来的许多书籍加以酌量改易，从而达到思想控制的目

的。编《四库全书》时，全部禁毁书籍达3 100多种，151 000多部，销毁书版80 000块以上。[1] 以上各书大多是难得的珍贵文献，使得中国典籍散佚数量也大大超过以前各代。而民间在高压政策下，自行毁掉的书籍数量也不在少数。禁毁活动给中国古代尤其是宋元以后典籍带来的损失，对当时及其后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造成的危害，已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和计算。可见，书籍编纂这类学术性活动已服从于政治实用性的目的了。

[1]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封建统治者以屡兴文字狱和钦定、御纂等手段，造成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迫使大批才智之士为避祸而埋首古书，以治经或整理古史为安，经年累月陷于字句的考证，走向脱离实际的繁琐考据，从而在客观上推进了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考据学成为当时学术的主流，学者们不问时事，淹没经世致用优良学风。随着封建社会日趋没落，清代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主义在官修活动中日益强化，以后学者们虽又编纂了大量书籍，但由于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要求和限制，也都是一切唯皇帝之命是从，对学术的发展起了阻滞的作用。

(二) 官修书籍的"资治"和教化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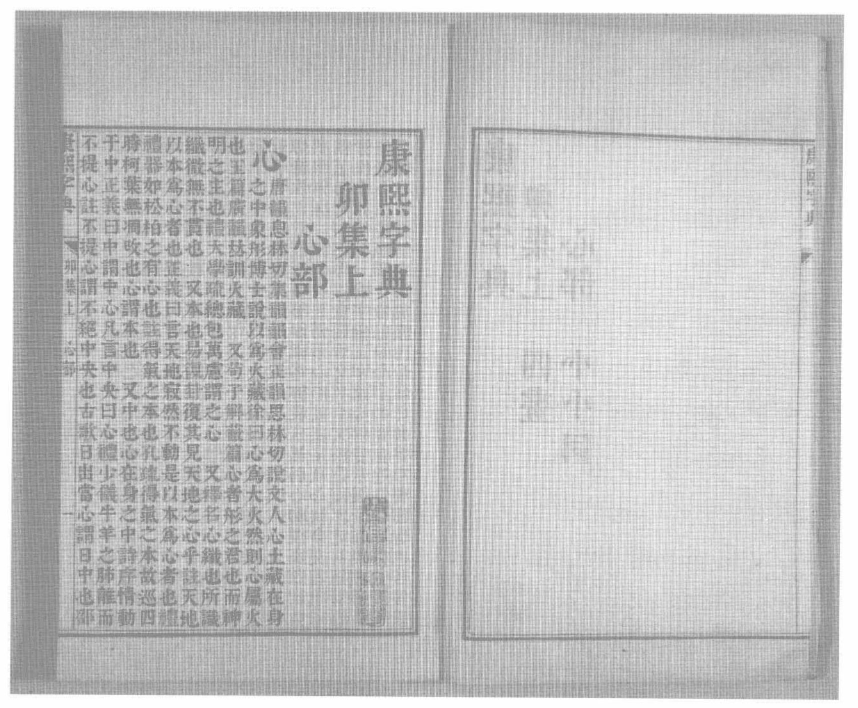
多数书籍的编撰，都是出于"资治"的需要和动机，尤其是敕编的各种史籍，提供了前代治乱得失的经验教训及圣君贤臣的经国之言，统治者可从中取得鉴戒，以守住天下大业。如乾隆帝敕编的《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取正史中自周至明历代册立太子事迹里有关鉴戒者编纂而成，共33件，以昭殷鉴。嘉庆帝命儒臣仿宋范祖禹《唐鉴》体例编成的《钦定明鉴》，取材于《明史》、《通鉴》、《御选明臣奏议》等书，还摘录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专论朱明一代的政治得失和教训。

很多具有"资治"功能的书籍，往往需要通过教化才能实现。这种教化，一是帝王的自我教育，经筵日讲即是主要方式之一。通过系统地学习《四书》、《五经》和诸史等，增长才识，博古通今，获得治国安邦的本领；二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向皇室子孙、后妃、中央及地方的臣僚乃至全国的百姓施教。如后宫教

育，其头等大事是培养塑造未来的皇帝。除令其学习满语、蒙文、骑射外，更多的则是要他们系统学习四书、五经、性理和通鉴之类。针对他们的特点，编刻了《承华事略》、《养正图解》等启蒙书籍，其语言浅近，并配有插图，以图附说，使他们从小就观摩古代帝王圣贤的嘉言善行，并以逆臣恶事为反面典型，了解历朝兴衰成败的史事，懂得治国之道和化民之方。针对内宫后妃，世祖福临辑注的《内政辑要》和《御定内则衍义》，采辑历代古籍中有关后妃的典型言行，再引经史诸书推阐衍义，意在使后妃以前贤为楷模，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再如对臣属的教育，顺治年间颁刻的《御制资治要览》，按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编次，分别阐述"君、臣、父、子"之道和齐家治国之方，并以儒家理论为经，历史上正反两方面事例为纬，劝勉百官敦品饬行。世宗所辑《劝学文》，辑录了宋真宗赵恒、宋仁宗赵祯以及唐宋两代著名历史人物，如白居易、韩愈、司马光、朱熹等人倡导读书学习的诗文，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劝勉人们要不懈地努力学习、求知，是一部启蒙励志的普教读物。雍正帝所编《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一书，追记其父皇康熙帝庭训之言246则，书中内容上涉天象，下及地舆，大到安邦治国之道和为君之方，小至饮食起居的细微琐事，均予以训导，作为治家、治国、教子、修身的座右铭。它如《御纂朱子大全》、《御纂性理精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多种书籍，更是广颁全国，作为童生的必读书和科考的标准。

(三)官修书籍资料的完备性

清帝效法前代明君，励精图治，加上官府收藏的文献丰富，又拥有众多翰林学士、硕学大儒组成的编纂群体，故所编书籍广征博引、资料宏富、内容全面，动辄万卷、数千百卷，前述《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四库全书》等丛书，无不具有涵尽古今藏书的恢弘气势，显示出极大的魄力。再如字书《康熙字典》，较梅膺祚的《字汇》多收13 856字，许多生僻字、奇冷字都收录其中，并把过去所收的怪字加以专门整理（图20）；《佩文韵府》



康熙字典
卯集上
心部
心唐韻息林切集韻韻會正韻思林切說文人心土藏在身
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藏徐曰心為大火然則心屬火
也王篇廣韻兹訓火藏　又荀子解蔽篇心者形之君也而神
明之主也禮大學疏總包萬慮謂之心　又釋名心纖也所識
纖微無不貫也　又本也易復卦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註天地
以本為心者也正義曰言天地寂然不動是以本為心者也禮
禮器如松柏之有心也註得氣之本也孔疏得氣之本故巡四
時柯葉無凋改也心謂本也　又中也心在身之中詩序情動
于中正義曰中謂中心凡言中央曰心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
不提心註不提心謂不絕中央也古歌曰出當心謂日中也部
康熙字典　卯集上　心部　一

图20
《康熙字典》，康熙五十七年武英殿刻本

一书，各韵所收字头12 000余个，词藻数量达六七十万条。每条词藻下征引文籍，少则一例，多至十数、数十例。《渊鉴类函》的实际字数倍于《太平御览》，更数倍于《唐类函》。资料完备的优势是一般官私、坊刻书籍均无法比拟的，这使得它们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　翻译机构与翻译活动[1]

清王朝广收博蓄的文化政策以及其多民族特性，加之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清代翻译图书出版之盛，为历代之首。

一、入关前的翻译活动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满

【1】常林：《清代北京翻译图书出版述要》，《满族研究》1997年第2期。

文，后世谓之老满文，或称无圈点满文。既创满文，便颁行部中，复命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等记注政事，翻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诸书。

早在关外时，清太宗皇太极就确立了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的方针，其主要手段是开始译刻有关的汉文图书，并吸收使用。天聪三年（1629年），“夏四月丙戌朔，设文馆，命巴克什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旋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酌加圈点，使之成为相对完善而便于学习的语言符号，成为新满文。文字的改进无疑促进了当时翻译工作的开展。此后便有了天聪九年（1635年）纂修《满洲实录》之事。该书记述了努尔哈赤的开国事迹，是清代所修的第一部《实录》，共8卷，图文并茂，兼有满、蒙、汉三种字体。崇德四年（1639年），又“命达海译《通鉴》、《六韬》、《孟子》、《大乘经》”，还刻有《国语》、《四书》、《三国志》（达海译）各一部，主要是用以“临政规范”，并使军事将领们从中学习兵法和道德规范。

二、入关后的翻译活动

清王朝进入政权的巩固阶段后，执政的多尔衮、顺治、康熙、乾隆等人都把尊重汉族的传统文化，全面吸收儒家学说，重视提拔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作为治国之第一要务，大量译刻汉文经典著作。为此还专门培养、选拔翻译人才，如在乾隆年间多次举办翻译乡试和会试。同时清王朝对西方和阿拉伯的外来文化也不盲目排斥，而是采取了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正确态度。因此清代翻译图书的出版主要分两部分：即对汉文儒家经典、史学、医学、地理、文学艺术等图书的译刻和对外来宗教、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等西方图书的译刻。

（一）汉文典籍的翻译

清入关后的翻译出版工作，仍旧是从满文与汉文字的翻译开始的。康熙帝亲政后，对汉文化的学习与吸收进一步成熟。如他令将《大学衍义》翻译成满文，进呈太皇太后，并颁赐诸王以下

各官；同时又赐八旗官学各一部，作为满蒙官学生必读之书。到乾隆朝时，清政府还专门设立翻书房，并由内府译刻了不少经学图书。据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一载："定鼎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由于清帝对儒家经典的推崇，自清初开始，至乾隆朝的百余年中，特别译刻了《满汉合璧五经四书》。在鼓励翻译儒家、史学等著作的同时，清政府却严格禁止译刻《水浒传》等汉文小说。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上谕内阁："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裨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为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但另据陶湘所编《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卷下·清文书目》中载，满文本的《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后西游记》等124部满文图书一同赫然在目，可见内外标准有所不同。史学书籍方面，康熙三十年（1691年）三月二日，满译《通鉴纲目》成。地理书有殿版《西域同文志》24卷8册。康熙十二年至四十七年（1673—1708年）六月二十二日，由傅达礼、马齐、马尔汉等奉敕纂《清文鉴》告成。此书为满文分类辞典，共36部，280类，21卷，共收12 000余条，后几经重修，在《清文鉴》、《满蒙文鉴》、《两体清文鉴》(又名《御制增订清文鉴》)、《三体清文鉴》(又名《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四体清文鉴》的基础上，成满、汉、蒙、藏、维5种语言对照之《五体清文鉴》。可见，清代出于民族团结的国家政策，还大量进行了汉文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或多种民族文字合一的图书译刻工作。如藏文图书的翻译有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北京以藏文梓版刊行的藏族说唱体英雄史诗《格萨尔》(即《格

萨尔王传》)。有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月用满文、蒙文、汉文三体合一，由国史馆会同理藩院将各蒙古扎萨克事迹谱系详加采订，以一部落为一表传，其事迹显著之王公每人立一专传，而成的《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历书方面除有内府满文本《时宪书》、《钦定星历考原》、《日食图》、《月食图》外，还有蒙藏不同译本行世。据《〈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考》一文考证，康熙年间由奏藏蒙事内府御前侍卫拉锡、藏文学校藏蒙文教习扎萨克喇嘛丹金格隆、蒙历法师伯吉、蒙译师奥其尔、汉历法师何国宗、刘玉恩等36人，“谨遵圣命”，将此“前所未有的历算典籍之精本重新用汉字编写，再用蒙文翻译刊刻”。成书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初八日，始译自汉文。所译汉文书即明末之《崇祯历书》，清初之《西洋新法历书》，后名《时宪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据此蒙文本，译刻成藏文本。藏译本校阅刊版序言中云：“又命文殊大皇帝之亲弟子，精习此道之格隆·阿旺罗卜藏、格隆·丹巴加木参二人为钦使，携此蒙文译本送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请其译为藏文。于是以大师为首，与呼毕拉干·兰占巴、衮班智达、额尔德尼·毕力克图等共同译成后，进献于帝。时予承乏驻京掌教，奉旨校阅刊板，参与其事者有总管京师喇嘛扎萨克·阿旺巴拉珠尔呼图克图……，竭尽绵薄，细勘蒙藏两文，遇难处则对勘汉文；浑天仪等图绘制者系汉族算术博士刘玉恩。”由序言中可知蒙藏两部历书的译刻源流以及满、汉、藏族翻译家们的紧密协作，这是清前期翻译出版史上的又一个值得称颂的事件。故宫博物院还存有清乾隆六十一年(1796年)内府泥金写本《笳吹番部合奏乐章满洲蒙古汉文合谱》一部，这是仅有的辑录清代少数民族和外国乐曲的音乐书籍，内有满、蒙、汉、西番、安南、缅甸等六种文字。此外，还有清内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雍正二年(1724年)译刻的《藏文大藏经》，于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年)译刻的《蒙文大藏经》，于乾隆五十五年译刻完成的《满文大藏经》。

清代北京的少数民族文献的官方刻印机构，主要是崇祝寺，

它可称为清代蒙文、藏文的刻版印刷中心。该寺除刻印蒙、藏文经典外，还刻印世俗蒙文图书。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刻版朱印《(御制）蒙文甘珠尔》108函，乾隆十四年〔1749年）刻版朱印《(御制）蒙文丹珠尔》225函（即《蒙文大藏经》）等佛教经典，乾隆七年（1742年）刻印《智慧之源》(即《藏蒙合璧海比忠乃词典》)，道光八年（1828年）刻印藏蒙合璧《详解月光词典》，以及刻印《易学藏文》、《古旧字韵》、《药方》、《各种必需药剂配方汇集》、《七珍丹与药方》和《王中书劝孝八反歌》(满汉蒙文）等图书。

总的来看，殿版中满文刻本包括有历史、地理、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军事、法律、语言、文字、天文、医学、农业等各类。仅以十三经来看，几乎全部被译为满文并刻印出来。现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文书目》将殿本满文图书列出，计124种：

圣训类有《太祖高皇帝圣训》、《太宗文皇帝圣训》、《世祖章皇帝圣训》、《圣祖仁皇帝圣训》、《世宗宪皇帝圣训》、《高宗纯皇帝圣训》、《仁宗睿皇帝圣训》、《宣宗成皇帝圣训》、《文宗显皇帝圣训》、《穆宗毅皇帝圣训》、《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圣谕广训》、《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覆》、《谕行旗务奏议》、《实录内摘出旧清语》；

方略类有《皇清开国方略》、《平定三逆方略》、《御制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御制平定金川方略》、《御制平定两金川方略》、《安南使事纪略》；

法律类有《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则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大清通礼》、《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钦定宗人府则例》、《钦定八旗则例》、《钦定吏部则例》、《礼部则例》《近科试策法程》、《钦定户部旗务则例》、《钦定中枢政考》、《督捕则例》、《白塔信炮章程》、《钦定回疆则例》、《大清律例》、《大清律集解》、《大清律续纂条例》、《大清律续纂

条例总类》、《钦定国子监则例》；

历史类有《八旗通志初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图21)、《蒙古源流》、《辽史》、《金史》、《元史》、《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览纲目续编》、《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纲鉴汇纂》、《历朝史传抄》、《恩封宗室王公表》、《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昭忠祠传续编》、《御制清凉山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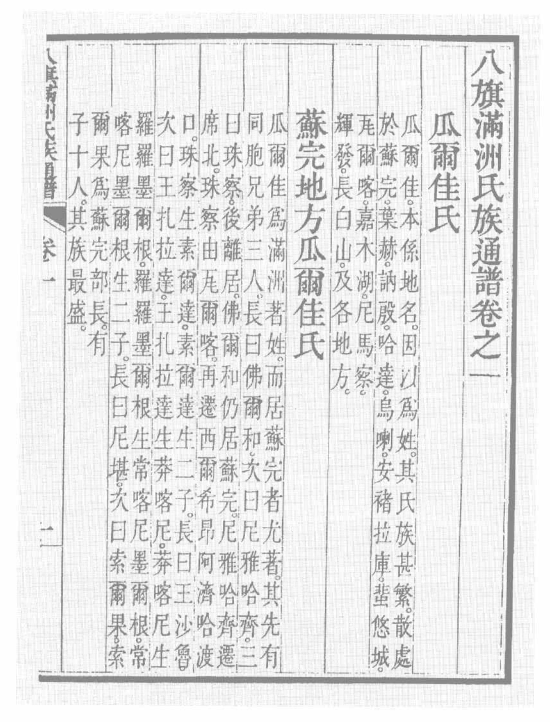
儒家经典有《易经》、《日讲易经解义》、《书经》、《日讲书经解义》、《御制诗经》、《日讲春秋解义》(图22)、《御制清文四书》、《日讲四书解义》、《孝经合解》、《女孝经》、《御制清文鉴》、《字法举一歌》、《小学合解》、《御纂性理精义》、《御制资政要览》、《御制劝善要言》、《内则衍义》、《内政辑要》、《御制人臣儆心录》、《大学衍义》、《孔子家语》、《宋名臣言行录》、《养正图解》、《古今列女传》、《人镜阳秋》、《洪武宝训》；

科举类有《顺天府进士考试录》、《顺治十二年进士登科录》；

自然科学类有《时宪书》、《几何原本》、《钦定星历考原》、

图21（左）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馆所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乾隆九年武英殿刻本

图22（右）
《日讲春秋解义》，乾隆二年武英殿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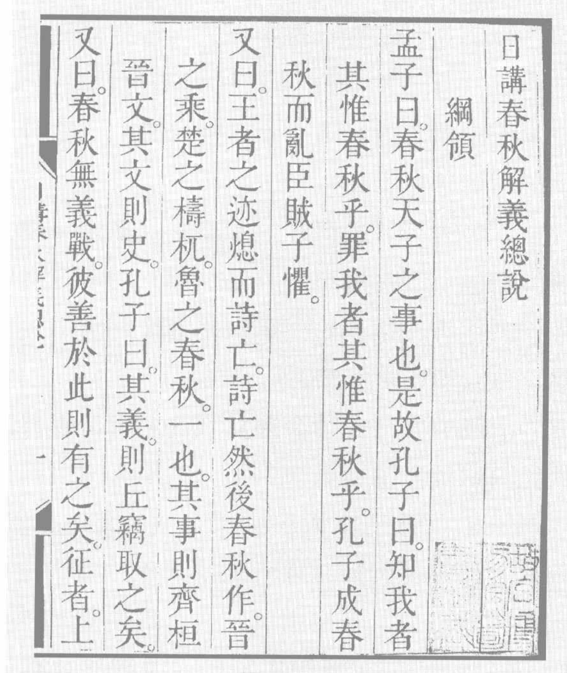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之一

瓜爾佳氏

瓜爾佳本係地名因以為姓其氏族甚繁散處於蘇完葉赫訥殷哈達烏喇安褚拉庫輩悠城瓦爾喀嘉木湖尼馬察輝發長白山及各地方

蘇完地方瓜爾佳氏

瓜爾佳為滿洲著姓而居蘇完者尤著其先有同胞兄弟三人長曰佛爾和次曰尼雅哈齊三曰珠察後離居佛爾和仍居蘇完尼雅哈齊遷席北珠察由瓦爾喀再遷西爾希昂阿濟哈渡口珠察生素爾達素爾達生二子長曰王沙魯次曰王扎拉達王扎拉達生莽喀尼莽喀尼生羅羅墨爾根羅羅墨爾根生常喀尼墨爾根常喀尼墨爾根生二子長曰尼堪次曰索爾果索爾果為蘇完部長有子十人其族最盛


日講春秋解義總說

綱領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

《历事明原》、《日食图》、《月食图》、《前定数》、《晴雨录》、《玉匣记》、《裁衣日》、《王叔和脉诀》、《寿世保元》、《雷公炮制书》；

文学艺术类有《古文渊鉴》、《御制盛京赋》、《御制盛京赋篆字三十二体》、《御制避暑山庄图咏》、《唐人说荟》、《二十四孝图说》、《醒世要言》、《三国演义》、《水浒传》、《樵史演义》、《西游记》、《后西游记》、《连城壁》、《八洞天》、《平山冷燕》；

音乐类有《律吕纂要》、《律吕节要》。

除官方的翻译出版外，民间翻译者也很多，主要有满洲正黄旗人阿什坦，曾用满文翻译《大学》、《中庸》及《孝经》等。

除了各民族文字之间的翻译，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中西文之间的翻译也逐渐展开，许多汉籍被翻译成西文并刊刻流传。试举例说明：

译者	汉籍名或译名	所译语种	翻译或出版时间
卜弥格	《脉经》	法文	顺治十五年译，康熙二十五年刻
郭纳爵、殷铎泽	《大学》	拉丁文	康熙元年江西建昌刻本
殷铎泽	《中庸》	拉丁文	康熙六年广州刻本
	《资治通鉴纲目前编》（部分）	法文	雍正八年北京刊本
巴多明、汤执中	《本草纲目》（节录）	法文	雍正十三年刊
	《步天歌》	法文	雍正十二年刊行
	《礼记》	拉丁文	乾隆十七年刊行

（二）西方图书的译刻

清代初期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态度，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图书的翻译出版。1688年，康熙帝亲政之始，便遇到了中西历法之争。南怀仁“劾奏钦天监监副吴明煊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内，闰二月应是九年正月，又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种种误差”。康熙令议政王开会议决，议政王等“命大臣二十员赴观象台测验，南怀仁逐款符合，吴明煊逐款皆错”。通过新旧历法之争，使康熙首次接触到西方科学，了解到其确有先进之处，从此开始钻研西学，

使得西学图书的满译和汉译发展起来。

为了给康熙讲解西方的算术方法，南怀仁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康熙帝在初学西学时，就十分重视翻译和编纂西学书籍。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一起译述了大量的西方科技书籍。据统计，从明末刻印《几何原本》(1607年）至清雍正帝驱逐传教士止（1723年），共译述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书籍132种，其中有32种是在康熙时期翻译的，有的还被翻译成满文，并由内府刻印出版，如《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文书目》中载的《几何原本》、《钦定星历考原》、《日食图》、《月食图》等。现将清代部分翻译图书情况列表如下，以为清代译刻西方图书的说明：

书　　名	撰译或编译者姓名	出版时间及地点	备注
超性学要	利类思	1654 年	
不得已辨	利类思	1665 年　上海	
康熙永年历法表	南怀仁、闵明我	1668 年　北京	
西方纪要	利类思	1669 年　北京	
历法不得已辨	南怀仁	1669 年　北京	
康熙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月食图	南怀仁	1670 年　北京	
教要序论	南怀仁	1670 年　福建	
真福直指	陆安德	1670 年　上海	
验气说	南怀仁	1671 年　北京	
坤舆图说	南怀仁	1672 年　北京	
赤道南北星图	南怀仁	1672 年　北京	
仪象图	南怀仁	1673 年　北京	
四末真论	高一志	1675 年　上海	
狮子说	利类思	1678 年　北京	
进呈鹰说	利类思	1679 年　北京	
御制简平新仪用法	南怀仁	北京	
进呈穷理学	南怀仁	1683 年　北京	
德行谱	巴多明	1726 年　上海	

续 表

书　　名	撰译或编译者姓名	出版时间及地点	备注
黄道总星图	戴进贤	1737 年　北京	
圣世刍荛	冯秉正	1738 年　福建	
圣年广益	冯秉正	1738 年　重庆	
圣经广益	冯秉正	1740 年　上海	
历象考成续编	戴进贤、徐懋德	1742 年	
仪象考成	戴进贤	1744 年　北京	
仪象考成	戴进贤等	1752 年	
性理真诠提纲	孙璋	1753 年　上海	
性理真诠	孙璋	1753 年　上海	
仪说	戴进贤	1759 年　北京	
地球图说	蒋友仁	1780 年	

宗教图书方面，有沈氏怀安堂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刊印的伊斯兰教书籍《修真蒙引》。天主教书籍则主要是由北京各教堂及传教士刻印的，据李致忠先生的《清代北京图书出版杂俎》一文统计，自顺治至乾隆二十三年以前，共刻印有70余种。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刻印的葡萄牙人何大化的《天主教引蒙要览》，康熙八年（1669年）刻印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妄占辩》，康熙十五年（1676年）刻印的意大利人利类思《司铎典要》，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刻印的西班牙人庞迪我的《七克》等。

雍正皇帝即位后，由于传教士中发生关于传教的名词与礼仪之争，1724年2月雍正皇帝发布禁教令，规定国人信奉天主教者必须放弃，否则将处以极刑，使得在华传教士的数量大减，西学书籍的译刻自然大为减少。在京所译图书仅有戴进贤所译《黄道总星图》、《仪说》、《仪象考成》等几部自然科学图书。

第三章　清前期中央官署出版机构及其出版概况

清代的中央出版印刷，主要集中在武英殿修书处，它所印刷出版的书籍称为“殿本”，武英殿是内务府下设的机构之一，但不是当时内府唯一的刻书机构。其他机构也或多或少承办过宫中刻印书籍事宜：如经清政府奏准的各衙门编刊的六部则例，多由各部自行捐资刻行，这些书通常被称为“各部、院本”；当时扬州、苏州等书局也是内府的书籍承刻单位之一，刻行过著名的《全唐诗》、《全唐文》、康熙帝《御制诗集》等。这些书籍以细楷字精刻，字迹秀丽匀净，其风格接近于康熙时期的武英殿刻本，被誉为“康版”。除了官书局的印刷外，各地书院也从事书籍印刷。由于这些书院多为政府创办，因此书院多成为政府印刷的一部分。

第一节　中央官署出版机构及其出版活动

早在顺治皇帝入关后不久，内府刻书活动即已开始。当时并没有专门的刻书机构，但政局初定，法制亟待建立，用于思想教化的书籍编刻也已提上日程，于是先利用明内府的刻书条件，于顺治四年刻印了《大清律》，这是参照《大明律》编纂的清代第一部成文法典。稍后，又编刻了一系列宣扬儒家伦理、劝善惩恶

等内容的书籍，用以教育臣民及内宫眷属，这些都是为达到长治久安所采取的“文治”之举。这些书籍因为是由明代工匠承办，[1]所以字体、版式等方面都带有明内府刻书的特征。

【1】陶湘：《清代殿版书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一、武英殿刻书处

自明代开始，在宫内司礼监经厂专设刻书机构，用以刊印官府编纂的书籍，强化“文治”。清宫刻书初承明内府经厂之余绪，后针对其刻书内容校勘不精等弊，改变了由司礼监经管的制度，在武英殿设立了修书处，隶属于内务府。

武英殿作为清宫修书处的历史，始自康熙十九年（1680年），[2]初曰武英殿造办处，专司内府书籍的缮样、发刻和刷印。另有一种说法，初曰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1729年）改为修书处，[3]直至清末。时间长达200余年，几乎贯穿全清。武英殿修书处是“殿本”的发源地，有“皇家出版社”之称。

【2】《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清咸丰二年内府抄本。

【3】《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九十九。

（一）武英殿沿革

武英殿区是紫禁城内众多相对独立而对称的建筑群落之一，位于外朝西路，确切地说，是在太和殿西侧的熙和门之西，[4]与太和殿东侧之文华殿构成左辅右弼之势。

【4】［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十三，17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武英殿区的一组建筑为明初所建，据《清宫述闻》等书记载，该殿曾是皇帝斋居、召见大臣之地，设有待诏，择能画者居之，后移至文华殿。武英殿还曾是皇后千秋命妇朝贺之地。此外，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亦曾即位于此。另据清蒋良骐《东华录》等记载：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多尔衮进朝阳门，乘辇入武英殿升座，将其作为办公场所。

（二）武英各殿及其用途

武英殿为前后两重，由武英门、武英殿、敬思殿、凝道殿、焕章殿、恒寿斋、浴德堂诸殿堂及左右廊房六十三楹组成。门前有御河环绕，上跨石桥三座，护以石栏。

武英门：武英殿的正门，是守卫值宿之处。面阔5间，南向，正面辟有3门，设3阶，出9级。黄琉璃瓦歇山式顶，门内丹陛直

通武英殿。

武英殿：正殿。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式顶，南向，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御题门额曰“武英”。周围有石栏，前出月台与丹陛相接，东西陛9级，直通武英门。

敬思殿：武英殿之后殿，储书籍版片之所。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式顶。有乾隆御笔匾曰“敬思”。

凝道殿：武英殿东庑，亦称东配殿。为钦定刊布诸书校刊、装潢之处。面阔5间，进深1间，黄琉璃瓦悬山式顶。乾隆四十年御题“凝道”二字。

焕章殿：武英殿西庑，亦称西配殿。清钦定刊布诸书校刊、装潢之处。面阔5间，黄琉璃瓦悬山式顶。乾隆四十年御题曰“焕章”。

恒寿斋：武英殿东北角之小殿，曾为缮校《四库全书》诸臣之值房。面阔3间，进深1间，黄琉璃瓦硬山式顶。

浴德堂：武英殿西北平台之上，为词臣校书值房，专司刊刻、装潢书籍等事宜。有房3间，坐北面南，卷棚歇山式黄琉璃瓦顶。堂东次间后檐辟门通后室，室平面呈方形，上为穹顶，四壁至顶皆为乳白色瓷片贴面，顶部有窗。其用途说法不一：有说为皇帝斋戒处；又有称为浴室；还有称为蒸纸处，室外有锅台，西有井亭，悬石槽将水引入烧火处大锅，烧水蒸汽入室，供印书蒸熏纸张之用。

修书处的缮校、刊刻、装潢等活动，集中于殿左右直房。此外，武英殿前后二重，即武英、敬思二殿，面积宏阔，皆用于贮书，[1] 收藏数量最多时达到数万册，还有刻书版片数万块。东庑凝道殿也曾收贮过“四库”存目等书9 000余种。因此，武英殿又曾是清宫最大的书库。

武英殿与其他殿堂一样，也是木结构，因而发生过多次火灾。清代较大的有两次：同治八年（1869年），延烧房屋30余间，并焚毁了全部库存殿版书和部分书版，只有焕章殿无恙。同年，重建武英殿。光绪年间，一次雷击，又将武英殿部分殿堂焚毁，以后陆续修建或修补。所以，现今见到的武英殿已不是最初的建

【1】[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十三，17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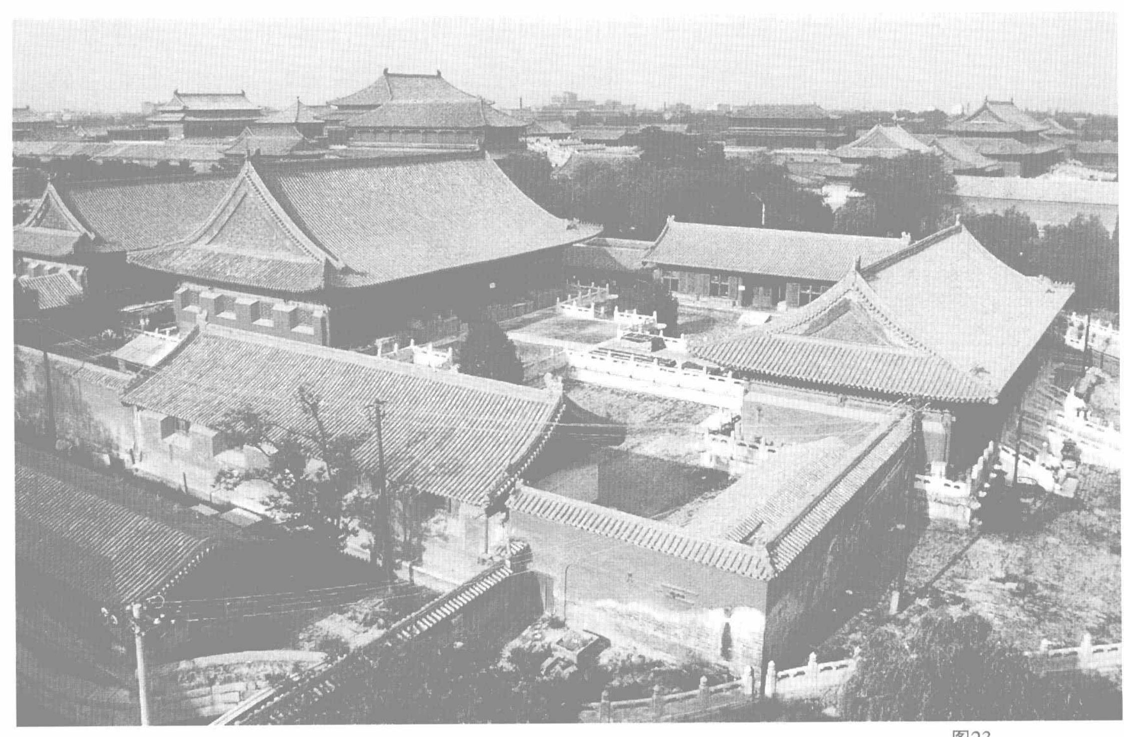


图23
武英殿修书处鸟瞰

筑。（图23）

图中各殿的情形与康熙初年修书处成立时的情形有出入，可能是武英殿经过多次修缮而有所改变的缘故。

（三）修书处的机构、人员及职掌

武英殿修书处掌书籍折配、刷书、刻字等。由监造处和校刊翰林处组成，由皇帝特别简派总理王大臣督办一切事务。具体设管理事务王一人，大臣一人，郎中一人，正监造员外郎一人，副监造副内管领一人，委署主事一人，库掌四人，笔帖式四人，委署库掌六人，额外掌库三人，柏唐阿十六人，效力柏唐阿十九人，委署司匠二人，委署领催六人，苏拉二人。[1]

【1】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文献论丛》，85-116页，民国二十五年。

监造处掌监刊书籍，其下分设若干作房和事务机构：

1. 书作。亦称“作书作”。位于武英殿东南廊房，故称“东作房”或“南作房”。负责各种书籍的装潢、托裱、修补、界划等事宜，故又称为“装潢作”。

2. 刷印作。位于武英殿群房。负责刷印、齐订书页等事务。

3. 折配作。位于武英殿群房。专管折配书页、经页等事。

4. 刻字作。亦称“刻字馆”、“写字局”。该作分宫内、宫外两部分。宫内刻字馆设在武英殿群房，负责钩摹御书、缮写版样、刊刻书版等事宜。

5. 铜字作。负责铜字、铜盘及摆列等事。雍正六年（1728年）始设。

6. 聚珍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应金简的提议而设立。地点在西华门外北长街路东，设有摆书房和供事办事值房，专门负责排印木活字版书籍。

7. 御书处。地点在武英殿斜对面，共有房“四十三楹”。顺治朝设立时称文书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改名。下设刻字作、裱作、墨作和墨刻作，承担钩摹御制诗文、镌刻拓印法帖等任务。道光时因经费支绌，曾归并武英殿管理。后又成为独立机构。设有正监造一人，副监造一人，库掌三人，委署库掌三人，委署司匠四人，笔帖式二人。[1]

【1】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文献论丛》,85-116页，民国二十五年。

监造处还设有若干行政办事机构：如档案房、钱粮房、办事值房、值宿房、材料房、通行书籍售卖处等，负责有关事务。

武英殿下附设校刊翰林处，又称为翰林处、校对书籍处、提调处或校对处等。位于武英殿浴德堂及其周围群房内，有提调房、校勘房和办事值房等。专掌校正文字，包括底本和刻竣之本的校勘。设有苏拉八人，书匠四十四人，刷印匠四十人，恩甲二十二人，裱匠十人，面匠二人，术匠十六人。

武英殿修书处的主要职掌是刊印内府书籍。它的工作内容大致分为缮样、发刻、刷印三个主要环节。此外，还兼办其他事项，如缮写御览图书、存贮宫廷图书、修补装潢内廷藏书、缮印内府所用的礼单和档册，等等。

（四）武英殿刻书概况

武英殿刻印的多是清代皇帝下令编纂的关乎“文治”的书籍，故书名前多有“钦定”、“御纂”等字样，带有强烈的皇帝个人意志和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些书籍都是由专门的修书馆编纂完

成后，再发交武英殿刊刻，因篇幅关系，本文仅限于武英殿刻书方面，即技术的层面。

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武英殿修书处先后刊行书籍数百种，在版本学上即以刊刻地点称之为“武英殿刻本”，简称为“殿本”。

（五）几种具有普查性质的统计资料

近年来，已经不止一位学者作过统计，现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统计资料：

1. 肖力在《清代武英殿刻书初探》一文中，按朝代统计了殿本的卷数和种数，共有520种，52 395卷。这个数目是根据陶湘所编殿版书目得出的。[1]

2. 常林在《清代北京自然科学图书出版述略》一文提到：“从所见的资料来看，武英殿共计刊行各类殿本书籍385种，55 222卷，另有8种不分卷，再加上聚珍版138种，2 414卷，袖珍版13种，940卷，共计544种，58 576卷。”[2]

3. 台北学者吴哲夫，曾以陶湘所编《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核对台湾各大图书馆收藏殿本实况，共得595种，即：经部115种，史部234种，子部107种，集部135种，丛书4种。[3] 因只有总数，不得其详。

4.《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4] 一书（以下简称《解题》），共著录书籍1 310种。其中著录为“武英殿刻本”者不足半数：经部39种，史部249种，子部69种，集部67种，丛书148种，合计为572种。

以上几种统计的数量均在500种以上，而且3、4两种调查的范围更广泛，前者以台湾地区为主，后者以大陆地区为主，具有联合目录的性质。尤其是《解题》，它以故宫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殿本为主，并且调查了北京图书馆、承德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等馆的藏书，还参照了国内外有关图书馆的藏书目录。这部书目还将清内府所有的书籍品种如雕印、套印、铜印、铜木活字摆印、铅

【1】肖力：《清代武英殿刻书初探》，《图书与情报》1983年第2期。

【2】常林：《清代北京自然科学图书出版述略》，《满族研究》1996年第1期。

【3】吴哲夫：《清代殿本图书》，台北《故宫文物月刊》3卷4期(总28期)，1985年。

【4】辽宁省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印、石印、油印等等均收录在内，是目前对清代内府书籍最完整、最系统的著录，故所得出的殿本数目应该与实际刊刻的数目比较接近，只是书名中所称“刻书目录”未能涵盖实际收录的品种，铅印和石印书籍已经超出了“刻书”的范围。

（六）各朝刻书概况

清朝十二帝，除前两位尚未遑于文治外，自顺治起的后十位皇帝皆身体力行，致力于编刊图书，代代相续。由于所处历史阶段的条件以及个人的主观努力等的不同，每朝在刻书方面的建树有很大差别。

顺治一朝，国基初定，刻行书籍数种，多用前明遗留的机构经厂及经厂的刻印工匠，其刻书风格直承明末经厂之余绪。此期刊刻的重点是儒家经书，大力宣扬竭忠尽孝。对于内宫后妃则有世祖福临辑注的《内政辑要》和《御定内则衍义》，采辑历代古籍中有关后妃的嘉言善行，意在使后妃以前贤为楷模，以其言行为行动准则，“广教化而美风俗”。（图24）历来女教之书多出自儒臣之手，皇帝亲为之者仅福临一人，说明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同时也说明封建社会末期，帝王已深感其统治的根基不稳，乃亲自出马以匡救。对臣属的教育亦非常重视，颁刻《御制资治要览》一书，阐述“君、臣、父、子”之道和齐家治国之方，劝勉百官敦品饬行。世祖福临撰《御制劝善要言》一书，从儒家经典著作中择取论善之言，围绕封建道德的最高标准，也是儒家哲学思想核心内容的“善”，多方面论述其本源和本质，宣扬“知命顺天”、“先义后利”及“因果报应”说，劝勉人们向善、行善，将善视为做人的道德标准。这一时期是明清内府刻书交替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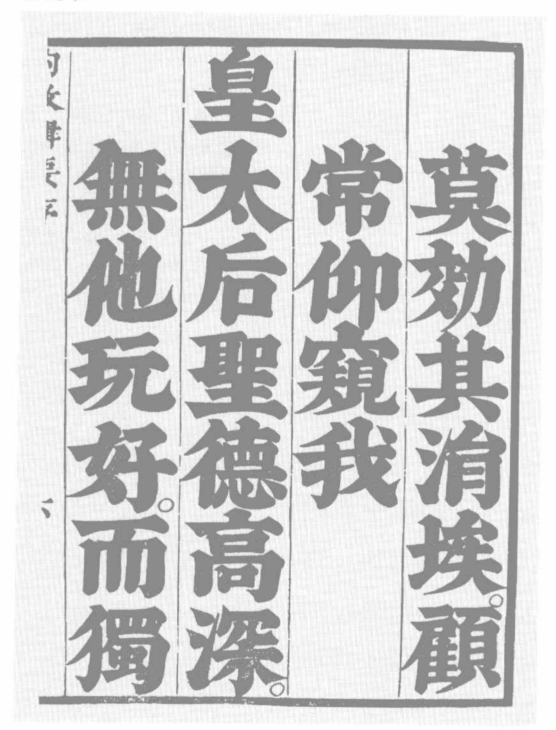

莫効其涓埃。顧常仰窺我
皇太后聖德高深。無他玩好。而獨

图24
《内政辑要》，顺治十二年内府刻本

康熙帝雄才大略，有多方面的建树，在刻书方面也卓有成就。特别是在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后，编书、刻书活动走上正轨，不仅在书籍编纂体裁和内容方面有很大拓展，而且在版刻形式各方面皆别开生面，以全新的面貌卓立于书林之中，以后各朝书籍的编刊，无不沿袭康熙朝的既定之式继续发展。因此，康熙朝的刻书有着发凡起例之功。清立国后，帝王为了达到永延国祚的目的，励精图治，孜孜求学，以自我教育等方式，编纂、注释和学习各种典籍，经、史、子、集无所不览，以便增长才识，博古通今，获得治国安邦的本领。经筵日讲即是封建帝王自我教育的学习方式之一。康熙帝对此项活动特别重视，积极主动参加，除因巡幸、出征偶未举行外，从未停止过。在康熙十五年的日讲活动中，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和诸史。为了学习上的需要，编刊了大量注经、译经，并批注史籍若干。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年底，康熙帝决定于内廷设局，翻译《通鉴纲目》，并亲自校阅、注疏翻译文稿，三年如一日，极为勤奋认真。他在该书《序文》中写道："朕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务期晓畅无遗，归于至当而后止。立有程课，自元旦以至岁除，未尝有一日之闲，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随。迄今三年有余，全集告竣，将锓梓颁行。"至四十六年（1707年），诸臣辑成《御批通鉴纲目》等书，其中有未得要领之处，康熙帝又"亲御丹毫，详加论定"。同时，康熙帝也重视后宫教育，把教育皇子，培养皇太子——塑造未来的皇帝，作为后宫教育的头等大事。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专门针对皇子特点，编刻启蒙书籍，从小进行道德教育和历史教育。康熙帝对自然科学的许多门类都有浓厚的兴趣，学识渊博，特别是在数学、天文、水利和地理学方面，因此而有《御制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律吕正义》和三书合一的《御制律历渊源》以及《皇舆全览图》等一系列科技著作的编纂和出版。这些书籍，有的以御制的名义颁行全国，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对促进当时的科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雍正帝因皇族内部斗争，偶然以皇四子身份入继大统，这

重農桑以足衣食
朕聞養民之本在於衣食農桑者衣食所
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
受之寒古者天子親耕后親桑躬爲至尊
不憚勤勞爲天下倡凡爲兆姓圖其本也
夫衣食之道生於地長於時而聚於力本
務所在稍不自力坐受其困故勤則男有
餘粟女有餘帛不勤則仰不足事父母俯
不足畜妻子其理然也彼南北地土雖有

聖諭廣訓　重農桑以足衣食　二

图25
《圣谕广训》，雍正三年武英殿刻本

一特殊经历使其随时处于警觉防范状态，故雍正帝在位期间政争严苛，所刻书籍也带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如首先颁刻的《圣谕广训》，将康熙约束民人的规范《圣谕广训》加以演绎，成万言之书，刻印颁发，广泛宣传，借助圣祖之言规谕、约束王臣，以稳固自己的皇位。（图25）又编《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一书，以康熙帝庭训之言教导兄弟子孙如何处事，并作为治家、治国、教子、修身的座右铭。接着，颁刻了《御制朋党论》，书中以六经、《论语》、《孟子》及宋儒的传注为立论的根据，以宋朝文人欧阳修《朋党论》为驳论的目标，严正指出朋党之道与朋友之道的不同。指斥朋党之道是“小人之道”，大论为臣之道，并美誉个人，把君主打扮成至大至公的代表，要求朝臣弃朋党而至大公。此外，雍正时运用佛教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倾向也很明显，内府刻本中十九种释教书籍，有十四种是雍正朝刻本。

乾隆帝自幼受到严格、系统的教育，多才多艺，文化素养相当高。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均达于极盛。他诏修群书，数量超过康熙。首先校刻了正经正史，接着辑刻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编纂了著名的《四库全书》，完成了雍正时校刻的汉文《大藏经》，又诏刻满文《大藏经》，都是卷帙繁多、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编刊的其他经史子集书籍的数量也最多。对中国的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刻书事业推向极盛，刻印品种、数量最多，门类齐全，各种印刷技艺都广泛采用，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已到达顶峰。但是在隆盛的表象之下，已有虚衰之苗头内伏，因为此时的著作题材不再有大的拓展，以汇编、整理之作为主，印刷技艺的精细程度

也已达到饱和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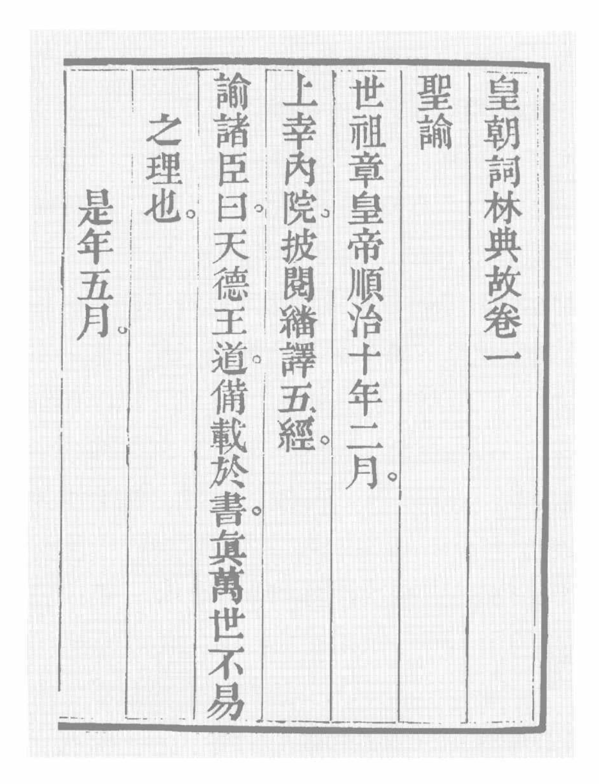
嘉庆、道光以后，随着清朝社会走下坡路，内府刻书衰微之象渐显，刻印数量渐少，新纂之书已寥寥无几。光绪朝稍有反弹，也不过是“回光反照”，已无回天之力。因此，研究清朝内府刻书，应着重研究“殿本”，而研究“殿本”，则又以嘉庆以前为重点。（图26、图27）

殿本的版刻、印刷、字体、纸张、装帧等风格特点将在第九、十章中述及。

二、各部、院刻书

除武英殿外，其他机构也或多或少承办宫中刻印书籍事宜，这些书通常被称为“各部、院本”。

各部、院刻本主要是清政府各衙门编刊的各部则例。当时不仅中央各部、院，无不编有则例，而且各个部、院之下，还有分


皇朝詞林典故卷一
聖諭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二月。
上幸內院披閱繙譯五經。
諭諸臣曰天德王道備載於書眞萬世不易
之理也。
是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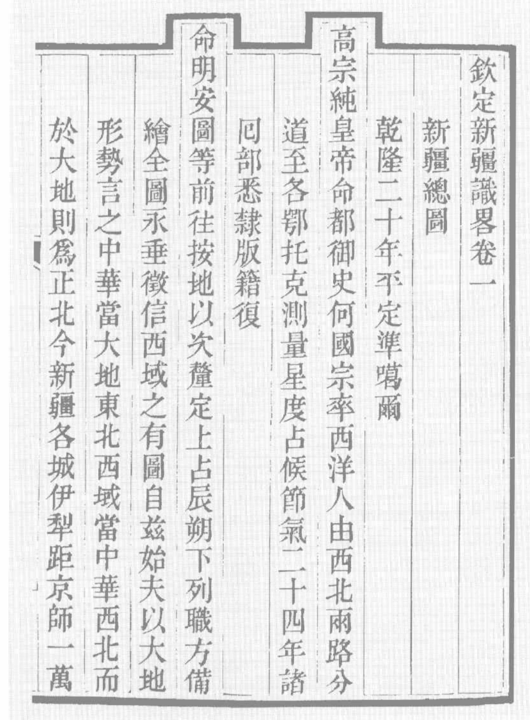

欽定新疆識畧卷一
新疆總圖
乾隆二十年平定準噶爾
高宗純皇帝命都御史何國宗率西洋人由西北兩路分
道至各鄂托克測量星度占候節氣二十四年諸
回部悉隸版籍復
命明安圖等前往按地以次釐定上占辰朔下列職方備
繪全圖永垂徵信西域之有圖自兹始夫以大地
形勢言之中華當大地東北西域當中華西北而
於大地則為正北今新疆各城伊犁距京師一萬

图26（左）
《皇朝词林典故》，嘉庆十年武英殿刻本

图27（右）
《钦定新疆识略》，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

司或专门性的则例，政书的品种和内容极为丰富。多数部门的则例还都经过数次续修，以确保其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新增的若干则例，皆为适应时务需要而修。如乾隆年间所修《钦定户部鼓铸则例》，系因户部"办理盐漕事务均有志书可遵，惟鼓铸一项向未著有明条。……鼓铸钱文上动帑金，下资民用，……头绪纷杂，款项繁多，……其间有题定章程者，有咨准成案者，虽销算查核历系比照往例办理，但款案尘积，检查匪易，且历年准驳条款纷繁，若非画一订正，亦恐易滋弊端"[1]而奏请纂修的；再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回疆叛乱后，事务纷繁，理藩院专设徕远司，承办一切事件，并未纂订则例。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七月，才开始立馆派员纂办《回疆则例》。[2]此类则例弥补了该部则例之缺项。

在一般情况下，各部则例都遵照乾隆年间定章修例年限：五年小修一次，又五年大修一次。[3]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后，各部则例十年纂修一次。[4]而刑部律例，乾隆十一年（1746年）七月经内阁衙门于遵旨议覆御史戴章甫条奏案内议定，"虽奏明三年一次纂修，而三年内或酌改无多，不必拘定三年，应以五年为期纂修一次"。[5]因续修间隔越长，其间所奉谕旨、内外臣工条奏、增删事件等日积日多，"承办衙门不克划一遵守，未免歧义"，续修时也必定头绪纷繁，所以，"亟宜随时核办"。[6]

实际上，续修各本的间隔与所定之间隔期限并不相符。这是由于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如《钦定学政全书》，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后，经礼部议准，统以10年为期续加纂辑刊发一次。如果10年内例案增改不多，则继续延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续修后，因例案无多，四十八年（1783年）届期未修，至五十七年（1792年）才请旨续修，[7]增临雍、诏试二门，续增例案320条。两次续修间隔了20年。再如乾隆四十三年所纂《钦定国子监志》，"纂辑以来迄今阅五十余年，既未刊刻，亦未增修，无以征信而垂永久。臣等谨查应行增入事宜，乾隆五十年高宗特建辟雍、五十五年新刊石鼓、六十年刻立

【1】[清]乾隆三十四年武英殿刻本《钦定户部鼓铸则例》卷前，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奏疏。

【2】[清]道光二十二年武英殿刻本《钦定回疆则例》卷首，理藩院奏疏。

【3】《钦定续通典》卷前，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纪昀等撰提要。

【4】[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增修三十八年本《钦定礼部则例》卷前，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德保奏疏。

【5】[清]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本《大清律例》卷前，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刘统勋奏疏。

【6】[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本《钦定吏部则例》卷前，清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德保等奏疏。

【7】[清]乾隆五十八年礼部刻本《钦定学政全书》卷前，王杰等奏疏。

十三经碑碣，嘉庆三年仁宗临雍，道光三年宣宗临雍讲学……均属有关巨典，未可阙而不详，……敬谨增辑”。[1] 此外，续修间隔还有长达70年的情况。[2]

部分续修本，当时按期完成续修工作，但是并未发刻。如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曾续修《钦定吏部则例》并缮写样本交武英殿。三十四年十月，因吏、兵二部则例内有关文武官员处分不均，高宗谕令武英殿停止刊刷，进行修订，并增纂三十二年后应修各例。此书最终于三十七年底纂竣，缮写黄册呈览钦定后，再缮录副本送交武英殿，并于三十八年刊颁。这是两次续修结果并刻之例。[3]

续修除增补外，还包括修改、修并、续纂、删除四项内容。[4] 随着不断续修，内容一般会依次递增，如清初《大清律》附例文459条，[5] 雍正三年（1725年）为815条，[6]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增至1 456条，[7] 嘉庆六年（1801年）为1 604条，[8] 道光时递增为1 853条，[9] 同治九年（1870年）则达到1 892条。[10]

再如嘉庆十三年（1808年）兵部刻本《钦定中枢政考》一书，因例案繁多，十八年奉旨作了三项较大变动：一为删减；二是将原书中散见的处分则例，改辑为《处分则例》，二十一年告成；三是续修《中枢政考》，于二十五年告竣。道光元年（1821年），因又有新定章程，两书暂停颁行。特请旨修改《处分则例》，并将嘉庆二十二年以后所奉谕旨和奏定章程补入《中枢政考》，两书至道光四年九月告成进览，五年七月刊刻颁行。[11]

则例的续刻有两种方式。如果续修内容多，卷数增多，版面变化较大，书版需要重制，谓之重修，实与新刻无异；如果是少量、局部增补，则利用原有书版，将更改之处铲平重刻；[12] 或仅增刻续补部分，谓之补修或增刻等。

补刻之例较为多见。如清光绪十年本《钦定总管内务府则例》，即是据咸丰二年武英殿本续补的。如“设官稽察”一节，由18页增至41页，前14页完全相同，说明是利用咸丰二年旧书版刷

【1】《钦定国子监志》卷前，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李宗昉奏疏。

【2】［清］光绪十年《钦定工部则例》卷前，光绪八年二月十四日工部奏疏。

【3】［清］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刻本《钦定吏部则例》卷前，乾隆三十五至三十七年傅恒、刘统勋等奏疏。

【4】［清］宣统二年七月铅印本《钦定大清刑律》卷前，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沈家本奏疏。

【5】［清］顺治四年内府刻本《大清律集解附例》。

【6】转引自黄卓越、桑思奋：《中国大书典》，396页，中国书店，1994年。

【7】［清］乾隆六年武英殿刻三十三年增修本《钦定大清律例》卷前，凡例。

【8】［清］乾隆五十五年武英殿刻嘉庆七年增修本《大清律例》卷前，凡例。

【9】［清］乾隆五十五年武英殿刻嘉庆、道光五年、二十七年递修本《大清律例》卷前，凡例。

【10】转引自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合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195页，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11】《钦定续通典》卷前，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纪昀等撰提要；道光二十五年兵部刻本《钦定中枢政考》卷前，兵部奏疏。

【12】［清］乾隆四十八年增刻三十八年本《钦定礼部则例》卷前，德保等奏疏。

印的；自第18页开始增入咸丰二年十一月至光绪九年十一月间所奉上谕等资料，自第15页开始，行文格式、行款与字体有所改变；回行由上空两字改为上空一字，字体不同，结体更为紧密，字号略小，说明这部分是新增补的。其他各节亦均是照此办理的。

各则例的初修本，一般交由武英殿刊刻，称为武英殿刻本。而续修本，有些仍交武英殿刊刻，有些则因武英殿无暇办理，由各供事等自备纸张或书版自办，形成所谓部、院本，这也是沿用明内府的作法。

有些则例以满、蒙等文字同时发刻，更便于满、蒙官员使用，而刊刻任务亦随之倍增。如《钦定中枢政考》一书，嘉庆以前各本均由武英殿刊刻，自嘉庆八年始，因各部则例版片均交武英殿动帑刊刻，须二三年方能完成，故由供事自行刊刻，以求迅速，限六个月将清、汉书则例全部刊竣。[1] 乾隆四十五年，《钦定科场条例》续成，亦“因武英殿刻书多以次刊刻，尚需时日，特请准承办供事鸠工刊刻通行”，[2] 此后各本亦为礼部自行刊刻而成。可见，由于武英殿修书处刻书任务的繁忙，才产生了部、院刻本。

【1】[清]嘉庆八年兵部刻本《钦定中枢政考》卷前，保宁等奏疏。

【2】[清]乾隆四十五年礼部刻本《钦定科场条例》卷前，德保奏疏。

政书续修的连贯性，反映出清朝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也反映了书籍编纂形式的因循性。而频繁的修订之举，则又反映出各种律例条规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些都说明清朝统治者将政书的编订作为加强统治效能的重要手段，在法制建设方面始终处于高度自觉的状态。

续修工作的制度化也带来诸多弊病，这在清中期以后已经显露出来，“以往各部则例十年一修，多不能依限告成，每迟至六七年始刊完竣，又不能及时颁发。其间数年之久，各省官员既无新例可循，又谓旧例已改，茫无所措。及至刊刻颁行，又到届期重修之时，新例又成废本，无所遵循。况且各部院则例因门设类，以类系条，详明记述所属办理相关事务的各种旧例本属美备，因迴护办法两歧，或致舍例就案轻为更改，或因开馆为书吏仰邀议叙，种种弊端实不能保其必无。”对此，道光帝批复：“所

奏甚是。以后各部已颁成例不得轻议更张，亦不必限定十年即行开馆重修。”[1] 此外，虽然条例规定详尽，也仍有办理参差互歧之处；有些规定则仅仅流于形式；官员事事求诸规条，必然僵化而不知应变等，亦属弊症。

【1】[清]道光二十三年吏部刻本《钦定吏部则例》卷前，道光十九年、二十三年吏部尚书等奏疏。

总之，各部、院刻行的则例等政书广泛参考了大量书籍、档册，材料丰富具体，叙事详晰至微。作为成文的条规法令，与武英殿刊行的《大清会典》和《大清律例》等构成完整密致的典律网络和文本系统，代表着清代各期典制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可供系统地了解和研究各朝规制的增损和沿革。

三、扬州书局的出版活动

除各部、院本外，当时的扬州、苏州等书局也是内府的书籍承刻单位之一。扬州书局主持者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他在以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期间，在扬州天宁寺创设了以刊刻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扬州书局，主持扬州书局的校勘古籍等事宜，奉康熙帝之命编校刊刻《全唐诗》等书。

天宁寺位于扬州城内，居清初扬州八大刹之首。相传是东晋谢安的别墅。义熙间（405—418年）就别墅建寺。“一庙五门天下少，两廊十殿世间稀”，建筑规模宏伟。初名谢空寺，后易名为兴严寺、证圣寺。扬州书局就在天宁寺院内的最后一进，殿内建筑保存完好。

曹寅在扬州书局挑选各方书手、名工百余人书写、刻印、装订，随校随刊。《全唐诗》从开始到书成“进呈圣览”，仅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速度很快。校补、缮写、雕刻、印刷、装潢，无不精益求精，反映了当时扬州书写、刻印艺人的高超技术水平，成为我国雕版史上公认的杰作之一。康熙看了样本后朱批赞叹道：“刻的书甚好。”

表十一　扬州书局刊刻内府书籍一览

序号	书　　名	卷　　数	刊刻时间
1	《御定历代赋汇》	一百四十卷《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	康熙四十五年
2	《御定全唐诗录》	一百卷以上	康熙四十五年
3	《钦定历代题画诗类》	一百二十卷	康熙四十六年
4	《钦定佩文斋咏物诗选》	四百八十六卷	康熙四十六年
5	《御选历代诗余》	一百二十卷	康熙四十六年
6	《佩文斋书画谱》	一百卷	康熙四十六年
7	《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	三百零四卷	康熙四十八年
8	《渊鉴类函》	四百五十卷	康熙四十九年
9	《佩文韵府》	一百六十卷（一作四百四十四卷）	康熙五十年
10	《钦定全金诗》	七十二卷 首一卷	康熙五十年
11	《钦定词谱》	四十卷	
12	《曲谱》	十四卷	
13	《御制诗初集》《二集》《三集》	十卷；十卷；八卷	

扬州书局所刻各书校刻俱精，特点是细楷字精刻，字迹秀丽匀净，纸张选用洁白细薄而又坚韧的开化纸，墨色均匀，装潢考究，精致典雅，秀丽天成。版式风貌与“殿本”有所不同，被誉为“康版”。初印本是用开化纸所印，全部运送至宫中武英殿，再对外发放。因此扬州书局也可视为武英殿的一个分号。

扬州雕版刻书已有八百多年悠久历史，开始于我国印刷术发明不久的中唐时期，发展于宋元明代，至清代达到顶峰，其刊刻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与质量之精，为前代所未有。官刻、家刻、坊刻皆大为兴盛，成为当时江南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在刊刻《全唐诗》的同时，曹寅还以扬州书局、扬州使院名义，刊刻了他的私家藏书《音韵五种》、《楝亭藏书十二种》和自著的《楝亭诗钞》、《词钞》等，其刻印之精，不在《全唐诗》之下，素为人们珍视。扬州的官宦私刻书亦精美，如雍正年间江都陆钟辉所刻的《笠泽丛书》、《南宋群贤诗选》，广陵般若庵刻《冬心先生集》，

写刻字体遒劲豪健，纸墨印刷上乘，都是难得的收藏精品。

校刊《全唐诗》之后，康熙帝又把刊刻《佩文韵府》的重任交给了曹寅。这部书历经8年始成，一百零六卷，18 000余页。曹寅在扬州会同苏州织造李煦与杭州织造孙文成商议刻书之事，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遴选到好手一百余名，在天宁寺正式开工刻书。后因感冒风寒，卧病数日，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校刊《佩文韵府》之事。曹寅卒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扬州书局结束年月不详。从曹寅的诗文中，可知他对诗、书局的题名十分严谨。在康熙四十六年以前的诗文都用诗局、诗馆，不题书局；以后则称书局或前诗局，不再题诗局。[1]

【1】潘天祯：《扬州诗局杂考》，《图书馆学通讯》1983年1期。

康熙至乾隆间的扬州书局，究竟是奉命另建，还是扬州诗局的延续、别称？或并非实体，只是刻书牌记而已？至今还无从考实。根据史籍明载，正式建立扬州书局是嘉庆年间的事。

嘉庆十二年（1807年），皇帝颙琰阅内府所藏旧钞《唐文》一百六十卷，“觉其体例未协，选择不精”，于是命儒臣重加厘定，仿效康熙年间辑刊《全唐诗》之盛举，再辑刊一部巨帙唐人总集。次年，即下诏编纂《全唐文》，发两淮盐政刊刻。敕下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两淮都转盐运使曾燠即遵旨办事，于扬州开设全唐文馆与扬州书局，办理《全唐文》编、校、刻、印诸事宜。（图28）

编纂《全唐文》，由大学士董诰领衔，漕运总督阮元为首席总阅官，集中词臣、文士100多人入馆编校。扬州参加此事的有秦恩复、邓立诚、汪端光、汪铮等人。《全唐文》以内府《唐文》为蓝本，采辑内府所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古文苑》、《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中唐、五代文章，按照《全唐诗》体例编纂，历时6年完成。全书千卷，收唐、五代文18 488篇，涉及作者3 042人，附作者小传与姓氏韵编。此书采择广博，颇受学界好评，晚清学者俞樾赞曰：“有唐一代文苑之美毕萃于此，读唐文者叹观止焉!”[2] 扬州书局在曾燠主持下，挑选书手、名匠刻印《全唐文》。嘉庆十三年（1808年）开雕，嘉庆十九年

【2】俞樾：《唐文拾遗序》，《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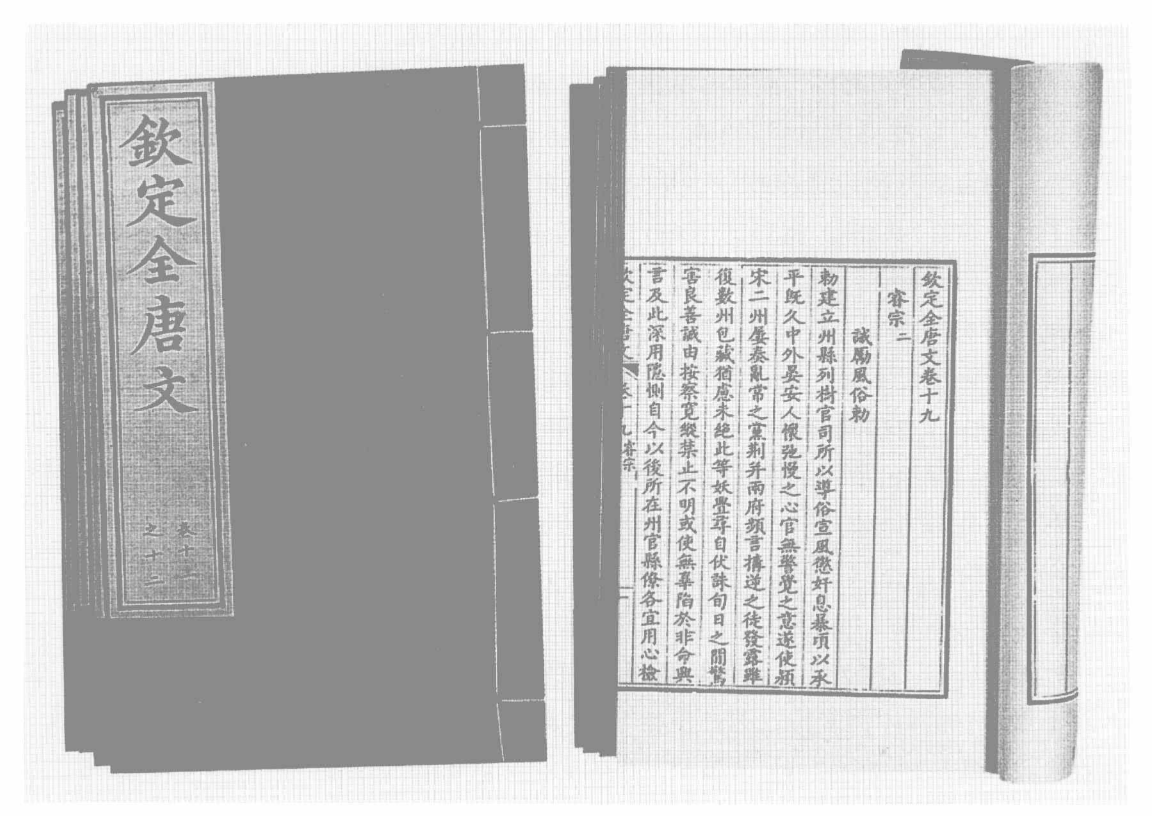


图 28
《钦定全唐文》，嘉庆二十三年扬州书局刻本

(1814年）刻印完成，装订为一千册。写刻、印刷、装帧之精良，一如《全唐诗》。《全唐文》刻印完工后，扬州书局继续刻印《唐文拾遗》七十二卷、《唐文续拾》十六卷（清董诰等奉敕编）、《钦定明鉴》二十四卷《首》一卷（一作一百二十卷）等书，大抵还是属于清内府刻本，多在嘉庆间完成。此后有同治八年至十二、三年所刻《困学纪闻》、《广陵通典》等书，亦署“扬州书局刊”，其实是淮南书局所刻，此时之“扬州书局”，乃淮南书局之别称。[1]

【1】王澄:《扬州刻书考》，广陵书社，2003年。

淮南书局，又名扬州书局。同治八年（1869年），两淮盐运使方浚颐创设淮南书局于扬州东关门内琼花观街，以整理旧有《盐法志》和各种官书残版、刊布江淮耆旧著述为宗旨，聘“养贤馆”（署盐运使李宗羲开设）中士人袁昶、谭献、高行笃、朱铭盘等至局校理。其经费仍于（盐务）裁减成本项下开支，书成

平值出售。有广东、福建、杭州、扬州、苏州、江西各官书局刻本，名为“聚珍”，实为影刻，刻印质量不及原刻本。据此，扬州影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官书局，当是淮南书局。

淮南书局刻书多为重刻，刻印质量不及《全唐诗》、《全唐文》精良，然而它在弘扬历史文化、传承地方文献方面，亦为世人所称道。

四、汉满蒙藏文大藏经的出版

清前期对《大藏经》的整理出版非常重视，几部卷帙浩繁的《大藏经》的刊刻充分显示了清政府刻书的强大实力和水平。

（一）汉文大藏经的刊刻

乾隆版《大藏经》为清代官刻汉文大藏经，简称《乾隆藏》，又因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名《龙藏》，泛称《清藏》。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十三年（1735年）正式开雕。至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全藏共收经1 669部，7 168卷，分作724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机”。本藏为折装本，每版25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前485函（从“天”到“漆”）乃覆刻《永乐北藏》；后293函（从“书”到‘机’）内容较《永乐北藏》有增减。各函首册前有佛陀说法变相图，末册有护法天神韦驮图等。各卷末附音释。它以明《北藏》、《南藏》为底本，又出于政治目的增入明清著名僧人语录、杂著，撤出《出三藏记集》等重要典籍。印成后，乾隆帝还再三下令撤毁其中“违禁”的内容。因此，它比明刻诸藏更具有时代特征。乾隆版《大藏经》的编刊工程浩大，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历时6年完成。初印104部，颁赐各地禅院。此后至民国年间，又陆续刷印了数十部，共印行150余部。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所用版片特选直隶、山东出产的优质梨木，每版尺寸为75×28×5cm，全部是无结节、无拼凑的整板，共79 036块，

均两面刻字。1988年文物出版社利用此版再次重印时尚存73 024块，有67 090块仍能用以刷印。自宋至清，木刻汉文大藏各代频出，唯有《龙藏》经版保存至今，其印本完整者亦极鲜见，因此，它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 经板的选择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允昼等奉命率众议刻汉文大藏经，预计刊刻全藏需用长二尺四寸、宽九寸、厚一寸一分的梨木板片73 100余块。因尺寸厚大，京师难于购买，经奏准，特派内务府修书处官员分赴直隶、山东出产梨木地方办理。至乾隆元年二月，时近一年，仅采得板片一万余块。为保证刻经急需，经奏准，把采买板片的任务交给直隶、山东督抚分派给出产梨木的州县代为办理。板片办齐后，统由内库银补给。然而，摊派的任务既重又急，一些州县难以完成，致使某些官吏将拼合而成的板片充数解京，而内务府官员验收时，又将不合格的板片退回，造成“官民交累”。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初八日，四川道监察御史程盛修奏称：采买经板购取梨木，官民交累，似宜斟酌变通，或三块合一，或二块合一，拼合成板，则地方之购求既易，州县之承办不难。乾隆当即批令允禄等人“照此速行办理”。[1]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军机处录副奏折档》。

然而，主管者允禄等人对此却另有别见。允禄在九月十二日的奏折中对程氏所奏予以辩驳。其主要内容有三：允禄首先表白自己奉敕管理刻经事务如何用心尽力。为办理梨木板片，他一面要求督抚饬令地方官“留心采办，秉公发价”，不许丝毫“累民’，一面又饬令内务府验收板片的官员要“悉心访察于解到之板，除不堪应用者，随到随收，不许稍有停留，有累解役”。二是极力说明拼合之板不能使用。他说，为保证刻经质量，曾走访了许多刻字工匠，了解有无省便之处。但据刻匠称，“经板长大，两面见刻。肿节、潮湿且不可用，何况拼合。若只顾目前，苟且塞责，恐日后易裂，不惟徒费钱粮，亦且难垂久远”。同时，他还查得明永乐年间库存经板，全系整块并无拼合。因年久朽坏，

于康熙四十二年重修，其中杂有拼合之板，今已全行脱字损坏。此次刻藏经如果使用拼合之板，实属省便，但恐过二三年仍复损裂，所以“臣等不敢擅用拼合与肿节、潮湿之板”。三是辩解采买板片有累地方，是由于“地方官奉行不善”造成的。最后，允禄仍强调说，经板所需七万余块，现今地方官解过万余，连前内府采办万余。未办之板若搀入拼合之板，不但易致损坏，也与已办之板不能整齐划一。因此，程氏所奏，使用拼合之板“似有未妥”。乾隆皇帝以为允禄所奏言之有理，遂又改变了主意，当即下了一道谕旨：一是以后凡“解到板片，除合式者收用外，其不合式者，尚可留为刊刻书籍之用，著内务府亦行收存，不必发回”。二是“从前所定板片价值，每片三钱二分，其中或有不敷，可令地方官酌量增添、毋令稍有累民之处”。三是关于地方官料理不能尽心，“著该督抚等严行申饬，嗣后务须妥协办理，不得丝毫累民。内务府查收板片，亦须公平验看，倘有勒措抑捺等弊，查出定行究处。该承办地方官不得因有此旨，遂将不堪应用之板解送，有误刻经之用”。[1] 乾隆皇帝的这一折衷办法，平息了上下官员间的纠葛。此后，内务府先后收到直隶170州县、山东107州县交来“堪用板”三万七千四百多块，“收节裂、尺寸不敷、不堪应用板”一万六千余块，即照上述旨意查收的，不能使用的板片亦未退回。

【1】《高宗实录》，卷26。

经板的高质量保证了《大藏经》的质量，同时也体现了乾隆时期的强盛国力。这些上等梨木板，经过晾干、刨光、上油等多道整治工序后，才能操刀镌雕。

2.《龙藏》的刊刻和刷印

全部《龙藏》卷帙浩繁，仅以四年时间告成。其中包含着相当数量的儒林学者、佛门高僧、写刻工匠及管理人员付出的艰辛劳动。据载，总理刻藏一切事务者为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允昼二人。总校阅官有工布查（负责校正梵字咒语、佛像、总管西番学）、原任江苏巡抚邵基、翰林院侍读学士梁诗正三人。总率、领带分析语录、带领校阅和一般分析语录、校阅藏经者，是来自

全国各地五十多个著名禅院的住持及其弟子共计60人。他们都是当时佛教各宗的著名代表，有的是极负声望、具有影响的高僧。如：总率超盛，是皇帝钦赐紫沙门临济宗贤良寺的住持，他戒律精深，洞彻释典，雍正帝常召见于大内，命居圆明园，封为无阂永觉禅师，并有语录行世。负责监督刊刷的管理人员大都是武英殿修书处的官员，有参领、郎中、员外郎和正副监造等七人。负责写刻、刷印、折配、装潢的监造人员，大都是内务府抽调的笔帖式、柏唐阿等一般办事官员，共计85人。另有值日僧官二人。而各种匠役多达869人。其中以刻字匠为最多，计691人。其次是刷印匠71人，木匠9人，折配匠50人，界画匠36人，合背匠12人。刻字匠大都来自江南各地。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十七日，庄亲王允禄等奏报：京师刻字匠役不过四百余名，除上谕馆、武英殿等处雇用二百余名外，所余无几。刻字匠役不能多得，恐于刻藏工程仍属迟延。特请准交三处织造，照所定刻经板一块，工价银七钱二分之例，令其招募数百名来京刊刻。其他各种工匠大都是京师招募的技术工人和内务府修书处的旗匠。以上直接参加编校、刊刷、装潢的各种人员总数达一千多人。这是目前所知清代官刻大藏经调用人员最多的一次，从组织上保证了校刊大藏的顺利进行。（图29）

《龙藏》历时四年刊刻完竣，首次刷印了100部，分别颁赐京师等地各大禅院。乾隆二十七年又曾补刷3部。此后，嘉庆二十四年刷印3部，道光六年、十四年又以聚珍馆存银各刷印4部，总计114部，这是目前所知清代官方刷印《龙藏》的情况。此外，全国各寺庙禅院有请求自备工料刷印者，均经呈请批准后，方可前往柏林寺刷印。乾隆年即有此例，如《万缘金刚经集注》，前有汤辇召识语，内称："我邑三峰主院僧妙言，乾隆五十四年遵例具呈，恭请《龙藏》全经，庄严古刹。户部侍郎少农蒋公，仰承先志，捐资代交刷印工价，照例六百六十八两。颁发《藏经》全咒一分，并又恭给装潢工价，装成七百二十九函，护送至三峰禅寺"。可见，各寺院自备工料请刷藏经，早在乾隆五十四年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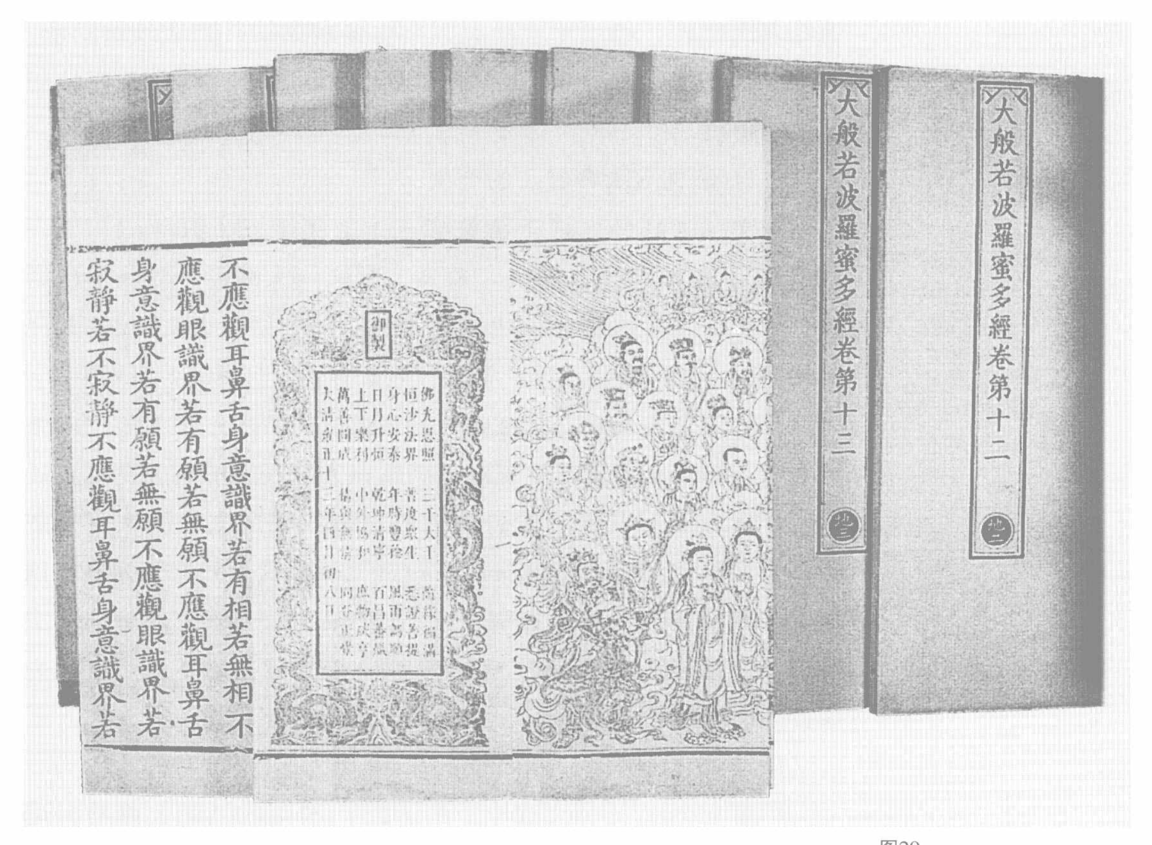


图29
《龙藏》，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年内府刻本

前就有了。但刷过多少部，尚不得而知。

清统治者为刊刷《龙藏》，不仅组织了一支数以千计的编刊和管理队伍，还为采办经板付出了白银二万五千二百九十多两，为雕造经板又付出了工银五万六千九百多两。仅此二项开支，即高达八万二千多两白银。若连同纸墨等其他开支和因“官民交累”等造成的损耗，其实际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远远超出上面的数字。

《龙藏》的编刊，虽因历史的局限而有其不足，但其所收经典、杂著之丰富，校勘之精湛，仍不失为佛教典籍中的重要代表作品，反映了清代佛学界的学术水平。由于采用整块优质梨木板，拒绝掺用拼合杂木和节裂、肿节、潮湿等劣质板片，选用优良的写刻工匠，并在刊刷完毕之后采取有力措施妥善保护经板，使得这部《大藏经》的经版得以大致完好地保存至今，

中经多次刷印，经版不曾断裂，字口锋棱如初，边栏纹饰清晰，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大藏经》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

（二）满文《大藏经》的刊刻

满文《大藏经》译于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72—1794年），是以汉文、藏文、蒙文、梵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清代又称《国语大藏经》。共108函（夹），收佛教经典699种，计2 466卷。对于满文《大藏经》，“自1854年俄国汉学家瓦西里首先言及此书，自此后穆璘德、劳费尔、伯希和、内滕虎次郎、福克思等东方学家对于满文《大藏经》的有无及是否还存在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嗣后故宫博物院成立，满文《大藏经》又复显于世”。[1] 据清礼亲王昭梿《啸亭续录》云，为刷印该书所雕刻的几万块梨木经版尚存，“初储经版于馆中，后改为实录馆，乃移其版于五凤楼中存储焉”，[2] 现今这批梨木经版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1】韩儒林：《穹庐集》，4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清］昭梿：《啸亭续录》，348页，中华书局，1980年。

1. 满文《大藏经》译刻的起因及年代

对于刊刻满文《大藏经》的原因，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乾隆皇帝认为开国至今未能刊刻国语《大藏经》，“揆之阐教同文之义，实为阙略，因特开清字经馆”，[3] 命章嘉国师将《甘珠尔经》译成满文，从学府成绩优异人员和在京喇嘛中选择通晓语言文字者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一起开始翻译经卷，并下旨“以汉文《大藏经》中咒语及诸佛秘密心印非可以文义强求，是以概不翻译，惟是咒中字样，当时译经者仅依中华字母约略对音，与竺乾梵韵不啻毫厘千里之谬，甚至同一汉字亦彼此参差……”。[4]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281-283页，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281-283页，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

清字经馆位于宫中西华门内。设置之始，乾隆皇帝谕旨：“简派皇子、大臣于满洲、蒙古人员内，择其通晓翻译者，将藏所有蒙古文字、汉字两种悉心校勘，按部翻作清文。并命章嘉国师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审正进呈，候朕裁定。”今据章嘉国师奏称：“唐古忒《甘珠尔经》一百八部，俱系佛经。其《甘珠尔经》内有厄纳特珂克得道大喇嘛等所传经二百二十五部。至汉

字《甘珠尔经》，则西方喇嘛及中国僧人所撰，全行列入。今拟将大般若、大宝积、大集华严、大般涅盘、中阿含经等及大乘律全部翻译。其五大部支派等经八种并小乘律，皆西士圣贤撰集，但内多重复，似应删繁就简。若大乘论、小乘论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乃后代祖师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无庸翻译等语。所奏甚合体要，自应照拟办理……。”[1] 并选派人员包括总裁4人，副总裁3人，提调官5人，纂修官9人，收掌官18人，阅经总裁1人，阅经副总裁4人，办理经咒喇嘛4人，校对喇嘛4人，总校僧人2人，诸经僧4人，共96人。其中总裁有和硕质亲王永瑢、多罗义郡王永璇、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和珅，副总裁为吏部尚书金简及藏族著名高僧章嘉呼图克图国师等，皆精通经史，博学多闻，这使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刊刻在人力上有了可靠的保障。为使译经顺利进行，乾隆帝又下旨："兹清字经馆正当发凡起例之始，如不立定规条，致禅和唾余剽窃，亦得因缘贝夹，淆乱经函，转乖敷扬内典之指，可将章嘉国师奏定条例清单，交馆详晰办理……"[2] 并降旨规定："除现在刊定藏经毋庸再为删削外，嗣后凡别种语录著述，只许自行存留，尚有无识僧徒妄想裒辑汇录，诡称续藏名目，觊欲窜淆正典者，俱一概永行禁止"。[3] 经过18年的努力，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满文《大藏经》翻译工作全部完成，部分经卷印刷成帙。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281–283页，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281–283页，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281–283页，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

在满文《大藏经》翻译告竣且部分经卷刷印完成的同年十二月，译经处清字经馆遭遇大火，损失严重。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西华门茶房外果房失火，延烧房屋及乐器，经卷间被焚烧……。至此项经虽未全行焚毁，但一经搬损必致残缺失次。其版片俱系梨木，不但经刊刻者徒费工料，即未经刊刻字者亦觉可惜，所有被烧刻字版是否存有印刷底稿，若竟连底稿焚毁不全，岂不更为费事！此经内如《大般若》、《二般若》等经，曾经各印刷十分，颁发盛京前、后殿等处供奉，如现在经馆内所存放版片、卷页多有不全，尚可从容缓办。其未经颁发各经最关紧要，其中每部经文，有已经刊刻完竣刷印成部，版片、卷页多被烧毁

者；有版片虽经烧毁，而有刷印卷页尚存者；有刷印卷页烧毁，而版片尚存者；有版片未经刊刻完竣即被烧毁者，均不可不详细检查。将所有版片、卷页逐一校对，以便互相补辑，俾臻完善。”由此可知，乾隆五十五年满文《大藏经》只是完成了翻译，尚未能全部付梓，刊刻完成者也有部分被焚。现存的满文《大藏经》部分经页经版为五十五年后重新雕版印刷的。另乾隆五十九年清内府《活计档》记载：“所有本馆办理颁发《大般若》、《阿含》等经统计一百零八套，每套十二分，陆续实收过此处装函共壹千贰佰玖拾陆套，相应付覆查明，可也。”[1]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五十九年二月《活计档》。

据上所述，清字经馆陆续收过装函佛经1 296套，每部满文《大藏经》108函12部。全部满文《大藏经》刷印装潢的完成应在乾隆五十九年，共刷印12部，部分留存宫中，其余颁赐至盛京（今沈阳）、承德、西藏布达拉宫等处。至今仅存世两部，其中西藏布达拉宫收藏一部（缺一函）；故宫博物院收藏76函（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32函（夹），两地所藏合为一部完整的满文《大藏经》。清内府原刻的4万余块双面刻文字版和160余块单面刻佛像图版目前完好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满文《大藏经》及其经版不但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也代表了清内府书籍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

2. 满文《大藏经》的装潢与版画插图

满文《大藏经》共108函（夹），每函经叶数量不等。最多者，《大集经》第一卷728叶，最少者《华严经》第四卷173叶，每函由经叶、内层护经板、内经衣、外层护经板和外层经被组成，经叶朱色双面印刷，长73厘米，宽24.5厘米，由内层上、下护经板、外层上、下护经板保护。内层上、下护经板皆为木质外包金黄色织锦面制成，长73.7厘米，宽24.6厘米，厚2.3厘米，其中内上层经板装饰最为庄严华丽，板面分别由金、黄、红三层精制的织锦覆盖。中间凹进部分正中呈现泥金满文书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敬语，及本函（夹）第一部经名、卷数，两侧各彩绘图像鲜明、独具风格的佛菩萨像一尊，每尊佛像右下角书藏

文、左下角书满文佛菩萨名号，又在两尊佛像的框边由右至左以汉、蒙、藏、满四体文字用直书方式恭题该函（夹）第一部经名及经叶数。内下层经板的板面绘四至五尊护法神图像，每尊像的右下角以藏文、左下角以满文直书该佛名号，右框边以汉文、左框边以满文恭题该函（夹）的第一部经名。整函经叶全部依顺序码放整齐，经叶的四周呈现出八吉祥图案，两端一拼成喷焰摩尼图，一拼成火焰图，火焰图中又拼成该函第一部经名字样，这样不但美丽整齐，而且利于经叶码放，经叶一旦码放错乱或丢失，四周图案即错乱，利于发现及保管。外层上护经板长77.5厘米，宽27.5厘米，高3.7厘米，底平，上为弧形，为木质红漆描金制成。版面凸起，四框正中由左至右以泥金绘出胜利幢、金鱼、宝瓶、妙莲、右旋海螺、磐肠、宝伞、金轮八吉祥图案。为便于搬运及收藏保护，内层经叶、经板要用丝质黄色的经衣包裹起来，再用外层经板上下保护，并用长约25米的经带把整部经函捆扎起来，外面再用1.5米见方的绸面黄色丝棉经被包裹，用黄色笺条粘于包裹外，注明该函卷数，就成为一部完整的经函（夹）。

满文《大藏经》中有大量精美的插图作品，均为整版独幅版画，有数十幅。每幅版框纵16.5厘米，横59厘米，为每函（夹）经的扉页画和末页画。扉页画为每函（夹）经的第一页，图版四周饰有匀称连续的云纹，左、右为佛菩萨像各一尊，每尊佛像的右下角以藏文、左下角以满文恭书佛的名号，用直书的形式恭题该函（夹）第一部经名及经页版数，中间文字为恭书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敬语，及以梵文音译的本函第一部经名、卷数等字句。末页插图版画中有四至五尊佛像，为护法神、龙王、天王、大梵天阿修罗王等，佛像四周同样为云纹，每尊佛像的背后布置了炽盛光环，每尊佛像的右下角以藏文、左下角以满文恭书本尊佛名号，又在佛右边以汉文，左边以满文恭书该经函（夹）第一部经名。

这批佛教版画中，有一些形象奇特、怪异的图像，在一些著名的佛像学著作中未见著录，如《喇嘛神像集》收录喇嘛教先圣

及诸天等300幅，《诸佛菩萨圣像赞》收录画像360幅，并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标出各像名号，在佛像学上极富有价值。其中又有一些菩萨、观音、度母、佛陀等佛像，在形象的绘刻上都十分严格地按照《造像度量经》的标准定制，如佛像的手势、姿态，佩戴的饰物及刻板的法度，均依规定作画、镌版，形象非常规整，给人以庄严肃穆的美感。

造型奇诡怪异是满文《大藏经》佛教版画的最大特点，如四臂勇保护法、四面勇保护法、黄勇保护法、毗沙门天王等等，造型夸张，对人物变幻莫测的神态描绘得相当生动。其中女神如日神、月神、地神母等等，有的头戴宝冠，稳坐莲台，有的手持法轮、莲花、宝剑、绢素、钺斧，有的长带绕肩飘舞，面容慈祥，每尊像后佛光环绕，浮云流动，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些佛教版画作品造型独特，镌刻线条流畅圆润，具有较高的绘刻水准，为佛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满文《大藏经》及经版的存世不但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在翻译时又创出许多新的满语词汇，进一步深化了满语的语义。“满文与汉文是两种不同的语文，难分优劣”，[1] 但汉文佛经文字深奥难懂，而满文翻译多以白话体对译，文义清晰，浅显易解，有助于了解汉文佛经的文义。

（三）蒙文《大藏经》的刊刻

蒙文《大藏经》除了零散的翻译之外，大规模的翻译、刻印工作就进行了五次。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奉成宗之命，在国师却吉俄色的主持下，由藏、蒙、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地区刻造印刷。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阿拉坦汗之子僧格都楞汗命锡勒图固什却尔济、阿尤喜固什却札木苏等人补译部分《甘珠尔》经卷；察哈尔林丹汗召集贡噶敖斯尔等三十三位高僧学者会译《甘珠尔经》未译部分，于1629年译完，并用金字写成，即著名的《林丹汗金字甘珠尔》。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五十九年（1720年）依据北京版藏文《甘珠尔》校对补译后，在北京雕版印刷《甘珠尔》，

【1】李学智：《满文台湾史料译文的商榷》，《食货》（月刊），民国六年（1917年）第8卷第11期。

又称《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1—1749年），将225卷《丹珠尔》全部译成蒙文，又称《续番藏经》或《续藏经》，蒙文大藏经至此完备。

1. 清蒙文《甘珠尔》的刊刻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开始制作的蒙古文《甘珠尔》经版，是继藏文《甘珠尔》经版之后的又一重要活动。它由全国蒙古族同胞共同集资，历经三个春秋，耗资巨大，才得以问世。《多伦诺尔庙达喇嘛等为调员奉旨校勘蒙古文〈甘珠尔〉经事咨土默特右旗都统等文》(蒙文）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朱批奏折《乾清门侍卫拉锡奏为奉旨刊刻蒙古文〈甘珠尔〉经所需费用等情折》(满文）两份文件，给我们提供了办理康熙版蒙古文《甘珠尔》经的缘起、主事者、蓝本来源、校勘经过、誊写及镌刻人员、刊刻场所、经版存放地点、经费预算及其来源、经费之收掌衙门等重要信息。

根据这两份文件及《御制蒙文〈甘珠尔〉序》和蒙文史籍记载，康熙版蒙古文《甘珠尔》经版是康熙皇帝直接提议，由乾清门侍卫拉锡主持刻制的。拉锡系正白蒙古旗人，姓图伯特氏。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三月十九日，康熙帝降谕一等侍卫善绶，“据闻尔家中有蒙古《甘珠尔》经。京城有吐蕃特《甘珠尔》经版，却无蒙古《甘珠尔》经版，倘若刻版，则甚佳也。此乃一善事，著转告乾清门侍卫拉锡，召集八旗蒙古大臣、侍卫、官员、巴克什等共同会议，若布施刊刷，非但颇益于供诵，且较抄写价廉。著将此共同会议布施，朕亦布施。”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初四日，拉锡等奉旨以善绶家藏写本蒙古文《甘珠尔》为蓝本，并以喀喇沁固山贝子善巴喇什、苏尼特贝勒西哩之“今存蒙古《甘珠尔》经俱系辗转传抄，漏讹甚多，今一经刻版，将永世流传。太皇太后之吐蕃特《甘珠尔》经版刊校甚细，制作完备。倘蒙俞允，将我蒙古《甘珠尔》经与该吐蕃特《甘珠尔》经详细校勘，拾遗补网，妥加恭刻，则不胜善哉！校勘此《甘珠尔》经，宜拣选多伦诺尔之诺颜席热图、达喇嘛祖勒齐木噶布楚及我

等之熟悉经书之贤能喇嘛、巴克什等携我处之蒙古《甘珠尔》前往，共同详细校勘镌刻为宜”等情请旨，拉锡奉旨并将蒙文经本交与贝勒西哩等携往多伦诺尔校勘，多伦诺尔庙诺颜席热图、达喇嘛祖勒齐木噶布楚率领蒙古喇嘛、笔帖式等将经本与太皇太后之吐蕃特文《甘珠尔》经校勘。由于当时人手不够，主持校勘工作的多伦诺尔庙席热图诺颜绰尔济甘珠尔巴达喇嘛、多罗诺颜西哩、公德木楚克等行文土默特右旗都统调员，经过将近半年的时间校勘完毕。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初九日，拉锡又请旨“将自多伦诺尔庙校勘送来之《甘珠尔》经（蓝本）及恭谨誊抄、粘版、镌刻所用之《甘珠尔》经一部（之事)，交与自八旗拣选之写经喇嘛、巴克什等缮写”，其镌刻事宜“交与妙应寺达喇嘛诺尔布格隆”。其刊刻场所“拟于皇城油毡房内镌造。缮写经文之喇嘛、巴克什等亦拟集于该房内缮写。经文之缮写、校对、修改、刻版等项事务，拟交与喇嘛、巴克什等监制。制作完竣后，入经版库置放”。康熙皇帝一并应允。

至于刊刻和刷印经费，康熙皇帝明示“著将此共同会议布施，朕亦布施”，并且强调“布施不可指派，概视所愿”。拉锡提议将所需布施银两交给理藩院掌管，康熙皇帝认为理藩院一向办事拖拉，命交给理藩院和广善库两处收掌。布施人员除康熙皇帝外，均系京城之八旗蒙古人等、外四十九旗扎萨克蒙古人等、游牧察哈尔蒙古人等，京城之喇嘛、外喇嘛等。其经费预算如下：

第一项，抄写经文。

（1）要抄写出一部《甘珠尔》经文，需要以红花水印刷的带有行道的两层裱背纸共九万张。一张纸以九厘计，共需用纸价银八百一十两。

（2）抄写经文需要墨五十斤。一斤墨以六钱计，共需用墨价银三十两。

（3）抄写经文喇嘛、学者等人的抄写费，以供给饭食银的形式支给。抄写一张经文以二分五厘计，九万张经文，需用饭食银

二千二百五十两。

第二项，制作经版。

(1) 制作一块长二尺、宽七寸、厚一寸五分的梨木经版，以二钱计，四万五千块共需银九千两。

(2) 制版时每块板的正反两面都要刻字，两面和四个边都要精细加工整理。一块板的加工费以三分计，四万五千块板共需用手工银一千三百五十两。

(3) 每一块板的四个边上要上漆，其中两个边要裹两层布，上三遍漆。一块板以一钱三分五厘计，四万五千块板共需用上漆手工银六千零七十五两。

(4) 每一块板的两面都要刻字，刻一块板以三钱五分计，要刻四万四千七百八十块板，需用刻字手工银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三两。

(5) 要制版的《甘珠尔》共为一〇八册，每一册第一页的两边要雕画两个佛像，中间刻一“祥”字，四周围画蕃草花。一块版以二两计，共雕画一百零八块版，需用手工银二百一十六两。

(6) 《甘珠尔》的每一册第二页的四个边上要雕画蕃草花，中间刻经文。一块版以一两二钱计，共雕画一〇八块版，需用手工银一百二十九两六钱。

(7) 《甘珠尔经》的最后四页，每一页上要画四个金刚佛，四周围要画蕃草花。需要制作四块版，一块版以五两四钱计，共需用手工银二十一两六钱。

第三项，经版的修改。

(1) 《甘珠尔》的经版制作完毕后，需要三次印刷清样，共需用抬连纸一百二十篓，一篓纸以一两计，需用纸价银一百二十两。

(2) 印刷清样时，需要红花水二千四百斤，一斤红花水以一钱五分计，共用红花水价银三百五十二两八钱。

(3) 三次印刷清样，需用手工银一百二十两。

第四项，置办设备。

(1) 抄写校对经文需要矮桌四十个，每张桌价银以五钱计，需用银二十两。

(2) 平时放置《甘珠尔》稿本，需要高桌五个，每张高桌长七尺、宽二尺二寸。每一高桌以一两五钱计，五张桌共用银七两五钱。

(3) 刻版的工匠们需要工作桌一百个，每桌长一丈、宽一尺六寸，桌面厚二寸，高二尺七寸。每张桌以一两六钱计，需用银一百六十两。

(4) 刻版的工匠们需要长板凳一百个，每一板凳长一丈、宽五寸、高一尺七寸。一张板凳以二钱计，需用银二十两。

(5) 刻完的经版要放置在架子上，共需用一百五十个架子。架高八尺、宽一丈，可分六个格。每一架子以十三两计，需用银一千九百五十二两。

第五项，其他支出。

(1) 参加清样校对和修版的喇嘛、学者等人共三十名，每天供给每人饭食银各一钱，以三十个月计，共需用饭食银二千七百两。

(2) 抄写经文及核对、修版喇嘛学者等人，冬季每天烤火用木炭以一百斤计，三个冬天烤火共用木炭二万七千斤。一百斤木炭以五钱计，共需用木炭价银一百三十五两。

(3) 以上喇嘛、学者等人，冬季每天暖炕用煤以二百斤计，三个冬天用暖炕煤五万四千斤。一百斤以二钱计，共需用暖炕煤价银一百零八两。

(4) 参加制作经版工作的喇嘛、学者等所住房屋，需要修炕、门、窗等，所需修缮用银一百五十两。

(5) 经版制作完毕后，先印刷一部样本，需银二千二百八十七两四钱。

以上各项共用银四万三千六百八十七两九钱。

上面所罗列的数字，都是侍卫拉锡等于康熙五十六年经与有关人员进行认真研究，精打细算而估计出来的，在实施当中，可

能会有突破，因为有些必要的损耗和可能遇到的问题没有估计到。譬如，理藩院尚书隆科多于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件奏折中记载说，初次制作的蒙古文《甘珠尔》经版，由于在经版库内的八间屋放不下，又经奏请在经版库院内择一空地建盖三十间屋。每间屋用银一百六十两，三十间屋共用银四千八百三十余两。不难看出，当初拉锡等所拟的制版预算，仅仅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办理蒙古文《甘珠尔》经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初开始运作，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宣告结束。由于以朱砂刷印，今人将此“康熙版《甘珠尔》”又称之为“朱砂版《甘珠尔》”。

2. 蒙文《丹珠尔》的刊刻

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又下诏开始翻译、刊刻蒙古文《丹珠尔》。在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主持下，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达赖固什阿格旺丹丕勒、贡布扎布、札萨克喇嘛却音丕勒多尔济、札萨克喇嘛丹僧却德尔、达喇嘛毕力昆达赖，以及由蒙古各地选派来的200余名高僧和学者，经过八年的努力，终将《丹珠尔》刊刻完成。

（四）藏文《大藏经》的刊刻

自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命大臣吞米·桑布扎创制藏文以来，藏族就开始了梵、汉、于阗等文的佛经翻译。到公元8世纪赤松德赞热巴巾执政时，吐蕃的佛经翻译、整理、编目达到了高潮。早期的佛经翻译主要以手抄本为主，还没有编纂出相对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大约在13世纪中期夏鲁派高僧布顿大师在前人佛经翻译和编目的基础上编纂出第一部《甘珠尔》和《丹珠尔》藏经目录。其后，著名学者蔡巴·贡噶多吉聘请布顿大师共同编纂、审校完成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遂成为定本，这就是后世著称的“蔡巴甘珠尔”《大藏经》。《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和律；《丹珠尔》又名祖部，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藏文《大藏经》除佛教经律论等内明著作外，还包括了

因明（逻辑学）、声明（语言文字学）、医方明（医学）、工巧明（天文历算、工艺技术等）等方面的著述。因此，可以说藏文《大藏经》不仅是一部佛教丛书，还是一部古代的百科全书。其中收录的经籍大部分是8、9、11、13世纪时从梵文翻译的，少部分译自汉文。其中密教经轨及论著等，大部分是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因此倍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13世纪以前，藏文《大藏经》以抄写本形式流传。元皇庆二年（1313年）至延祐七年（1320年）间，在江河尕布的主持下，搜集各地经、律、密咒校勘雕印，是为藏区藏文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即那塘古版《大藏经》，版片及印本均无流传。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那塘古版藏经，其实并不是刻版藏经，而是一部抄写精美的手写本藏文《大藏经》。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的刻版藏文《大藏经》当属永乐版《大藏经》。永乐版是明永乐八年（1410年）在南京据那塘古版复刻，只刻了《甘珠尔》。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硃刷印，亦称赤字版。此后在明代又有多个版本，如万历版、塔尔寺版、昌都版、理塘版等。到了清代，又进行了多次的刊刻。如民间刊刻有卓尼版、德格版、那塘新版等。而清代敕刊官版藏文《大藏经》即北京版，又称崇祝寺版，是其中质量非常高的一部。北京版刊刻始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先刻了《甘珠尔》，并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刊成。雍正二年（1724年）续刻了《丹珠尔》，乾隆二年（1737年）对其进行修补。早期印本大部为硃刷，也称赤字版。版片毁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役。该版藏经因系清王室官本，刻造、装帧颇为精良，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每夹扉画均为手工绘制，笔触细腻，设色鲜丽，大多出自藏族和蒙族宗教画家手笔。它是自永乐版之后的第二部官版藏文《大藏经》，是康熙皇帝为其母和祖母祈福禳灾作功德而敕刊的，正因此，无论在技术力量和经费来源上都是任何地方版刻《大藏经》所无法比拟的。概括地讲，这部官版《甘珠尔》校勘缜密，雕版精湛，版式疏朗，纸墨讲究，豪华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1. 藏文《甘珠尔》的刊刻

北京版藏文《甘珠尔》的刊刻是由康熙皇帝亲自颁赐御制序文，遴选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主持的一件盛事。该经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十六日福全上疏请序，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康熙帝颁赐《御制番藏经序》，全部《甘珠尔》版片于康熙三十九年四月完成。

从康熙帝的御制序文中可以清楚地得知，“广崇《大藏》颂两宫之景福”，是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祈福禳灾的功德善举，所用一切费资“不涉民财，经营悉出之宫，非关内帑”，也就是说不从民间募捐集资，也不由国库拨支经费，一切开支均出自后宫。“番藏旧文，爰加镌刻”，到西藏迎取《大藏》佳善之本镌梓流通。至此，方针政策已定，紧张的校勘工作就正式开始。

首先是精心组织了阵容强大的校勘整理班子，调集了全部在京喇嘛中学问优长的大德高僧、活佛、大师，以保证校勘大藏的质量。再有这次刊印《甘珠尔》是以霞鲁寺古写本为底本，与永乐版《甘珠尔》的底本同为著名的藏族大学者、翻译家布顿·仁钦朱所编定。

领衔总理监造《大藏经》的是和硕裕亲王福全，监造官员以内阁侍读学士舒辂为首，共30人；校阅经字喇嘛，以总管京都喇嘛班第查萨克大喇嘛墨尔根绰尔济为首，番文总教习索诺颜绰尔济副之。从事具体工作的对读经字喇嘛均为黄寺的藏族喇嘛，以根敦达尔扎克龙为首，共40人，对看（总校阅）喇嘛是章嘉胡图克图，下属住持喇嘛王钌克津巴格隆、罗卜藏巴尔柱格隆等共6人。监修官以内阁侍读学士食二品俸加四级乌拉代为首，共13人。校阅序目录官为丹代、拜礼、翁英3人；翻译番字序目录官为武熙布、登德2人；翻译蒙古字序目录官为喇睦璋、黑钧2人；满文誊录官为伊巴礼、增寿、禅布3人；汉文誊录官为曹占吉、王启沃2人。番文誊录喇嘛为罗卜藏鲁雷格隆、罗卜藏拜尔济格隆、索那木林亲格隆3人。各项工作共105人。这些人是从事核查、校勘、对读、总校阅和把御制序文及大藏目录翻译成藏、

蒙、满、汉4种文体等案头工作，其中尚不包括从事写版、雕版、裁纸、刷印、装潢、彩绘各项大量艰巨的具体工作的人员。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朱印藏文《甘珠尔》在结构体系上共分为秘密部、般若部、大宝积部、华严部、诸经部、戒律部六大部类，收辑经品九百七十二种，为长条散叶，梵夹装，共一百零六卷(夹)。每卷（夹）由外护经板、内护经板、经页三部分组成。外护经板上、下两块，杉木，髹朱漆，长73.3厘米、宽23.3厘米、厚3.1厘米。内护经板也分上、下两块，均长72厘米、宽23厘米，厚3厘米，明黄色织锦包衬，上面的护经板中间“合欢门”内有金碧彩绘如来趺坐于莲花座上的说法图，并以金织锦覆其上加以保护；下面的护经板有精心绘制的四大护法神，神态威猛，气宇轩昂，笔致极为工细，敷色鲜丽，当出自蒙藏佛门画家之手。版框长58.7厘米、宽14.4厘米，四周双边，外宽内细，横刊朱印藏文八行，栏框右侧刊有汉文经名及页码，字口清晰，印色匀净。每页经页为双面刷印，具体做法是将印好的经页按页码合粘为一页，这也就是印本梵夹装经典在装潢上独特的工艺程序，是最费人工和时间的。经页码放整齐，在经页断面厚度上进行彩绘，以朱红为地，上用墨彩、粉红彩、黄彩、紫彩、褐彩、藕荷色彩料绘制出幢、鱼、瓶、莲、海螺、磬肠、宝伞、金轮吉祥八宝，并以缠枝莲为隙地纹饰。经页的两端，一端以朱红、墨彩绘制喷焰摩尼图，另一端绘制火焰图，图中用藏文书写该卷经名，整体视觉效果庄严肃穆。康熙帝的御制序文及《甘珠尔》目录和修撰职名分别以藏、蒙、满、汉四种文体刊印，计143页。全部《甘珠尔》共收显、密经典972种，经页33 059页，连同目录等共计33 206页。

从康熙二十二年动议刊刻《甘珠尔》至三十九年雕镌版片全部完成，其间经历了17年，不能不说是艰辛漫长的刊刻周期。虽说在这期间清政府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战争中，但同时并未忽视对西藏地区佛教的扶持与尊崇，这一明智的政策赢得了蒙藏地区喇嘛教上层人物的衷心拥戴，在一定意义上对于

维护清政府政权的稳固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促进作用，对藏、蒙、满、汉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了催化作用。刊印《甘珠尔》不仅是清前期雕版印刷史上的一次盛举，同时也是保存传播珍贵的佛教典籍的有力措施。

2. 藏文《丹珠尔》的刊刻

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初三日，康熙帝降旨拉锡“着刻《丹珠尔》经版，刻完之后即送西土”。拉锡根据康熙帝的指示，即派笔帖式关音保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家中商议此事，并由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出面从西藏请来了藏文《丹珠尔》抄本。这部抄本，不仅从来没有制过版，而且是独此一本。这次制作《丹珠尔》经版，共挑选了符合要求的喇嘛、学者等五百余人，由扎萨克达喇嘛吉木巴扎木素、拉木扎木巴、索诺木绰尔济呼毕尔罕、扬察尔喇嘛等四人监造，由达喇嘛罗卜桑格隆等十多名喇嘛具体负责校对等工作，由妙应寺达喇嘛祖勒齐木端罗布格隆具体负责刻写工作。此外，又从武英殿造办处咨调画匠，以负责绘制《丹珠尔》里面的各种图案。同时，康熙帝还钦派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礼部右侍郎罗瞻总负责《丹珠尔》经版的制作工作。

从西藏请来的藏文《丹珠尔》抄本共二百二十五册，有八万三千七百二十二页，《丹珠尔》的目录为一百四十页。同时，又从“察罕喇嘛寺”找到一份《丹珠尔》目录，经与从西藏请来的《丹珠尔》目录相核对之后，将“雅满达噶”佛经等七种经文三百零二页增补到《丹珠尔》稿本里，而后又撰写“序言”。经过加工整理出来的《丹珠尔》稿本，仍为二百二十五册，有八万五千零二十四页，据尚书隆科多等研究估算，要制作一部藏文《丹珠尔》经版，共需用银八万六千一百零五两一钱七分六厘，计划在五年内完成。这次制作《丹珠尔》经版的全部资金，经向康熙帝奏请，不再从民间筹集，而直接从内库动支。下面将隆科多等所拟定的经费预算情况简要介绍。

第一项，抄写经文。

（1）抄写《丹珠尔》经文共需用以红花水印刷的带有行道的

两层裱褶纸十七万零四十八张，每一张纸以九厘计，需用纸张银一千五百三十两四钱三分二厘。

（2）抄写一部《丹珠尔》经文，需用墨一百五十斤。每一斤墨以六钱计，需用银九十两。

（3）抄写经文的喇嘛等人的抄写费，以供给饭食银的形式支给。每人抄写一张以二分五厘计，共要抄写十七万零四十八张，需要支给饭食银四千二百五十一两二钱。

（4）藏文《丹珠尔》的经文比蒙古文《甘珠尔》的经文更难懂，需要更加认真校对。喇嘛等抄写的经文，要经过三次校对之后，才粘贴于板面上，进行刻字制版，再经过三次印刷清样，进行三次校对之后，才制成经版。以上两项三次校对，需用五十名喇嘛，每日支给每人饭食银一钱计六十个月，需要供给饭食银九千两。

第二项，制作经版。

（1）制作《丹珠尔》的经版，需要采买梨木板八万五千零二十四块。每一块板价银以二钱计，共需用银一万七千零四两八钱。这里再补充一句，当时采买梨木板，由于用量过多，在北京附近难以买全，又派人至保定、正定、河间、永平等府采买，并且路经各关口一律不上税，直接运送到北京。

（2）每一块板都要认真细致地加工整理（包括四边）。一块板以三分计，八万五千零二十四块板，需用手工银二千五百五十两七钱二分。

（3）每一块板的两个边都要裹两层布，四个边要上三遍漆。一块板以一钱三分五厘计，八万五千零二十四块板，需用手工银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五两三钱二分。

（4）《丹珠尔》稿本共为八万五千零二十四页，需要刻成八万五千零二十四块版。刻一块版以四钱计，共需用刻字银三万四千零九两六钱。

（5）刻完的经版需要修版，要经三次印刷，三次清样校对，共需要印刷清样用的抬连纸二百六十篓。一篓纸价银以一两计，

共用银二百六十两。

(6) 三次印刷清样，需用红花水五千斤。一斤红花水价银以一钱五分计，共用银七百五十两。

(7) 三次印刷清样，共需要支给工匠手工银二百四十九两五钱。

(8) 一部《丹珠尔》的第一页两边要画两个佛像，中间写一个“祥”字，四周围要画蕃草花。最后一页的两边要画两个佛像，四周围要画蕃草花。以上共需要雕刻四块版，一块版以二两计，需用手工银八两。

(9)《丹珠尔》每一册的第二页四周围要画蕃草花，中间刻经文。一块版以一两计，制作二百二十五块版，需用手工银二百二十五两。

第三项，其他支出。

(1) 已经刻成的经版要放置在木架上，需要三百二十个架子。每一架子以十二两五钱计，共需要制作木架银四千两。

(2) 抄写和校对经文的喇嘛等，冬季需要供应烤火木炭，每日供应一百斤，五个冬季需用木炭为四万五千斤。每一百斤以五钱计，需用木炭价银二百二十五两。

(3) 制作经版喇嘛等每日用暖炕煤二百斤，五个冬季需用煤九万斤。每一百斤以二钱计，需煤价银一百八十两。

(4) 制作经版喇嘛等人的住屋需要修炕及修缮门窗院墙等，共需用修缮银三百两。

以上共计为八万六千一百零五两一钱七分六厘。

此外，经康熙帝批准在汉经厂内择一空地建盖五十间大屋，准备把八万多块《丹珠尔》经版存放在里面。每一间屋用银一百一十两，共用银五千五百两。这一笔开支，隆科多等最初拟定制版预算时，并没有计算在内。到雍正时藏文《丹珠尔》刊刻完成。乾隆二年（1737年），宫中将《甘珠尔》和《丹珠尔》重新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经》成，史称乾隆修补版，又因刻于北京称北京版藏文《大藏经》。

可以看出，在当时条件下，藏文《大藏经》的制作成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这两种经版和所建盖的经版库房用银就达十几万两，参加制作经版工作的喇嘛、学者、工匠等有关人员达千人，前后延续五十多年，充分体现了当时清政府的经济实力和出版能力。

第二节　地方官署出版机构及其出版活动

清初的地方官刻并没有太大的开展，后来因为修《大清一统志》，先后从全国征集志书，武英殿允许各省翻刻，各省的官刻书才逐渐增多，以刻书业发达的南方省份，如浙江、安徽等省的官刻本居多，以编纂与出版地方志书为主。此外，书院系统刻书也是地方官刻中的一个重要支脉。

一、府、州、县署刻本

仅以两个地区为例。

（一）扬州府署

多种版本的《扬州府志》都在本署刊刻。如康熙三年（1664年）刻扬州知府雷应元纂修的［康熙］《扬州府志》二十卷，十四年（1675年）刻扬州知府金镇纂修的［康熙］《扬州府志》四十卷，二十四年（1685年）刻扬州知府张万寿修、继任扬州知府崔华纂、邓汉仪等校［康熙］《扬州府志》四十卷。雍正十一年（1733年）刻扬州知府尹会一修、程梦星等纂［雍正］《扬州府志》四十二卷。乾隆三十年（1765年）刻两淮盐运使赵之璧修纂《平山堂图志》十卷。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阮元修、江藩等纂［嘉庆］《扬州府图经》（亦题《广陵图经》）八卷，十五年（1810年）刻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修、姚文田等纂［嘉庆］《扬州府志》七十二卷。道光十一年（1831年）刻清扬州营游击陈述祖修、郑余堂等纂《扬州营志》十六卷，十二年（1832年）刻冯道立撰《淮扬水利图说》一卷等。

清乾隆至道光间，扬州府各县署如仪真县、靖江县、高邮州、兴化县、泰兴县、江都县、泰州、甘泉县、宝应县等也刻印了多种志书：

仪真县署（雍正时因讳皇帝胤禛名改仪征县）刻印的有：康熙七年（1668年）刻仪真知县胡崇仁修、舒文灿续修、汤有光等纂［康熙］《重修仪真县志》十二卷，三十二年（1693年）仪真县署刻马章玉纂修［康熙］《增修仪真县志》十二卷，五十七年（1718年）刻仪真知县陆师纂修［康熙］《增修仪真县志》二十二卷。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颜希源、邵光钤纂修、吕彩助纂［嘉庆］《仪征县续志》十卷等。

靖江县署有康熙八年（1669年）刻靖江知县郑重修、袁元等纂［康熙］《靖江县志》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靖江知县胡必蕃修、金敞纂［康熙］《续增靖江县志》十八卷，同年，刻印的［崇祯］《靖江县志》十九卷。

高邮州署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初刻、二十三年（1684年）增刻邑人孙宗彝原本、李培茂（高邮知州）增修、儒学学正余恭增纂［康熙］《高邮州志》十八卷。雍正二年（1724年）刻高邮知州张德胜修、邓绍焕、汪士璜、王曾禄、张梦鲤纂［雍正］《高邮州志》十二卷。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刻高邮知州杨宜仑修、邑人夏之蓉、沈之本纂［乾隆］《高邮州志》十二卷、首一卷，十八年（1813年，一作二十年）刻杨宜仑原修、冯馨增修、邑人王念孙、夏之蓉、夏味堂等增纂［嘉庆］《高邮州志》十二卷、首一卷。

兴化县署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张可立纂［康熙］《兴化县志》十四卷。

泰兴县署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刻钱见龙、吴朴纂修［康熙］《泰兴县志》四卷，五十五年（1716年）刻宋生修、王令树等纂［康熙］《泰兴县志》四卷。嘉庆十八年（1813年）刻凌培、张先甲修、张福谦纂［嘉庆］《泰兴县志》八卷。

江都县署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刻江都知县李苏纂修、

邑人叶弥广所辑《志稿》重加增益的［康熙］《江都县志》十六卷。雍正七年（1729年）刻江都知县陆朝玑修、程梦星、蒋继式、尤璋等纂［雍正］《江都县志》二十卷、《图》一卷。乾隆八年（1743年）刻五格、黄湘修、程梦星等分纂［乾隆］《江都县志》三十二卷、《图》一卷。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刻王逢原修、李保泰纂［嘉庆］《江都县续志》十二卷、首一卷。

泰州州署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刻魏锡祚据明崇祯六年（1633年）刻明李自滋、刘万春纂修本重刻［崇祯］《泰州志》十卷、《图》一卷。雍正六年（1728年）刻泰州知州褚世暄修、陈九昌等纂［雍正］《泰州志》十卷、《首》一卷。道光七年（1827年）刻王有庆、陈道坦、刘铃、李国瑞等修，曹懋坚、梁柱、徐鸣珂等纂［道光］《泰州志》三十六卷、《图》一卷。道光年间泰州州署刻清泰州任钰、宫锡枯等撰［道光］《泰州新志刊谬》二卷。

甘泉县署于乾隆八年（1743年）刻吴鹗峙、王熙泰等修、厉鹗等纂［乾隆］《甘泉县志》二十二卷、首一卷。嘉庆十五年（1810年）刻陈观园修、李保泰纂［嘉庆］《甘泉县续志》十卷、首一卷。

宝应县署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刻宝应知县徐琏修、邑人乔莱纂［康熙］《宝应县志》二十四卷。道光二十年（1840年）宝应县署委宝应汤氏沐华堂刻宝应知县孟毓兰修、邑人乔载繇、成观宣等纂［道光］《重修宝应县志》二十八卷、首一卷。

两淮盐政官署刻有多种书，如康熙十二年（1673年）盐运道泰州分司刻汪兆璋修、杨大经纂《淮南中十场志》十卷，五十六年（1717年）两淮盐运使司刻《痘疹心法》十二卷、《碎金赋》一卷附《痘疹玉雕摘要》二卷，合称《痘疹心法全书》。雍正年间两淮盐运使司刻噶尔泰修、程梦星等纂《两淮盐法志》十六卷、《图》一卷。乾隆年间两淮盐运使司刻佚名撰《两淮盐运使司鹾务类编》，十三年（1748年）刻江都王世球纂《两淮盐法志》四十卷、首一卷，六十年（1795年）刻两淮盐运使曾燠辑《邗上题

襟集》一卷。嘉庆二年（1797年）刻《续集》一卷。

（二）徽州地区

清代徽州官刻书包括府署、府学紫阳书院、县衙诸处所刻书籍。时间大抵起于康熙年间，终于光绪中期。如徽州府署于乾隆四年（1739年）刻印宋朱熹《朱子经济文衡类编前集》、《后集》和《续集》，而以官刻地方志比较突出。

康熙年间曾三次纂修府志：十二年（1673年）的二十六卷本、二十二年（1683年）的续编八卷本、三十八年（1699年）的十八卷本。前两志今只存抄本，当时可能未予付梓。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有知府戴知城纂修的《[乾隆]徽州府志》十八卷。道光七年（1827年）有马步蟾纂修《徽州府志》十六卷、首一卷。

歙县作为府的附廓，在府属六邑中地位最为重要，有清一代，歙县刻有顺治四年（1647年）宋齐肃修、吴孔嘉等纂《[顺治]歙县志》十四卷。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刻靳治荆修、吴苑等纂《歙县志》十二卷，同时将志中山川图别出《古歙山川图》一卷，以阮溪水香园名义刊刻行于世。乾隆三十年（1765年）刻张佩芳修、刘大衡纂《歙县志》二十卷、《首》一卷。道光八年（1828年）刻劳逢源修、沈伯棠等纂《歙县志》十卷、首一卷。

休宁县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刻廖腾煌修、汪晋征纂《休宁县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刻徐日簪修《休宁县志》。道光三年（1823年）刻何应松修、方崇鼎纂《休宁县志》二十四卷、《图》一卷。

绩溪县有康熙七年（1668年）刻苏霍祚修、曹有光等纂《绩溪县志续编》四卷。乾隆二十一年（756年）刻陈锡修、赵继序、章瑞钟纂《绩溪县志》十卷。嘉庆十五年（1810年）刻清恺修、席存泰纂《绩溪县志》十二卷。

祁门县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姚启元修、张瑗等纂《祁门县志》八卷。道光七年（1827年）刻王让修、桂万超纂《祁门志》三十六卷、首一卷。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祁门

县志》三十六卷、首一卷。

黟县有顺治十二年（1655年）刻实士范纂修《黟县志》八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王景曾修、尤侗纂《黟县志》四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刻《黟县志》十二卷。嘉庆十七年（1812年）刻吴甸华修、程汝翼、俞正燮纂《黟县志》十六卷、首一卷。嘉庆志又于道光五年（1825年）、同治十年（1871年）两度重印并依类续补刊刻其后，世称《二志》、《三志》。

婺源县有康熙八年（1669年）刘光宿修、詹养沉纂、三十三年（1694年）蒋灿纂《婺源县志》十二卷。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俞云耕修、潘继善纂，五十二年（1787年）彭家桂修、张图南纂修《婺源县志》三十九卷、首一卷。嘉庆十二年（1807年）赵汝为纂修《婺源县志》。道光六年（1826年）黄应昀、朱元理纂修《婺源县志》三十九卷、首一卷等。[1]

【1】本节所列方志参见《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公藏善本书目。

二、地方教育机构刻本

各地官署中的儒学、书院等机构，由于开展活动的需要，也从事书籍印刷。由于这些书院多为政府创办，因此书院刻书也是属于政府刻书的一部分，刻行过多种书籍。如扬州地区在康熙二年（1663年）维扬使衙刻有元马端临撰、清广陵史以遇辑钞《文献通考钞》二十四卷，明王圻撰、清广陵史以甲辑钞《续文献通考钞》三十卷，两书版式都是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高邮州学刻宋秦观撰《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系高邮学正余恭据明李之藻刻本重刻。雍正三年（1725年），淮扬道署刻傅泽洪辑《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图》一卷。嘉庆二年（1797年）石梁学署刻《竹书纪年校补》二卷，嘉庆十二年（1807年）扬州郡斋刻《静夫先生遗文》二卷。

再如徽州地区，府学紫阳书院于康熙四年（1665年）刻明末梁于埃、扶纲辑本《铁桥志书》二卷，三十七年(1698年）刻明朱芾煌撰《文嘻堂诗集》三卷。雍正年间刻《程朱阙里志》八

卷。乾隆年间，还曾三度翻刻内府刻本：《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首一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首一卷，《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反映了府学的雄厚资金和刻书能力，也显示出其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心态。五十五年（1790年）以木活字刻印山长周鸿《婺源山水游记》。梅花书院于道光中刻洪榜撰《二洪遗稿》等，东湖书院刻印过王舟瑶《水云集》等，以经解、儒学著述为主。书院系统刻书成为地方官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支脉。

从上述可见，地方官署以志书的编纂与出版为主。仅徽州一地，府署刻书1种，县署刻书26种，府学刻书15种，县学刻书3种，合计44种。其中，仅婺源县就出版府志5种（今存4种）、府属县志26种（今存25种），其数量在安徽省甚或在全国均称发达，堪与江、浙两省相比。《婺源县志》基本上为50年一修，这既反映了清政府屡次下诏修志，对志书编纂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当地人文及经济繁荣之盛况。

清代中期以后，武英殿允许各省翻刻，各省的官刻书逐渐增多。同治二年（1863年），金陵官书局开始在安庆设局，各省纷纷效仿。省一级的地方政府，大都有书局，编辑出版的书称为"局本"。浙江官书局、苏州官书局、湖北官书局（崇文官书局）、江西官书局、广雅书局、湖南官书局（湘南官书局）、四川官书局、安徽敷文书局、山西官书局、山东官书局、直隶官书局、江楚编译官书局、福州官书局、云南官书局、淮南官书局、贵州官书局等相继成立，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遍布全国的政府出版印刷网。这些书局以重兴文化为名，所刊刻的书籍多是"御纂"、"钦定"的本子，其中以经史类居多，诗文类次之。同时，为了迎合一般读者的需要，也刊刻一些普通读物，价格低廉，求之易得。由于主持人不同，这些书局选用底本、校勘精劣、纸墨好坏也各有差异。官书局刻书成为清代后期地方官刻书的重要代表。

第四章　清前期民间的图书编纂与著述

第一节　学术流派及私家著述

清前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士人学子，经历了痛苦的人生磨难。由于饱经战乱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摧残，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学术研究。研究学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学术大师和学术流派竞相出现。为了把学术成果公诸于世，“学者、藏家竞起刻书，至成一代风尚”，[1] 其学术成果表现在民间出版方面，就是书籍的类别增加，书籍的学术内容也更为丰富。可以说，学者们取得的学术成果对书籍出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中国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清前期的学术大致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流派。

【1】黄镇伟:《坊刻本》,5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理学各派　理学从宋朝开始在学术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府的正统思想。它的演进经历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两个阶段。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确立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社会的最高准则；继承陆九渊一派的王阳明心学冲破了朱学的羁绊，以其“致良知”和“天理”相调和，推进了理学的发展。但是，“心学”泛滥，空谈盛行，学术危机日见严重。明清之际历史剧变，作为统治阶级官方正统思想的宋明理学

已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不能解答社会现实问题。对心学和理学的弊病进行修正和批判，成为清初整个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正如梁启超所说："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以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1] 其代表人物有：孙奇逢（1585—1675）著有《理学宗传》、《四书近指》、《甲申大难录》、《周易大指》、《读易大旨》、《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孙文正公年谱》、《苏门纪事》和《夏峰集》；李颙（1627—1705）著有《帝学宏纲》、《经世蠡测》、《时务急着》、《廿一史纠谬》、《二曲集》、《时务急策》、《四书反身录》、《十三经纠谬》、《十三经注疏纠谬》、《观感录》等；陆世仪（1611—1672）著有《思辨录辑要》和《思辨录》；陆陇其（1630—1693）著有《三鱼堂文集》；吕留良（1629—1683）著有《与吴玉章书》、《东庄医案》、《吕晚村文集》、《吕晚村续集》、《四书讲义》和《东庄吟稿》；张履祥（1611—1674）著有《补农书》、《读易笔记》、《读史偶记》、《初学备忘》、《经正录》、《愿学记》、《问目》、《训子语》、《言行闻见录》和《杨园先生全集》。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诸子学派　经学独尊的地位受到冲击的时候，子书引起了士人的重视。梁启超云："自清初提倡读书好古之风，学者始以诵习经史相淬砺，其结果惹起许多古书之复活。其中最重要者为秦汉以前子书之研究。"[2] 考据训诂，唯古是尚，研究典籍必返秦汉以前的典籍，因此诸子学复兴。诸子之学在清初复兴，傅山功不可没，他著有《霜红龛集》和《荀子评注》等。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颜李学派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倡导、推崇宋明理学，出现了陆陇其、陆世仪、汤斌、熊赐履、李光地等理学家。他们笃信程朱，宣扬理学。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反对理学的思想家，对宋明理学坚决批判，其代表人物是颜元和李塨。颜元（1635—1704）著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李塨（1659—1733）著有《大学辨业》、《论语传注》、《周易传注》、《圣经学规纂》、《颜李遗书》和《颜

李丛书》。

经学考据诸家　清前期顾炎武、费密、黄宗羲、王夫之等从事考据，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埋头书斋，强调训诂、考据为要。其学术特点是汉宋兼采，不存门户之见，他们博通经史诸子之学，对以经学研究为中心的情况有所突破。顾炎武（1613—1682）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费密（1625—1701）著有《古经旨论》、《荒书》、《弘道书》、《中传正纪》和《燕峰文集》；阎若璩（1636—1704）著有《古文尚书疏证》等；胡渭（1633—1714）著有《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毛奇龄（1623—1713）著有《四书改错》、《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和《西河合集》。

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是清乾隆、嘉庆时期兴起的以考据为治学内容的学派。因其尊崇汉代学者对经学的解释，采用汉儒文字、音韵、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又称清代“汉学”。这一学派以朴实、考证为特征，也称“朴学”。它源于清初，形成于乾嘉时期，衰落于道光时期，所以又称其为乾嘉学派。梁启超认为，“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它。”[1] 乾嘉学派的兴起是各种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政治上，乾嘉学派的兴起是清前期专制统治加强的产物。清前期土地兼并日益激烈，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封建专制统治严酷、政治黑暗。康、雍、乾三帝大兴文字狱。乾隆曾言明“造为荒诞不经之谈”的学者“若仍不知悛改，消灭天道，自必不容，其败露，亦惟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2] 政治上的专制高压，使知识分子不敢过问、研究社会现实问题，于是把精力转向考据、训诂方面。经济上，清前期统治者采取有利于发展经济的种种举措，康熙朝推行“修养生息”的政策，雍正朝“摊丁入亩”，“使平民无厘毫之费”，乾隆朝“施惠于民，蠲免振恤”，促进了经济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2】《乾隆朝东华录》，卷四五。

的繁荣，“府库所贮，月羡岁增”,[1] 国库日益充足。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为乾嘉学派的兴起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文化上，康熙、乾隆二帝重视和提倡儒家文化。为了笼络文人，巩固封建统治,康熙、乾隆二帝都倡导研究经学，大力提倡并积极扶持，多次下诏地方官吏推举经术人才，从事古籍的考据和整理，提高了汉学的地位。

学术上，乾嘉学派的兴起是明末清初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康熙帝提倡宋明理学，使其成为统治人们思想的“显学”，但儒学发展到清初，已经开始露出衰象，正如费密指出，“后儒自取私说，妄改古经”。[2] 其结果是“虚文日甚，妄论日多……以学术误人国家，良可慨也”。[3] 理学误国误民，反对理学的声浪越来越高，动摇了理学的地位，曾经占据思想、学术统治地位的理学已经走向衰颓，学术的发展要求新的学术形态出现来取代理学。从清初到乾隆二十五年，国家最终完成了统一，民族矛盾逐渐缓解，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就为乾嘉学派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乾嘉学派按师承和地区可分为吴、皖、扬州和浙东四大派别。

（一）吴派：吴派因地域而得名。这一派擅长经、史，表现出详博的特点，宗汉而近乎于佞汉。其代表人物有：惠栋（1697—1758）著有《周易述》、《易汉学》等；沈彤（1688—1752）著有《仪礼小疏》、《九经古义》和《果堂全集》；江声（1721—1799）著有《尚书集注音疏》等；余萧客（1732—1778）著有《古经解钩沉》；江藩（1761—1830）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王鸣盛（1722—1797）著有《尚书后案》和《十七史商榷》；钱大昕（1728—1804），著有《廿二史考异》等。

（二）皖派：皖派与吴派在治学上有所不同，不仅表现在两派的学风不尽相同，而且治经的侧重点也有差别。吴派多治《周易》、《尚书》，皖派多治《三礼》，尤精小学、天文、历算。皖派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主要代表。江永（1681—1762）著有《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

【1】《石渠余纪》,卷一。

【2】费密:《费氏遗书三种·弘道书》,卷上,《古经旨论》。

【3】《费氏遗书三种·弘道书》，卷下,《圣门定旨两变序记》。

等；戴震（1723—1777）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和《方言疏证》等；段玉裁（1735—1815）著有《六书音韵表》和《说文解字注》等；王念孙（1744—1832）著有《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王引之（1766—1834）著有《经义述闻》等。

（三）扬州学派：扬州学派和吴、皖两派有着渊源的学术关系，是对吴、皖两派治学方法和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在学术的某些方面超越了吴、皖两派。其主要代表有汪中、焦循和阮元。汪中（1745—1794）著有《述学》、《尚书考异》、《大戴礼记正误》和《春秋述义》等；焦循（1763—1820）著有《孟子正义》、《雕菰楼集》；阮元（1764—1849）编有《研经室集》、《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阮元以后，汉学由盛转衰。

（四）浙东学派：乾嘉时期浙东学派的主要人物是全祖望、章学诚。全祖望（1705—1755）编撰有《宋元学案》、《鲒埼亭集》；章学诚（1738—1801）著有《文史通义》、《史籍考》等。

出版离不开学者们从事的校勘、辑佚、辨伪等学术研究。书籍在流传、复制、传抄、翻刻中经常出现脱文、讹字、倒字、重字、叠字等现象，这就需要校勘、更正和补订。清人段玉裁说："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然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1] 乾嘉学派各家均治学严谨，重视收集、归纳、考证和研究。他们"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一家"，[2] 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其中，超越前人的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的成果颇多，如段玉裁编撰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著的《说文通训定声》、王引之著的《经传释词》等专著，在考订文字渊源及其演变方面多有创建。乾嘉学派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古籍的整理、考订、校勘、辨伪和辑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乾嘉学派学者辈出，著作如林。仅《清代朴学大师传》所载史学家就有88人，这些学者致力于考据、版本、校勘和辑佚工作，对中国的学术进行总结，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汗水，其功不可没。梁启超在《清代

【1】段玉裁：《经韵楼集·与同志论校书之难》。

【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戴先生传》。

学术概论》一书中说:“夫无考据之学则无清学也。”这一评价是十分公允的。乾嘉考据的学术成果通过出版保存下来,同时又促进了出版的繁荣,对学术的传承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初至乾嘉时期主要学者著述简表[1]

姓名	籍贯	生卒年代	主要著述
孙奇逢	河北容城	1584 – 1675	《读易大旨》、《尚书近指》、《中州人物考》、《理学传心纂要》、《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
钱谦益	江苏常熟	1582 – 1664	《初学集》、《有学集》、《列朝诗集》、《明史断略》、《国初群雄事略》
朱之瑜	浙江余姚	1600 – 1682	《舜水遗集》
陈　确	浙江海宁	1604 – 1677	《大学辨》、《葬书》、《瞽言》、《性解》
傅　山	山西阳曲	1605 – 1685	《霜红龛集》、《女科》、《产后》
吴伟业	江苏太仓	1609 – 1671	《梅村集》、《绥寇纪略》、《吴都文献》
黄宗羲	浙江余姚	1619 – 1695	《南雷文定集》、《明文案》、《明文海》、《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行朝录》
陆世仪	江苏太仓	1611 – 1672	《思辨录辑要》、《陆子遗书》
张履祥	浙江桐乡	1611 – 1674	《杨园先生全集》、《张考夫遗书》
张尔岐	山东济阳	1612 – 1677	《周易说略》、《仪礼郑注句读》、《蒿庵集》
孔尚任	山东曲阜	1648 – 1718	《桃花扇传奇》、《湖海集》
归　庄	江苏崑山	1613 – 1673	《玄恭文钞》、《恒轩集》、《归玄恭遗著》
顾炎武	江苏崑山	1613 – 1681	《音学五书》、《历代帝王宅京记》、《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金石文字记》、《肇域志》、《菰中随笔》
尤　侗	江苏常州	1618 – 1704	《西堂杂俎》、《鹤西堂文集》、《明艺文志》
王夫之	湖南衡阳	1619 – 1692	《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永历实录》、《黄书》、《噩梦》、《姜斋文集》
毛奇龄	浙江萧山	1623 – 1716	《西河全集》、《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

[1] 本表资料来源: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续 表

姓名	籍贯	生卒年代	主要著述
顾祖禹	江苏无锡	1624－1680	《读史方舆纪要》
汤 斌	河南睢州	1627－1687	《汤子遗书》、《潜庵语录》、《洛学编》
李 颙	陕西周至	1627－1705	《二曲全集》、《四书反身录》、《富平答问》
朱彝尊	浙江秀水	1629－1709	《曝书亭集》、《经义考》、《日下旧闻》、《明诗综》
陆陇其	浙江平湖	1630－1692	《三鱼堂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困勉录》、《三鱼堂文集》
唐 甄	四川达县	1630－1704	《潜书》、《圃亭集》
徐乾学	江苏昆山	1631－1694	《读礼通考》、《资治通鉴后编》、《澹园集》、《大清一统志》
胡 渭	浙江德清	1633－1714	《易图明辨》、《禹贡锥指》
梅文鼎	安徽宣城	1633－1704	《历算全书》、《中西算学通》、《西国日月考》
颜 元	直隶博野	1635－1704	《四书正误》、《四存编》、《辟异录》、《朱子语类评》
阎若璩	山西太原	1636－1704	《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潜邱札记》
万斯同	浙江鄞县	1638－1702	《补历代史表》、《儒林宗派》、《历代宰辅汇考》、《明史稿》
刘献廷	顺天大兴	1648－1695	《广阳杂记》、《继庄集》
张伯行	河南仪封	1651－1725	《道统录》、《近思录》、《性理正宗》、《正谊堂全书》
李光地	福建安溪	1642－1718	《性理精义》、《朱子大全》、《二程子遗书》、《榕树全书》
方 苞	安徽桐城	1668－1749	《周官集注》、《周官辨》、《礼记析疑》、《望溪全集》
江 永	安徽婺源	1681－1726	《周礼疑义举要》、《春秋地理考实》、《近思录集注》、《礼经纲目》
惠 栋	江苏元和	1697－1758	《周易述》、《明堂大道录》、《易汉学》、《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
吴敬梓	安徽全椒	1701－1754	《文木山房诗集》、《儒林外史》
全祖望	浙江鄞县	1705－1755	《经史问答》、《困学纪闻》、《鲒埼亭文集》、《鲒埼亭诗集》
庄存与	江苏武进	1719－1788	《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旨》

续 表

姓名	籍贯	生卒年代	主要著述
王鸣盛	江苏嘉定	1722－1797	《周礼军赋说》、《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篇》
戴　震	安徽休宁	1723－1777	《戴东原集》、《毛郑诗考证》、《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方言疏证》
纪　昀	直隶献县	1724－1805	《史通削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
赵　翼	江苏阳湖	1727－1814	《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瓯北全集》
钱大昕	江苏嘉定	1728－1804	《潜研堂全书》、《十驾斋养心录》、《元史稿》、《恒言录》
朱　筠	顺天大兴	1729－1781	《笥合文集》、《十三经文字异同》
毕　沅	江苏太仓	1730－1799	《续资治通鉴》、《经训堂丛书》、《灵岩山人文集》、《灵岩山人文集》
段玉裁	江苏金坛	1735－1815	《经韵楼文集》、《说文解字注》、《声韵考》
章学诚	浙江会稽	1738－1801	《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方志略例》、《章氏遗书》
崔　述	直隶大名	1740－1816	《考信录》、《三代正朔考》、《东壁遗书》
邵晋涵	浙江会稽	1743－1796	《尔雅正义》、《南都事略》、校辑《五代史》
姚　鼐	安徽桐城	1781－1815	《惜抱轩十种》、《九经说》、《古文辞类纂》
翁方纲	直隶大兴	1733－1818	《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复初斋文集》
王念孙	江苏高邮	1744－1832	《广雅疏证》、《读书杂志》
孔广森	山东曲阜	1752－1786	《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大戴礼记补注》、《经学卮言》
孙星衍	江苏阳湖	1753－1823	《孙氏周易集解》、《尚书古文注疏》、《寰宇访碑录》、《墨子间诂》
江　藩	江苏甘泉	1761－1831	《节甫老人杂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
严可均	浙江乌城	1762－1843	《说文声类》、《说文校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焦　循	江苏甘泉	1863－1820	《易学章句》、《易图略》、《孟子正义》、《雕菰楼集》
阮　元	江苏仪征	1764－1849	《十三经注疏校刊记》、《畴人传》、《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经籍纂诂》

续　表

姓名	籍贯	生卒年代	主要著述
王引之	江苏高邮	1766－1834	《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字典考证》
刘逢禄	江苏武进	1776－1829	《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谷梁废疾申何》、《左氏春秋考证》、《尚书今古文集解》

第二节　古籍整理的辉煌成就

清前期是我国图书编撰的极盛时期，无论是图书编撰理论或是图书编撰实践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下面从古籍整理和新著编撰两个方面来介绍一下当时民间著述的概貌。

一、古籍考辨

清代学者对古籍的考辨集前代之大成，考辨了大量的古籍。他们对古籍的考辨包括校勘、辨伪、注释、订误、补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代表著作有：

经部

本时期经部书整理之作甚富，仅据阮元主编的《皇清经解》、王先谦《续皇清经解》所收，就有157家，书389种。未收者仍很多。

关于《周易》，主要有三类著作：一是辨宋人易图之伪，如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胡渭《易图明辨》等；二是辑述汉、魏人旧注旧说，如惠士奇《易说》，惠栋《周易述》、《易汉学》、《易例》、《周易本义辨证》，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孙星衍《孙氏周易集解》（续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作）等；三是新注疏之作，如焦循《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周易补疏》等，对汉《易》有所突破，用《周易》经传互证。

关于《尚书》，主要有四类著作：一是有关辨伪，如黄宗羲

《授〈书〉随笔》，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惠栋《古文尚书考》，丁晏《尚书余论》，程廷祚《尚书订疑》，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等；二是就二十八篇可靠之作辑纂汉古文家注，然后作疏解，如王鸣盛《尚书后案》，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三是辑考今文经说之作，如魏源《书古微》，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欧阳夏侯遗说考》，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等；四是专篇或专题注释之作，如盛百二《尚书释天》，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朱鹤龄《禹贡长笺》，胡渭《禹贡锥指》及《图》，丁晏《禹贡锥指刊误》，焦循《禹贡郑注释》，龚自珍《太誓答问》，徐文靖《禹贡会笺》等。

关于《诗经》，有四类著作：一是宗《诗序》、释毛郑之作，如朱鹤龄《毛诗通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焦循《毛诗补疏》等；二是破《诗序》、讨论诗旨之作，如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等；三是有关今文经之作，如魏源《诗古微》，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三家诗异义遗说》，陈寿祺《三家诗遗说考》等；四是各类专题之作，如王夫之《诗经稗疏》，毛奇龄《续诗传鸟名》，徐鼎《毛诗名物图说》，俞樾《诗名物证古》，焦循《陆玑疏考证》、《毛诗地理考释》，洪亮吉《毛诗天文考》，孔广森《诗声类》，段玉裁《诗经小学》等。

关于《周礼》，集成之作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此外如惠栋《礼说》，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宋世荦《周礼故书疏证》，丁晏《周礼释注》，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戴震《考工记图注》，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磬折古义》、《沟洫疆理小记》，阮元《车制图考》，郑珍《考工轮舆私笺》，庄存与《周官记》、《周官说》，王聘珍《周礼学》等。

关于《仪礼》，集成之作有胡培翚《仪礼正义》。此外如张尔

岐《仪礼郑注句读》，张惠言《仪礼图》，江永《仪礼释例》、《释宫增注》，凌廷堪《礼经释例》，段玉裁《仪礼汉读考》，邵懿辰《礼经通论》，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胡匡衷《仪礼释宫》，洪颐煊《礼经宫室答问》，任大椿《弁服释例》，徐乾学《读礼通考》等。

关于《礼记》，未有集成之作的新疏。主要著作如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朱彬《礼记训纂》，万斯大《礼记偶笺》，江永《礼记训义择言》，焦循《礼记补疏》，孙希旦《礼记集解》，丁晏《礼记释注》，陈乔枞《礼记郑读考》，俞樾《礼记郑读考》，江永《深衣考误》，任大椿《深衣释例》，胡培翚《燕寝考》，惠栋《明堂大道录》、《禘说》，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洪震煊《夏小正疏义》附《释音异字》，阮元《曾子注释》等。

关于通礼，如金榜《礼笺》，孔广森《礼学卮言》，武亿《三礼义证》，凌曙《礼说》，陈乔枞《礼说》，毛奇龄《郊社体祫问》、《大小宗通绎》，程瑶田《宗法小记》，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黄以周《礼书通故》等。

关于《春秋左传》，有一部集大成而未完稿（缺昭、定、哀三公）的著作，即刘文琪、刘毓崧《左传旧注疏证》，这是一部《左传》新疏，不以杜预注为基础，“先取贾（逵）、服（虔）、郑（玄）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袭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1] 同时广罗汉人旧注旧说，并列举清人研究的成果，下以己意，定其从违。其他如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惠栋《左传补注》，姚鼐《左传补注》，梁履绳《左通补释》，焦循《左传补疏》。关于《春秋》和《左传》综合研究之作，有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姚文田《春秋经传朔闰表》、施彦士《春秋经传朔闰表发覆》，徐善《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名考实》，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春秋姓名同异考》，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程廷祚《春秋识小》、《春秋职官考略》、《春秋地名辨异》、《左传人名辨

【1】刘寿曾：《伯山先考行略》，《刘寿曾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

异》，汪中《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等。

关于《春秋公羊传》，如凌曙《春秋繁露注》、《公羊礼说》，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庄存与《春秋正辞》，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姚鼐《公羊补注》，陈玄《公羊义疏》等。

关于《春秋谷梁传》，如许桂林《谷梁释例》，侯康《谷梁礼证》，姚鼐《谷梁补注》，柳兴恩《谷梁大义述》，廖平《谷梁古义疏》等。

关于《论语》，集大成之作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其他如毛奇龄《论语稽求篇》，程廷祚《鲁论说》，刘台拱《论语骈枝》，钱坫《论语后录》，焦循《论语补疏》，宋翔凤《论语说义》，江永《乡党图考》，黄式三《论语后案》等。

关于《孟子》，集大成之作有焦循《孟子正义》。其他如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孟子四考》等。

关于四书，如阎若璩《四书释地》、《一续》、《二续》、《三续》，宋翔凤《四书释地辨证》，翟颢《四书考异》，周炳中《四书典故辨正》等。（图30）



图30
《四书逸笺》

关于《孝经》，如阮福《孝经义疏补》，丁晏《孝经述注》等。

关于群经的校释札记，如臧琳《经义杂记》，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等。

史部

本时期对史部书的整理主要从校勘、注释、订误等几个方面着手，兹分几类举要介绍：

史籍校释、考证。其中从考者，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

札记》，杭世骏《诸史然疑》，洪亮吉《四史发伏》，洪颐煊《诸史考异》，李贻德《十七史考异》等。单史整理之作以前四史为多，如钱坫《史记补注》，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念孙《读史记杂志》，张文虎《史记札记》，崔适《史记探源》，吴翌凤《汉书考证》，惠栋《后汉书补注》，钱大昭《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三国志辨疑》，王念孙《读汉书后汉书杂志》，陈景云《两汉订误》，李慈铭《汉书札记》、《后汉书札记》附《三国志札记》、《宋书札记》、《梁书札记》、《魏书札记》、《隋书札记》，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三国志注证遗》、《五代史纂误补续》，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续志集解》，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北齐书疏证》，赵一清《三国志注补》，潘眉《三国志考证》，梁章钜《三国志旁证》，侯康《三国志补注》，吴兰庭《五代史记纂误补》，邵晋涵《旧五代史笺注》，彭元瑞《五代史补注》，洪亮吉《宋书音义》，刘寿曾《南史校议》，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陆心源《宋史翼》，厉鹗《辽史拾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施国祁《金史详校》及《史论》，汪辉祖《元史本证》，李文田《元秘史注》等。此外古史整理之作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逸周书补注》，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汲冢纪年存真》，丁宗洛《逸周书管笺》、《疏证》、《提要》、《集说》、《摭订》，黄模《国语补韦》，董增龄《国语正义》，徐元诰《国语集解》，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陈逢衡《山海经汇说》，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郝懿行《竹书纪年校正》、《穆天子传补注》，檀萃《穆天子传注疏》，陈逢衡《穆天子传注补正》等。《水经注》整理之作有戴震校《水经注》，赵一清《水经注释》，张匡学《水经注释地》，汪士铎《水经注图》等。表志传单篇整理之作亦很多，其中以《地理志》为最多，次则《经籍志》、《艺文志》、《天文志》、《律历志》略见，《食货志》、《乐志》、《舆服志》等则无。主要如：孙星衍《史记天官书考证》，汪越《读史记十表》，梁玉绳《古今人表考》，王元

启《汉书历律志正讹》，汪迈孙《汉书地理志校本》，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钱坫《新斠注汉书地理志》，徐松《新斠注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隋书地理志考证》，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吴承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王仁俊《汉书艺文志校补》，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朱右曾《后汉郡国志补校》，李聿求《后汉儒林传补》，陈运溶《后汉大秦国传补注》，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方恺《晋书地理志校补》，张穆《延昌地形志》等。

补作表志。本时期补历代史书表志之作甚多，有的同一表志有几人之作，这些著作多收在《二十五史补编》中。如杭世骏《补历代艺文志》，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钱大昭《后汉书补表》、《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五代艺文志》，姚振宗《补后汉艺文志》，曾朴《后汉艺文志》，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吴曾仅《三国郡县表》，洪亮吉《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钱仪吉《补晋兵志》，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赵在翰《晋书补表》，郝懿行《补宋书刑法志》、《补宋书食货志》，王仁俊《补宋书艺文志》，周嘉猷《南北史表》、《五代纪年表》，宋祖骏《补五代艺文志》，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等。

子部

本时期关于子部书的整理，多集中于先秦诸子及两汉子书，校勘、注释、辨伪、辑佚之作均有。对子书的校勘、注释之作主要有：孔广森补注《曾子十二篇读本》，阮元《曾子注释》，顾宗伊《曾子古本辑注》；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黄以周《晏子春秋校勘记》，卢文弨《晏子春秋校正》，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顾宗伊《子思子遗编辑注》；卢文弨《荀子校勘》，刘台拱《荀子

补注》，郝懿行《荀子补注》，顾宗伊《荀子新书辑注》；王一清《道德经释辞》，张尔岐《老子说略》，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徐大椿《道德经注》，董德宁《老子道德经本义》，魏源《老子本义》；王夫之《庄子解》、《庄子通》，宣颖《南华经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卢文弨《列子张湛注校正》，胡怀琛《列子张湛注补正》；洪颐煊《管子义证》，宋翔凤《管子识误》，戴望《管子校正》；孙星衍、孙冯翼《商子》，严可均校《商君书》；卢文弨《韩非子校正》，王先谦《韩非子集解》；钱熙祚《尹文子校勘记》、《尹文子逸文》；辛从益《公孙龙子》；毕沅《墨子校注》，苏时学《墨子刊误》，孙诒让《墨子间诂》；秦恩复《鬼谷子校》、《鬼谷子篇目考》；毕沅辑校《吕氏春秋高诱注》，梁玉绳《吕子校补》，陈昌齐《吕氏春秋正误》，茆泮林《吕氏春秋补校》，李宝洤《吕氏春秋高注补正》，杨昭俊《吕氏春秋补注》；卢文弨校《新书》；张敦仁《盐铁论考证》，王先谦《盐铁论校勘小识》；卢文弨《新序校补》、《说苑校补》、《新论校正》、《申鉴校正》、《盐铁论校补》等。此外校释诸子书的丛札有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俞樾《诸子平议》、《诸子平议补录》等。

集部

集部书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本时期的整理成果亦非常丰富。

《楚辞》类主要有：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楚辞说韵》，戴震《屈原赋注》、《通释》，顾天成《离骚解》、《楚辞九歌解》、《读骚别论》，屈复《楚辞新注》，王邦运《楚辞释》等。

别集类主要有两类著作，一类是校注，一类是辑集。如张澍《诸葛忠武侯文集》，丁晏《曹集诠评》，古直《曹子建诗笺》，黄节《曹子建诗注》附《曹孟德诗注》，陶澍注《靖节集》，古直《陶靖节诗笺》，钱振伦《鲍参军诗注》（黄节集说），卢文弨《鲍照集校补》，蒋清翊《王子安集注》，顾广圻校《骆丞集》，陈熙晋注《骆临海集笺注》，王琦《李太白集注》，钱谦益《杜工部集

笺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赵怀玉校《昆陵集》，张佩芳《陆宣公翰苑集注》，顾嗣立《昌黎诗笺注》，黄钺《昌黎诗增注证讹》，方世举《编年昌黎诗注》，陈景云《韩集点勘》、《柳集点勘》，姚文燮《昌谷集注》，顾广圻校《李元宾文编》、《外编》、《补》，王琦集解《李长吉歌诗》，汪立名编校《白香山诗集》，冯集梧《樊川文集注》、《外集》、《别集》，冯浩《樊南文集详注》、《玉谿生诗详注》，徐树谷、徐炯《樊南文集详注》，钱振伦、钱振常《樊南文集补编》，顾予咸、顾嗣立《温飞卿集笺注》，许培荣《丁卯集笺注》，张瓒辑刻《罗诏谏集》，黄丕烈校钞《骑省集》，柳渥川校刻《河东集》，查慎行《东坡编年诗补注》，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翁方纲《苏诗补注》，赵怀玉校刻《斜川集》，沈钦韩《王荆公文集笺注》、《王荆公诗集补注》，翁方纲校刻《山谷内集注》(宋任渊注)、《外集注》(宋史容注)、《别集注》、《外集补》，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王邦采《吴渊颖诗笺》，金檀《青邱诗集注》等。

总集以编纂为主，兼有旧集校注之作。《文选》类如：胡克家《文选考异》，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文选李注补正》、《文选考异》，余萧客《文选音义》，朱珔《文选集释》，梁章钜《文选旁证》等。文总集如：孙星衍《续古文苑》，许连《六朝文絜》，陈均辑《唐骈体文钞》，陆心源《唐文拾遗》，庄仲方《南宋文苑》、《金文雅》，彭元瑞《宋四六选》，张金吾《金文最》，鲁超《古文合钞》，麦在田《古文端》，姚鼐《古文辞类纂》，黄宗羲《明文海》，李光洛《骈体文钞》，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曾燠《国朝骈体正宗》等。诗总集如：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陈本礼《汉诗统笺》，曲滢生《汉代乐府笺注》，杜文澜《古谣谚》，徐焯《全唐诗录》，厉鹗《宋诗纪事》(总集兼诗文评)，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朱彝尊《明诗综》、《十家宫词》，王士祯《古诗选》、《唐贤三味集笺注》、《十种唐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周之麟《宋

四家诗钞》，沈德潜《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姚培谦《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吴翌凤《国朝诗》等。地方诗文总集也很多，不一一列举。词总集如：朱彝尊《词综》，陶梁《词综补遗》，王昶《明词综》、《国朝词综》，毛晋《宋六十家词》等。

二、古籍辑佚

辑佚是从现存的有关古书中钩稽、缀辑佚亡古书文字材料的辑考工作，包括辑整部佚书，或辑一部书的部分散佚材料。清前期辑佚成就巨大，稽考内容更加完备，缀合更加精密，所辑书籍范围也更加扩展，搜罗比较彻底。

清康熙中期以后，汉学兴起。一些汉学家因不满于魏晋以后各家尤其是宋人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而上溯汉人旧注，为搜集资料因而出现了一些辑佚之作。如惠栋从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中将散见的各家汉儒解《易》条文一一抄出而为《易汉学》八卷。尔后，又广搜汉人解经旧注，分家疏解，成《九经古义》十六卷。随着四库开馆辑书，民间的辑佚活动也广泛开展。私家辑书，虽然不像政府辑书那样有丰富的图书和充实的财力，但是他们靠着辛勤劳动，辑书范围和成果都大大超过了官府辑书。

以辑书范围而言，乾隆间的官府辑佚只是从《永乐大典》一部书中辑寻史料。而民间很多学者扩大范围，遍及周秦诸子、群经正史之汉人笺注、唐人义疏以及明初以前的各种类书。由于辑书范围扩大，因而辑出书籍也多，如汉时已经亡佚的周秦古书、魏晋以后亡佚的两汉经师遗说、历代遗文以及各种小学训诂之书，凡有佚文者大抵都被辑了出来。从而出现了一大批辑佚名家，有的一人辑书多至数百种，并结合整理文献的其他程序，不但辑佚，而且结合校勘、注释、考证，并将这些成果汇为专书刊印行世。著名的如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专辑唐以前之群经训诂；任大椿《小学钩沉》，辑录《苍颉篇》以下古代字书四十种；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汉魏遗书三十六种。又如黄奭《高密遗

书》、袁钧《郑氏遗书》、孔广森《通德遗书》，均为辑录东汉郑玄著作；孙冯翼、洪饴孙、钱大昭、茆泮林、雷学淇、秦嘉谟、张澍等分别辑佚《世本》；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等分别辑佚古本《竹书纪年》。此外，孙冯翼《经典集林》、王谟《汉魏遗书抄》、《晋唐地理书抄》、茆泮林《十种古逸书》、李调元《全五代诗》、张金吾《金文最》等书也都是辑佚名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严可均的《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黄奭的《汉学堂丛书》和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

《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为上古至隋的总集。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义乌人。嘉庆举人。嘉庆十三年，清政府组织一些学者编纂《全唐文》，因未被邀参加，遂独力创编是书。该书以明代梅鼎祚所辑《文纪》和张溥所辑《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以及当时行世的三十三种汉魏六朝文集为基础，遍辑古今史书、史注、类书、金石等，片言只语，悉加收录。并广求故记，为全书所收之三千四百多名作者各撰小传一篇，积九年之力始完成初稿。此后，作者又用十八年的时间“拾遗补阙”，对所收作者和文章进行整理编排，直到道光中叶才大致编就。此书使读者能够方便地看到唐代以前所有现存的单篇文章，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辑佚书。

黄奭字右原，江苏甘泉人，道光举人。早年曾就学于江藩之门，为惠栋的再传弟子。在随同江藩问学期间，曾辑录各家《尔雅》古注为《尔雅古义》，从而开始了他的辑佚工作。江藩去世后，他专心汉学，十余年中辑东汉郑玄著作为《高密遗书》十四种。又辑唐以前的二百八十多种佚书为《汉学堂丛书》。该书对所收各书佚文一一注明出处，便于读者复核。但因遭战乱，初刻之版片损失不少，传世者仅二百十五种，分为二百十九卷。

马国翰字词溪，号竹吾，山东历城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巨鹿州知州。少年时因家贫无力买书，每见异书则手自抄录。为官后，薪俸所入悉以购书，积至五万七千卷。他以章宗源的辑佚考证成果为基础，广征博引，成七百六十八卷《玉函山房辑佚

书》，辑周至隋唐佚书六百三十二种。该书还在所辑佚书之前叙其作者事略及该佚书之源流，在所辑佚书之后又附有自古至今的诸家论说和研究情况，对隋唐以前经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三、丛书编纂

和官修丛书相比，清前期私修丛书不但门类更齐全，而且种类和卷数也都远远超过官修丛书，其中多因文献价值高或质量好而享有盛名。除了普通丛书之外，辑佚丛书、族姓丛书、地方丛书、专科丛书、独撰丛书也大量涌现。

康熙初年，汪士汉辑刊的《祕书二十一种》，汇集先秦至宋古籍二十一种，文献价值颇高。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王晫、张潮共同辑刊的《檀几丛书》，收录明清两朝著作，分三集，收书一百五十七种。张潮辑刊《昭代丛书》则专收清朝人著作，收书九十种，分甲、乙两集，每集六帙，分别刊行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和三十九年（1700年），此书收录了清初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和南怀仁的《西洋要纪》，是清初少有的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吴震方辑刊《说铃》前、后、续三集，亦专收清人著作，共收书六十二种，分别刊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和五十一年（1712年）。该书收录了后来遭禁的屈大均的著作《登华记》一卷和南怀仁的《坤舆外记》。乾隆以后，私修的普通丛书数量猛增，一直持续到道光以后。著名者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卢见曾辑刊的《雅雨堂丛书》，收书十一种，一百二十八卷，大多为当时罕秘之本，且为精校名抄。孔继涵编修的《微波榭丛书》收书十七种。毕沅编修的《经训堂丛书》，收书二十一种，一百六十二卷，且皆精心校勘后付印。卢文弨编修的《抱经堂丛书》收书二十种，二百六十三卷，所收汉、唐古籍，皆精校精刊，还收其自著《群书拾补》三十九卷。周永年的《贷园丛书初集》、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孙星衍的《岱南阁丛书》和《平津馆丛书》、孙冯翼的《问经堂丛书》、顾修的《读画斋丛

书》、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张海鹏的《学津讨原》和《借月山房汇钞》及《墨海金壶》、吴省兰的《艺海珠尘》、陈春的《湖海楼丛书》、顾之逵的《艺苑捃华》等，或以收录多种古籍见长，或以精校精刊享有盛名，为中国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伴随着辑佚活动的兴盛，辑佚丛书也有了更大的发展。族姓丛书之著名者，如康熙中赵饮谷刊行的《高阳四种集》，内收许姓一族三人著述各一种，徐姓著述一种。程定远辑刊的《荥阳杂俎》，收唐、宋、明、清四朝郑姓作者著述八种。田雯辑刊的《德州田氏丛书》，收清初德州田氏族人所撰之书十三种。刘青芝辑刊的《刘氏传家集》，收清初以来刘氏族中八人著述二十八种。

地方丛书有嘉庆时祝吕泰所辑的《浦城遗书》，收录宋、元、明三朝浦城人著述十五种。宋世荦辑刊的《台州丛书》(一名《名山堂丛书》)，分甲、乙两集，收录宋、明、清三朝著作九种。道光十二年（1832年），赵绍组、赵绳祖辑刊《泾川丛书》正、续两集，收录明清两代各种著作五十一种。道光十三年（1833年），邵廷烈辑刊《娄东杂著》（一名《棣香斋丛书》)，分九集，收录元代以后与该地有关著述六十八种。道光中，吴兰修辑刊《岭南遗书》，内收宋、明著述六种。

在各种丛书中，专收经、史、子、集中某一部的专科丛书也很多。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刊行的纳兰容若的《通志堂经解》九百卷，收录自古特别是宋、元以来各家解经之作共一百四十种。乾嘉之际臧琳、臧庸合撰的《拜经堂丛书》，则收录二人自辑自撰之经注十种。道光中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是专收清人解经之作的大型丛书。史部丛书有道光中分别刊行的叶腾骧编辑的《崇正全书》和陈湖逸士编辑的《荆驼逸史》，都是明末清初的史料丛书，前者收书十种，后者收书五十八种。子部丛书有嘉庆九年（1804年）刊行的《十子全书》。集部丛书则更是举不胜举，仅小说一项，有的专辑前朝，有的专辑当代，有的甚至自撰小说编为丛书。如嘉庆十一年（1806年）王文诺辑

刊的《唐代丛书》，内收唐人传奇小说一百六十四种，分六集刊行。至于将前人文集合刊、选刊而印行的丛书，则更是不计其数。还有一些专辑医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丛书。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刊行的陈嘉璞《医学粹精》、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刊行的王琦所辑《医林指月》和道光十年（1830年）刊行的杨乘六所辑《医宗己任编》，都是有关医学的专科丛书。天文学的丛书有嘉庆十二年（1807年）刊行的徐朝俊《高厚蒙求》五集十卷。关于数学的丛书有雍正中刊行的梅文鼎自撰之《梅氏丛书》二十八种，嘉庆中刊行的安清翘《数学五书》，张作楠《翠微山房数学》十五种和道光中刊行的罗士琳编辑之《观我生室汇稿》十种，李锐自编《李氏遗书》十一种等。

清代前期丛书编修事业繁荣，对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据统计，全部现存丛书中保存的单种文献近四万种，其中约有万种文献保存在清代前期所编修的各种丛书中。尤其是那些私人编修丛书的学者，克服物质条件上的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搜求各种价值较高的古籍，整理校勘，使一些濒临亡佚的珍本秘籍重与世人见面。

四、类书编纂

清前期，类书的编纂空前发展，私修类书的分量不大，超过百卷以上的很少，但种类却较多，见于《四库全书总目》的便有四十八部。而且内容丰富多彩，堪称百科全书。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

康熙年间陈元龙编《格致镜原》一百卷。此书是考辨古代名物起源的类书。对所收资料，大多录其最早出处，并一一注明所据书目。对于书中涉及之各种名物，“必究其原尾，详其名号，疏其体类，考其制作，以资实用”。在编排体例上，该书按事类将全书分为乾家、坤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等三十类。类下又分细目，共计八百八十六个。全书“体例秩然，首尾贯穿，无诸家丛冗猥杂之病”。[1] 可见它不仅在分量上较为宏富，而且在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六。

内容上也考辨精审。

吴宝芝《花木鸟兽集》三卷。此书是专门汇集有关花、木、鸟、兽等方面词藻典故的类书。全书分一百一十目，虽内容涉及面比一般类书窄，但能深入发掘资料，除常见书籍外，还旁及稗官小说、诗词佳句，使得该书质量在一般类书之上。

葛万里《别号录》九卷。此书是专门汇集古代人名别号的类书。它将宋、金、元、明四朝之人署有别号者一一录出。按详今略古的原则，将宋、金、元三朝之人合为一卷，仅注其时代而不注其里贯；明人八卷，兼注时代及里贯。该书将各人别号之下一字按韵目次序排列，每韵之下，仅其第一人标两字别号，其余人别号因下一字与前面相同，故仅标出不同于前人之上一字。虽然该书收录之别号尚有阙漏，但为查找宋到明朝时期的部分人名别号提供了方便。

厉荃编修《事物异名录》四十卷。此书是专门汇集各种事物不同名称的类书。在我国古代语汇中，一物多名的现象非常普遍。作者搜集这些不同名称，分三十九部，部下又分细目。所收各种事物，先列通称，后列各种异名。书成后，又经关槐增订，于乾隆末刊行。

五、版本目录

清前期出版业的发达与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大规模图书收藏及刊行之成为现实，不仅大大改善了学术研究及教学的条件，也为目录学和版本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目录学和版本学不但服务于藏书的需要，而且更服从于治学的需要，私家目录获得长足发展，充分反映了出版业的繁荣。

附有详细说明及解题的图书目录已成为江南考据学发展的重要内容。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自序中指出：

>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究，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

也。自宋之晁公武而下，讫明之焦弱侯一辈人皆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伪谬也。

朱彝尊的名著《经义考》、谢启昆受人赞誉的《小学考》等目录学专著则是查阅专门性文献的依据。《经义考》著录了从汉代到1700年的经说及其他经学著作，还包括石经研究、正史艺文志的有关论述，及有关的重要私人藏书目录。（图31）不过，朱彝尊没有收录《尔雅》以外属经学领域的“小学类”著作，后来，浙江富有的鉴赏家谢启昆聘请章学诚的挚友胡虔在杭州编著了《小学考》，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分“训诂”、“文字”、“声韵”、“音义”四类，著录了1 099种有关著述。章学诚则曾计划编著

图31
《经义考》

經義考卷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易三

周易

漢志十二篇

存

山海經曰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四　一

易通卦驗曰文王得赤烏而演易

易辨終備曰煌煌之耀乾爲之綱合凝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咕吟六節搖通（謂六子）萬物孳甲日營始東（震也）

易乾鑿度曰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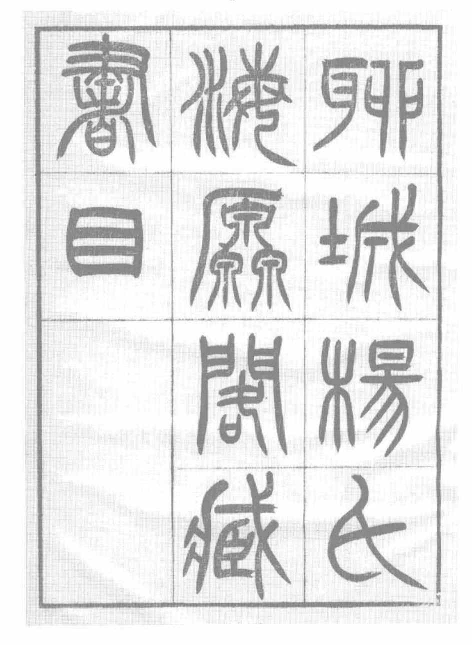
春秋說題辭曰易者氣之節含五精宣律歷上經象天下經計歷文言立符象出期節象言變化繫設類跡

《史籍考》。

清前期的私家目录数量众多，按照内容又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私藏目录：清代私人藏书盛行，很多藏书家都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目录。如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绛云楼书目补遗》，钱曾《述古堂藏书目》、《也是园书目》，姚际恒《好古堂书目》，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板书目》、《传是楼书目》，徐秉义《培林堂书目》，曹寅《楝亭书目》，张宗松《清绮斋藏书目》，金檀《文瑞楼藏书目录》，王闻远《孝慈堂书目》，吴焯《绣公亭薰习录经部》，孙从添《上善堂宋元板精抄旧抄书目》，彭元瑞《知圣道斋书目》，范懋柱辑《天一阁书目》、附《碑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倪模辑《江上云林阁藏书目》，曹金籀《石屋书目》，汪宪辑《振绮堂书目》，丁日昌《持静斋书目》，黄彭年《万卷楼藏书总目》，国英《共读楼书目》，刘人熙《楚宝目录》，黄澄量《五桂楼书目》，秦恩复《石研斋书目》，黄丕烈《求古居宋本书》，陈揆《稽瑞楼书目》，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陈树杓《带经堂书目》，杨绍和《楹书隅录》及《续编》、《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目》(图32)，丁白《宝书阁著录》，瞿世英《清吟阁书目》，施再盛《世德堂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吴引孙《测海楼藏书目录》，邓邦述《群碧楼书目初编》、《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赵诒琛《赵氏图书馆藏书目录》、《补遗》、《新抄书目》、《善本书目》，佚名《滂喜斋宋元本书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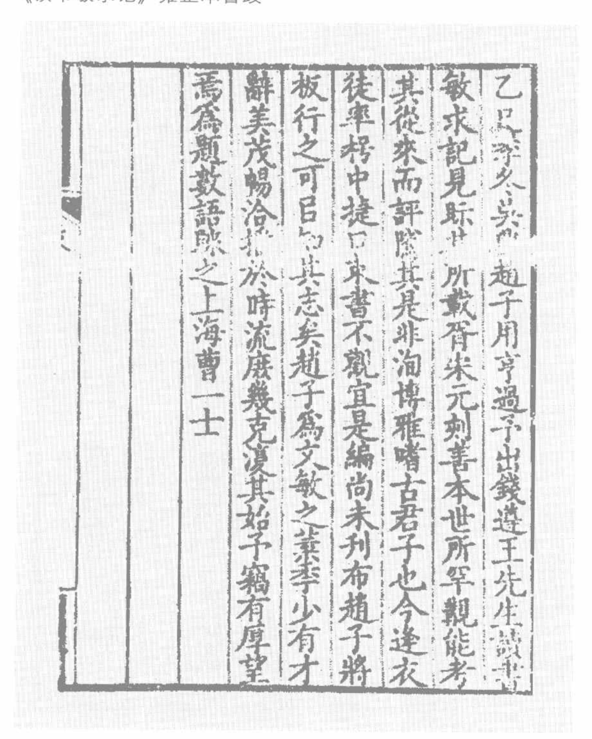
图32
《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目》



许多收藏家在校勘藏书后都要写一篇简要的后记，或撮录全书大意，或介绍抄本、刻本的流传源流。他们撰写的提要和题识，常讨论著者观点的优劣，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书评。提要类如钱曾《读书敏求记》，周广业《四部寓眼录补遗》，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沈豫《群书提要》，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及《续志》，翁方纲《通志堂经解目录》，沈豫《皇清经解提要》，吴翌凤《古欢堂经籍举要》，孙葆田《汉人经解辑存序目》，谢启昆《小学考》，章学诚《史籍考》，黄以周《子叙》，王昶《郑氏书目》，郑珍《郑学书目》等。题识类如：王士禛《渔洋书籍尾跋》，刘青莲《藕船题跋》，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附《金石跋尾》，汪璐《藏书题识》，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遗》、《续编》、《廉石居藏书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百宋一廛赋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士礼居藏书题跋再续记》（《续》及《再续记》为缪荃孙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再续录》（此二书为王大隆辑），陈经《墨庄书跋》，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及《补遗》（王大隆辑），瞿中溶《古泉山馆题跋》，等等。（图33）

图33
《读书敏求记》雍正本曹跋


乙巳秋冬之交趙子用亨過予出錢遵王先生讀書
敏求記見眎其所載皆宋元刻善本世所罕覯能考
其從來而評隲其是非洵博雅嗜古君子也今逢衣
徒來梓中捷以來書不覯宜是編尚未刊布趙子將
板行之可以知其志矣趙子爲文敏之裔季少有才
辭美茂暢洽於時流庶幾克濵其始予竊有厚望
焉爲題數語贈之上海曹一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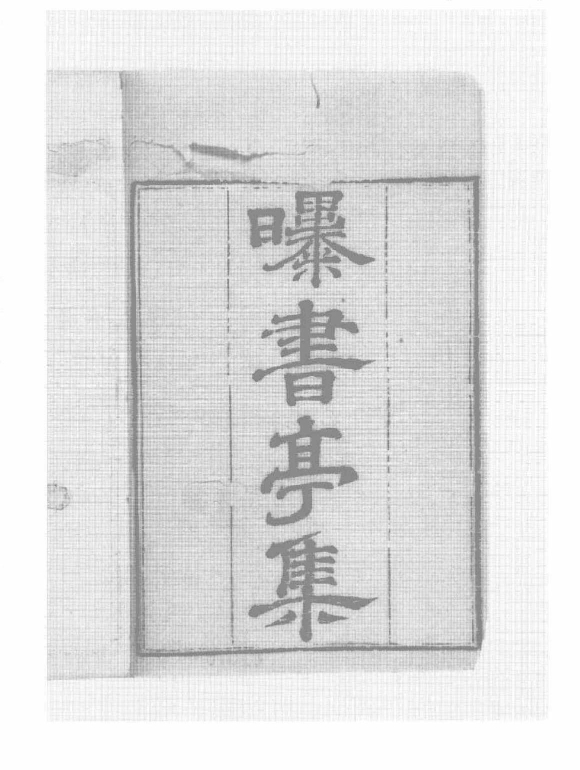
丛书的刊刻是清前期民间出版的一个重要特点。丛书目录也随之大量出现。如顾修《汇刻书目初编》，松泽老泉《汇刻书目外集》，北京琉璃厂书坊《增补汇刻书目》，傅云龙续编、胡俊章补遗《续汇刻书目》，朱记荣《行素草堂目睹书录》，朱学勤增补、王懿荣重编《汇刻书目》等。

随着目录学的繁荣，还出现了目录学理论著作，如章学诚《校雠通义》。该书强调目录提要对编修方志的重要性，并探讨了为保证材料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完整性，应如何分析、著录、比勘文献。他把目录学视为文献及史学研究的基础，阐述了目录学的基本原理。章学诚在追溯不同学派的古代源流时，通过系统研究，首次论述了图书著录方法及

“目录学”。因此，不管章学诚如何批评考据学。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他视为18世纪居于学术主流的考据学派的成员。章学诚认为，没有严谨的文献著录，书籍就易于失传，学术的专业化也就不可实现。只有国家系统地搜集书籍及抄本，这一问题才会得到解决。他还主张，教师和地方史学家应把收集、保存各种文献当作自己的日常性工作。这些收集到的文献要交中央权威机构保管、审查。

随着出版业的繁荣，版本学也获得长足发展。清初，不少藏书家在编制家藏书目时便已兼注版本。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于各书下分注宋本、元本、旧抄、影宋、校宋本等字样。其后，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均于卷首列出家藏宋版书目。乾嘉时期，宋、元旧刻日稀，因而许多藏书家不遗余力地搜求宋、元刻本并进行编目，一时出现了许多专记宋元旧刻的版本目录学著作。与此同时，有关版本学的研究著作也大量涌现，如钱曾《读书敏求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等。至于散在文章、日记、笔记中论及版本的专类专篇更多，如王士祯《居易录》、朱彝尊《曝书亭集》（图34）、何焯《义门读书记》、卢文弨《群书拾补》和《抱经堂集》、钱大昕《竹汀日记钞》、顾千里《思适斋文集》、阮元《揅经室外集》等，不仅说明版本学进入了全盛时期，也充分反映了清朝前期民间出版事业的繁荣景象。

图34
朱彝尊《曝书亭集》



综观本时期的古籍整理，集前代之大成，在整个学术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其特点是以古代语言文字学的成就为核心和骨干，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考证等全面开花，硕果累累，是我国古

代文献整理的一个高水平的总结。这一时期的宝贵的学术遗产，为后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三节　编撰形式的发展与丰富

一、札记体著作的新发展

由于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带动了编著形式的创新，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札记体著作的新发展。

自晚唐以来，随着历史资料的积累与人们对社会历史认识的深入，产生了要求打破时代局限，打破纪传、编年等传统著述形式的“以类相从”的新著述形式，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应运而生，札记体著述方式也接着出现。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罗钦顺的《困知记》，可以看作札记体著述的雏形。所谓的札记体就是收集各种零星资料以成的著作。清初，经学大家顾炎武即选择这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他的代表作《日知录》“为生平精力所集注，则又笔记备忘之类”。[1]《日知录》的成书，每成一条，大抵皆合数条乃至数十条之札记而成，都经过一番组织、归纳、批评的工夫。这部学术著作的典范，引导学者准确详实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记录下来。它与资料收集是密不可分的关系，鲜明地体现出清代学术截然不同于宋明理学风行的“语录体”著述体裁的学术特色。后人多将《日知录》比之南宋理学家黄震的《黄氏日抄》和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仔细研究，则其体例貌似一致而其内容实大不相同。后者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棉纱或纺线”；《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且“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2] 自顾炎武《日知录》起，“札记体著作”层出

【1】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2】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61-16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不穷，札记体裁成为清人学术成果的典范著述形式。此后阎若璩的《潜邱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汪中的《知新记》、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陔馀丛考》、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澧的《东塾读书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蛾术篇》、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等，都是模仿《日知录》的有代表性的札记体著作。（图35）


图35
陈澧

二、史部工具书与"学案体"的出现

在史部典籍中，历史地理、年代、职官等工具书大量涌现。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万斯同《历代史表》、《纪元汇考》，王之枢《历代纪事年表》，洪饴孙《史表》，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陆费墀《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段承基《历代统纪表》、《疆域表》、《沿革表》，沈炳震《廿一史四谱》（《纪元谱》、《封爵谱》、《宰执谱》、《谥法谱》），钱大昕《疑年录》（以后吴修、钱椒、陆心源、张鸣珂、闵尔昌陆续增补），钱东垣《列代建元表》、《建元类聚考》，钟渊映《历代建元考》，陈景云《纪元要略》，章学诚《纪元经纬考》，梁玉绳《元号略》，叶维庚《纪元通考》，姚文田《历代世系纪年编》、《建元重号》等。

学案体也在清代出现。"学案"是一种编纂和研究传统学术思想史的著述方式。"学"，即学者、学术，主要指儒学人物之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学术贡献；"案"即评论和考订，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案"之名，正式出现于明代中后期，耿定向撰《陆杨二先生学案》，刘元卿编《诸儒学案》，是以"学案"命名的早期著作。但真正内容系统完整、体例严密成熟的"学案"体著作，应以黄宗羲《明儒学案》和由黄宗羲创始、经全祖望纂定的《宋元学案》二书为最善。（图36）《明儒学案》略按时间先后及学术流派记述了17个学案，每个学案先作小序，再为有关学人撰一小传，后摘录其见解及相关评论，遂形成脉络清晰、结构



图36
黄宗羲

严谨的学案体史书体制。全祖望等人在对《宋元学案》的续补和增订过程中，将这种史书体进一步加以完备。主要表现在：第一，《宋元学案》有《序录》一篇，出自全祖望之手，明确了全书的百卷规模，指出每卷的内容和主旨，具有发凡起例的总纲性质。第二，由于宋代学派林立，师承学统头绪纷繁，《宋元学案》于每一学案增设一表，使该案卷的师承学统关系一目了然。第三，《宋元学案》在每一学案之后，多载时人或后人评论，议论持平，使观者明其主旨得失。《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出现，以完整的体例，系统记载学术源流、学派思想及其演变过程，是中国古代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也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增加了新的内容。正因为“学案”体著作在反映学术流变等方面有着其他史书无法替代的作用，故继黄宗羲、全祖望之后，作者踵继。江藩有《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唐鉴有《清儒学案小识》，唐晏有《两汉三国学案》。至于其他同类著作，如《闽中理学渊源考》、《江西理学考》、《台学统》、《皖学编》、《关学编》等地方性学案，《实学考》、《颜氏学记》等专门性学案，更是多不胜举，从而构成了庞大的学术流派史著作体系。

三、戏曲与通俗小说

明代嘉靖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市民意识随之产生，反映到文化方面则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小说、戏曲的空前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古典长篇小说都在嘉靖年间定型或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对后世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万历以后，戏曲、小说、小品文等成为当时文学作品的特色。其后更发展出许多著名的短篇小说。

明末清初，文坛上继续盛行戏曲的创作，当时这一类作品很

多，其中以孔尚任的《桃花扇》及洪昇的《长生殿》最为著名。(图37) 乾隆年间玩花主人及钱德苍编选了《缀白裘》12集48卷，选录当时流行剧目近200种、单出戏489出，是较为著名的戏曲剧本集。从康熙年间开始，小说的创作又进入高潮，相继产生了《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三部不朽的文学作品。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其祖先是汉族人，后来加入了满族的正白旗籍，成为皇家的“包衣”。曾祖父曹玺曾经任江宁织造。祖父曹寅继任江宁织造，官至通政使。曹寅故去后，其两子又任江宁织造。曹家和封建皇帝有着特殊的关系。雍正五年 (1727年)，曹家祸起，遭到革职、抄家，回到北京。从此，曹家由盛变衰。高鹗，字兰墅，汉军旗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举人，六十年(1795年) 中进士，为翰林院侍读。他与程伟元合作，补写《红楼梦》后四十回。乾隆时期的《石头记》抄本有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和《红楼梦》稿本。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己卯本抄定。乾隆二十六年以后，庚辰本抄定。乾


云亭山人编
桃花扇
西園梓行

桃花扇序　梁溪夢鶴居士題
[illegible]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
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
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詞輒因之
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
面以示悔過然而清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絶之過
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臭心甘城門所殃洊至荆棘
銅駝而不顧禍雖不始于夷門夷門亦有不得謝
其責者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
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于天下

图37
康熙刻本《桃花扇》

隆十九年，甲戌本底本抄定。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蒲家庄人。19岁应试连中县、府头名，但是后来多次参加省考不顺，无法实现愿望。以后他潜心学问，博览群书，至康熙五十年71岁始成贡生。蒲松龄早年在家乡做塾师，康熙九年南下江苏至宝应县做孙惠的幕宾，不久，随从孙惠调到高邮。康熙十年，从淮扬返回故乡，准备考试。次年，参加乡考不中。此时，他已经“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气已阑珊”，[1] 乃倾全部心血编撰《聊斋志异》，康熙十八年（1679年）编撰初稿结集。《聊斋志异》的版本很多，主要有：稿本影印现存半部的《聊斋志异》手稿。刻本和抄本，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青柯亭刊本为最早的刻本，后又发现半部手稿本和二十四卷抄本以及相当接近手稿本的《异史》等版本。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含短篇四百七十四篇。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间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含短篇四百七十四篇。康雍年间抄本《异史》，含短篇四百八十五篇。

【1】《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吴敬梓（1710—1754），字敏轩，又字文木，安徽全椒人，除了著有《儒林外史》外，他还编写了《文木山房集》12卷。《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作品塑造了二百多个人物。在封建社会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士人的思想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扭曲。吴敬梓用犀利的笔描绘出一幅封建社会的儒林群像，通过对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揭露了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和罪恶。《儒林外史》编撰完成后，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一叶轩漫笔》云：“《儒林外史》一书，寓怒骂于嬉笑，雕镌物情，如禹鼎温犀，莫匿毫发。”浴血生《小说丛话》云：“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叹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魑魅魍魉，莫遁其形。”人们争相传阅其抄本。金兆燕在扬州任官期间刊刻第一个刻本。嘉庆八年（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是现存最早的刻本。此后有清汪浦礼阁本、艺古堂本、苏州群玉斋本、申报馆排印本等。

四、野史笔记的起落

野史笔记是那些在官修史籍之外，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寒儒士所写的历史纪闻，属于四部之子部杂家类的杂记。这种体裁在我国流传较早，《山海经》、《穆天子传》都可以说属于这一类书籍。它肇始于秦汉时期，盛行于唐代，至宋代几乎每个学人都写有笔记。元末明清以来，有心人士所写的野史笔记因当时社会环境与时代的推移，呈回旋式发展的态势。清初顺康之际的士人因袭明末余习，撰写之杂记斗志激昂，因而触犯了清朝统治的尊严，乃不得不严野史之禁。于是出现了以王士祯、汪琬、周亮工为首的笔记。王士祯，山东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诗坛领袖，著名文学家，自号渔洋山人，极为当时人士所崇拜。他著有《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书，合刻为《渔洋三十六种》。所记载的都是明清时代名人逸事，畸士列女的事迹和“登山临水，游目驰骋之作”，描绘了清朝一片承平气象，偶尔也透露了一些清兵如何烧杀戮掠的情况。同时期的周亮工因为降清后几次入狱，遭遇不如王士祯顺利，所以他的《书影》、《画人传》、《印人传》以及《闽小纪》等书，记载了一些明末遗民对当时的不满、嬉笑怒骂的事迹，较王士祯略胜一筹。雍正、乾隆以后，文字狱迭起，禁书令频发，笔记类作品转而衰微。满洲贵族昭梿《啸亭杂录》，只因偶涉清代开国事迹，即遭不测。纳兰常安以清朝方面大臣，著有《瀚海》、《受宜室官宦游记》等书，就其亲身所阅历的事迹，调查当时社会比较详实，也遭到杀身之罪。一般人士更不敢写清朝的朝政时事，只有效法王士祯的遗风了。如汪启淑所写的《水曹清暇录》、法式善的《陶庐杂录》、《清述秘闻》、钱泳的《履园丛话》等书，只是歌功颂德、“有裨圣政”的乡帮文献而已。只是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姚元之的《竹叶亭笔记》，稍微透露出清初川陕楚三省教军起义及“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直到鸦片战争，外患频仍，民生涂炭，有心人士，触景生情，记载时事的野史稗乘如春笋丛生，由衰转盛。

这一时期的杂记，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十类：一是记述农业生产和新农种的引进，如张履祥《杨园见闻录》、周亮工的《闽小纪》、暌叙《隙光亭杂记》等；二是记述手工业、商业发达之现象的，如叶梦珠《阅世编》、陈作霖《凤麓山志》、钱泳《履园丛话》等；三是记述明清两代政治制度、朝章典故以及社会经济和社会风俗的，如昭梿《啸亭杂录》、法式善的《陶庐杂录》、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王庆余《石渠余记》等；四是记载农民起义的，如毛奇龄《后鉴录》、李世熊《寇变记》、吴伟业《绥寇纪略》、梁清标《雕丘杂录》、黄育楩《破邪详辨》等书，为我们留下了研究清代起义的材料；五是记载我国各少数民族事迹和起义的，如毛奇龄《蛮司合志》、纳兰常安《瀚海》、祁韵士《绥服纪略》、张穆《蒙古游牧记》等等；六是记载我国及世界历史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如谢清高的《海录》等等；七是记载对外关系和海外贸易的，如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印光任的《澳门纪略》、王芝子的《海客日谭》、王韬的《华英通商记略》等等。八是通记历史文献和人物传记的，如李桓《国朝耆献类征》、钱仪吉《碑传集》和缪荃孙《续碑传集》、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等等。而记载明末野史则不下千家。九是记载科学技术、工艺美术的，如阮元的《畴人传》、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顾禄的《桐桥倚櫂录》、齐学裘的《见闻随笔》等等；十是记载明清两代文史哲学家传记的，如黄宗羲的《思旧录》、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周亮工的《画人传》、《印人传》、江藩的《汉学师承记》、钱林的《文献徵存录》、郑方坤的《本朝诗抄小传》等等。[1] 当然，有清一代野史杂记之内容尚不止于此，仅以上面所举，已足以反映其丰富性。

【1】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88-10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五、宗教典籍的汉文著作

宗教类典籍也出现了很多新著，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清前期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北方和西北的回族穆斯林建立了经堂教育制度，他们在南京、苏州等地进行了汉文译著活动。这些书籍涉及伊斯兰教的哲学、历

史、典制、人物、文字等。当时，伊斯兰教译著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马注及其著述。马注（1640—1711），云南金龄（保山）人，字文炳，号仲修，经名郁速馥。自称是穆罕默德后裔，自幼笃学，攻读儒书，“十五而业文章，学为经济”，[1] 16岁时考中秀才，30岁以后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专攻伊斯兰教经籍。他一生著述不多，最能代表其宗教思想的是《清真指南》一书。该书“上穷造化、修身，末言后世，天地之秘，神鬼之奥，性命之理，生死之说，巨细隐显。集穷经而摘其粹”。[2] 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伊斯兰教伦理道德体系。马注对儒家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纲常伦理不但全盘接受，而且将其与伊斯兰教伦理学说相融通，把儒家世俗的人伦规范纳入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清真指南》在恪守和维护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养分，把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与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内容涉及伊斯兰教的历史、教义、教律、哲学、天文、传说、教派斗争等，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资料。

刘智及其著述。刘智（约1660—约1730），字介廉，号一斋，江苏南京下关人。他出生在一个穆斯林世家，受其家庭影响，信奉伊斯兰教。少年时，他就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及其他书籍。并深入研究儒家的传统著作和佛教、道教。他到各地去游学，接触到了各种文化，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思想。他还把中国的传统哲学与阿拉伯的医学以及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晚年，他专心从事研究和著述、翻译著书数百卷。刘智的著述丰富，刊行有《天方性理》全卷、《天方典礼》二十卷、《天方性理》五卷、《天方典礼择要解》二十卷、《大方至圣实录》二十卷、《五功释义》和《天方字母解义》等。

马德新及其著述。马德新（1794—1874），字复初，云南大理人。出生在伊斯兰经学世家，少承家学，阅读了大量书籍。青年时，他到陕西受教，曾经两次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并且游

【1】[清]马注著,余振贵标点：《清真指南》,卷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清真指南》,自叙。

历了阿拉伯、西亚、东南亚。回国时，带回大批伊斯兰教书籍。他把宗教经典译成汉文，加以诠注，并在云南地区从事宗教宣传，弟子盈门，名声广为流传。1857年，他曾经参加了当地穆斯林起义，后来，被统治者收买，任命为负责管理云南、贵州地方事务的官职。晚年，他辞去官职，主要从事宗教学术活动。其著作主要有：《四典要全》、《醒世箴言》、《性命宗旨》、《朝觐途记》、《天方历源》、《环宇述要》、《会归要语》、《礼法捷径》、《祝天大赞真经》、《宝命真经直解》五卷、《会归要语》、《四典要会》、《幽明释义》、《信源六箴》、《天方环宇述要》和《大化总归》。

第四节　图书编撰学的实践与理论

一、弘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谥文达，直隶河间献县人。纪昀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曾多次主持官书的编撰工作，其中由他主持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水平最高，影响最大。其成书过程与《四库全书》相始终。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纂修官在辑佚、校阅图书的同时，为每种图书各写一篇提要，最后交总纂官纪昀增删厘定，总其大成。“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的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改定、整齐划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1] 该书对官修和私撰两大类型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在书目编撰方法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总目》主要通过以下四个途径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途径之一是撰写类叙，于“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2] 即于每篇类叙中揭示该类的学术源流。如《经部·四书类叙》，把《四书》的发展源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

【1】黄云眉：《从学者作用上估计四库全书之价值》，《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五期。

【2】《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之二篇”；第二个阶段“自宋淳熙始”，“编为《四书》”；第三个阶段“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途径之二是撰写提要。《总目》对于每部著录的书都撰写有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有些提要还“论其刊刻传写之异同，编次增删之始末”，并说明“是本之善否”。[1] 途径之三是撰写按语。《总目》共有按语100多条，这些按语附于某类或某书之后，除说明分类方法，亦多涉及学术源流，“以明通变之由”。如《孟子音义》后附加按语，追溯条理出“宋尊《孟子》始于王安石”，而“表章之初，在汉为文帝、在宋为真宗；训释之功，在汉为赵岐，在宋为孙奭，固不始于王安石”。途径之四是分类。《总目》“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条理分明”。[2] 这一由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属组成的分类体系，基本上涵盖了众多图书，梳理了学术发展的脉络和流变。

【1】《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2】《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如果说纪昀在主持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过程中，实践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编撰原则的话，那么，章学诚则是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做了理论上的阐释。首先，章学诚提出了考辨学术源流在《书目》编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3] 在此，章学诚论证了掌握学术发展的源流在编制《书目》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刘向父子编制的《七略》之《辑略》，尤能体现学术源流：

【3】章学诚：《校雠通义·自序》。

> 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

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1]

【1】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第一》。

在肯定刘向父子的贡献与成绩的同时，章学诚以发展的眼光，进一步论证了考辨学术源流之时代走向："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2] 其次，章学诚提出了以撰写小序和提要，而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因为小序"讨论群书之旨"，"最为明道之要"；[3] 提要"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于叙录之下，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4]

【2】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第二》。

【3】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第一》。

【4】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第二》。

二、分类与著录的方法论探索

在分类和著录上，纪昀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了不少探索。对于类例，在认真分析了始自《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法的基础上，"择善而从"，设置了四十四个二级类目，并确定其隶属之部。如诏令奏议类，马端临《文献通考》收入"集部"，《总目》自"以其事关国政"，仿《新唐书·艺文志》和《汉书·艺文志》分列"史部"。又如兼诂群经的图书，《总目》则弃《新唐书·艺文志》而取《隋书·经籍志》之文，"名之曰五经总义"。就具体图书的分类而言，有三个原则性的方法：一是"不以书名分类"，如唐陆龟蒙《笠泽丛书》名曰"丛书"，实属文集，应入"集部"之"别集"类，而不入"子部"之"杂家"类"杂编"之属；二是对于内容复杂的图书，以内容重点分类，如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汇释十二经音义，同时受魏晋玄学的影响，汇释了《老子》、《庄子》，但全书重点是儒家经典，故分入"经部"之"五经总义"类，而不分入"子部"之"释家"类；三是对于注释性著作，随原书分入同一类目，如汪越的《读史记十表》，即随《史记》分入史部之正史类。在著录方法上，

《总目》也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著录方法，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著作方式、版本等，格式整齐划一。其主要特点有：一、著录著作方式，将“撰著”与“编纂”加以区别，前者是汇集、排比资料，后者是有所论断。如《西圃丛辨》著录为“国朝田同之编”，因为“是书杂采诸家说部，分类排比，皆因其旧文，不加论断”。[1] 二、用别裁之法，著录一书内的不同内容。如明戴冠撰《濯缨亭笔记》，既著录于“子部”“杂家类”之“杂说”之属，又将该书之附录《礼记集说辨疑》著录于经部礼类礼记之属。又如，明于慎行撰《谷城山馆集》分为两部分，其《谷城山馆诗集》著录于集部别集类正目，《谷城山馆文集》著录于集部别集类存目。

[1]《四库全书总目·西圃丛辨》。

与纪昀的探索实践不同，章学诚在分类与著录方法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为理论的升华。在章学诚那里，古往今来的史籍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圆而神”与“方以智”分别是这两类著述的特征：

>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2]

[2]《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章学诚遗书》,5页。

章学诚以《易》的“圆神”、“方智”之义概括古今史籍，突出“撰述”与“记注”两大宗门说。两大宗门各有自己的形式与目的。“记注”要求体例上规整有序，目的在于“赅备无遗”，尽可能容纳更多的资料，其精神是“方”；“撰述”在形式上则不为体例所拘，尽可能灵活多变，目的是使得史家“抉择去取”，充分表达对历史的独特见解，其精神是“圆”。在很多地方，章学诚以著述与比类（或比次）来代表撰述与记注。比次之书在于

整齐故事，以待后人之论定。比次之道可分为三种：

> 有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若刘歆、扬雄之《史记》，班固、陈宗之《汉纪》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为薪者，若王氏《玉海》、司马《长编》之类是也；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若迁录仓公纪述，固载刘向《五行》之类是也。[1]

[1]《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下》,《章学诚遗书》,39页。

章学诚认为，无论哪一种比次之书，都是为了著述而作基础，作准备。独断之学、考索之功，也必须建立在比次之书的基础之上。在章学诚的时代，学者们往往忽视了著述与比类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学问。因此，章学诚特别强调著述之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别裁，或详人之所略，或弃人之所取”，有“独断”，有“别裁”，不为类例所拘泥，勇于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

章学诚区分“撰述”（著述）和“记注”（比类），是图书编纂学上的重要理论成就，对于后人著述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据此确定图书在编撰上的性质；一方面，可以根据编和著的不同性质，分别用“方以智”和“圆而神”的要求来提高图书的编纂水平。

第五章　清前期民间出版活动

清初，战争对社会和生产的破坏十分严重，加之文字狱迭兴，严重地影响了民间出版业的发展。但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社会走向稳定，民间出版业开始恢复。到乾隆年间，出版业已经在全国很多地区兴盛起来。清前期的民间出版，表现出几个重要特征：一是民间出版业的规模超过了明代；二是民间出版业遍布全国主要的省份和城镇，分布比明代更为广泛；三是清前期出版业采用了雕版、木活字版、铜活字版、泥活字版等；四是出版物内容更加丰富。尽管如此，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严重地摧残了学者、出版家、刻书工匠，有人甚至为刻书献出了生命。这种情况迫使民间出版者放弃了刻印当代学者编撰的书籍，转向翻刻殿本书籍，此时出版的书籍主要有经、史、子、集、训诂和考据等。乾隆晚期，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使民间出版物数量大增，当代学者的典籍刊刻数量增多，小说、戏曲书籍的出版成为时尚。综观清前期的民间出版活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所突破，值得认真总结。

第一节　坊肆出版

坊肆出版是指民间手工业作坊为出售牟利而进行的书籍出版活动。由于多年的战乱和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坊肆出版受到严重

打击。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平定三藩之乱之后，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生产力逐渐恢复，民间出版业也得以逐步振兴。北京成为全国图书出版发行的中心，苏州成为南方出版中心，浙、闽、徽、赣、粤、川、鲁、豫、晋等地区的坊肆刻书也有了发展。

一、坊肆出版的代表地区

（一）北京的坊肆出版

北京是清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图书文化事业繁荣发达，书铺林立。“由于其重要的政治、文化位置，仍然成为全国重要的图书集散地和交流中枢”。[1] 琉璃厂、隆福寺街都是京都书肆繁集之处。如“琉璃厂于前清乾隆年间已成书市，四方来京会试之举子暨朝野文人，恒视此为消遣岁月之地。书商获利既丰，辄归功于文昌之保佑，遂建馆祀之；此琉璃厂由来。此两处馆、庙，为厂肆书贾最重要之祀典”。[2] 书商托福文昌之保佑，建馆祀之，也可以说明京师书坊之盛。乾隆年间李文藻著《琉璃厂书肆记》，记录了30家书肆名称：

声遥堂、唐氏嵩□堂、李氏名盛堂、郑氏带草堂、李氏同陛阁、曾氏宗圣堂、李氏圣经堂、曾氏聚秀堂、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皆李氏）、郑氏宏文堂、徐氏英华堂、傅氏文茂堂、曾氏聚星堂、周氏瑞云堂、金氏文粹堂、徐氏文华堂、李氏先月楼、周氏宝名堂、周氏瑞锦堂、韦氏鉴古堂、周氏焕文堂、陶氏五柳居、刘氏延庆堂、李氏博古堂，可见当时琉璃厂书肆盛况。[3] 又如隆福寺的书摊：“内城隆福诸寺，遇会期，多有卖书者，谓之‘赶庙’。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积数十年，蓄数十万卷，皆由不全而至于全。盖不全者，多是人家奴婢窃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自至矣。”[4] 除了琉璃厂、隆福寺书肆外，北京的其他街道，也分布着不少书坊。北京的书肆有的以贩卖为主，有的兼作雕版印刷发行。如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

【1】周少川：《藏书与文化》，18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2】孙殿起：《琉璃厂小志》，27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3】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琉璃厂小志》，10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4】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33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堂、文成堂、文宝堂、荣禄堂、文锦堂、文贵堂、文友堂、翰文斋等，都是刻印兼发行。所刻书大部分是村塾采用的《五经》、《四书》和启蒙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七言杂字》以及初学书写临摹的字帖等。或者是医、卜、星相、佛经、善书、类书、小说等。这些刻本，不为藏家士大夫所重视，大都行销民间，所以保存下来的也很少。除了这些百姓日常需要之书以外，也有不少善本。比较有名的坊肆刻书机构有：

五柳居：北京的"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1] 五柳居的主人陶正祥，少年时家境贫寒，后来以经营书肆为业。后迁寓北京，设书肆于琉璃厂路北。陶氏长于版本鉴定、搜访异书秘本，深受学者、藏书家称赞，刻有《十三经注疏》、《抱朴子》、《太玄经集注》等。其子陶珠琳随他往来北京和苏州之间贩卖书籍，把在苏州一带收购到的古籍旧书，由水道运往北京。

【1】孙殿起：《琉璃厂小志》，3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文萃堂：嘉庆六年（1801年）京都文萃堂刻有《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蒙汉图文对照三节版，上层下层为对照文字，中间是图。此书收辑了许多当时习用的会话词语，刻印精雅，携带方便。除此之外，为了方便各族语言的交流，还刻有满、蒙、汉文对照的《三合便览》，全书十二册。

老二酉堂：经营时期比较长，书肆位于琉璃厂路南，刻书很多，行销华北各地。老二酉堂所刊刻的典籍一般在书前封面题刻"京都老二酉堂"，或在书尾刻"老二酉堂梓行"。老二酉堂在光绪十五年（1835年）刻明伦评《聊斋志异》，朱墨套印，镌刻精审，为坊刻善本。

聚珍堂：聚珍堂是刘魁武于同治年间在北京隆福寺街路南创办的。聚珍堂出版的典籍很多，而且采用雕版与活字两种技术。《五经》、《四书》用刻版印刷，文学、小说、诗词等作品多用活字排印。聚珍堂所印书籍，版式较小，多在封面题刻"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书坊梓行"，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刻有《书经》、《四书章句》、《幼学琼林》以及用木活字排印的《王希廉评

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济公传》、《聊斋志异》等。聚珍堂本各书，校勘审慎，镌刻清晰，属坊刻本中上乘之作。聚珍堂还先后刊印过满汉合璧的《孙子兵法》四卷、《幼学琼林》四卷、《书经》六卷、《翻译四书》六卷，及满汉分类的《满汉音字对式》、《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四书章句》、《满文圣谕广训》等。

在北京的印刷作坊中，还有一家鸿远堂。它于乾隆三年（1738年）刻印过《满汉字书经》，是一种汉、满文对照的书。其他印刷作坊也刻有很多书籍。例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本立堂刻有《医学入门》等医药书籍。乾隆间韦氏鉴古堂设书肆于琉璃厂，刻有《辑宋诗钞》等。文萃堂书坊，嘉庆六年（1801年）刻有《满汉同文新出对像蒙古杂字》（简称《蒙古杂字》，又名《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文盛堂书坊，在琉璃厂西门内，多出版满文书籍，曾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刊有《六部成语》（满汉分类）六卷。

（二）河南的坊肆出版

河南的坊刻业大致兴起于五代后期至北宋初年，可谓历史悠久，此后各代时有零星的坊刻本出现。但直至清代，河南坊刻才进入最为兴盛的时期。刻坊的分布大多集中在开封、洛阳、登封、光州、嵩县、武陟等地。尤以开封的书坊数量最多。开封的书坊大多集中在北兴街和南北书店街一带，东司门与相国寺附近也有一些较重要的书坊。

开设于乾隆年间的乔文耀斋，是河南当地见于著录开馆最早的一家书坊，也是比较著名的代表性书坊。它位于开封南书店街中路西。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曾刻印《岳忠武王文集》等书。道光以后，书坊铺号大量增加，仅在开封见于著录曾刻过图书的就有二三十家，刻印规模也随之扩大。有的是规模不大的刻字店，以刻印零活为主，偶尔也刻印《四书》、《五经》、《千字文》、《三字经》以及历书、宗教类通俗读物等字数有限的图书，有雇佣工人，但人数不多，如龙文斋、朱文茂

斋、庆文斋、豫文斋、徐益文斋等。也有较大的刻字店、铺、书坊，能刻印部头较大的图书，雇佣多名工人，刻、印、售合一。

清代也是河南私营雕印业最发达的时期。私刻图书的风气更加深入人心，一些富裕人家纷纷刻印自著诗文集或教育子女的启蒙读物。在一些名门显族发起的大修族谱、家乘活动的影响下，以祠堂、家塾之名刻印族谱、家乘、祖先遗著的风习盛行，一直沿续到民国年间。由于科举制的更广泛推行，河南理学名家的辈出，学生至友更加注重刻印师友的著述。地方乡贤绅士对本乡邑邦的名人显宦的著作尤其注意搜集整理与刻印，使其广为流传。

河南的私营刻印业，在康熙、道光时期先后出现过两次高潮。顺治年间因政局刚刚平稳，刻印之事很少。雍正、乾隆、嘉庆年间由于清廷采取文化高压政策，刻印图书也较少。而晚清时期私营刻书则相对较多。清代河南坊肆遍及各个府州，绝大多数的县邑也都出现了规模大小不等的书坊。开封、安阳、洛阳、怀庆府依然保持了明代私营雕印业的中心地位，商丘、归德、睢州、襄城一跃成为新的雕印中心，其他较重要的雕印地区还有辉县、武陟、上蔡、登封、光州、信阳、鄢陵、新郑、郾师、宁陵、沁阳、渑池、鹿邑、汝南、汤阴、项城、孟津、杞县、新安、封邱、嵩县、禹州、息县、浚县、濮州、温县、永城、商城、临汝、固始、许昌、仪封、邓县、南阳等，其他州县也有一些坊肆出现。

康熙年间，河南私营刻印业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刻印图书100多种，刻印规模较大的丛书5种。经营雕印业的地区大量增加，较重要的从事雕印业者有大梁赖古堂周氏、新安吕氏、洛阳邵氏、辉县兼山堂孙氏、上蔡敦临堂张氏、一鹤轩、永宁程氏、汝南周氏、商丘宛委堂宋荦、爱日堂汤氏、怀庆杨衙、睢阳马志光、仪封正谊堂张伯行、新郑笼春堂高有闻等。其中以大梁周氏、辉县孙氏、上蔡张氏、商丘宋氏、新郑高氏、仪封张氏刻印

图书较多。规模较大而且知名度较高者，尤以宋荦、张沐最为著名。

康熙年间河南刻书最多也最著名的私营出版家当推商丘的宋荦。宋荦与贾开宗、侯方域等六人结雪苑六子社，合作刻印图书。宋荦藏书藏画丰富，著述甚丰，刻书也多，是清初著名的诗人，也是精于校勘的版本学家。他以宛委堂为刻书名号，在康熙二十七年到五十年间刻有十多种图书，总卷数在二百卷以上。刻印较好的有《施注苏诗》、《西陂类稿》、《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等书。宋荦刻印的图书校勘精详，刻印精美，为清代私刻图书中的精刻善本。雪苑六子中的侯方域，也曾组织过雕版印刷，刻印有自己的诗文集。这样，以雪苑六子为代表的商丘，成了康熙年间河南的又一个文化中心。与宋荦同时代的仪封（今兰考）张伯行也是清代著名刻书家。张伯行，字孝先，号敬庵，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官至礼部尚书。为清前期著名理学家。他在福建为官时，创建鳌峰书院，名其堂曰"正谊"，以"正谊堂"之名刻书近百种。最著名的是在福州刻印的《正谊堂全书》，该丛书分"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六类，镌版刊印五十五种。此外，景日珍、窦克勤刻书在当时也颇负盛名。

乾嘉年间，河南私营刻书者比较重要的有怀涧堂汤氏、睢州蒋泰、博陵尹氏、大梁宋氏、彰德府知事黄邦宁、襄城刘氏、郾城刘氏、中州武亿、郾师武穆淳等，尤以武亿著述刻书为丰。武亿，字虚谷，偃师人，乾隆四十五年（1870年）进士，官至山东博山县知县，乾嘉年间中州汉学大师，知名学者。他考据经史，旁求金石，著有《群经义证》、《经读考异》、《金石三跋》、《金石文字续跋》等多种书。他所纂修的《安阳县志》、《偃师县志》，体例谨严，内容丰富，征引典籍，俱见根据，至今仍是公认修得较好的志书。此外，怀涧堂汤氏刻印《洛学稿》、武穆淳刻印《授堂遗书》也较为重要。

嘉庆年间，河南因连年战争，经济开始衰落，坊肆刻书自然

处于低潮。仅宁陵吕氏、安阳贵泰、汝郡翕顺堂、汤阴知县郝延年、大梁侯氏、睢阳蒋荣昌等重印或刻印了一些图书。

道光年间，河南私营雕印业进入第二个繁荣时期。这一时期雕印的地区迅速增多，分布更广，并且雕印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道光三十年间，出书品种渐增。这一时期较重要的有偃师望嵩堂郑氏、濮州尊经阁、温县镜花斋、宁陵绳其居、睢阳存诚堂袁氏、封邱贻谋堂边氏、开封敬思堂、武陟观我堂、偃师武氏、沁阳崔鸿达、信阳郭氏、开封文得堂、开封苏氏、鄢陵苏源生、杞县耿氏、开封怡古堂、怀庆府贺汝田、鲁山县荣誉等。其中尤以吕氏、武氏、苏源生等比较著名。吕坤的后代刊有《吕新吾先生文集》，武亿之子武穆淳刻印有《授堂遗书》。鄢陵苏源生刻书很多，曾求学于著名出版家钱仪吉，刻印自撰《大学臆说》、《鄢陵文献志》等书，鄢陵随之成为此期的一个私刻中心。[1]

【1】海继才、温新豪:《河南出版史话》，文心出版社，1996年。

（三）江浙的坊肆出版

清初设置两江总督，统辖今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康熙帝亲政后，分省治理，苏州成为江苏巡抚的驻地，扬州、镇江、金陵等发展成为发达的城市。纵横交错的河流、水路把这些城市联结起来。苏州成了江南刻书的集散地，其刻书在全国首屈一指。来往穿梭的舟楫载运书籍，促成了金陵书市的形成。江苏的坊肆出版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金陵、扬州等地共同发展的格局。

苏州府属下有长洲、元和、吴县、常熟、昭文、崑山和新阳。苏州是胡应麟所称四大“海内书”荟萃地之一，“夙称人文渊薮，自乾嘉两朝上溯国初，其成名以去者，固已千秋俎豆矣。……有专精经古而不以科举为事者，宋刺史翔凤、顾文学广圻、陈徵君奂也；有从事科举之业而兼通经史者，吴侍郎锺骏、冯宫詹桂芬也。其时未经兵燹，郡城藏书诸家尚在，有无相通假，坊间多善本。有用之书，有力者求之即得，老师宿儒未尽亡，学者有所折衷”。[2] 由此可见苏州刻书之盛。蒋镜寰在《吴中先哲藏书考略》中说：“自来嗜学好古之士以积书称者，代不乏人。风尚

【2】雷浚:《学古堂日记·叙》，《乃有庐杂著》，清光绪乙未(1895年)孟春刊本。

[1] 蒋镜寰：《吴中先哲藏书考略》，《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64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2] 闵萃祥：《重刻平津馆丛书序》，《重刻平津馆丛书》卷首。

[3] 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一，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所趋，首推江浙，而吾吴实其中心也。"[1] 文化的长期积淀、教育的发达、书业的兴盛使苏州地区成为清初藏书家和刻书家分布的重要地区。乾隆年间，苏州刻书业兴盛，华亭闵萃祥说："我朝稽古右文，广开四库，遗书大出，于是海内通儒，益务考据之学，搜罗秘逸，是正讹误，往往汇成巨帙，刊布于世，在乾嘉之时为极盛。"[2]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九《吴门书坊之盛衰》中说苏州"书肆之盛，比于京师"，并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描绘出当时苏州书坊的分布情况：胥门有胡鹤（字立群）经营之经义斋，城隍庙前有陶廷学与其子陶蕴辉经营之五柳居，山塘街有钱景凯经营之萃古斋。此外，郡城有学余堂书肆，郡东王府基有周氏墨古堂、有高氏书摊，府东有敏求堂书肆，臬署前书坊有玉照堂、文瑞堂，玄妙观前有学山堂书坊、有东闵师德堂、有墨林居，醋坊桥有崇善堂书肆，紫阳阁有朱秀成书坊，葑门有大观局，阊门有书业堂、文秀堂书坊，阊门横街有留耕堂，阊门外有桐泾桥头书铺芸芬堂，有名号的书铺还有遗经堂、酉山堂、本立堂书坊……除此以外，《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还记录了不少流动于苏州地区的书贾，譬如吕邦惟、郁某、郑益偕、胡益谦、邵钟磨、沈斐云、吴东亭、吴立方、郑云枝；书船友曹锦荣、吴步云、郑辅义、邵宝墉，估人吴东白，华阳桥顾听玉、常熟苏姓书估、平湖人王征麟、无锡浦姓书估，湖人施锦堂、陶士秀等等，他们与固定的书肆一起，构成了苏州繁盛的书业。为了加强各坊肆之间的协作与团结，康熙十年（1671），苏州还成立了书业公所——崇德书院，"供奉梓潼帝君，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并同业中异乡司伙，如有在苏病故，无力回乡者，代为埋葬狮山义冢等项事宜"。[3] 通过这些可见清前期苏州出版业的繁荣及其管理之有序。

苏州最有名的书坊是"席氏扫叶山房"。主人洞庭席氏，于明朝万历年间设在苏州。取古人"校书如扫落叶"之义，起"扫叶山房"为肆名。席氏刻书，以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以及笔记小说为主，多至数百种。毛氏汲古阁《十七史》书版散出后，

也辗转归席氏所有。扫叶山房最早刊刻的是其补刻汲古阁本《十七史》中的《旧唐书》、《旧五代史》。其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所刻宋王偁《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叶隆礼《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四十卷；清邵远平《元史类编》四十二卷；嘉庆二年（1797年）刻明钱士升《南宋书》六十八卷，世称“四朝别史”。此时主持刻书的是席世臣。嘉庆五年（1800年）又刻《唐六典》三十卷、《东观汉记》二十四卷、《吴越备史》四卷。以上各书，字体仍仿汲古阁本，为扁方形。《契丹国志》卷首下题“扫叶山房校刊”，版心下刻“扫叶山房”四字。前有席世臣刻书序，略云：“以中秘本校正之，视坊本为完善。”序文以楷书写刻。到同光年间，扫叶山房刻书种类更多，数量更大，行销大江南北，常见的有《毛声山评点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绣像评点封神榜全传》、《千家诗》、《龙文鞭影》初、二集附《童蒙四字经》(其他刻本无附《四字经》者)，刻印清晰，质量上乘。

书业堂也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书坊，刻书以小说为重点。所见传世本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刻《说呼全传》十二卷，四十回。封面题：“乾隆己亥夏镌，金阊书业堂梓”。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刻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十二卷；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刻《新刻批评绣像后西游记》四十回，有图赞十六幅，封面题“《重镌绣像后西游记》，天花才子评点，金阊书业堂梓行”。嘉庆十年（1805年）刻《英云梦传》八卷，封面题“嘉庆乙丑新镌，书业堂梓行”。金阊书坊黄金屋刻有《新刻世无匹传奇》四卷十六回，封面题“黄金屋梓”。书分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四回。

其他如聚文堂，刻有《十子全书》等，封面刻“姑苏聚文堂藏板”。另外还钤盖“苏州绿荫堂鉴记精造书籍章”长方戳记。封面题“嘉庆甲子（1804年）重镌，姑苏聚文堂藏板”。苏州四美堂刻《龙图公案》十卷，附图十幅，封面题“姑苏原板，四美堂梓行”。

金陵（即南京）为清代两江总督驻地，地处江南首要之地，为长江南北交通枢纽，既是东南政治中心，文武大员云集于此，又是经济繁荣要镇，豪商巨贾必争的商场，[1]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它也是刻书的密集地区。清初史家戴名世通过他对江宁（南京）等地刻书情况的了解，指出："天下各种书板，皆刊刻于江宁、苏州，次则杭州。四方书贾皆集于江宁，往时书坊甚多，书贾亦多有饶裕者。"[2] 清孔尚任《桃花扇·逮杜》载明末南京书商、二酉堂主人蔡益所语亦云："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因此，当时不少书坊径冠以"三山"两字，如"金陵三山街绣谷对溪书坊唐富春"、"金陵三山书坊"等。金陵书坊刻印、售卖的书籍以戏曲、小说、医书、时文等类为主，特别是配有插图的戏曲、小说书籍，更是名闻遐迩。关于清代南京书肆的具体情形，尚未找到确切的文献资料。不过，根据今人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等人《江苏刻书》"清代刻书"之研究，金陵官私刻书机构多达二十余所，其中较为活跃的民间书坊就有三山堂、三乐斋、文英堂、文进斋、芥子园、宝仁堂、大业堂、奎壁斋、萃文书屋等十数家。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清代南京书肆虽不及明代繁荣，但依然相当兴盛。

【1】王一羽:《金陵古玩业概述》,《江苏文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王树民等编校:《戴名世遗文集》,122页，中华书局，2002年。

图38
彩版《芥子园画传》



芥子园是李渔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创办的书坊，刻有《三国志》、《水浒》等书，以精刻饾版五色套印的《芥子园画传》最为著名。初印本用开化纸，不失原稿神韵，色调绚丽夺目，问世后颇受欢迎。（图38）

金陵郑氏奎壁斋，乾隆年间曾刻陈振纲、丁庚等辑著的《四体字法》。奎壁斋主人，乾隆时为郑元美，莆阳人。到光绪年间

书版已多散售易主。其所刻《易经》，版片售归金陵富文堂，光绪十二年（1886年）富文堂刷印时，封面改题“光绪十二年新镌，富文堂藏版”，而书内旧序末尾原刻“莆阳郑氏订本，金陵奎壁斋”双行牌记仍然存在。

金陵萃文书屋曾用木活字印行《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是书在乾隆五十六年初印，次年又印，主持其事者为程伟元。因此，第一次印本，称“程甲本”，第二次印本称“程乙本”。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将甲、乙两本对勘，内容变动五千多字，二本流传至今，为研究《红楼梦》宝贵资料。

另外，南京的李光明庄、聚锦堂、德聚堂都刻印了不少书，李光明庄主人李光明，设肆于金陵聚宝门三山街大功坊郭家巷内电线局西首秦状元巷中，并设分肆于状元境口状元阁。所刻各书，前面多印有推广文字的告白启事。版心下刻“李光明庄”四字，有的还在刊叶附刻目录。据所刻《书经》刊叶目录所载，李光明庄刻印了一百六十七种书，计经部四十一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五十二种，启蒙类二十四种，闺范类四种，医算杂学类二十四种，善书类十三种。据传本所见，刻书用两种字体，一是宋体方字，占多数；一是欧体楷书，如《益幼杂字》，字体书写秀劲。书版多委金陵唐鲤跃雕镌，旌德李鸿才校字。李光明庄刻印的书籍在当时坊本中是比较好的。而聚锦堂、德聚堂所刻的书，纸墨刊工则不如李氏选择认真。

在浙江的绍兴、宁波、余姚、慈溪、嘉兴等地，也有一定数量的印刷作坊。宁波的玉山房等书肆，刻印有《瘟疫论》、《瘟疫条办》等医类书籍。杭州的刻书业在清初受到沉重的打击，王士祯在《居易录》中说：“今杭绝无刻。”杭州的刻书虽然减少，但仍有很多书坊、书肆刊刻新书。印卖科举考试用的墨卷是杭州书肆的重要内容。

（四）闽赣的坊肆出版

福建刻书始自宋元，至明代出现繁盛局面，其盛况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顺治、康熙年间，福建建阳刻书业一派繁荣景象，

康熙《建阳县志》载："是日里人并诸商会聚，各以货物交易，至晡乃散，俗谓之墟。而惟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书商皆集。"这种盛况也一再反映在朱彝尊、查慎行和杭世骏等的诗文里。与朱彝尊差不多同时的王士祯则说："今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流行，建本已不复过岭。"可见，建阳书坊在全国刻书业中的地位已经发生动摇。

福建四堡书坊异军突起使福建刻书业再次创造了辉煌。清杨澜在所著《临汀汇考》中称："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刷印，贩行远近，虽未必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典籍，以及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城市有店，乡以肩担，不但便于艺林，抑且家为恒产。"四堡书坊起于邹葆初。据《范阳邹氏族谱》载，他"壮年贸易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聚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书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开创也"。康熙年间，四堡书坊蓬勃兴起。据邹、马两姓族谱记载，仅雍正朝之前邹氏就创办有大书坊10多家。他们世代相传，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乾嘉时期达到极盛，"致富者累相望"。从族谱、账册及现存书版中统计，四堡刻书见到实物或有文献记载的有667种，除各种重复外，共489种，其中有《四书集注》等儒家经典105种；有《千金翼方》等医药类58种；有《人家日用》、《弟子规》等日常实用类65种；有《文心雕龙》、《楚辞》等文学类80种；有历代文人诗文、宋词、元曲、小说等51种；有地理、堪舆、占卜、星算等42种；有启蒙读物41种，可谓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自然，其读者也极庞杂，如文人举子、收藏家、儿童及从事医学、风水等各行业的人，这使得四堡刻书拥有很大的市场。鼎盛时期的四堡刻书，"刷就发贩几半天下"。四堡坊刻，纸张质地好，装帧考究，精致大方；字体多为宋体，笔划齐整，字形清秀；校核精细，讹错甚少。而且书页天头高，便于读者批注。因而信誉极高，销量极大，"垄断江南，行销全国"。

江西地区以浒湾刻书较为著名。浒湾是江西金溪县的一个镇，明崇祯元年（1628年），谷祥四在此创办第一家书坊，至康雍乾嘉年间书业达到鼎盛，有书坊近50家，刻工六七百人，主要刊行启蒙读物、戏曲、说唱、小说等。镇中有两条并列的横街，叫前书铺街和后书铺街。前后书铺街上比较有名气的书坊有红杏山房、大文堂、两仪堂等，均为世代相承的书坊业世家。素有“临川才子金溪书”的盛誉。“金溪书”即指金溪县浒湾镇所刊行的书籍。浒湾的雕版水平较高，印书用纸考究，刻字工价很低。因此，金溪坊刻价格低廉，销路甚广。现有据可查的金溪刻书堂号与书籍还有不少，如：两仪堂康熙时期刻印了《慎怡堂礼记》、乾隆时期刻印了《河洛精蕴》等；嘉庆年间的大文堂刻印了《纲鉴》等；文奎堂多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声律启蒙等书；咸丰同治年间红杏山房刊印了大量的抚州乡贤遗著，如《抚州五贤全集》、《江宜笏诗文存略》、《陆象山全集》、《汤文正公集》、《西沱蠢遇录》等；旧学山房刻印了《天佣子全集》等。此外，善成堂多刻医书，四友堂刻印了《十三经注疏》，槐荫堂刻印了《字学举隅》，尚友堂刻印了《古文关键》，文德堂刻印了《皇朝经世文编》等。

（五）其他地区的坊肆出版

陕西的坊肆主要分布在西安、三原、朝邑、华县下庙等地。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刊刻由贾汉复修、李楷编纂的《陕西通志》开始，西安坊刻书籍增多，著名的坊肆有义兴堂、崇云阁、芸香堂、崇顺堂、稽古堂、翰文斋、余庆堂、杨文兴堂、王家刻字铺等等。从清乾隆时期开始，广东的刻书业也发展起来，刻书从顺德一带发展到广州和佛山，这一带刻工云集，刻书价格很低。广东的刻工有许多妇女参加，工价较其他地区低廉，因而吸引了不少出版者。苏杭一带的一些书商往往到广东刻版，将版运回当地印刷。各地官员将自己的著作送到广东刻印。广州可考的书坊有三元堂、五桂堂、文经堂、善书堂、敬业堂、翰文堂等二十余家。康乾时期，四川的出版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如重

庆善成堂、成都尚友堂、德格印经院等，刊刻了大量的典籍。其他如山东、山西等地的坊肆出版也得到了发展，为繁荣当地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山东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聊城、济南等地。陕西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西安、安康等地。安康的来鹿堂从成都请来刻工，先后印刷书籍200余种。清代中期，两湖等地的印刷业也发展起来。湖北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武昌、汉口、沙市等地。湖南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长沙、常德等地。四川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重庆、成都、德格等地。安徽的印刷业主要在安庆。奉天（辽宁）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盛京（沈阳）、辽阳等地。云南的印刷业主要在昆明。另外，吉林、山西、甘肃、西藏等，几乎所有的省区都有一定数量的印刷机构。印刷业分布如此广泛，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二、坊肆出版的主要特点

除了具备坊刻的特点，清前期的坊肆出版也有其特色：

（一）刻书地区扩大

清代的坊肆刻书分布广泛。初期刻书以南京、苏州刻书较多，苏州的刻本质量较好。福建刻书也多；北京是清代都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央的官刻都在这里进行。在政府刻书风气影响下，坊间刻书事业繁荣发达，是全国的刻书中心地区。到中后期，刻书地区分布更广，湖南、湖北、江西、山东、山西、河北、广东、福建等省，刻书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

（二）刻书种类繁多

清代的雕版印书，内容丰富多彩。经、史、子、集四部俱备。上自皇帝谕旨，下至民间日用杂品，应有尽有，品类齐全。普遍采用雕版印刷方式。书籍编撰的类型不断创新，尤其是卷帙繁简不等、题目范围多式多样的丛书、类书不断刊刻。这类书籍的刻印流传，对于发展传统学术研究、保存古代文化遗产，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形式多样

在书籍着色上，坊刻书籍有单色印、多色印之分。在单色印中，有普通印法，也有少数嵌印法。在多色印中，有涂色法，有拱花套印法。形式新颖，书籍有黑口、耳格等。黑口为书版的中线，便于折叠。耳格内可刻简短篇名，便于翻检。版式一般为左右双边，也有四周双边或单边的。大部分是白口，少数是黑口，字行排列较为整齐。书前大多刻有封面，封面一般刻三行字：中间一行是书名，字体较大，右行刻编著者，左行刻藏版或雕梓者。装帧基本上采用线装，但版框大小不一致，装订时以齐下栏为规矩。

有的坊主为了尽快获利，在刻书过程中求速度，不顾坊本的质量，因为受需求者的购买力制约，坊肆只有采用低价售书薄利多销的策略，才能使本身存在下去并得以发展。为了降低书价，就必须降低成本，因此，坊刻本无论是用工还是选料，都无法与不惜工本的官刻、家刻书相提并论。由此导致坊刻存在一定的缺点，如忽视刻书质量，校勘不精，伪误较多，纸张、墨以次充好，有的书坊还妄改书名卷第，书中章节互易，增减内容等，这些问题都影响了坊刻的质量。

第二节　私宅出版

私宅出版是指私人以传播学术、文化为主要目的，并非以赢利为主的刊刻、出版书籍的活动。清前期的私家刻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人所刻自己编撰的书籍和前人的诗文，这类书多是写刻上版，并选用上乘的纸墨刷印的精品书籍；另一类则是乾嘉之学兴起后，藏书家、校勘家辑刻的丛书、逸书和影刻本。除刻本之外，清代还出现了很多经过藏书家精校的写本和抄本，它们也非常值得关注。

一、私人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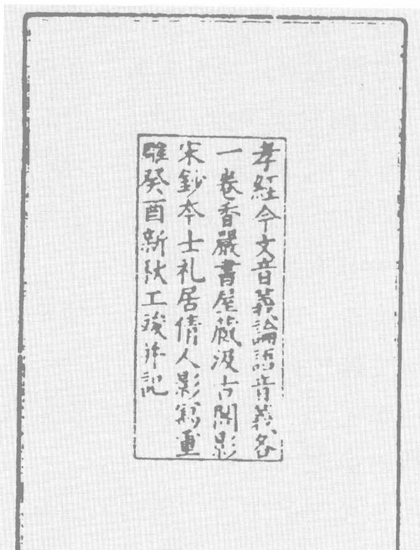
（一）清前期私人刻书概况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精本佳刻。当时的殿本及扬州诗局所刻的书，很多是精写上版。在此影响下，私刻也开始盛行精写上版。当时有许多著作都是由名家精心缮写付梓的，如林佶曾手写汪琬撰《尧峰文钞》、陈廷敬撰《午亭文编》、王士祯撰《古夫于亭稿》和《渔洋精华录》，被誉为“林氏四写”。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顾嗣立秀野草堂刻的《韩昌黎先生诗集》，为吴郡著名刻工邓明玑、曾唯圣所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刻印的《汤子遗书》为古吴范稼庵写，金陵名匠刘文藻刻。雍正十一年（1733年）广陵（今扬州）般若庵刻本《冬心先生集》，写刻字体笔画磅礴豪迈，纸墨均臻上乘，印刷极为精致。雍正年间刻印的浦起龙撰《读杜心解》，为张亭俊写，何元安刻；雍正十三年（1735年）辛浦校刻的汪琬《说铃》，为梁溪（今无锡）华育渠所写。此外还有许多是未署写刻人名而字体书写刻印纸墨精湛的，如陈撰的《玉几山房吟稿》，卓尔堪的《三家诗》，李光暎的《观妙斋金石文字考略》，以及宋荦、黄叔琳、姚培谦、何文焕等人的著作，都是软体字书写上版，字体秀美，笔力遒劲，刊印精工，纸墨版式亦无不精雅悦目。乾隆十二年（1747年）林佶同门歙县程哲七略书堂写刻的《带经堂全集》，黄晟写刻的《水经注》都是精工绝伦。乾隆十四年(1749年）郑燮自己书写由其门徒司徒文膏刻字的《板桥集》；胡介祉自己写刻的《王司马集》、《陶靖节诗》、《谷园印谱》刻印极精。乾隆六年吴江沈守义所刻《南船记》，图文并茂，书写精劲，镌刻工整，阅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嘉庆时有些私家刻书，尤其崇尚写刻，著名校勘家黄丕烈手写上版的《季沧苇书目》，字画圆润而苍劲，刻印不失原书神韵，可作识别黄氏题跋手迹的重要参考。

清代私家刻书的第二个特点，是私人刻印丛书、逸书和旧版书籍成为风尚。乾嘉时期，一些藏书家延聘著名校勘学者从

事校书刻书工作，所校书籍往往汇刻为丛书，其中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较为著名。有些校勘学家自己也校刻书籍，如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毕沅的《经训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等等。还有一些丛书，虽不很精当，但收罗宏富，可资参考。如张海鹏的《学津讨源》、吴省兰的《艺海珠尘》等。嘉庆年间阮元所刻的《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更是搜罗齐全，为研究清代经学的重要资料。在乾嘉学术的影响下，私人刻书家掀起翻宋、仿宋潮流，对刻书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丕烈、顾广圻就是其中的代表。特别是顾广圻，一生都为当时的藏书家校书、刻书。经他手校刻印的宋元本书，有给黄丕烈校刻的宋本《国语》、《战国策》、《隶释》、《易林》、《舆地广记》；给孙星衍校刻的宋本《古文苑》、元本《唐诗疏议》；给汪士钟校刻的宋本《仪礼疏》；给张敦仁校刻的宋本《仪礼注疏》、《礼记注疏》；给吴鼒校刻的宋本《韩非子》等等，皆极为有名。这一时期所校印的某些精刻本，直到近代、现代还一再翻刻、影印，为后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乾嘉之学的影响下，有些人还从事辑佚工作，将很多亡佚的书重新搜集，并刊刻成丛书，其中最著名的有黄奭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以刻印地方先人著作为目的的丛书，一般称为“郡邑丛书”，如《台州丛书》、《浦城丛书》等等，这些书对于保存和研究地方文化是很有益处的。私人刻印的各式各样丛书，为保存历史资料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在乾嘉时期，私人影刻宋本、元本等古旧善本的风气一度盛行。这种风气起源于明代，例如汲古阁就曾影刻宋本，到乾嘉时代更为精审，这种刻印的古书，可以和原本丝毫不差。《士礼居丛书》中就有好几种是这样影刻的精本。（图39）

清前期私家刻书使用精写上版的方法刊刻了大量书籍。当时的刻书家讲求出版书籍的水平，写刻求精成为风气，所以在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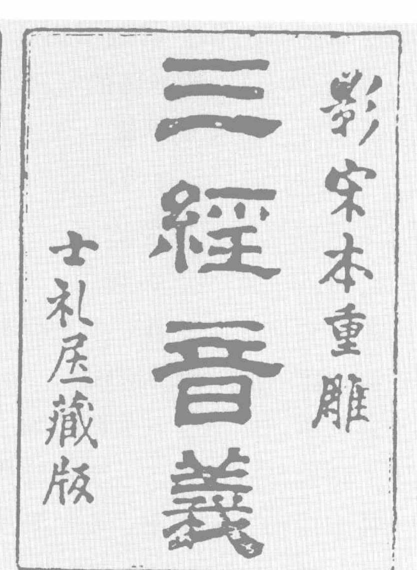


图39
黄氏士礼居刻《三经音义》书名页及其牌记

时期，精本佳刻不胜枚举。下面就对清前期著名的私人刻书家做一个大概的描述。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又有陶庵、缄斋、适园、栎下先生等别号，河南祥符人，后移居南京。明朝崇祯年中进士，授官至御史、监察御史。其所藏书籍、字画、砚石、古墨、铜器都很丰富，尤其喜欢收藏书籍、印章，自谓："生平嗜此，不啻南宫之爱石。"明清易代后，受官户部右侍郎等职，两次被劾入狱，均遇赦获释。他生平嗜学不倦，博极群书。出狱后，笔耕、刻书不断，对刻书有自己的思考："一曰笃故旧，二曰奖人才，三曰搜遗佚。"[1] 他刊行有重要价值的书稿；搜集、刊行前贤的遗稿。他编辑、刊刻了大量的书籍，主要的有：《赖古堂集》、《闽小纪》、《赖古堂文选》、《书影》、《因树屋书影》、《读画录》、《印人传》等。还刊刻了《天中四君子集》、《黄汉臣集》、《马元御赋》和《中左史宫词》、《赖古堂藏印》和《赖古堂印谱》等，传世墨迹有《行书诗轴》、《七言绝句诗轴》、《五言诗轴》等。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的出版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安徽歙县人，随

【1】周亮工：《赖古堂集》附《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父迁居杭州，后定居桐乡县青镇（今乌镇）杨树湾。鲍家世代经商，殷富好文，不惜巨金求购宋元书籍。名其室为“知不足斋”。久之，藏书甚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诏求天下遗书编《四库全书》，廷博献精本620种。他校书、抄书、刻书都很多，校辑所藏秘籍刻成《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另外还刻了一些单行本，如《销夏记》、《名医类案》、《聊斋志异》等。嘉庆十八年(1813年)，廷博续刊《知不足斋丛书》至二十六集。《清史列传·鲍廷博》记载：“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页某讹字，有持书来问者，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旨，所存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抄刻，真伪若何，校误如何，无不矢口而出，按之历历不爽。”为了刊刻书籍的方便，鲍廷博筑室贮书。嘉庆皇帝听说后，称赞廷博好古博学，老而不倦，加恩赏给举人。次年，第27集将成时病逝。其子士恭秉承父志，刊至30集。

张海鹏（1775—1816），字若云，号子瑜，昭文（江苏常熟）人。青年时期补博士弟子员。后来，他绝意名禄，笃志于收集宋金遗集，储于“借月山房”。张海鹏精研经学，善刻书，他利用自家的藏书，刊刻了大量的书籍。他以刊刻书籍为己任，认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1] 为此，他省吃简用，把资金用在刻书上，刊刻了大量的精品书籍。藏书家钱曾、毛晋的藏书散出后，多为他所收藏。张海鹏编辑、刊刻的书籍有《泽古斋重抄》、《太平御览》、《借月山房汇钞》、《宝重修琴川志》、《学津讨原》和《墨海金壶》。《学津讨原》20卷，收书173种，是增删《津逮秘书》编成；《墨海金壶》丛书收书117种，多选宋代以后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借月山房汇钞》丛书共16集，收书137种，专选明清人的著作，所收书籍经史百家，范围及其广泛。

【1】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荛圃、荛夫、复翁、抱守老人、荛圃主人、士礼居主人等（图40）。江苏吴县人。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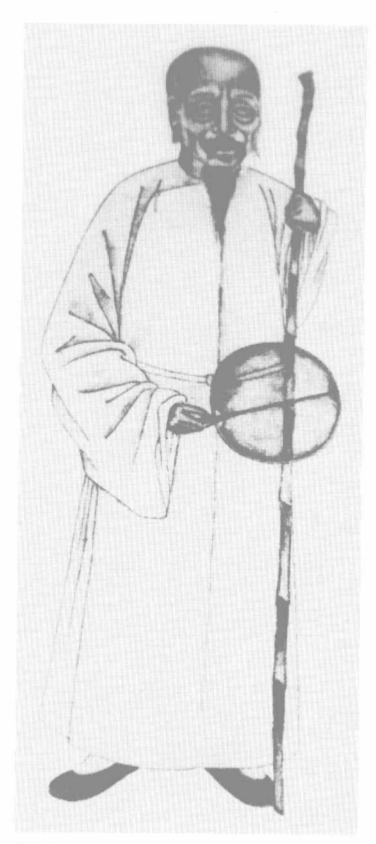


图40
黄丕烈

名有百宋一廛、学耕堂、学圃堂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九岁，入长洲县学，是年就试崑山。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十六岁时考取南京举人。嘉庆六年（1801年）三十九岁入都，由举人挑一等，以知县用，签发直隶，不就，纳赀议叙，得六部主事，旋归里。筑宅于王洗马巷，放弃仕途，以藏书、校书和刻书闻名。黄丕烈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说："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所好在是也。"正因为他热中于此，故不惜劳苦钻研刻书业务，"于版本之后先，篇策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引幅之疏密，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1] 其所刻书籍可谓精益求精。一生刊刻、出版了《国语》、《汲古阁书目》、《国策》、《博物志》、《季沧苇书目》、《百宋一廛赋》、《梁公九谏》、《焦氏易林》、《宣和遗事》、《舆地广记》、《藏书纪要》、《论语音义》、《仪礼》、《汪本隶释刊误》、《船山诗草选》、《周礼》、《洪氏集验方》、《夏小正》、《伤寒总病论》、《同人唱和集》和《三经音义》、《士礼居丛书》、《汲古阁秘本书目》、《仪礼郑注》、《战国策》等数十种书。

【1】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金山钱氏是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守山阁是钱氏藏书室名。乾隆年间，钱氏开始刻书，一直刻到晚清。其刻书时间长，刻书数量多。钱氏刻书子承父业，几代人刻书。其中钱树本、钱树立、钱树堂、钱熙祚、钱熙载、钱熙辅、钱培益、钱培名、钱润道、钱润功等刻书达数百种。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始，到光绪末年，其间数代人相继不衰。在钱氏所刻诸书中，《守山阁丛书》、《艺海珠尘》、《小万卷楼丛书》"一时考据家称为善本"。钱树本刻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国策》、《庄骚读本》等；钱树堂、钱树立刻有《经余必读》、《醉经楼经验良方》、《保素堂稿》等。钱树芝刻有《温热病指南集》等；钱

熙祚、钱熙载刻有《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等；钱熙辅刻有《艺海珠尘》、《壬癸集》等；钱培名刻有《小万卷楼丛书》等；钱润道、钱润功刻有《钱氏家刻书目》等。钱家有“树、熙、培、国、润”五代人，绵延百余年，坚持刻书不断，这在清代繁荣的私家刻书活动中也是不多见的。钱家刻书多为医书和实用书，很受社会欢迎。其《守山阁丛书》和《艺海珠尘》两部丛书，汇刻群籍，尤便于使用。

顾广圻（1766—1835），一生以校勘刻书为己任，是一代校勘名家，经他手校勘刊刻的精本无数。他代人刻了很多书籍，如代其从兄顾之逵刻的刘向《列女传》，依宋本重雕，附有考证一卷，为嘉庆元年（1796年）所刻，刊刻精美，今已传世日稀。代张敦仁校刻的有抚州公使库本《礼记》；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新淦涂祯仿宋嘉泰本《盐铁论》；宋本《礼记注疏》。代胡克家校刻的有宋淳熙尤延之本《李善注文选》和元兴文署本《资治通鉴》。代秦恩复校刻的有北宋本《骆宾王集》、足本《吕衡州集》、宋本《李元宾集》，统称为《三唐人集》。代秦刻的又有宋汉平本《扬子法言》、道藏本《鬼谷子》、唐卢重元注本《列子》，称“秦刻三子”；代秦刻的还有北宋本刘球的《隶韵》，唐赵元一的《奉天录》、《词学丛书》。代吴鼒校刻的有宋本《韩非子》，元本《晏子春秋》。代汪士钟校刻的有宋单疏本《仪礼疏》、宋刻本《鸡峰普济方》、《刘氏诗说》、衢州本《郡斋读书志》。代洪莹校刻的有《名臣言行录》、《隶释》和《隶续》（图41）。代孙星衍刻的有《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代汪喜孙刻的有汪容甫《述学》和《广陵通典》。他自己校刻的有明吴元恭本《尔雅》和段玉裁的《释拜》。此外，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也是顾氏代为校刻。凡是顾广圻校刻的书，都是选择最好的本子作底本。不过最好的版



图41
扬州诗局刻本《隶续》书名页

本即如宋本，其中也难免略有舛误，所以又要用几个本子互校，将校勘所得写成考异、识误，或者札记附在后面。用几个本互校可能在宋代已经开始了，不过到了顾广圻益加精密，对后世校勘起了典范作用。

清代有很多私人刻书家刻印了很多精良图书，现举其较为突出者，列表于下：

姓　名	主要刊刻图书
卢见曾	《雅雨堂丛书》、《金石三例》、《感旧集》
孔继涵	《微波榭丛书》、《算经十书》
李文藻	《岭南诗集》
张潮	《昭代丛书》
纳兰性德	《通志堂经解》
黄叔琳	《文心雕龙辑注》《史通训诂补》
张海鹏	《学津讨原》、《借月山房汇钞》、《墨海金壶》
卢文弨	《抱经堂丛书》
张敦仁	《郑注礼记》、《郑注仪礼》、《盐铁论》
鲍廷博	《知不足斋丛书》
吴骞	《拜经楼丛书》、《海昌丽则》
毕沅	《经训堂丛书》
孙星衍	《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
秦恩复	《列子》、《三唐人集》、《词林韵释》、《享帚精舍词学丛书》
汪士钟	《孝经义疏》、《郡斋读书志》
吴鼒	《晏子》、《韩非子》
黄丕烈	《士礼居丛书》
蒋光煦	《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东湖丛记》
阮元	《十三经注疏》、《文选楼丛书》、《皇清经解》
胡克家	《资治通鉴音注》、《文选注》
马国翰	《玉函山房丛书》
钱熙祚	《守山阁丛书》
龚翔麟	《玉玲珑阁丛刻》、《浙西六家词》、《龚氏经笥》

续 表

姓 名	主要刊刻图书
孙均	《灵芬馆诗初集》、《灵芬馆诗三集》、《灵芬馆诗话》
汪立名	《白香山涛集》、《唐四家诗》、《今韵笺略》、《汗简》、《中州名贤文表内集》、《钟鼎字源》、《天下乞山汇抄》、《名山图》
黄晟	《太平广记》、《考古图》
鲍康	《寿滕斋诗集》、《荔枝诗》、《鲍觉生诗钞》附《咏物诗钞》、《咏史诗钞》、《感旧诗钞》、《觉生诗续钞》附《白汀年谱》、《赋则》和《观古阁丛》
曹秀先	《赐书堂稿》、《依光集》、《地山初稿》
万廷兰	《太平寰宇记》
何焯	《义门读书记》、《诗古文集》、《语古斋识小录》、《道古录》
顾嗣立	《秀野堂诗集》、《闾丘诗集》
惠栋	《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
顾广圻	《骆宾王集》、《吕衡州集》、《李元宾集》
周锡瓒	《群书缀述》
顾之逵	《一瓻录》
袁廷梼	《金石书画所见记》、《红蕙心集》
钱曾	《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
孙从添	《上善堂书目》、《藏书纪要》
张金吾	《诒经堂续经解》、《金文最》、《续资治通鉴长编》
陈揆	《稽瑞楼书目》
徐乾学	《传是楼书目》、《传是楼宋元版书目》、《通志堂经解》、《读礼通考》
汪启淑	《飞鸿堂印谱》、《切斧集古印存》、《汉铜印丛》、《续印人传》、《水曹清暇录》、《粉场日记》
杭世骏	《道古堂诗文集》、《金史补》、《史记考证》、《三国志补注》、《续礼记集说》、《续经籍志》、《十三经》和《二十四史》
汪远孙	《国语考异发正》、《诗考补遗》、《振绮堂遗书》
郑性	《南雷文定》、《明儒学案》、《南溪梦寐》、《南溪寤歌》、《南溪不文卷仅真集》、《寒村集》。
伍崇曜	《粤雅堂丛书》、《岭南遗书》、《粤东十三家诗》、《舆地纪胜》
潘仕诚	《海仙山馆丛书》
潘祖荫	《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

续 表

姓 名	主要刊刻图书
陆心源	《十万卷楼丛书》
顾修	《读画斋丛书》
杨以增	《海源阁丛书》
丁丙	《武林掌故丛书》、《武林往哲遗书》
张钧衡	《适园丛书》
王鹏运	《四印斋所刻词》
刘喜海	《六艺纲目》
黎庶昌	《古逸丛书》
缪荃孙	《云自在龛丛书》

(图42、图43、图44)

(二)清前期私宅出版的主要特点

1. 请名家手写上版或亲自刻书。因为私人刻书的目的在于扬

图42(左)
《钦定熙朝雅颂集》,嘉庆九年阮元刻武英殿印本

欽定熙朝雅頌集首集卷第二
太子少保山東巡撫前吏部侍郎八旗通志館總裁臣鐵保纂輯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朱珪禮部尚書臣紀昀原任工部尚書臣彭元瑞校閱
鸞臣法式善侍讀學士臣陳希曾侍講學士臣汪廷珍左庶子臣汪滋畹侍讀臣吳鼒纂
果毅親王 四十九首
王名允禮
聖祖仁皇帝第十七子有春和堂集靜遠齋集奉使紀行
詩集
題畫
我聞吳楚間逶迤富山水巖岫不須高平遠即可喜煙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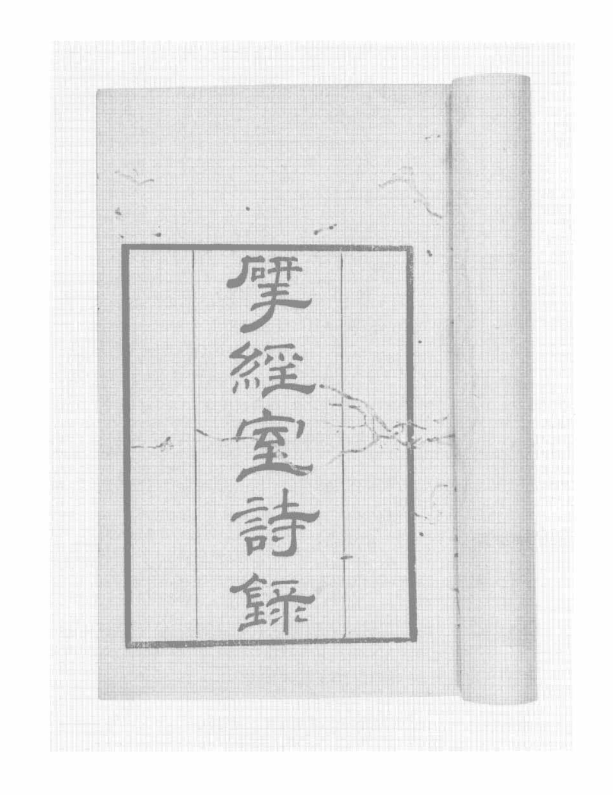


图43(右)
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之阮元《研经室诗录》

名，以求不朽，故不惜重资，延聘著名书法家手写上版。清初书法家林佶亲书汪琬撰《尧峰文钞》、陈廷敬撰《午亭文编》、王士祯撰《渔洋精华录》和《古夫于亭稿》，被文坛和藏书家誉为“林氏四写”。乾嘉时有许翰屏，以书法擅名，当时著名私人刻书家，皆聘许翰屏影宋写样。此外，还有的私人刻书家自己写刻上版，如黄丕烈自写《季沧苇书目》和《百宋一廛赋》等。请名工巧匠刻版印书，这是刻印图书的最后环节，私刻主人同样不惜工本。家刻重视质量，在刻版前认真校勘、校对，家刻刻书之多，需要校勘的也多。只有认真校对文稿，才能刻印出高质量的书籍。书版刻成后，还要经过校对，才能付印。甄别、选择底本至关重要。在校书实践中，出版家们积累了丰富的校书经验。



图44
藏书家吴骞

2. 选择优秀底本和校本。校书确定底本、校本十分重要。底本、校本的优劣关系到校刻质量，刻书家对校书选择底本和校本都很重视。顾广圻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选择底本，十分谨慎。选优秀底本和校本，才能保证所刻书籍的质量。底本不佳则无以成善刻，故选择底本和校本，精审校雠。古籍流传久远，并经历代翻刻，非详加雠校不能复其旧。顾氏为清代著名学者，尤以版本学和校勘学见长，其论刻书之难首在选择善本作底本，是可以知道慎择底本对刊刻书籍的重要性的。段玉裁在《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篇疏证》曾谈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可见校勘中底本选择的重要。

3. 搜集众多不同版本以便核校。校勘之事必先备众本，然后可以参校同异、抉择去取。孙德谦云：“欲校一书，须备众

本，有断然者。盖不备众本，书之或有缺佚，或有谬误，其义皆不可通，此读者之大憾也。故既得一别本矣，足与此本对校，又当兼备众本，如是则异同得失始能辨别而有所折衷。”古书在流传过程中，或为坊肆翻刻，或为学者校勘，版本极多。故在择取一佳本作底本后，尚须罗致其他不同版本，以备校勘之用。针对底本不同，采用多种校勘方法校勘，是古籍整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方法多种多样，各有优长，须就底本不同情况而定。”[1]

4. 精审校勘。“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2] 刊刻古籍，必重校勘。校勘是提高古籍质量、保证所刻书籍准确无误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通过校勘，恢复古籍的原本面目。千年古籍一朝恢复，求实存真，才能嘉惠学人。汉刘向《别录》称：“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所谓校勘，即将古籍之不同版本及有关资料加以对比，列举各本异同，正其音释，审其文字，详究编次，查明脱衍颠倒之处，详明原文之正误真伪，以求恢复书籍本来面目。

5. 合作刻版印书。清前期工匠在长期的刻字、刻画实践中提高了刻印技术。前人在刻书、画的时候，有的刻得精细，有的刻得粗糙。刻出来的字画质量悬殊，差别很大。在版画方面，有时画稿上乘，但刻印成版画时，却貌合神离。主要原因是画家、工匠和印工各搞各的，缺少联系所致。为了克服由此对刻书质量带来的影响，在实践中，三者要建立密切的联系，让刻工和印工理解画家的创作意图，刻印出来的画能传画家之神。作者、刻工和印工三者配合。画家作画时，考虑到刻工水平和刀刻的效果，把创作意图告诉刻工。刻工动刀时，力求能理解画家的意图，考虑印刷的效果。在雕镌的时候，刻工和印者及时同作者协商，作者经常查看，如果刻得不妥，就让刻工修正。如画家陈洪绶与名工黄建中密切合作甚久，陈氏非常了解黄氏的刀法；黄氏也非常熟悉陈氏的笔法，最后，刻出了《博古叶子》这一精品之作。还

【1】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228页，中华书局，1962年。

【2】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83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有，陈氏与浙江名工项南洲共同创作了《西厢记》插图等。画家与刻工合作刻印作品，提高了刻工的刻印技术，保证了书籍插图的刻印质量。清初的《芥子园画传》等，也都是这样刻印的。沈因伯在其指导刻成的精品书中说："画中渲染精微，全在轻清淡远，得其神妙……必须镌者以刀代笔，得其飞扬笔法；印者以帚作染，得其轻清染法，则笔墨之妙传矣。遂博访名手，十有八年，始得其人。加意镌镂，覃心渲染。间有握管者所未及者，捉刀者及之；捉刀者所未及者，操帚者及之。以致一幅之色，分别后先，凡数十版，有积至逾尺者。一版之工，分别轻重，凡数十次，有印至侈时者。"该书所成，是画家、刻工、印工三者通力合作和长期精心研制的结果。

二、私人抄书

除了私人刻书，清前期还存在私人抄书。之所以存在私人抄书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有：第一，有些书籍刻印成本较高，价格昂贵，付不起资金，又有迫切的需要。如科举、学习、研究需大量的书籍。第二，书籍短缺，购书困难。清初禁毁图书，大兴文字狱，对出版造成影响，有些书籍印行有限，读者求购困难，就手工抄书，或雇人抄书。私人抄书以苏、常最多，湖、杭次之，金陵和徽州较少。

（一）清前期私人抄书的代表人物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轻时参加"复社"。清军南下时，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载书遍游华北，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多有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鉴于书籍价格昂贵，顾炎武经常抄书，他在《抄书自序》中说："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据易宗夔《新世说·雅量》记载："《诗本音》卷二稿再为鼠啮，再为抄写，略无愠色，有劝其熏瓦倒壁、一尽其类者，公曰：'鼠啮我稿，实勉我也。不然，庋置不

动，焉能五易其稿耶？'”可见其抄书之勤及其治学的毅力。



图45
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秀水人，曾任翰林院检讨等职，参加编写《明史》，对书爱不释手，有善本必抄。（图45）钱曾《读书敏求记》写成之后，朱彝尊急于阅览，向钱曾借阅，但钱曾匿而不借。据吴焯《读书敏求记·跋》记载：“竹坨谋之甚力，终不可见。竹姹既应召，后二年，典试江左，遵王会于白下。竹姹故令客置酒高宴，约遵王与偕。私以黄金翠裘予侍书小吏启钥，预置楷书生数十于密室，半宵写成而仍返之。当时所录，并《绝妙好词》在焉。词既刻，函致遵王，渐知竹姹诡得，且恐其流传于外也。竹坨乃设誓以谢之。”朱彝尊因为抄书的事，被罢官，他在《书椟铭》中记载这件事：“予入史馆，以楷书手王纶自随，录四方经进书。纶善小词，宜兴陈其年见而击节。寻供事翰苑，忌者潜请学士牛钮，形之白简，遂罢予官，归田之后，家无恒产，聚书三十椟，老矣不能遍读也。铭曰：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朱彝尊抄书很多，计有《周易图说》、《内外服制通释》、《三礼图》、《太平治迹统类浅集》、《崇文总目》、《国史考异》、《方泉集》、《牟氏陵阳集》、《圣宋文选》、《吴都文粹》、《山中白云词》等。

吴翊风，字伊仲，吴县人，著名藏书家，昼夜抄写，手抄书籍数百种之多。后积劳成疾，形神俱疲，眼睛失明。

蒋衡（1672—1742），名振生，字拙存，号湘帆，金坛人。他自小临摹，苦练有成。后游历关中观古碑，西入秦关探碑文，临摹碑帖300多种。他抄写《十三经》花费了12个年头，“先其难者，以《春秋左传》二十万言始，凡五年讫工；继以《礼记》十万言，又二年；其余《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又五

年，共历一纪乃毕”。[1] 蒋氏所抄《十三经》，装成300册、50函。他还刻成《拙存堂临古帖》28卷。乾隆四年（1739年）呈进，“上以振生年近七旬，志在尊经，赐国子监学正衔，其手书《十三经》尽用木板刻印，以备颁发”。乾隆帝为此赐其国子监学正衔，以示褒奖。

[1] 钱泰吉:《曝书杂记·蒋氏自跋十三经字册》,清刻本。

梁同书（1723—1815），字元颖，号山舟，晚号不翁，钱塘人。他博学多文，善鉴别。由他书写的碑刻和题写的书籍不可胜数，他手抄《文选》16册，“始壬申至丙子，盖五年毕事，全书无一字草率。有误者，则朱书其旁”。[2] 表明了书写一丝不苟的精神。

[2] 徐珂:《清稗类抄·艺术》。

倪模（1750—1825），字迂村，号韭瓶，一号迂存。安徽望江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任凤阳府教授10余年。极嗜藏书、金石、古钱，尤以藏书为富。他立志于藏书。入京都，见宋元善本，不惜重价购藏。抄有《宜靖备史》，在其抄本之后附书目二页，列书34种，有倪氏题识云：“佚存未备之书，购求原本抄录，所有书目附于卷，俟再得秘藏之本，陆续缮成，以行于时。”还抄有《孙子》、《刘宾客文集》等。

钱熙祚，字雪枝（一字锡之），松江金山人。他借抄《四库全书》文澜阁藏本432卷，为编刻《守山阁丛书》准备材料，藏书极富。他建宗祠堂，堂后筑阁以贮书，曰“守山阁”。因得张海鹏《墨海金壶》残版，又从文澜阁《四库全书》中录出流传较少之书。《藏书纪事诗》卷六记载：“浙江文澜阁，在西湖孤山下，功令愿读中秘书者，许领出传写。道光乙未冬，钱锡之通守辑《守山阁丛书》，苦民间无善本，约同人侨寓湖上之杨柳湾，去孤山二里许，面湖环山，上有楼，楼下集群胥。间日扁舟诣阁领书命抄，毕则易之，同人居楼中校雠，湖光山色，滉漾几席间，意豁如也。是役也，校书八十余种，抄书四百三十二卷。”

瞿世瑛，字良玉，号颖山，钱塘人。家虽贫寒，以抄书为己任，但手抄罕见古书，以为日课。抄写书籍近千册。积数十年，得书几千册，建“清吟阁”为藏书楼。他的藏书目录记载，其藏

有名人抄本792种，批校抄本475种，影宋元抄本30种。瞿氏还校刊《东莱博议》、《帝王世经图谱》、《阳春白雪》等书。

蒋汝藻（1872—1954），号乐庵，乌程南浔人，室名“密韵楼”。手抄宋本书上百卷。王国维《观堂集林·乐庵写书图序》说：“观其手影《魏鹤山大全集》一百十卷，则又张目哆唇，舌挢而不得下。盖海内藏书家如乐庵者，屈指计之，尚不得四五。至于手模宋本至百余卷之多，非独今所难能，抑亦古所未有者也。”

赵魏（1746—1825），字晋斋，号录森，一号洛生，仁和人，研究篆隶，以精书法，抄书数千卷出名。其家徒四壁，家藏碑版极多，不辞劳瘁抄书，“间亦作画，迥别时流”。著《古今法帖汇目》、《竹崦庵碑目》、《竹崦庵金石录》。

曹言纯，字种水，号古香，秀水人，嘉庆丙辰岁贡生。家贫无书，曾借人书籍，李贻德赠诗云，“少时森森挺玉笋，藏锄中为买书尽”。其藏书处曰“五千卷室”，抄书孜孜不倦，坚持三十年。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中说：“同邑曹种水明经言纯，自弱冠后专心词章之学，家苦无书，借人书籍，取其精华，蝇头细书三十年，无虑千百册。”亦喜买书。他留给后人大量的书籍，著有《水经注钞》、《征贤堂集》、《种水词》等存世。

（二）清前期私人抄书的特点

第一，有无相易，精工缮写。为了防止古书亡佚，曹溶在《静惕堂记·流通古书约》中说：“今酌一简便法：彼此藏书家，各就现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次史，次文集，次杂说。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抄互换。此法有数善：好书不出户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互相借抄书籍，可以互通有无。黄宗羲与曹溶、徐乾学关系甚密，经常互借抄书；朱彝尊编《明诗综》，林佶全力帮助，并借给他大量的书籍。

第二，重视借抄善本。书籍质量差别很大。宋代善本极佳，

但是，宋本不多，很难得到。影抄罕见的宋本，黄丕烈乐而为之。他经常访寻借抄。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邵氏闻见录跋》中说：宋人说部虽有刻本，必取其抄本而藏之，恐时刻非出自善本，故弁刻取抄也。抄本又必求其最善者，故一本不已，又置别本也。可见其抄书以求善求真为己任。

第三，清代抄本有不少戏曲、唱本、弹词小说。根据有关书目著录，百本堂、聚春堂、老聚春堂、别野堂、燕翼堂等均以传抄戏曲唱本著称。

传世抄本，清抄居多。与刻本相比，清抄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有些抄本可以补刻本之不足，如陈澧《东塾读书记》有多种刻本，但是均为残本。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分，但是刻本只有经子集三部，史部残缺。现存稿本《东塾杂俎》正是刻本所缺的史部，稿本和刻本加起来才是足本。

第三节　其他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

除了坊刻和家刻，清代还有一些机构也从事图书的出版刊刻活动，主要有书院刻书和寺院刻书。

一、书院刻书

清初，清政府限制书院刻书，但到雍正时期，改为公开提倡书院刻书。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就曾发布上谕："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为此书院刻书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出于"化导士子"的目的，朝廷规定各省省会设立书院一所，书院经费由政府拨给，书院山长由各省督抚、学政聘请，学生由各省道员和布政司会同考核。这样，实际上把书院逐步办成了官学。由于清统治者采取扶持政策，清代书院几遍及各省通都大邑，甚至穷乡僻壤。据陈元晖等统计，清代设立书院达1 900多所，大部分控制在政府及其

官员手中。综观清代书院，大致有四种类型。一为讲求理学为主的书院；二为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这类书院在清中叶大盛，对于学术文化发展影响很大；三为以考课为主的书院，这种书院也很普遍。第四种为近代人士举办的学习西洋科学的书院。这四种类型的书院刻书成为又一重要出版形式。

（一） 清前期书院刻书兴盛的原因

清代书院刻书活动兴盛，而且刻印的图书又比较精良，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继承前代遗风。我国古代书院制度始于唐代，宋代得到发展。从那时起，“书院本”就以其技术精良、字体优美而成为当时地方刻书的代表。以河南书院刻书为例，宋时四大书院之中的睢阳书院、嵩阳书院及元时的临汝书院皆在河南，这就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河南书院。因此，几度兴废的嵩阳书院、大梁书院在清初就积极进行刻书活动。大儒孙奇逢更是“讲学于苏门之夏峰，并创建兼山堂作为讲学、刻书之地”。[1] 他不仅自己在此曾刻书数种，而且后世作为刻书堂号，也刊刻了许多著作，这对当时及以后的书院刻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 书院拥有大量藏书，其中多有善本，这不仅可以为刻书提供较好的底本，而且是校勘工作的重要保证。清代书院注重藏书，许多书院都建有藏书楼。如河南大梁书院有《大梁书院藏书总目》一册，根据该目著录，其中经书700种，8 936卷；史书196种，13 205卷；子书184种，3 480卷；集书290种，5 037卷；丛书112种，4 218卷；可见藏书相当丰富。

3. 山长（或院长）学术水平较高，勤于校勘，又为书院刻书提供了质量保障。书院山长，多为社会名流，著书立说者甚多。如百泉书院山长孙奇逢是清初名儒，著有《理学宗传》、《四书近指》等。他的弟子耿介主讲嵩阳书院，著有《中州道学编》、《理学要旨》。江宁钟山书院山长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等。这些书院的山长不仅重视讲学、著述，而且还积极从事刻书活动，经他们校勘的书，质量高，讹误少。

【1】钱仪吉：《经苑·儒行跋》，1923年重印本。

此外，书院的经费比较充足，再加上印刷术的广泛流行和普遍使用，这都为书院的刻书提供了条件。

（二）清前期书院刻书的内容

清前期书院刻书活跃，范围也较广泛，其所刻图书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 刊刻学规、章程。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讲学，启迪诸生童，但生童品行不同，因此，书院都很重视教学管理。有很多书院在管理中借助前代的章程，也有不少书院制订了自己的学规。如大梁书院"刊刻宋朱子熹《白鹿洞规条》及元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于讲斋"，[1] 严格要求院生照章学习；朱阳书院"定立学规，仿朱子《白鹿洞规条》，列为居敬、穷理、力行、制事、接物五者，复辑圣贤切要之言，刊布学宫，使学者触目惊心，破习俗之见，砥日新之德"刊刻学规。[2] 此外，鳌峰书院编刻《学规类编》27卷；正谊书院刻《宪定正谊书院章程》等。

2. 刊刻各类古籍文献。书院刊刻了很多用于教学的典籍。如文清书院办学"以正学淑士子，刊陈北溪《严陵讲义》、薛文清《读书录》、吕新吾《省心纪》、陈确庵《圣学入门书》、彭访廉《儒门法语》，令学者切己体行"，[3] 特别是冉觐祖去嵩阳，"入书院于诸生讲《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别理欲，众皆惊听。随出《天理主敬图》、《为大学旨》两册，颁士学者，耿公梓而行之，四方闻风踵至"。[4] 在以经史训诂为主的书院中，刊印经籍更为必做之工，其中经史义疏之类著作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张伯行在福州创建鳌峰书院。张伯行学宗程朱，为官以教化为己任，所到之处必立学延师，在临清建立清源书院。康熙四十六年任福建巡抚，"甫下车，即开鳌峰书院"，[5] 建堂曰"正谊"，并"订儒先居敬穷理力行之书，刻名臣节义经济之籍"，[6] 他特别注意"取朱子语类、文集、文略、遗书、二刻遗书、朱刘问答诸书及闽前哲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黄勉斋、陈北山、高东溪、真西山诸文集，尽刊布之，凡五十五种"，[7] 名曰《正谊堂丛书》。这部丛书于康熙四十六年开始刊刻，康熙四十

[1] 黄舒昺：《祥符县志》，卷十一《学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本。

[2] 窦克勤：《崇祀乡贤名宦录》卷下，康熙年间朱阳书院刊本。

[3] 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一。

[4] 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十六《冉检讨觐祖传》，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1966年。

[5] 游光绎：《鳌峰书院志·祠祀》，清嘉庆十一年福州鳌峰书院刻本。

[6] 游光绎：《鳌峰书院志·祠祀》，清嘉庆十一年福州鳌峰书院刻本。

[7] 游光绎：《鳌峰书院志·杂述》，清嘉庆十一年福州鳌峰书院刻本。

八年完成。全书分为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6部，所收起自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迄清代汤斌、陆陇其等人著作，是一部比较完备地汇集宋代以来濂洛关闽学派理学名著的丛书。阮元创立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也刊刻了大量的典籍，其中诂经精舍刊有《诂经精舍文集》八集，学海堂刊印书籍《学海堂经解》180种，《学海堂文集》九十卷，共收集了500人的著作。此外，衡山船山书院重刻了《学海堂经解》小字本，南菁书院刻《续皇清经解》和《南菁书院丛书》；紫阳书院连续刻印《铁桥志书》二卷、《文嘻堂诗集》三卷和《婺源山水记》二卷；庐峰书院刻《蔡氏九儒书》；宏道书院刊《惜阴轩丛书》，广雅书院刻《广雅堂丛书》，端溪书院刻《端溪丛书》，解州书院刻《有诸己斋格言丛书》等等。刊刻这些丛书，对于保存古代典籍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书至今仍然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

3. 刻印书院师生自己的著述。自古以来，书院不仅是讲学中心，而且也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基地。许多书院山长（或院长）都十分重视学术研究，有不少书院拥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如杜知耕专门从事数学研究，著有《数学钥》六卷、《几何论约》七卷及《杜端甫诗集》等，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耿介著《中州道学编》、《理学要旨》等由嵩阳书院刊行；苏源生著《大学臆说》、《贞寿堂赠言》、《师友札记》，以及《国朝中州文征》五十四卷、《鄢陵文献志》四十卷等在文清书院问世。其他如阎若璩《潜邱札记》、臧琳《经义杂记》、卢文弨《钟山札记》和《龙城札记》、王鸣盛《蛾术篇》、汪中《知新记》、洪亮吉《晓读书斋杂录》、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正燮《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陈澧《东塾读书记》等都在书院刊行。同时，书院也很重视诸生作品的刊刻。如张伯行的鳌峰书院“每月具饮馔，集诸生考课，口讲指画不少倦，拔其尤雅者裒而刻之”；[1] 此外，正谊书院将师生日记汇编为《学古堂日记》，关中书院也刊有《志学斋日记》。

[1]《福建通志·名宦》，清刻本。

4. 刻印各类方志。清政府很重视修志，因此，各种志书蔚为大观。省府州县志有之，山志、水志有之，许多书院也纂修了书院志并自行刊印，如清初青阳书院刊印了敬恕堂主人的《嵩阳书院志》；康熙三十年（1691年）紫云书院刊印了李灼然的《敕赐紫云书院志》等。这些书院志都详细记载了该书院的历史沿革、基本概况、教学规程以及著名学者在书院的讲学活动和应对酬答诗文等，比较全面、完整地保存了有关书院的资料。同时，书院的刻印人员还直接为社会修志服务。如林县的黄华书院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刊印了杨潮观纂修的《林县志》，鹿邑的真源书院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刊印了许莶纂修的《鹿邑县志》等。

书院刻书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顾炎武曾论："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所事，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不贮官而易刊行，三也"，[1] 说出了书院刻书的特点。

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西学的输入，新式学堂的兴起，旧式书院制度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书院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连同它的藏书和刻书活动，在我国的教育史乃至藏书史、出版印刷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

二、寺院刻书 [2]

【2】本小节部分内容引自周书荣：《福建佛教历史上的刻经事业》，黄维忠：《恢弘的藏文大藏经》。

寺院刻书的主要内容是佛经，清代刊刻佛经的寺院很多，仅举其大要。

汉文佛经的刊刻以福建地区寺院为例：明、清以来，福州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均有刻经流通。鼓山涌泉寺的刻经规模更为福建全省之冠。涌泉寺刻经肇始于明万历年间，入清以后，在住持道霈的主持下，刻经事业迅速发展，康熙年间达到鼎盛。他在鼓山涌泉寺辟永通斋，专门从事雕刻佛经的工作。康熙三十年（1691年），道霈刊刻《鼓山永通斋流通诸法宝划一》，介绍该寺的刻经目录及其单价。1932年9月，虚云和尚的弟子观本禅师在鼓山涌泉寺编成《鼓山涌泉禅寺经版目录》，

他在跋中谈及："鼓山白云峰涌泉禅寺之西厢宝积仓上，危楼五楹，插架连云，藏有古刻经版多种。查此经版，自明崇祯年间永觉贤祖继紫柏尊者之径山寂照庵而起，为霖霈祖绳武主之。时在有清康熙中叶，刻经最多。其中如《华严经疏论纂要》，凡百有余卷、四千有余页，为海内未经见之本。其他刻本属于近代名德之著述，多非《龙藏》及日本《弘教藏》本所有，惟近代日本明治藏经院所编之《续藏》始搜采之，然亦不备。"1934年，弘一法师在《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序》中也提到："昔年余游鼓山，览彼所雕《法华》、《楞严》、《永嘉集》等，楷字方册，精妙绝伦。以书法言，亦足媲美唐宋，而雕工之巧，可称神技。虽版角有少腐阙者，亦复何伤，弥益古趣耳。又复检彼巨帙，有清初刊《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而《华严疏论纂要》为近代所希见者。余因倡缘印布，并以十数部蹭与扶桑堵寺。乃彼邦人士获斯秘宝，欢喜忭跃，遂为摄影镂版，载诸报章，布播遐迩，因是彼邦佥知震旦鼓山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1] 今据《鼓山涌泉禅寺经版目录》一书统计，鼓山涌泉寺刻经自明万历间（1573—1620年）起至1932年止，计有359种。其中明刻84种、清刻195种、民国刻45种、年代不明的及抄本35种。清刻中多康熙年间（1662—1722年）所刻，有141种，几乎均是精椠之本，其中著名的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顿悟入道要门论》、《鼓山永觉禅师广录》和《旅泊庵稿》；康熙五年（1666年）刊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原为宋书法家苏轼所书，鼓山涌泉寺据镇江金山寺宋本翻刻，以镂工精良著称。福州怡山西禅寺刻经始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至1949年止，共有49种。清刻中著名的有《禅门日诵》、《万佛名经》、《经律异相》、《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等；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的《释迦谱》(又名《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四卷，图文并茂，雕工精细。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刻经流通始于明末清初，寺有刷印楼，"在藏阁上，凡法宝新旧板俱在此楼，递年刷印者住焉"。[2] 该寺共刻经24种，其中著名的有《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

【1】释弘一:《福州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序》。

【2】[清]《黄檗山寺志》,卷二。

法要》、《虎丘隆和尚语录》、《祖庭钳锤录》、《心经斫轮解》、《黄聚隐元禅师语录》和《云涛集》。

其他又如嘉兴楞严寺。清顺治、康熙二朝（1644—1722年）的民间刻经事业，以补续《嘉兴藏》为大宗。当时各地民间、寺院刊行的僧传、语录，经版皆集中于嘉兴楞严寺。《嘉兴藏》发起于明嘉靖末隆庆初，到万历七年基本确定。万历十七年在山西五台山开雕，一年内共刻500多卷。因该地气候寒冷，二十年迁到浙江余杭县的径山继续刊刻。后又分散在嘉兴、吴江、金坛等地募刻，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完工，由嘉兴楞严寺集中经版刷印流通。全藏分正藏、续藏和又续藏三个部分。正藏210函，完全按《永乐北藏》的编次复刻，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史字，末附《永乐南藏》特有的5种，153卷。续藏95函，收入藏外典籍248种，约3 800卷。又续藏47函，续收藏外典籍318种，约1 800卷。康熙十六年以后，抽去续藏5函、又续藏4函，收入内容也略有变动。计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2 090部，12 600余卷。该藏除了改变历来佛经沿用的折装式装帧为轻便的线装书册式外，主要是在续藏和又续藏中收集了大量的藏外著述，内容包括疏释、忏仪、语录等。

自明代开始刊印藏文《大藏经》以后，随着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雕版印刷业在藏区空前兴盛起来，藏区较大的寺院中均有印经院，大量印刷藏文《大藏经》等典籍。在此过程中，一些大的印经院也逐步形成，较著名的有德格印经院、那塘寺印经院、布达拉宫印经院、塔尔寺印经院、拉卜楞寺印经院等。实际上稍有规模的寺院都在印经书。因为办一印书机构并不需要很多投资，除木料、墨、纸张外，主要是要有很好的书法家写出来，同时要有很好的画工、刻工。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印经院是诸印经院中颇有声名的，由德格第42代土司却吉旦巴泽仁兴建于1729年，全称为藏族文化宝藏德格印经院大法库吉祥多门，兴建此印经院花了16年时间。最盛时期的德格印经院刻工据载有1 300多人，刀功精细雄健，文字准确清

晰，内藏以样本为主，并有少量松木的书版200多部，印版计21万余片。内容以《甘珠尔》、《丹珠尔》为主，尚有藏族学者的有关文集、传记、宗教史、天文历算、音乐、美术、雕刻、文法、正字、词藻类图书等。德格版藏文经籍不但畅行于整个藏区，还流传到汉、蒙等地区和国外。拉卜楞寺印经院和藏经楼虽然不是藏区最大的，但作为安多地区的重要寺院，闻名遐迩。据说原来的藏经楼藏经书228 820余部，藏文经版62 000余块，现有图书65 000余部，经版18 216块。从这些劫余的图书的数量中，我们仍可领略到藏区当年刻经、印经的规模和程度。1959年，拉卜楞寺工作组曾对该寺藏书进行清理，油印《拉卜楞寺图书总目录》共2卷，仅列入该书目的就有7 824部。在历史上德格印经院与拉萨布达拉宫印经院、日喀则那塘印经院并称三大藏文印经院。其他重要的寺院刻书处还有：布达拉印书院，由清初五世达赖建立于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的下面，十三世达赖曾予以扩建，刊刻了很多宗教书籍；卓尼印书院，设在甘肃卓尼，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由摩索贡布创办，康熙五十九年刻印藏文《甘珠尔》，后又刻印《宗喀巴全集》、《智华谢知布全集》、《吉祥经》、《赛昌经》和《四部经典疏注》等藏文书籍；孜达果加布印书院，设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后侧顶部，五世达赖喇嘛创办，所印经籍切口处涂以红色，以示为宁玛派之书，藏有宁玛派典籍书版1 892块；药王山藏医印书院，设在西藏拉萨药王山，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创办，刊刻了《四部医典》、《宇妥·云丹贡布传》、《蓝琉璃》和《藏医史》；刷经寺印书院，设在四川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中部（今红原），雍正年间由土司梭磨创办，刻印了大量佛教典籍；察干乌拉庙印书馆，设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察干乌拉庙，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由大喇嘛察哈尔格布希·罗布藏楚勒特木建立，刻印有《宗喀巴圣传十一章》、《阿尔塔希地皇太子的故事》、《育民甘露》和《育民甘露注释》等书籍。

第四节　民间出版的地域分布特点

清前期是中国刻书事业普遍发展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刻书活动。由于各自的地理、自然、人文等条件的不同，民间刻书地域分布疏密程度也有区别，形成了刻书业的几个密集地区。刻书的地域主要分布在北京、江苏、浙江、四川、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山东、山西、河北、广东等地。

一、刻书家地域分布特点

要研究刻书家的地域分布，可以从藏书家的地域分布中得其端倪。因为藏书和刻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藏书家为刻书家刻书提供了丰富的书籍。清前期藏书家家藏的文化典籍极为丰富，他们利用自己的藏书从事著述，把撰著的成果付诸剞劂。如目录学史上著名的《千顷堂书目》即是藏书家黄虞稷根据家中藏书编纂而成的（图46)。有的藏书家尽管自家藏书已很丰富，但为了刻书，还要到其他的藏书家那里造访，“求先贤遗集，或得其手翰遗墨，则摩挲抚玩，不啻亲接颜色”。[1] 当时亦有藏书家因自身刊刻书籍力量有限，很乐意为他人刊刻书籍而奔走呼吁，藏书家卢文弨就是这样，他不仅借给鲍廷博大量书籍，还走访其他的藏书家，为其刻书求助。他在《征刻古今名人著作疏》中说：“鲍君之为此，既远于害，亦非以徼利也。古人精神之所寄，即天地英华之所聚。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咸其嘉赖之，其为利益也广矣、大矣。”[2] 以此劝说藏书家们尽力帮助，实现其著述书籍，

【1】《清史列传》，卷七十三，中华书局，1987年。

【2】卢文弨：《征刻古今名人著作疏》，《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一集，卷首。



图46
黄虞稷

把撰著的成果付诸剞劂的素愿。

要对清初藏书家、刻书家的地域分布作出准确的统计是不可能的，其一，因为藏书家、刻书家的界定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其二，有些藏书家、刻书家找不到文献的记载，无法证明其身份。我们可以借助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考察一下他们对藏书家、刻书家的统计，了解藏书家、刻书家的基本状况。

【1】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19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清代藏书家地域统计表[1]

地域	浙江	江苏	安徽	福建	北京	山西
人数	267	247	158	74	36	34
地域	广东	山东	上海	湖北	江西	四川
人数	26	17	12	9	9	8
地域	河北	河南	陕西	湖南	辽宁	贵州
人数	6	5	4	4	3	3

从上表可以看出，清初江浙、闽赣地区藏书家非常集中，这就为这些地区出版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考察清前期民间著述家的地域分布特点对研究清前期出版家的地域分布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关清初著述家地域分布特点的问题，可以从乾隆时纂修的《四库全书》中找到答案。《四库全书》收录了全国大多数名士的书籍，因此可以把它作为文化地域分布的一个鸟瞰。《四库全书》对于作者地理分布的统计数字如下：

【2】参考王垒《四库全书中所收著作的作者时代与地理分布研究》，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

《四库全书》中作者的地理分布统计表[2]

名次	省份	名次	省份
1	浙江	6	山东
2	江苏	7	河南
3	江西	8	河北
4	福建	9	上海
5	安徽	10	四川

由上表看出，清初全国各地的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江、浙、安徽和直隶地区发展成为文士儒生生活的密集区，沿海

地区的闽、粤文化日渐兴起。清代文士、儒生的地域分布统计表证实了这一点。

清初文士儒生统计表[1]

名次	省份	名次	省份
1	江苏	7	江西
2	浙江	8	山西、湖北
3	安徽	9	河南、陕西
4	直隶	10	贵州
5	山东、湖南、广东	11	甘肃、广西
6	福建		

【1】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15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根据清初的文士儒生分布情形来看,江浙地区保持着文化优势,安徽也由稍微落后的地区而跃居第3位,直隶地区因处于天子脚下,提升到了第4位,而广东和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则在文化优势上超过了文化盛地江西;西北、东北、西南等地区则处在落后状态。按照文化的传承规律,清初文士儒生的地域分布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清初的刻书家地域分布状况。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清初藏书家、刻书家在地区分布上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江浙地区刻书家分布最密集。上海、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刻书家分布也很密集,福建和广东刻书家分布也比较集中,此外,北京、山东、河北和河南又是一个刻书家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西北、东北、西南地区刻书家的数量有限。具体地分析清初藏书家、刻书家的地域分布,我们认为:

一、北京和河北地处清朝的政治中心,刻书家的数量比较可观。

二、江浙地区出版家地域分布的密集程度首屈一指,成为清初出版家分布的密集地区。(图47)

三、广东和福建是出版家分布的第二密集地区。

四、安徽省的出版家数量可观,在清初出版家地域分布人数中也处在领先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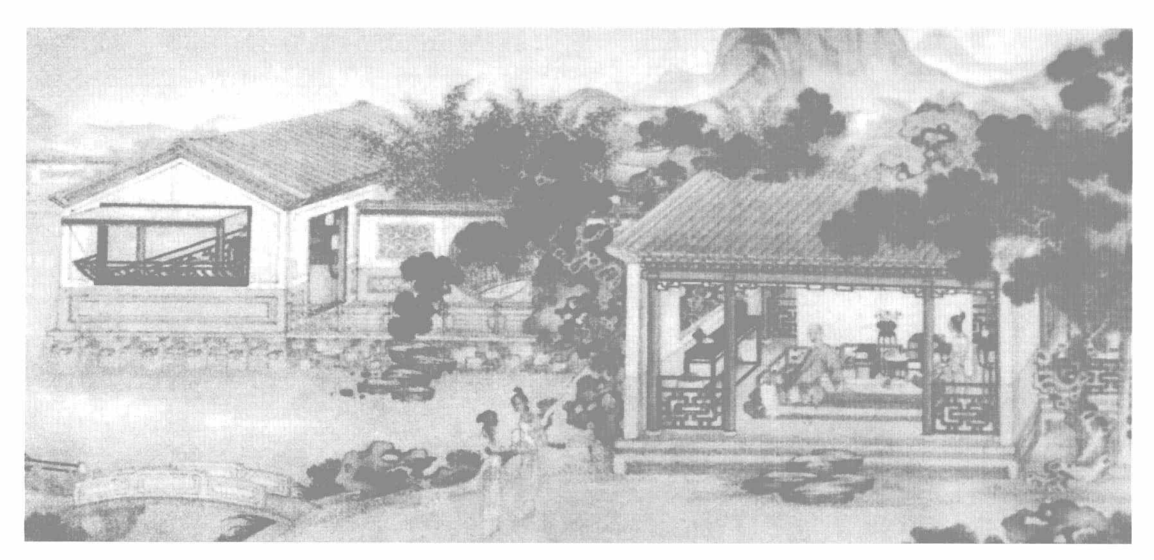


图47
江苏长洲藏书家汪文琛《汪厚斋都转溪亭勘书图》

五、江西地区的出版家数量处于劣势，到了乾隆年间，江西、广东的刻书业兴旺起来，发展成为刻书业的重要地区，江西金溪县的浒湾分布着很多刻书家；广东顺德县刻书家分布密集，还有很多女刻书家。[1] 湘、鄂地区的刻书业也很兴旺。

清前期的民间刻书家在江浙一带分布最为密集。这一带物产极为丰富，一直是刻书最集中的地区。由于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造就了代代相传的刻书世家，还有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刻书材料丰富，纸、墨和刻板质量上乘，书籍远销各地。清初，福建建阳的刻书业一蹶不振，这里的刻书家已经远走他乡，根据史料记载来看，他们主要奔赴福州等地，也有的前往江西和浙江地区。建阳刻书业败落的主要原因是全国经济恢复、发展，其他地区刻书业的兴旺，对建阳刻书业是极大的排斥。

二、民间出版地域分布特点的形成原因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清代民间出版家之所以呈现地域分布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清初刻书家的地域分布与清初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文化发达的区域，就是刻书家分布密集的地区。刻书家地域分布的

【1】《池北偶谈》,《粟香三笔》卷四,《居易录》卷十四。

疏密程度与文化发达的程度基本成正比。江浙地区人才济济，处在文化发展中的优越地位，因而使江浙地区刻书业繁荣。东南沿海、安徽、湖南、湖北的文化优势也促进了这些地区刻书业的发展。因此，我们说清初文化的繁荣为出版家的大量涌现提供了条件，对出版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诚然，有的时候两者不能完全一致地体现出来，但是这恰恰说明了清初文化发展有其特殊性。

2. 清初出版家的地域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出版家地域分布的密集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的繁荣程度基本上成正比。地区经济繁荣是该地区出版业发展的前提，对该地区出版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3. 清初出版家地域分布的疏密程度与当地藏书发达与否有密切关系。藏书家越多、藏书越丰富的地区，刻书家越多。江苏、浙江两省的藏书家人数名列前茅，刻书家人数也首屈一指。

4. 清初出版家地域分布与名士、硕儒地域分布密集程度并不完全一致。陕西出现很多名士、硕儒。安徽、广东、福建却寥寥无几。江西也是如此。除了其地域自身的原因外，又说明了清初出版家的增加与名士硕儒的关系不大。

下面将选择几个地区来具体探讨出版家地域分布特点产生的原因。

北京地区　北京坊刻家不如江浙多，但售卖书籍的店铺、书摊十分发达。这是因为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占文化和地理的优势，仍然成为全国重要的图书集散地和交流中枢。[1] 琉璃厂书坊数十家，其中很多是售卖书籍的店铺、书摊，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界人士。但是北京的坊刻却不如江浙多，其原因如下：首先，北方缺乏造纸原料，出版、印刷的纸张从江浙远途运来，势必加大了出版书籍的成本，不如在江浙买进书籍，转手渔利。其次，由于中央官府刻书规模大，数量多，需要从民间招聘大量的刻书工匠，这一举措减少了民间刻书的人手，削弱了民间出版力量。再次，在天子脚下，出版业担有政治风险，一

【1】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18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旦出版的书有意无意地触怒了皇帝，就有杀身之祸。

江浙地区　该地区在清前期民间出版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地的出版家刻书占有天时和地利。首先，江浙地区的经济基础为出版家的刻书提供了条件。吴晗曾说："大抵一地人文之消长盛衰，必以其地经济情形之隆诎为升沉枢纽。而以前辈导挈，府风辉映，后生争鸣，蔚成大观，为之点缀曼衍焉。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中心，期间间或互为隆替，大抵常熟富庶，金陵、吴县繁饶，且为政治重心，维扬则为鹾贾所集，为乾隆之际东南经济中心也。"[1]如苏州府，地处江苏东南，太湖之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素称鱼米之乡。自然条件优越。河湖港岔，舟楫便利，商业繁荣。苏州城"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2]扬州地处东南，盐业发达，为两淮盐政中心所在，盐业是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扬州繁华以盐盛"。盐商以盐获利后聘请名士编撰书籍，然后刊刻，其中最有名的要数程晋芳、马曰珀、马曰璐、安麓村、黄晟等。杭州等地商品经济发达，物产丰饶，盛产蚕桑，"蚕桑之利甲天下"，[3]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文人墨客云集，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居士集·有美堂记》载，杭州"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经济发展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增长，市民的生活比较富裕，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他们需要各种书籍。书籍的流通加快，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其次，江浙地区文化的发展为刻书提供了条件。如苏州有着良好的文化氛围，刻书风气很浓。宁波亦为具有学术渊源之地，藏书尤其丰富。章学诚说："惟浙中自元明以来，藏书之家不乏，盖元、明两史，其初稿皆辑成于甬东人士。故浙东史学，历有渊源，而乙部储藏，亦甲他处，近俱散失尽矣！三十年前，京师鬻旧书者多从浙江旧家收购，近十许年不复顾也。闻海外番舶，如日本、琉球，颇用重价购书江浙之间，有司不甚稽

[1] 吴晗：《江苏藏书家史略》序，中华书局，1981年。

[2] 孙嘉淦：《南游记》，卷一，清嘉庆年刻本。

[3] 《清高宗实录》，卷五十一。

察，此恐所关非细。”[1] 宁波藏书丰富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刻书之兴盛与之有密切关系。清代江浙地区有藏书家526人，占全国藏书家总数的57%，达到了一半以上。[2] 丰富的藏书为出版家刻书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不仅如此，江浙地区的人才储备也为刻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图48）

【1】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九，《与阮学使论求遗书》，民国十一年（1922年）刘氏嘉业堂刊本。

【2】周少川：《藏书与文化》，17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东南沿海地区　清初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出版家数量增多，其原因如下：首先，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刻书事业繁荣的基础，广东和福建经济的发展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清初很多中原流民迁移到闽、粤，当时，广东和福建又远离清朝统治的中心，南明政权的存在，其辖区具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广东、福建出版业一直向前发展。再次，清初广东、福建地区人们的抗清斗争为编撰出版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当地的学者深入抗清第一线，抗清失败后，痛定思痛，回首往事，国恨家仇，感慨万端，再加上自身多有渊博的学问，于是编撰出版书籍，以寄托亡国之恨。所以，这一时期在广东、福建一带出版了大量有关明末清初人物事迹的书籍。

江西地区　我们把出版家数量进行比较，再参照清代文士、儒生的统计表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江西的人文优势发展到清初



图48
宁波天一阁内景

已经衰退了，开始落后于江浙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并最终导致了出版业的衰落。下面我们来探讨江西地区出版业衰退的原因：首先，江西地区经济的衰退严重影响了文化的发展。清初战争一度破坏了江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背井离乡，田地荒芜，成为废墟。战后，清政府招集流徙之民，垦荒种植。但是，由于江西山区较多，土地较少，经济恢复缓慢，直接影响到出版业。其次，江西地区出版业根基不牢。尽管江西在出版方面不乏名家，但是没有形成出版密集区，出版业繁荣常常是昙花一现，无法形成出版的优势。再次，江西崇文的风气减退，对出版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江西人口流失严重。清前期江西籍的进士人数无法与明代的进士人数相比。进士人数减少，到中央任官的人数必然有限。《明史》列传记载晚明江西有宰辅18人，清初仅仅有5人。[1]通过这一对比，不难看出，江西文化的衰退是直接造成出版业衰弱、出版家减少的原因。最后，地方官吏对江西文化事业的摧残，影响了清初江西出版事业的发展。江西的地方官吏多次秉承朝廷旨意查缴禁书，曾多次奏缴图书，其种类多达四百五十二种。黄爱平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长达十九年，江西查缴禁书27 485部，对文化的摧残骇人听闻，致使出版家不敢从事出版业，造成民间出版业衰落。

【1】许怀林：《江西史稿》，577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其他地区　清初东北地区文化还未发展，在出版方面也未见史料记载。西南地区的四川、广西、云南分布有一些出版家。自从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建立大西政权，四川的经济起落较大，直接影响文化的发展。当地的文人出于历史的责任感，把四川的历史变故编撰成书籍出版。可见历史的变故及历史事件对出版业有很大影响。

通过对上述出版家地域分布状况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影响清初出版家地域分布的重要原因涉及到诸多因素。其中，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历史事件等都是重要因素。此外，我们还不能忽略各个区域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地方治理的特点。出版传承久远的

地区，经常保持着出版的人文优势。而出版不发达的地区，经常难于维持现状。地方官吏落实朝廷旨意的举措是否得力也影响着出版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地方官吏秉承皇帝的禁令，限制、甚至摧残出版业的发展，出版业的发展将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另一方面如果地方官吏鼓励出版，就会对出版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出版业就出现繁荣的局面。

第五节　民间出版的历史贡献

清前期民间出版为中国文献的搜集、整理、保存和学术文化的发展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出版了大量书籍，其中有些书籍是官府出版的书籍无法比拟的。清代民间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民间出版的贡献、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存了中国古代的典籍

清前期民间出版刊刻了大量的珍贵古籍，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私人刻书家搜集散落在民间濒于亡佚的书籍，刻印出版，种类之多，不下数万种，使一些书籍得以保存下来，流传至今。如蒲松龄编撰的小说《聊斋志异》完稿后，由于生活拮据，无钱刊刻，多次寻亲问友求得资助。幸亏鲍廷博家资富足，肯于帮助，将其刊刻出版，才使其广泛流传。程伟元为了不使《红楼梦》失传，用木活字刊印这部不朽的著作。徽州清代私人刻印的插图版画，保存到今天的尚有3 000多幅。金陵富春堂刻书，仅戏曲一类，见于收藏的就有三四十种。闽建余氏一姓书坊清时所刻之书现存台湾者有20多种。乌程严可均刻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收文多至3 000余家，资料十分珍贵。徽州张潮刻的《昭代丛书》，是清代最大的专收清人小品的专类丛书，保存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二、推进了书籍刻印技术的进步

为了提高刻书质量和速度，民间出版勇于采用新技术，出现了影印、活字、套印等方法。如不少影宋、元刻本不仅行款格式字体与原本悉同，连讳字缺笔等也照旧。有些影刻本酷似原刻，几可乱真，非细审之，实难辨出。除影刻本外，还有影抄本。其方式方法多同影刻，只是手抄罢了。有时，影抄本比影刻本价值还大，一是遇底本残缺，务必精工抄写补足；二是抄本多只有一套，实为孤帙，更显珍贵。这些影刻、影抄、影印本，保存了宋、元、明、清很多版本的本来面貌，对研究版本有着重要价值。有很多书原本已亡佚，依赖影本存世流传，此类影本更显宝贵。

三、提供了丰富的治书成果

在《中国图书印刷史论》中肖东发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周少川先生整理、刘大军博士整补的清代私藏目录一览表，列出220多位出版家，近三百种目录，表明了我国清代私刻及成果之多。中国的书籍分类历史久远。在书籍的整理、保存中，产生了系统的书目的分类体系。刻书离不开书目，书目在刻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录是刻书不可或缺的。“目录在刻书过程中作用较大，受到刻书者的重视。他们在刻书过程中出于需要，编出了很多目录，这就推动了目录编制工作”。[1]

【1】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17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六章　清前期印刷技术的发展

清代是中国传统印刷事业发展的最后阶段和顶峰。清初的统治者从接收明朝皇室藏书起，就着手对历代书籍进行收集和整理，成立了中央的编辑和印刷机构，加上地方编书印刷机构，以及遍及全国各地的民间印刷业，印书量很大，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作坊到家刻的遍及全国的出版印刷网络，印刷业的总体规模已远远超越明代。

从印刷技术的角度看，清代仍然沿用宋、元、明以来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法，基本是明代印刷技术的延续。古代发明和发展的各项印刷技术在此时都得到了普及和应用，印刷工艺进一步改进和提高。活字印刷的比例大大增加，木、铜、泥等各种材质活字的制作和排印都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雕版彩色印刷不但更为普及，而且质量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年画印刷迅速发展，遍及全国很多地区，作品进入千家万户。总体来说，清代的印刷技术在明代已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但没有新的突破。若从横向考察，还可以看出官府、私宅坊肆、书院、寺观等不同系统在技术应用方面的旨趣不尽相同，加上物质材料和技术力量的悬殊，导致技术水平出现差异，呈现出一种非同步发展的现象。

第一节　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与提高

在清代，无论是官府印刷业还是民间印刷业，无论是私宅刻书还是书坊刻书，雕版印刷都已非常普及，遍及全国。尤其是乾隆以来，雕版印刷业的分布更为广泛，民间印刷业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及主要城市，此在第五章中已经论述。

清前期，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使用数量上，还体现在雕版印刷技术和质量的提高上。仅以内府刻书为例即可充分说明清前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清内府单色刻本有数百种，是内府印书的主流。康熙朝以后普遍采用圆秀的“软字”或笔力遒劲的仿宋硬体字上版，中规中矩，每部书都精雕细刻。虽是单色雕印，也力求版刻风格的多样，富于变化。

还有部分书籍是以艺术字体上版镌刻。如明嘉靖时陈凤梧曾刻印过《篆文六经》，康熙末年，圣祖命儒臣李光地等又增加《四书》，刻印了《钦定篆文六经四书》，通篇镌以小篆，以洁白莹润的开化纸印制，赏心悦目。乾隆十三年（1748年），武英殿又刻了32体篆文本《御制盛京赋》，每种篆体刻一卷，各卷内容相同，依次为玉筯篆、奇字篆、大篆、小篆、上方大篆、墳书篆、倒薤篆、穟书篆、龙爪篆、碧落篆、垂云篆、薤露篆、转宿篆、芝英篆、柳叶篆、鸟迹篆、雕虫篆、麟书篆、鸾凤篆、龙书篆、剪刀篆、龟书篆、鹄头篆、鸟书篆、科斗篆、缨络篆、悬针篆、飞白篆、殳篆、金错篆、刻符篆、钟鼎篆，古法篆体荟萃于一编，极具欣赏性。

清代影刻宋元本的图书质量也大有提高，如康熙年间仿宋咸淳元年吴革刻本《周易本义》，略去版心下刻工姓名，其他版式等一切照旧，翻刻质量甚佳。（图49）乾隆帝喜好古版书，征书时曾得相台岳氏所刻五种经典中的《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后又在“天禄琳琅”中找到《春秋》，终成完璧。为避免再度分离，将其专贮于昭仁殿后殿，亲题为“五经萃室”。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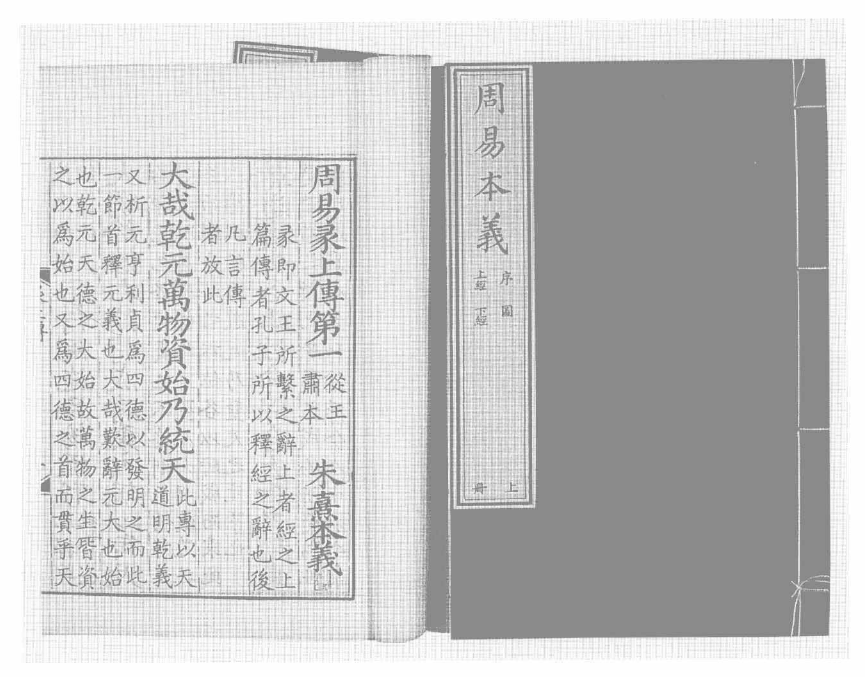


图49
《周易本义》，康熙五十七年武英殿刻本

十八年，武英殿据“五经萃室”原本刻成《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附考证)，连底本上的历代收藏印记都影刻下来。遗憾的是把原版心下的刻工姓名去掉，而在每卷末页左边栏外下方刻上翻写者的姓名，如“内阁中书臣费振勋敬书”，书册外还配上磁青洒金绢书衣和织锦函套，既精致又美观。尽管近年经学者考证，“五经”各书是由元初义兴（今江苏宜兴）岳飞九世孙岳浚主持，据宋廖莹中世彩堂本校正刊行的，而非岳飞之孙岳珂所刻，但乾隆帝的好古、惜古之心是显见的。

清内府刊刻书籍中，有不少旷日持久的大工程，如《乾隆版大藏经》(因其经叶边栏饰以龙纹，又名《龙藏》，泛称《清藏》)，共7 245册，经折装。以《千字文》为序，始“天”终“机”，共724字。每字一函，每函十卷，加上《目录》，共7 245册，分装725函。所用版片，特选直隶、山东出产的优质梨木，全部是无结节、无拼凑的整板，[1] 共79 000余块，均两面刻字。负责监造的人员有80余人，还募集各种优秀工匠860余人，专事刻字、刷印和装帧，历时4载完成。[2] 字体工整，笔锋秀丽，镌刻精湛，如

【1】孙关根：《乾隆版大藏经重印琐记》，《中国印刷》1989年第8期。

【2】杨玉良：《清〈龙藏经〉的刊刷情况拾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出一人。佛像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反映出版画艺术的高超造诣。印成后，颁赐京师等地各大禅院。此外，还有袖珍小册，蝇头小字的镌刻更见功力。

内府刻本的总体特点是写、刻、印各个环节皆一丝不苟，讲究精良纸墨、版式的搭配，对雕印技艺的运用可谓游刃有余，刻印质量达到近乎完美的境地，充分体现了清代雕版印刷的水平。

第二节　套印技术的不断完善

清代的套印精品多出自内府，它使这一精细复杂的技术也达到了近乎完善的境地。以下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看其中的发展变化。

一、各色用途形成定式

内府套印本各色之用途已形成定式：除正文用墨，句读用红以外，还利用红色鲜明的特性，在人名、地名和注释引书等处做专名号；或用来印皇帝的朱批，使之醒目。在《度数表》(即三角函数表）中，书口处以红色印度数，以便于翻检、查找和对照。在《钦定词谱》中，还有一种用途，即以虚实朱圈分别平仄：平用虚圈○；仄用实圈●；字本平而可仄者上虚下实◒；字本仄而平者上实下虚◓，便于阅者识读。

遇有评注、批语之书，而评注者又不止一位，则另加蓝、绿等色，用以分辨各家手笔。如《御选古文渊鉴》中，圣祖御评用黄，高宗御评用朱，诸臣品题用蓝，条理明朗，分次井然。有时评注的方式有多种，亦以各色区分，如《御制唐宋诗醇》中，诸子等注用蓝，而对于其中有“援据正史杂说用资考订疏解者，与古今人评诗之语义，则另作绿笔书，以便阅者灿若列眉”[1]。这些均是源于“闵本”的传统。在殿本中，正文与圈点等符号、御评、诸臣评注各专用一色，不重复使用。御评则非黄即红，均为专用色彩，主次分明，且各书基本相同，形成一定的规律。《劝善

【1】《御选唐宋诗醇》凡例，乾隆十五年武英殿刻四色套印本。

金科》一书，是以红、蓝、绿、黄、黑五色套印而成：戏目采用单行大绿字；宫调用双行小绿字；曲牌用单行大黄字；科文与服色以小红字旁写；曲文用单行大黑字；韵白则以小黑字旁写；曲文中每句、每读、每韵、每叠、每格等皆以小蓝字旁注以区别；南腔、北调则各以小红圈一一圈出。与同期出现的套印本相比，此书套色数量最多，套色准确，印制精良，清晰悦目，既有提示、助读的作用，还美化了版面，兼具艺术欣赏性，是清代前期彩色套印技术发展水平的杰出代表。这些都是优于明代套印本之处。

二、套印技艺精益求精

套印技术的关键在于套印位置是否准确，颜料是否纯正，色彩施用是否得当。殿本在这些方面均无可挑剔，如朱色句读不偏不倚恰好落在当顿之处，未见有叠印和偏差现象，一丝不苟。加之选用上等徽墨和银朱、红花水、白芨、雄黄、靛末、广胶等上好颜料，并定量配制，保证了套印书墨色如漆，其他各色均纯正、匀净，虽年代久远，仍不洇不渝。而闵刻本的套印色彩很不纯正，而且普遍陈旧，套印位置也不准确。

三、对套印技术的应用恰到好处

从套印这一印刷形式本身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使段落、字句分明，词意显赫，使所要强调的局部醒目，在多方面起着助读作用；第二，由于在白纸黑字的书籍中增加了富于美感的色彩，又使它们在客观上具有艺术欣赏性，即在实际的效用之外，增添了观赏的意义。这种令读者赏心悦目、“精神为之一振”的作用是其他印刷方式所不具备的。闵氏曾将套印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类书籍：上起《周易》，下迄传奇，经、史、子、集无所不涉；而武英殿却只将其用于诗赋、文集、剧（曲）本等少数几类书籍，内容范围大大缩小。内府刻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何种内容的书采用何种方法印制，均需奉旨而行。经史之

书，文字大多奥曲艰深，阐述发人深思之哲理，研读时需全神贯注，并作理性的思考，因而采用了墨色印本，利于视觉和神思的集中；而诗词、曲谱等文学艺术体裁的书籍，多合辙押韵，抒发种种思想感情，吟诵时需抑扬顿挫，欣赏品味，并可作丰富的联想，此类书籍则较多地采用富于艺术性的套色方法来表现。所以，就内容与形式的结合而言，殿本恰到好处。（图50）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对比，可知武英殿的套印技术更加成熟和精湛，其技术水平所达到的完美程度几乎无可匹敌，但是方法上并没有大的突破：一是套色数量未见增加。武英殿刻朱墨两色套印本有《钦定词谱》、《钦定曲谱》、《御制冰嬉赋》、《圆明园四十景诗》、《钦定协纪辨方书》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三色套印本未见；四色套印本有《御选唐宋文醇》、《御选唐宋诗醇》和《御选古文渊鉴》；五色套印本有《御选古文渊鉴》和《劝善金科》。此外，雍正至宣统历年的时宪书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朱墨套印本或朱墨套印袖珍本，系钦天监所刻。从整体来看，内府刻套印本绝大部分为两色，四色、五色套印本出自于康熙、乾隆两朝，嘉庆朝以后则仅见两色印本。二是套印方法未见突破。从套印技法来看，仍采用分版套印法，与明代基本相同。如康熙年间所刊《御选古文渊鉴》中，每页黑色版框的左右下角，各有一约0.5厘米长的红色标记“▌”、“▌”与栏线重合；在朱墨套印本《钦定词谱》中，也可以见到红色的直角形印记“┗”、“┛”叠印在版框的左、右下角上。很明显，它们是用分版印刷法印成的，红色符号即是为了对准另一块印版所作的标记。另外，红色覆在黑色上面的情况也依稀可见，由此得知是先印好墨色版，再印红色版；黑色版起了使其他印版对齐、定位和

图50
《钦定同文韵统》，乾隆十五年武英殿套印本

天竺字母說
粵稽象敎之興原於天竺(卽尼訥嚩珂克)大藏一十二部聲輪宏轉徧滿寰區惟昔釋迦敷座談經現身說法廣宣妙義辨析微言一則爲諸大弟子闡發圓明一則以提醒衆生解脫纏縛遂使迷津克渡彼岸同登原未嘗立定門法以何語言文字設爲敎品但就其依因現示色身所著之處竺土大衆同曉之語言聲韻爲之唱說固已聖慈廣被妙化宏敷其間義以音宣音由呼出音呼相繫韻切從生天竺字母有自來矣韻

套准的作用。现代有关的书籍中有将此版称为“标准版”或“关键版”的，也有称作“轮廓版”的。这说明殿本的套印方法与前代并无不同。

同期的私刻套印本，有道光年间涿州卢坤所刻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其中明王世贞的评语用紫，王慎中用蓝，清王士祯用朱，邵长蘅用绿，宋荦用黄，正文用墨。其用色之多，堪称套印本之最，但若细而观之，仅字行之间各色圈点就多达四种，过于密集、纷繁，以致出现不同颜色的圈点叠印和交错的现象，显得眉目不清；再从用纸、墨色、颜料等各方面综合来看，更是明显逊于殿本。

殿本与其他套印本的不同，有些反映了技术方法上的前后演进关系，有些则是所出时代和刊刻机构等客观条件不同所致。

第三节　活字印刷技术的多种尝试

政府积极使用活字版印书也是清代一大特点。雍正四年（公元1728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了大部头书《古今图书集成》，共刻铸铜活字20多万个。乾隆年间，武英殿又刻制木活字25万多个，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政府大规模使用活字版印书的行为，对于民间活字版的推广和使用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木活字印刷的普及

（一）武英殿聚珍版

清代的木活字印书已在全国通行。各地的衙门、书院、官书局大都备有木活字，而且出现了如“活字印书局”或“聚珍堂”等专门采用活字印刷的店铺。最大的一项木活字印书工程，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的丛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臣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世所罕见的宋元古籍后，欲使其广泛流传，特诏户部右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四库全书》副总裁金简办理此事。金简

认为若以后要刊印的书籍不断增加，恐雕版难以应付，因此根据胶泥活字、铜活字等材料的利弊，提出了以枣木制作活字印书的办法和建议，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批准。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138种书，其中有134种是木活字排印。总的来看，内府活字本比起外间活字本要精细。所以，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完成后，只用木活字印了《千叟宴诗》、《大事记》、《平苗纪略》、《西巡盛典》、《八旬万寿盛典》、《钦定吏部则例》、《白塔信炮章程》、《畿辅安澜志》和《续琉球国志略》等，而没有再大量使用，可能与此有关。

事后，金简编撰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书中将造木子、刻字、字柜、槽板、夹条、顶木、中心木、类盘、套格、摆书、垫板、校对、刷印、归类、逐日轮转办法（附轮转摆印课程）等各项分别条目，一一绘成生动的图示，并作出简要说明，从理论上概括总结了全部工艺流程。由于这篇文献是印刷史上为数不多的几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活字印刷史料之一，且是唯一的单行文献，故将全文录下：

成造木子

聚珍版摆印书籍，固称简捷，然以数十万散字中撮辑成章，其木子大小难以画一。若逐字铲削，又事繁而工费，故制造木子之法。利用枣木解板，厚四分许，竖裁作方条，宽一寸许，先架叠晾干，两面用刨取平，以净厚二分八厘为准，然后横截成木子，每个约宽四分。豫以硬木一块，长一尺四寸，宽一寸八分，中挖槽一条，内宽一寸，深三分，底墙欲平直，外墙以铁镶口，下首两墙挖空寸许。将木子数十个仄排槽内，用活闩挤紧刨之，以平槽口为度。是槽深三分，则木子亦净宽三分。宽厚分数既得，再用木槽一个，其法如前，中挖之槽只宽三分，而深用七分，将木子竖排于槽内，刨之平槽口，则得直长之数。凡大木子每个

厚二分八厘，宽三分，直长七分。其小木子厚长分数皆与大木子相同，而宽只二分。将前槽深三分者另制深二分木槽一个，仄排刨之即得。但用刨必须轻捷，若沉著太过，恐刨齿致损槽口。仍于刨完后用铜制大小方漏子二个，中空分数与大小木子相符，将木子逐个漏过，自无不准之弊矣。

刻字

应刊之字，照格写准宋字后，逐字裁开，覆贴于木子之上面。用木床一个，高一寸，长五寸，宽四寸；中挖槽五条，宽三分，深六分。每槽可容木子十个，上下用活闩塞紧，即与镌刻整版无异。

字柜

按照《康熙字典》，分十二支名，排列十二木柜，高五尺七寸，宽五尺一寸，进深二尺二寸，足高一尺五寸。每柜下用木凳一条，高与柜足相齐，以便登踏取字。每柜做抽屉二百个，每屉分大小八格，每格贮大小字母各四，俱标写某部某字及画数于各屉之面。取字时，先按偏旁应在何部，则知贮于何柜，再查画数，则知在于何屉，如法熟习，举手不爽。间有隐僻之字，所用不多而备数亦少，仍按集另立小柜，置于各柜之上，自能一目了然。

槽板

用陈楠木做方盘，外口面宽九寸五分，径长七寸七分，高一寸六分；里口面宽七寸六分，径长五寸八分八厘，深五分。四围用铜包角，以期坚固。

夹条

一分通长夹条

用楠木或松木做成条片，宽五分，长五寸八分八厘，厚一分，凡书内整行大字靠整行大字，即用此夹摆。按，套格每行额宽四分，而大字木子只宽三分，以

之居中，则每行之两傍各空半分，二行计之则合空一分，故用一分夹条，方能恰合格线。

半分通长夹条

宽长如前，厚半分，凡整行小字靠整行大字者用此。盖小字木子每个宽二分，双行排摆则宽四分，尺寸与套格相符。本行原无庸夹条，但傍边若靠大字，则仍有半分之空处，故宜用半分夹条。

一分长短夹条

厚一分，长自一字起，至二十字止，凡双行小字下遇大字而傍行亦系大字者，视字之多寡、长短拣用。

半分长短夹条

厚五厘，亦自一字起至二十字止，凡大字下遇双行小字而傍行系大字者用此。其长短亦随字拣用。若旁边均系小字，则全不用夹条，自然合格。

顶木

凡书有无字空行之处，必需嵌定，方不移动，是谓顶木。用松木做成方条，高五分，用于大字者，面宽三分，小字者，面宽二分，俱自一字起至二十字止。量其空字处，长短拣合尺寸嵌于无字空行处。

中心木

凡摆书至九行即放中心木一条。亦用松木，高五分，长五寸八分八厘，宽四分，此即套格之版心处也。

类盘

用松木做托盘，宽一尺四寸，长八寸，深五分，内嵌木档数十根，档宽四分许，凡取字、归字，随时安放木子，庶不致倒乱。

套格

用梨木板，每块面宽七寸七分，长五寸九分八厘，与槽板里口画一，周围放宽半分为边。按现行书籍式样，每幅刻十八行格线，每行宽四分。版心亦宽四分，

即将应摆之书名、卷数、页数暨校对姓名先另行刊就，临时酌嵌版心。

摆书

俱用粗通文义明白字体之人分稿后，即将原文统计文内某字用若干个，各以类聚。另誊一单，按单取完各字，置于类盘之内。然后照稿顺其文义，配合夹条、顶木，排摆于槽板之内。随用小方签写某书、某卷、某页，贴于槽版之外边，以便查记。凡遇大字书，每人一日可摆二版，小字书只可得一版之数。间有某字即同某字，今字柜中，褫其重复，酌存其一。抑或原稿内写法与字柜中写法不同而实即一字者，俱不可不审其同异而辨其正俗之体也。至于有不归偏旁而未易检查之字，在《字典》中《补遗》、《检字》诸法皆备，习之则自得崖略。

垫板

木子虽按式制准，然经刷印之后，干湿不匀，则木性究有伸缩。故摆书完后，视其不平之处，将低字抽出，用纸摺条微垫，即能平整。

校对

每版垫平之后，即印草样一张校阅。或有移改以及错字，即时抽换，再刷清样。覆校妥，即可刷印。其换出之字，仍即贮于本柜内。

刷印

逐版校竣之后，即将前刻套格版先行刷印格纸。如某书应刷若干部，则每块豫刷格纸若干张。随将所摆之槽板查对方签，与格纸卷页相符，用以套刷，即可成书。如遇溽暑天气，刷书时木子渗墨微涨，即略为停手，将板盘风晾片刻，再为刷印。至套刷，本系常法，然用之于画图套色。套边，偶为之耳。今逐部逐篇用此，其中墨气条线均不得草率从事，亦宜令艺精

者为之。

归类

每版印完之后，即将槽板内字子尽数抽出，各按部分检置于类盘之内，然后就柜归于原屉。凡取字、归字，出入必须按类，方能清晰无讹，故虽千百万之多，亦不觉其浩繁。若稍有紊淆，则茫无涯际，取给何能应手？仍于每年岁底，逐柜检查一次，不但字数有所稽考，且无鲁鱼之谬矣。

逐日轮转办法

现在刊成字数，其中虚字及经见常用之字，多备已不啻倍蓰。然书帙种类不一，其用字各有所重，如算书之于数目字，《禹贡》之于山海、地舆字，多有一语而两三见者，苟办理不善，则虽备数百万字，亦不能资其取给，又何简捷之有焉？故摆书与归类必须间日相继，而垫版、校对、刷印等事，亦必按日轮转，不可令有一处耽延。或遇卷页浩繁之书，此种应用之字，如实有不敷，则宜兼摆别种书一部，俟归类一二次，再行续摆本书，则字数自能活泼敷用，他书亦可兼办而出矣。兹列十日办法于左，其版数之多寡，纵不必拘定程式，而轮转之法殆不可忽也。

轮转摆印课程

第一日摆书二十四版；

第二日平垫十二版；

第三日校对十二版，平垫十二版，摆书二十四版；

第四日校完发刷十二版，校对十二版，平垫十二版；

第五日校完发刷十二版，校对十二版，平垫十二版，摆书二十四版；

第六日归类二十四版，校完发刷十二版，校对十二版，平垫十二版；

第七日校完发刷十二版，校对十二版，平垫十二版，摆书二十四版；

第八日归类二十四版，校完发刷十二版，校对十二版，平垫十二版；

第九日校完发刷十二版，校对十二版，平垫十二版，摆书二十四版；

第十日归类二十四版，校完发刷十二版，校对十二版，平垫十二版。

以上十日计之，共摆书一百二十版，应归类七十二版，现在刷印十二版，现校对十二版，现平垫十二版，未平垫十二版。

共常积四十八版之数，逐日周转。

这篇文献述及的主要工作流程是：

1. 成造木子

分为两个步骤：一是造木子，即制造木活字的刻块。其制作过程包括：按尺寸把枣木截割成长方条，晾干、刨平后横截成木子，再平准木子宽度、高度等；二是木子检验，即用铜制成方漏子，逐个检验平准后的木子，以保证木子的大小符合预定标准。

2. 刻字

将需要刊刻的字用宋体写在事先画有格子的薄纸上，写好后逐字裁开，反贴在木子的上面。然后将木子放在专用刻字的木床上，用活闩闩紧，就可由刻工像镌刻雕版一样刻字了。

3. 字柜

制字柜按照康熙字典的十二干支分类法，将活字分列在十二个木柜中。每柜配备一条木凳，木凳高度与柜腿高度相等，以便站凳取字。每柜做抽屉二百个，每屉分为八格，每格放入大小字各四种，在每屉面板上写上某部某字及笔画数，便于取字。生僻字另造一个小木柜收藏，置大木柜之上，捡用十分方便。

4. 槽板

用干燥的楠木做成外口宽九寸五分、长七寸七分、高一寸六分，里口宽七寸六分、长五寸八分八厘、深五分的长方形槽板。在槽板的四角包上铜角，使其更加坚固耐用。

5. 夹条、顶木、中心木

分为制夹条、制顶木、制中心木三项内容，用于排版时在不同位置固定活字，对应版心等。

6. 类盘

用松木做成的宽一尺四寸、长八寸、深五分的托盘（类盘），盘内嵌入数十根木档板，形成数十个宽四分的空槽，取字或归字时，随手将木活字放到木档板之间，木子就不易向左右两边倾倒。

7. 套格

用梨木制成宽七寸七分、长五寸九分八厘的木板，在板内刻上比槽版里口每边大半分的边线，板心按现行书籍的式样每幅刻出十八行格线。每行宽四分，版心也宽四分。书名、卷数、页数与校对者姓名事先另处刊刻好，在印刷套格时把书名等嵌入版心一同刷印。

8. 摆书

对每叶文稿字数进行统计、分类后另抄一纸，按抄件从字柜中将字取出放入类盘，然后按文稿顺序将类盘中的活字摆放在槽板内，每排满一行放入一根夹木条，在大小字混排及有空档时，放入不同厚度的夹条及顶木等，一块槽版摆满后，在纸上写明某书某卷某页粘贴在槽板上，以便查找核对。

尽管以木活字印书早在元明时期就有，但此次聚珍版的实践还是有它的特殊意义：

其一，摆印方法是雕板和活字并用，除了正文和版心的书名、卷次、页码以及校刊人姓名用活字版摆印以外，其余整个界栏和普通版刻一样，是在一块整版上刻成的，金简称这种方法为“套格”。因此，有的书如《后山诗注》和《农桑辑要》等出现文字与上下边栏或界行相重合的现象。

其二，摆印过程中的制字、排架、拣字、拼版、打校样、拆版、还架等工序，已接近于现代铅印活版车间的一系列程序。

其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刊刻，是我国古籍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继承和总结了宋明以来各种活字印刷术的成果和经验，把我国古代活字印刷术推向了发展的高峰。尤其是《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简明扼要，图文并举，通俗易懂，第一次从理论上概括总结了木活字制作、摆印的全部工艺流程，是继宋沈括《梦溪笔谈》、元王祯《造活字印书法》之后论述活字印刷最详细的著作，成为我国印刷技术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珍贵文献之一。该书刊行后，各地纷纷仿效，推动了清代刻书事业的发展，而且已被译成德、英、日等文字，流播海外，为推动我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传播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四，《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8种，以作者朝代论，汉至唐人的著作有24种；宋人的著作最多，达90种；金至清人的著作20种。其中有80余种书是名家撰写的汉唐以来稀见的亡佚之书。清代学者从《永乐大典》这部大类书中将它们一点点辑出，重新整理成书。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准奏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发往东南五省各一份，情愿刊印者，任其翻版通行。[1] 从此，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各种各样的聚珍版书越来越多。这些派生的版本都不是聚珍版，而是刻版。各地所刻年代不一，品种也不完全一样，广雅书局刻行的品种最多，共有148种，多出10种。为便于区别，人们将外地刻本统称为“外聚珍本”。至于单独刻行的就更多了。各种稀见之书借助聚珍版的流传而广泛传播，同时对全国的书籍出版也起到了示范作用。(图51)

【1】《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日武英殿总裁董诰奏折。

图51
康熙本《水经注》



自宋代毕昇于庆历年间（1041—1048年）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历经宋、西夏、元等数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应用与发展，到了明代，我国古代的活字版技术，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各种材料都有使用，技术和工艺已齐备。到了清代，只是仿用前代的工艺方法，虽有改进，但没有较大的创新。

（二）民间木活字版印刷

由于乾隆皇帝为木活字取了“聚珍版”的雅名，又大兴木活字之役，因此，民间闻风而起，纷纷效仿。其木活字印刷在民间的广泛使用，大大超过了元明时代，地区众多，印刷内容十分广泛。仅举江苏一省数府县为例：

江宁府有乾隆四十年（1775年）张滏《金陵琐事》四卷。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溪刘氏重修宗谱》三卷。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金陵程伟元“萃文书屋”第一次木活字印本《红楼梦》一百二十回，附图二十四页木刻，前图后赞。正文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四字。后来坊刻一百二十回本都从此本出。还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金陵程伟元“萃文书屋”第二次木活字印本。图像行款与第一次印本相同。尾有“萃文书屋藏版”六字。引言称：“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

苏州府木活字印本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越钱氏宗谱》，嘉庆十六年（1811年）《禹贡节注便读》，朱陶性木活字印本《伤寒补天石》；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王氏族谱》等。

吴县有嘉庆七年《东园徐氏重辑宗谱》八卷，嘉庆十五年（1810年）吴氏“真意堂”木活字印本《有竹石斋经句说》，嘉庆十六年（1811年）璜川吴氏木活字印本《真意堂三种》，道光八年（1828年）《洞庭煦巷徐氏宗谱》等。

长洲县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甫里周氏“易安书屋”木活字印本《甫里逸诗》二卷，《佚文》一卷，清周秉鉴等辑。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下印“易安书屋”四字。甫里即内直镇，在吴县东。是书辑晚明至清初人诗编

成。姓氏后有“印一百部，五十分送四方，五十分待售，纹银二钱”一行。上卷收三十四人，下卷收四十四人。还有嘉庆十年（1805年）《假年录》八卷，版式与《甫里逸诗》同。

吴县有嘉庆十七年（1812年）“白鹿山房”木活字印本《中吴纪闻》六卷。嘉庆十八年（1813年）《淞南志》十四卷，道光七年（1827年）“清芬阁”木活字印本《一统志案说》。

昭文县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昭文张氏“爱日精庐”木活字印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版心下印“爱日精庐”四字。目录后有“嘉庆己卯仲夏海虞张氏爱日精庐印行”牌记二行。张金吾是著名藏书家，室名“爱日精庐”。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金吾从无锡得木活字十万余，又从何梦华处购得传钞“文澜阁”本，遂排印以传。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有《爱日精庐藏书志》。

常州地区的活字版字大而整洁，有道光间（1821—1850年）木活字印本《武备志》，讲求字划，编排行格精密。木字一头刻字，底面又写字。所以拣字归字比较容易。又用细土在字盘内铺平，作为垫版之用，以此印被称为“泥盘印工”。因为常州泥盘印工技术高明，所以安徽人把省立的官书局——曲水书局设立在常州龙城书院先贤祠内。木活字主要用以修谱，间及士人诗文小集，刻印实物有道光九年（1829年）“百寿堂”木活字印本《毗陵沙氏族谱》、十年（1830年）《横林黄氏宗谱》、十七年（1837年）《毗陵冯氏宗谱》、十七年（1837年）《固林巢氏宗谱》、“辈学斋”《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皇朝舆地韵编》二卷。

江阴县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木活字印本《暨阳义安蒋氏宗谱》，六十年（1795年）的《暨阳古竹王氏宗谱》，嘉庆十三年（1808年）《江阴花塘刘氏宗谱》，道光元年（1821年）的《江阴季氏宗谱》。

镇江府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木活字印本《大港赵氏族谱》、《京口严氏宗谱》、《笃素堂文集》、《澄怀园语》等。嘉庆七

年（1802年）木活字印本《润州朱方镇尤氏族谱》，九年（1804年）《京江严氏宗谱》，十三年（1808年）“松铭堂”木活字印本《京口丁氏族谱》，十六年（1811年）《京口朱方陈氏宗谱》，十八年（1813年）《润州姚氏宗谱》等。道光元年（1821年）有《润东顺江洲陶氏续谱》等等。

淮安府有道光十一年（1831年）“甘白斋”木活字印本《信今录》。

山阳县有道光十年（1830年）木活字印本《修凝斋集》。

扬州府有嘉庆十一年（1806年）扬州汪氏木活字印本《太平御览》一千卷，道光八年（1828年）鲍氏广陵木活字印本《鲍氏汇校医节四种》等。

甘泉县有康熙十五年（1676年）木活字印本《甘泉里甘氏家谱》，嘉庆十六年（1811年）木活字印本《义台张氏分迁邵伯支谱》六卷。

宿迁县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王氏“信芳阁”木活字印本《蠹言》、《痘症定论》，道光九年（1829年）《诗说考略》等。[1]

【1】江澄波编著：《江苏活字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其他地区使用活字印书的也很多，应用十分广泛，除书籍之外，木活字普遍用于印刷宗谱，因此清代十分之六七的家谱都用木字排印。

据新华社2005年3月9日报道，在安徽省皖南山区乡村发现了一套保存非常完整的清代木质活字印刷字模。全套木字模由四种不同字号的字模及各种整块雕版组成，木字模共计28 976个，是迄今为止在皖南发现的最完整的一套木质印刷字模。目前，这套字模已被安徽省源泉徽文化民俗博物馆收藏。

二、金属活字的应用

（一）内府铜活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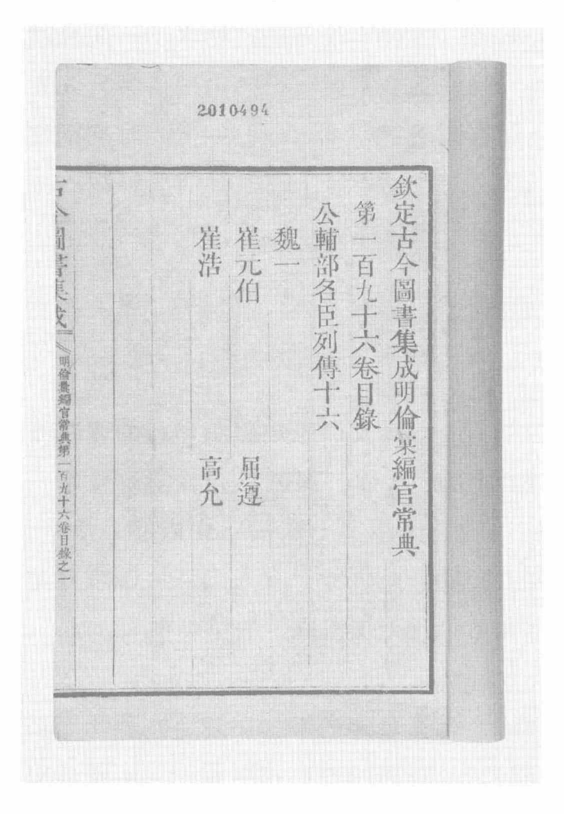
在明代的金属活字印刷取得了长足进步之后的两个世纪中，铜活字印本不断出现，而最大最著名的一部便是绝无仅有的《钦

定古今图书集成》。（图52）书中有大小两号字：大者约一厘米，用于正文；小者减半，用于作注。笔画横轻直重，字体清秀端正，为标准的正方宋字。全书版式整齐，印刷清晰，纸墨精良，装潢富丽，其卷帙之富、排印之精，史无前例。书中插图亦镌印精美。《古今图书集成》共印制60余部，有开化纸和黄纸两种。每部5 000册，目录20册，计5 020册；盛于楠木匣内，共525匣。置于宫中各处收藏，颁赐皇室贵胄和在朝显官。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赏给江浙地区进呈书500部以上者各一部；[1] 南北七阁除收贮《四库全书》外，亦各收藏此书一部。[2] 现今完整存世者已寥寥无几。（图53）

内府铜活字本还有康熙时的《律吕正义》、《御制钦历书》、《御制数理精蕴》、《御定星历考原》、《御选宝筏精华》、《金屑一撮》、《妙圆正修智觉永明寿禅师心赋选注》等可数的几种。乾隆时期未见铜活字本，一种说法是，京城钱贵，铜活字被熔为铜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010494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一百九十六卷目錄
公輔部名臣列傳十六
魏一
崔元伯　屈遵
崔浩　高允
古今圖書集成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一百九十六卷目錄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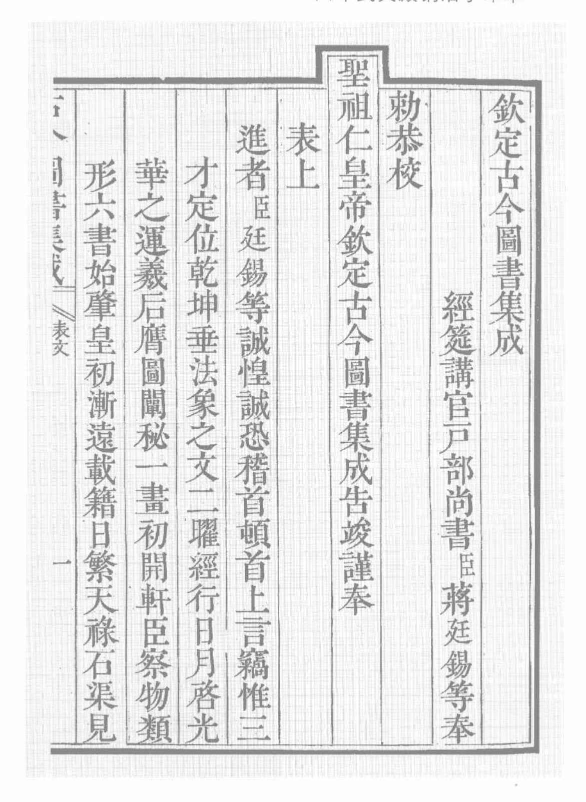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臣蔣廷錫等奉
勅恭校
聖祖仁皇帝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告竣謹奉
表上
進者臣廷錫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三
才定位乾坤垂法象之文二曜經行日月啓光
華之運羲后膺圖闡秘一畫初開軒臣察物類
形六書始肇皇初漸遠載籍日繁天祿石渠見
古今圖書集成　表文　一

图52（左）
雍正年间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

图53（右）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武英殿铜活字印本

钱了；还有学者曾看到清代档案记载，铜活字被熔铸为宫内的陈设物了。至于铜活字是刻成还是铸成，乾隆帝如此叙述："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活字为活版。"[1] 还有推测为铸造者。[2]

（二） 民间的铜活字印刷

清代民间采用铜活字印刷书籍，目前见到的清代最早的铜活字印本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常熟县吹藜阁排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四卷。该书共四册，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大单边。在书名页、目录下方、卷四尾页终末行均有"吹藜阁仝版"五字。仝版即铜版。前有钱氏七十五岁时所写自序称："于是稍简汰而授之活版，以行于世。"不过他未说明铜活字版是自己的，还是借用别人的。但是他的出版时间要比清内府所印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早四十年。这是现在所知清代最早的铜活字本。其字体为笔写体，也就是所谓"软字"或"今体"，流利悦目，印刷清晰，十分精致，体现了很高的印刷水平。此外就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侯官陈梦雷撰《松鹤山房诗集》九卷的铜活字印本。此后，还偶有铜活字印本出现。如道光时期福建林春祺印《音学五书》、《军中医方备要》，咸丰时期吴钟骏在杭州印《妙香阁诗文稿》等，多数用软体字。

三、其他活字技术的尝试

（一）磁版书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山东泰安徐志定磁版印行的张尔岐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自称"偶创磁刊，坚致胜木"。有人认为所谓"磁版"使用的是泥活字上瓷釉后烧成的瓷活字，也可能是泥活字拼版后再上瓷釉烧成磁版，有人则认为磁版并非活字版，说法虽不一，但确是对此类技术进行的革新性尝试。

（二） 泥活字印书

探索使用泥活字印刷的，有道光十二年（1832年）苏州李瑶用胶泥活字排印其所校补的《金石例四种》和温睿临《南疆绎史

【1】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祝福乾隆三十八年至嘉庆八年木活字印本。

【2】吴长元：《宸垣识略》5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龚青显：《亦园脞牍》卷一，光绪四年（1878年）诵芬堂木活字本。包世臣：《安吴四种》，觃进斋丛书本，1883年刻。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95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勘本》。此外，在江苏常州、无锡和江西宜黄也都有人从事过泥活字印刷。安徽泾县的翟金生，按照毕昇的方法花费30年时间，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制成泥活字十万多个，分大、中、小、次小和最小五号，并试印成功自己的诗集，名为《泥板试印初编》。他把这套泥活字印本书称为“泥斗板”、“澄泥板”或“泥聚珍板”。此后他又用这套泥活字排印了《仙屏书屋初集》、《修业堂集》、《水东翟氏宗谱》等书。这两位都是用胶泥制成阳文反体泥活字，进行活字排版印刷者。

（三） 活字泥版印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吕抚采用的活字泥版印书工艺，与泥活字排版印刷方法不同。在雍正末至乾隆初正气堂活字泥版印本《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演义》一书中，有两篇关于活字泥版印书工艺的文献，是该书编撰者吕抚对其自制泥活字字母、制泥版印刷此书方法及所用各种工具的详细记载。文中所述制字、制版方法，是我国古代印刷术中的又一新工艺，且鲜为人知，[1] 特转录于此：

【1】白莉蓉：《清吕抚活字泥版印书工艺》，《文献》1992年第2期。

抚因思一法，以秫米粉和水捻成团，如梅子大，入滚汤内煮令极熟。去汤，用小木棰练成薄糊，待牵丝不断，以大梳梳弹过新熟棉花和匀，乃和漂过燥泥粉，放厚板上，用斧杵千百下，宁硬无软，用两开方铜管，借他人刻就印板，或照《字汇》将要字另刊挤印，造成字母，如图书状，阴干待燥。照《字汇》分行分格排定，面写本字，以便寻印，背写行格马子，以便退还。

然后以熟桐油练漂过细泥，用斧杵千万下，宁燥毋湿。待极粘腻，屈丝不断，将油泥打成薄薄方片，用飞丹刷格板，以泥片印成细格，乃用木板刷薄油一层，以泥片切齐铺板上。先做外方线，撮字母，依书样用尺用线照格逐字印之。其字母有高者，用砖略磨平之，印以平直为主。每印一行，用刻字小刀割清一行。若有歪邪，

用字母套移端正，再用平头小竹针于空处筑实，用笔再涂桐油做圈点。待坚燥讫，用沙纸沙平刷印，价甚廉而工甚省。因与儿维垣、维城、维基，姪维藩、维封、维荣，及亲邻俞说再等，姑试为之，坚于梨枣。

《印字物件列后》一文，为刻版印刷，附于该书第二十五卷末。对所用各种工具的形状及功用以及漂泥方法，常用字储备等作了详尽的描述，并附有绘图，其文如下，题名按原书所题。

漂泥法：择细腻好泥入水内搅浑，去下沙，将泥水另取澄调清，去水，用下泥晒干，其底下一层沙亦须割去。临用，杵细，将绢筛筛过听用。

煎桐油法：煎油与漆匠煎法同，须略老些，泥须拌油燥拣，久之自溶。

两开方铜管总形：竹针形，此竹针两头平，一头大一头小，须于铜管内面可行，不大不小方妙。铜管形，铜管分形，外边中间有耳，以便开合，内边中间外面为雌雄笋（榫），犬牙相挽，拿紧方不参差，将铜管擗开，入秫米粉糊所取泥条在内，叩在印板字上，将平头方竹针揿下，即成阴文字一个，待阴干后，晒极燥听用。放字格子形，长约二尺五六寸，阔约一尺五六寸，高约寸余，与窗格一同造法。长五格，阔三格，下订薄板以放字母。其每格旁边，将格内所有字开写于上，以便寻觅。共一十六盘作一担，以便携带。每八盘为一头，上下用夹板，以便捆缚收藏，临时依次序排列听用。

其字择《字汇》中紧要常用者，其奇怪不常用者，不必入也。其体或宋，或时，或苏、王、米、蔡不拘。文章约刊三千余字，古书约刊七千余字，将铜管叩印出，已自足用矣。

其○、、、△、L阴文，每个用木刊就，大小须多

造几个听用。

其放字格，一、乙为一格，丨、亅、丶、丿为一格，二、梨为一格。人字照画数分为九格，入、八一格，儿、几一格，口、匚、干一格。其冑、冐二字，兼入肉部，晟、冕二字，兼入曰部。宀共分二格，穴一格，刀二格，力一格。勹、凵、厶一格，出字兼入山部。匕，比、毛一格，十、卜，寸一格，卩、邑共为三格。其危、卷、卺三字，兼入已部。阜二格，厂、广共分为二格。又、攵、夕一格，歹、殳一格，口九格，囗一格，土三格，士、千、工一格。大一格，女四格，子一格，小、尤、己一格。山三格，尸、户一格，巾二格。幺、玄、支、元、斗一格，艹、弓一格，弋、戈一格，曰、彡、斤一格，彳一格，行、止一格，文、攴一格。心八格，手九格，方一格，日四格，曰、白一格，月、肉共五格，欠一格，木十格，夭二格。母、氏、气、父、支一格，水共为十二格，火四格，爿、片、爪、瓜一格，十一格，犬三格，玉三格，瓦、缸一格，甘、生、用、疋、八、皮一格。田一格，广二格，皿、血一格，矛、矢、内一格。目二格，自、网一格，石二格，示二格，衣三格，立、辛一格，竹五格，丱十一格，米一格，系六格，羊、耒一格，羽一格，老、而、耳一格。臣、舌、至、舛、艮、色一格。聿、臼、一格，舟一格，虫五格，西、角、谷一格，见一格，言六格，豕、豸一格，贝二格，页二格，豆、赤、身、辰、采一格，反、走一格，辵四格，足二格，车二格，酉二格，金四格，里、青、非、面一格，门、斗二格，隹一格，鸟三格，两一格，革一格，食二格，韋、音、风一格，首、香、鬯、鬲、麦一格，骨、髟一格，马二格，鬼、鹿一格，鱼二格。麻、黄、黍、常、鼎、鼓、鼻一格，黑、黽、龟一格，鼠、齐、齿、龙一格，杂字一

格。常用中花字及之、乎、者、耶、有、在、无、夫、存，心、怀、想、念、天、大，小、上、中、下、蓋、以、焉、哉、矣等字，与数目字，重放二格。〇、丶、△、乚一格，刀、线、竹针等项放一格。

格板、托板：格板，即刊就格板，全部只用一片，多少随意。托板，乃托油泥印字板，每二页共一片，必须此面干燥极，乃可用反面，及印纸。其板须燥过性，杉木为上，白杨、杂木次之，惟松木伸缩不可用。

凡印字，先印格数行，用大漆刷将托字板上刷油令匀。粘泥倒退印完，再将泥片印格数行，放上续印，方不燥皮。字母，先在燥泥粉中印过，则不粘。

界方，印字者每人一根，须高阔至一寸六七分以上，以便靠手，使不坏字。

小竹界方、平头竹针，亦每人一根，如篾片状，须平直。以便画线。又将字数长短、阔狭画于其上，叩字使无朗密高低。其平头小竹针：两头削成大小方圆不等，所以剔字旁使清，恐字旁使实。

线：约长尺余，以细为妙，两头垂以泥饼，每印一行，两头牵线叩字，使无歪邪高低。

清字小刀，如刻字刀形，一头圆扁，小而平，以便筑字空处使坚，一头如马蹄刀形，以披切余泥，并切线。凡印字，指力须匀，乃称妙手，多印则巧生。

刮铁：所以移正行数之字。

撮字手格：以薄板为之，阔约五寸，长约六寸，柄长三寸，四旁订以小木条，木条内边上下开孔，界以篾片，以便行走撮字。

放字板：直短阔长，所以放字于前便印。

其余作法，悉见前篇，大抵一人撮，二人印，每日可得四页。率昆弟友生为之，不用梓人，虽千篇数月立就。士人得书之易，无以加于此矣。

吕抚的活字泥版印书工艺自有其特点。

首先，吕抚对制字原料的选择不是单纯地用泥，而是用具有一定粘度的秫米粉和属于纤维物质的棉花，再与经水中澄洗去沙的细细泥粉和在一起。用这种原料制成的泥字，不但具有一定的韧性，不易断裂，而且坚于梨枣，这比毕昇、翟金生等单纯用泥刻字更进了一步，更具科学性。

第二，吕抚是在别人雕刻好的现成的阳文反字印版上，制成阴文正体泥字母的。这种作法与翟金生使用胶泥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中现成的阳文反体字上"制得阴文正体泥字模"的作法是一致的。

关于这种阴文正体泥字母的作用，北京图书馆李致忠先生在对翟氏泥活字实物中的阴文正体泥活字进行分析后指出，原来这些阴文正刻的字，是制作阳文反刻字的母范。还指出："泥活字时制字方法，至少是常用字的制造方法，并非直接在泥块上镌刻阳文反字，而是先制造出阳文正刻字的母范，……。"[1] 吕抚在别人雕刻好的现成的阳文反字印版上制出的阴文正体泥字母，正是这种制作阳文反刻字的母范。

【1】白莉蓉:《清吕抚活字泥版印书工艺》,《文献》1992年第2期。

第三，制版方法是采用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相结合的方法，即先制作阴文泥活字字母，再用字母制泥版，进行整版印刷，故可称作活字泥版印书法。[2]

【2】白莉蓉:《清吕抚活字泥版印书工艺》,《文献》1992年第2期。

关于制泥版印书，在我国史籍中不见记载。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一书中"泥板与纸形"条下记载："1804年英人斯坦荷普伯爵发明泥板，其法以泥覆于排成活板之上，压成阴文，以铅等混合金属熔烧其上，即成阳文铅板，可以印刷，有木板之利，而无活板之弊。"这里所说英人斯坦荷普发明的泥版，是用于浇铸铅版之用，即现代纸型印书法之雏形。而清代吕抚所制泥版，虽不是制作铅版之用，但在制作原理及工艺上却有相通之处。而吕抚发明泥版的时间，却要比英人斯坦荷普伯爵发明泥版早近70年。因此，吕抚所创活字泥版印书方法，不但是我国古代印刷术中的又一新工艺，也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印刷技术的又

一伟大贡献。

（四）铅活字、锡活字

铅活字和锡活字在清代也都有使用。道光三十年（1850年），广东佛山镇唐姓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共计铸成扁体字、长体大字、长体小字三套，约有20多万个。其扁体字为正楷，两种长体字近似仿宋体，比较美观。唐氏铸造锡活字的方法是：用木活字制成泥字范，浇上熔锡，凝固后取下，加以修整即成。咸丰元年（1851年）曾用这批锡活字印成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共19 348页，订成120大册，印刷墨色清晰，受到社会的好评。

道光十四年（1834年），湖南人魏崧在他所著的《壹是纪始》中说："活板始于宋……今又用铜、铅为活字。"可见，早在近代铅合金活字传入中国之前，已经有人用铅做活字了。可惜早期的铅活字印本没有流传下来。

第四节 书籍版画插图的发展

版画是一种经过刻版再进行印刷的图画。清代版画延续了明朝的雕版印刷工艺。在明末清初交替之际，明末刻工艺匠大都健在，所以，顺、康时期的版画承袭明朝遗风，多有精品佳作，特别是宫廷版画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清后期逐渐步入衰落。

一、宫廷版画异军突起

植根并生长于广土众民之中的木版画，于清代初年进入宫廷，这是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这支宫廷版画流派异军突起，在清代版画领域掀起了一个高潮。

清宫木版画较多的应用于"钦定"书籍的插图，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宫规礼制的制约。从清宫木版画的题材看，大部分是因袭传统，同时根据统治的需要，也有新的拓展。

因袭传统的有农业题材的《御制耕织图》、《农书》、《授时通

考》、《授衣广训》等；手工业题材的有《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和《墨法集要》等；经解、史传故事有《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养正图解》、《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等；图谱或谱录则有《皇朝礼器图式》、《大清会典》、《西清古鉴》、《皇清职贡图》、《御纂医宗金鉴》（图54）等；园林、山水题材的有《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圆明园四十景诗》、《盘山志》(图55)、《南巡盛典》等，还有寺观、佛像等宗教题材等。综合以上各类的代表作品是《古今图书集成》，文字部分以先进的铜活字排印，木版画穿插其间。与该书的丰富内容相应，图绘的内容也极其丰富，涉及地理、谱录、工技、农艺、经济、军事、医学、卜筮、草木虫鱼、园林建筑、边裔、神怪仙佛等各个方面，共有版画8 000余幅，多精雕细刻之作。

拓展、创新的作品有康熙五十六年完成的《万寿盛典初集》，说明纪实性题材开始进入版画领域。该书共一百二十卷，厘为宸藻、圣德、典礼、恩赉、庆祝、歌颂六大部分，仿纪事本末体

图54（左）
《御纂医宗金鉴》，乾隆七年武英殿刻本。

图55（右）
《盘山志》，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

御纂醫宗金鑑卷一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
傷寒論後漢張機所著發明內經奧旨者也
並不引古經一語皆出心裁理無不該法無
不備蓋古經皆有法無方自此始有法有方
啓萬世之法程誠醫門之聖書但世遠殘闕
多編次傳寫之誤今博集諸家註釋採其精
粹正其錯譌刪其駁雜補其闕漏發其餘蘊
於以行之天下則大法微言益昭諸萬世矣

御纂醫宗金鑑 卷一 訂正傷寒論註太陽上篇 一

盤山志卷之一
圖考
周官職方氏大司徒掌土訓之地圖天下險要阨
塞具焉後世工畫者往往模寫山水及宮宇之制
非僅備觀覽而已將以辨脈絡正方位也盤山舊
有圖舉大勢於尺幅簡率已甚今茲繪事有總有
分以
行宮為標準而內外諸景暨峰巘寺觀之著名者以
次布列復為說以考證之清華水木造物閟此奧

盤山志 卷之一

式。木刻插图置于“庆祝”部分之首，即第四十一、四十二两卷，均为双面连式。所绘起自北京西郊畅春园，终于禁城西华门，前后相连，首尾呼应，共计148叶。各叶画面接续，总长度达50多米。整个画幅宏伟，构图严谨，人物密致，景物繁复，详尽描绘了臣庶迎銮嵩祝的盛大场面。与《万寿盛典初集》所具有的开创性相比，乾隆五十七年成书的《八旬万寿盛典》，则基本上是仿效之作。

清宫木版画直接为帝王歌功颂德，或为宣扬其文治武功服务，从而决定了其题材的正统性。民间坊肆最喜刊刻的戏曲、小说的版画题材未见在宫中镌刻。戏曲、小说本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但是由于清代统治者重视刊行所谓正经、正史等“有裨文教”诸书，将一些戏曲、小说视为琐语淫词、秽恶之书，饬令严禁通行并限时销毁，违者重究，由此导致了清代小说、戏曲版画的衰落。源于民间的宫廷版画，反过来又对民间的版画创作产生了强大的影响，“钦定”作品的权威性和示范效应于此可见一斑。

清宫木版画为御用工具，势必带有浓厚的庙堂气息，与民间版画在审美和意趣方面构成明显的反差。主要体现在：其一、场面宏大，构图繁复。像巨帙《万寿盛典》和《八旬万寿盛典》，虽然无法细绘人物的表情，但是通过装束和身形的变化，体现画中人物的千姿百态。其构思之缜密，写绘之精细，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二、画面规整，铺陈拘谨。如《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等书，大都据实写绘，以平稳的构图，客观地描绘皇家苑囿的建筑风貌和景致，但限于对具体景物的绘刻，缺少对意境的渲染和烘托，使画面看起来呆板、沉闷，缺乏艺术趣味和灵动之气。由于两部版画集所绘写的对象现已发生较大变化，可据其了解建筑艺术和版画艺术的沿革。《南巡盛典》因跨越数省，所绘异地山川风物、园林奇观较多，刻画既婉丽繁复，又明净挺秀，较为生动。其三、参用西洋透视画法。《万寿盛典》和《八旬万寿盛

典》，其构图布局主要采用传统的俯瞰透视法，在人物配景方面，受西洋画风的影响比较明显。《御制耕织图》也是以传统画法为主，参用西法。其四、画风细致，法度严谨。从《授衣广训》、《皇清职贡图》等作品的技法来看，人物形象逼真，身形比例准确。大部分作品中的人物姿态、造型与表情及衣折的飘举，线条的运用圆熟流畅、细腻秀劲，使画面看起来秀逸清隽，细巧疏爽。《皇朝礼器图式》等物形的摹写准确到位，纹饰的绘刻细腻工致，婉劲有力。《墨法集要》、《养正图解》等图中的配景道具，如竹林、水月、岩石等，多能布置得宜，动静有法。综观清宫木版画，虽然受到宫廷仪法的限制，有些作品一味称颂，不能自由挥洒，但在描写山川风物、寺观园林、各阶层人物形象和配景方面，可称生动活泼，绘刻俱佳，有些已成为可独立欣赏的艺术佳品。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外，它们还有着与书中的诗赋等抽象文字相结合所产生的更为表情达意的互补作用，具有学术等多方面的价值。此外，据实景摹绘的器物、人物等，也程度不同地带有纪实色彩，故此类作品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嘉道以后，国力渐趋衰弱，画家队伍逐渐解散，西洋的铅印、石印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这意味着版画渐渐失去依附，其衰亡已是大势所趋。至光绪时，带有石印版画风格的《承华事略补图》一书刻竣，清宫木版画的发展历程就此终结。

二、民间版画平稳发展

清代初期，民间对版画的刻印也十分热衷。其中，有很多是由著名画家提供画稿底本，由镌刻名匠雕版印刷，两方面优势相结合，刻印了一批保持较高水平的版画佳作。如：顺治年间刻印的优秀代表作品《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系名画家陈洪绶绘制插图，由武林名匠项南洲镌刻的；陈氏绘画的《水浒叶子》40幅，《博古叶子》48幅，也是传世极为罕见的清初版画精品。此

外，顺治二年（1645年）擅长山水、人物绘画的著名画家萧云从绘画的《离骚图》，顺治五年（1648年）萧云从绘画、旌德名匠刘荣、汤义、汤尚等人镌刻的《太平山水图画》，刊印极精，被誉为版画史上的不朽之作。康熙年间，由河南祥符人、工书法、擅画人物山水的画家刘源绘画，吴门柱笏堂刻印，吴中著名工匠朱圭镌刻的《凌烟阁功臣图》，图绘唐代开国功臣长孙无忌等24人像，末附观音、关羽等绘像，共20幅人物图像，镌刻纤丽工致，为清代人物绘刻艺术的代表作品之一。康熙三十一年，阮溪水香园刻本《古歙山川图》24幅，为靳治荆纂修《歙县县志》时，特请画家吴逸绘山水图别刻成书。连嶂叠秀，笔墨生动，堪称清初徽派版画中杰作。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由吴牕绘画、休宁刘功臣镌刻的《白岳凝烟》，绘图40幅，镌刻精雅，为清代墨范之典型作品。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丰溪吕世镛怀永堂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由程致远绘画，郑子猷镌刻，也属于精雅作品之列。

清代前期也刻印了一批小说，其中所附插图也多以人物为主。较著名的有：长洲四雪堂刻印于康熙三十八年（1684年）的《隋唐演义》，其插图由王祥宇、郑子文刻版。全书共100幅插图，皆细致入微，堪与明代高手并驱。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696年）四雪堂刻印的《封神演义》，也有不少结构奇幻、刀刻有力的插图。四雪堂还刻印过《东西汉演义》、《东西两晋志传》、《西游真铨》、《唐书志通俗演义题评》、《水浒后传》、《玉娇梨》、《平妖传》等附了插图的小说。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刻印的《西游证道奇书》，内附精致的插图17幅，写孙悟空与天兵天将斗法场面，布置奇丽，极耐人寻味。绘画与刻版技术，都体现了明代的遗风，是清初版画的珍品。

清代创作了很多小说名著，如《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等，这些小说刻印时都附有插图。道光年间王希廉评本《红楼梦》插图六十四幅，人物形象，花草禽鸟，笔画比较简洁，神态自然。

各地的出版印刷作坊，也大量刻印附有插图的历史小说，使版画印刷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明代末期胡正言创制的“饾版”、“拱花”彩色套印技术，在清代得到继承，但没有获得新发展，应用也不广泛。虽然清初有人用饾版方法复制了《十竹斋画谱》，但在刻版、着色、用墨、纸张各方面都没有达到胡氏原作的水平。直到清代末期，北京荣宝斋的木刻水印技术，才真正继承了胡正言的技术，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将我国这一印刷技术遗产发扬光大，在现代印刷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木刻水印技术仍然在焕发绚丽的光彩。

清代彩色版画印刷代表作品主要有《耕织图》和《芥子园画传》。明末作家李渔之婿沈因伯于康熙年间用饾版印刷了《芥子园画传》，由沈因伯聘请王概、王蓍、王臬三位画家在他保存的明末画家李流芳原有四十三幅画稿的基础上继续补绘完成，共计一百三十三幅。经李渔的帮助，刻印出版，并以李氏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之名，题为《芥子园画传》。全书共有四集，每集再分若干卷。由于沈因伯、王概等人对胡正言的饾版技术理论与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体会，掌握了套版彩色印刷关键性的工艺环节，很好地运用了绘、刻、印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做到有机的结合，所以使《芥子园画传》刻绘、印刷精美绝妙，达到相当高的境界。是继《十竹斋画谱》之后的又一部彩色套版印刷艺术珍品，代表了清代彩印版画的高峰，对后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此外，清初的年画印刷在很多地方发展起来，形成了一支独具风格的印刷门类。清晚期，戏曲、小说等通俗读物中虽然也多有插图，但是刻印水平低下，粗率不精，已不为世人所重视。正是此时，石印、铜版印刷相继传入中国，传统的木刻版画更迅速走向衰落。

从整体上看，我国古代的印刷技术，到明代已发展到高峰，到了清代，这种传统技术没有新的突破，只是应用领域更为广泛，技艺更为熟练。清代印刷技术有所发展，这与社会政治安

定，经济发达，文事昌盛这一客观环境有很大关系。但在这一共性条件下，官、私、坊三大刻书系统间技术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这又与清宫得天独厚的小环境的优越条件有直接关系，可说是多种因素之合力。主要因素有：

其一，帝王的垂青。清代皇帝的文化素养较高，这不仅表现在他们雅好文翰书画，敕编了大量书籍，还体现在他们更懂得利用各种印刷技艺彰显书籍的内容，使其为歌颂文治武功和升平之世服务。在统治者的倡导之下，内府将单色雕印、多色套印、铜活字和木活字摆印、版画插图等各种技艺兼收并蓄，恰到好处地加以运用，各展其长，制出大批精美之品，这与明代内府仅仅倚重单色雕印一技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清宫书籍事业得以兴盛的首要因素。

其二，优良的艺术条件。帝王重视翰墨丹青，便在宫中聚集了一批御用艺术家，使版画的创作有了先决条件。就版画的创作来说，绘、刻、印三者缺一不可。根据文献记载，清宫版画的绘制者，主要有《耕织图》的绘者焦秉贞，工人物；宋骏业，《万寿盛典初集》画稿的首任绘制主持者，山水大家王翚的弟子，清宫画坛名宿；继任主持者王原祁，画家王时敏之孙，也是王翚的弟子；《万寿盛典初集》的绘制者之一王翚，擅长临古；《万寿盛典初集》画稿的修润者冷枚，焦秉贞的弟子，历康、雍、乾三朝，擅画人物仕女、山水、鸟兽，康熙中期任内廷供奉；《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圆明园四十景诗》的绘制者沉嵛，内务府司库加一级，擅画山水，尤长于楼阁。其他如《皇朝礼器图式》的绘制者门应兆，冷鉴，刘墀，苏廷楷、章佩瑜，余鸣凤；《皇清职贡图》的绘者门庆安、徐溥、戴禹汲、孙大儒以及该创作群体中未具名的画家，都是皇帝颇为赏识的宫廷画家，彼此间还有师徒传承或父子相继关系，其相近的画风、集群的优势，共同构筑了宫廷版画的典型面貌。

其三，精良的技术背景。皇室依仗其特殊地位和权力，用“科派”和“雇募”的形式，征调到南北各地优秀的技术工匠。

名工圣手聚集宫中，成为支持清宫书籍制作的中坚力量。绘、刻、印俱出高手，各穷技巧，三妙合一，才使清宫书籍的制作达到精美绝伦的水平，成为一个时代的精品。见于记载的版画刻工，主要是著名刻工朱圭和梅裕凤。朱圭，吴人，字上如，善绘事，苦心剞劂。清初选入养心殿供事，以效力授鸿胪寺序班。他的作品均为版画史上的精品和名作，出手不凡，鬼斧神工，具有大家风范。

其四，富足的财力支持。书籍艺术的发展，不仅需要绘、刻、印三者的密切配合，而且对纸、墨、印刷物料的要求也更高，更强调艺术的审美价值。无论是宏篇巨帙、连幅版画还是套印本，都需用数书之费，非斥巨赀不能成功。宫中刻书所用的材料都是从各地专门采办的，皆为同类中之首选：如南中国的紫檀木、楠木、樟木、楸木等木材，安徽等地白玉一般的开化纸、上等徽墨和颜料，苏杭一带的绫、罗、绸、缎、织锦等各类丝织品，镌刻所用无结节的上好梨木等等，都是从全国南北各地择优征调而来，所需经费每年从国库定期拨给。以嘉庆朝前13年为例，仅武英殿修书处，每年要向广储司请领银库银5 000—10 000两，用于书籍的缮写、刊刻和装潢，以及匠役工价、翰林饮食、供事公费等项开支。[1] 由此，造成书籍材质也有高下之分，印制效果自然出现等级差别。

其五、严格的管理制度。如嘉庆十九年严定刻书期限，规定一人每日刻字百个，按照每人每日刻字数目计算功课，并责令总管监造按日查收功课，每阅旬日呈明总理王大臣稽察勤惰，别其精窳，“如有延缓粗率，随时核办”。[2] 再如，“武英殿聚珍版……此项书籍既经颁发，嘉惠艺林，必须排列精审。现在已责成原任翰林祥庆、笔贴式福昌专司此事。其原书样本尤须校对详慎，应请即于每页后幅版心下方印某人校字样，俾益专其责成，校对自更不敢草率”。[3] 此类规定还有很多，表明管理制度严格，既保证了工作的紧张和有序，也保证了印制质量。

特定的环境，优越的条件，造就出“殿本”等富于庙堂特色

【1】《武英殿修书处奏事档》，嘉庆元年至十三年。

【2】《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董诰等议覆武英殿办书章程。

【3】《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王际华、英廉、金简奏折。

的版本，极尽精雕、精写、精绘、精印、精校之能事，集中了一个时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之精华，所以单色刊本、套印本、铜活字本、聚珍本（木活字本）等都是精品，卓立于时代的前列。综观同时期一般官、私、坊间的各种版本，鲜有胜于“内府本”者，莫不与上述条件有关。

第七章　清前期书籍装帧艺术

清代是古代册装书籍发展的最后时期，图书的版式行格、字体、纸张、装订形式基本定型，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在成熟定型中追求发展变化。

第一节　图书版式

我国古代刻印书籍的版面款式在宋代已有了比较固定的式样，以后各代大同小异。清代图书只是在前人基础上，根据出版者的喜好，选用或设计不同的版式规格。变化较多的主要是版框装饰和版心装饰。版框形式有细线单边、细线双边、上下细线单边左右细线、双边、四周文武边等。版心装饰有鱼尾的形式和使用，横割线的使用，中线的使用，文字内容的选择及排列等。

官府刻本行距宽、开本大，舒展，有皇家气派，左右双栏或四周双栏，多白口，单鱼尾或双鱼尾。每半叶8至10行不等，每行20字左右，小字双行。书前多冠有“御制序”，有御笔，也有大臣代笔，手书上版；序后等处或有“体元主人”、“万几余暇”、“稽古右文”、“惟精惟一”等印记。

当时的扬州、苏州等书局也是内府的书籍承刻单位之一，刻行过著名的《全唐诗》、《全唐文》、康熙帝的《御制诗集》等。这些书籍以细楷字精刻，字迹秀丽匀净，其风格接近于武英殿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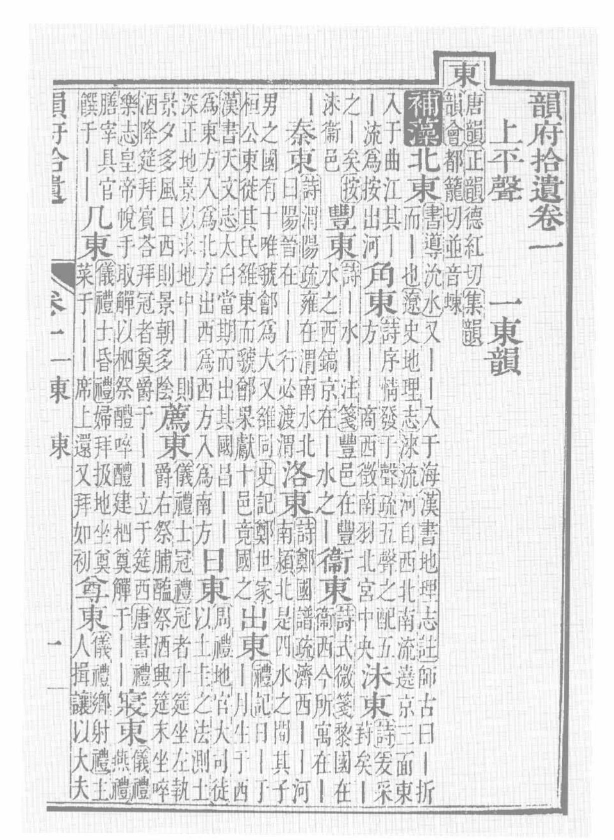


图56
《韵府拾遗》，康熙五十九年武英殿刻本

本，被誉为“康版”。（图56）

内府本多版式宽大，左右双栏。康熙朝以后，多为四周双栏，且多为白口，双鱼尾。装订形式多为丝线四眼线装，少数书籍为包背装或蝴蝶装。书衣有古色纸、洒金纸等，还有明黄、磁青等色的绸、绢、绫等丝织面料，并配有丝质包角和书签。各书还配有各种精美的盒、函、夹等护书用品。各种版本特征综合在一起，一望即知出自清内府。

乾隆年间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中，规定了字号尺寸、行格和版式：活字：大号活字厚二分八厘，宽三分，高七分。小号活字的厚度和高度与大号活字相同，宽二分。字行：每半版9行，加中缝一版19行，行格宽四分，整版宽七寸六分；行长21字，合五寸八分八厘。注释为双行排。中缝：上部居中排书名，上鱼尾，鱼尾下为章、节名，双行排，下部有横隔线，线上为页码。边框及格线：边框为文武线，行间为细线。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官府公布此类标准，可视为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普及的一个标志。对于活字版来说，统一的文字尺寸、高度、版面行长行宽、版心大小十分重要，对统一版式起了一定作用。（图57）

再如《乾隆版大藏经》，简称《乾隆藏》，经折装。每半开5行，行17字。上下双边。版框27.2×25.7厘米。以《千字文》为序，始“天”终“机”，共724字。每字一函，每函十卷，加上《目录》，共7 245册，分装725函。

私家及书肆印书则多依各自喜好，采用不同的版式。私坊刻书版框大小不尽一致，坊间刻书多小型版本，以便于销售、携

带，价格低廉。如乾隆年间松江张奕枢松桂读书堂刻本《白石道人歌曲》，版式框高14.7厘米，宽10.5厘米，黑口，上下鱼尾，左右双边，每版22行，每行19字，写刻工整，字行整齐，疏密得当，也是版刻中的精品。《续机缘集》上、下二卷，系辑录历代文人和禅师对船子遗韵及法忍寺兴衰的讴歌、记叙，并附有清刻编辑者漪云上人的诗集。其版式为左右双边，黑鱼尾，版口刻字，每版16行，每行17字。用明体镌刻，这种明体，俗称宋体，在清代广为流行，这是印刷字体发展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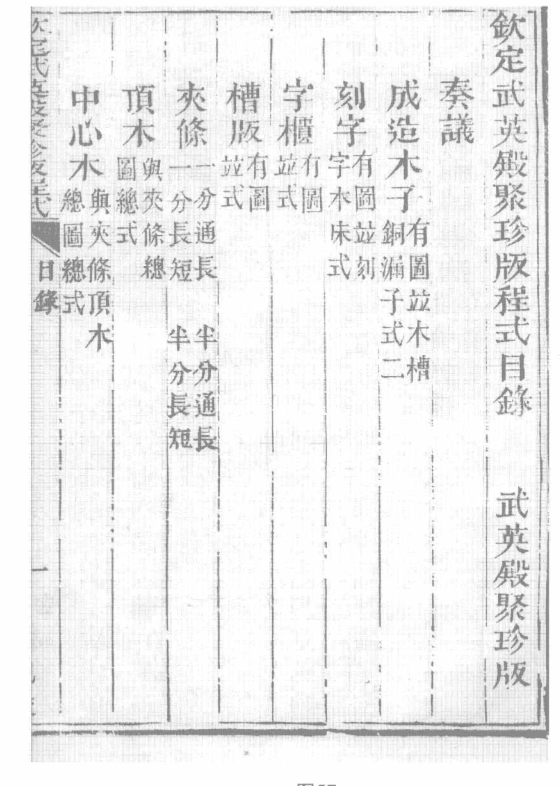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奏議
成造木子 有圖並木槽銅漏子式二
刻字 有圖並刻字木床式
字櫃 有圖並式
槽版 有圖並式
夾條 一分通長一分長短總 半分通長半分長短
頂木 與夾條總圖總式
中心木 與夾條頂木總圖總式

图57
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印本《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清刻本版式一般为左右双栏，也有四周双栏或单栏的，大部分为白口，也有少数黑口，字行排列比较整齐。清代前期由于大兴文字狱，特别是经过庄氏史案后，刻书工人不敢在书上刻记姓名，嘉道以后，逐渐有所改变。

第二节　图书字体

字体与时代风尚有关，也与帝王的个人偏好有一定关系。顺治朝刻书，上承明经厂本之余绪，故刻印风格与之相似。字体正方，横细竖重，结构呆板，人称“匠体”；字大如钱，行格宽疏。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后，因康熙帝喜好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字体，书手以圆秀、工整的楷书字体上版，工整秀丽，时称“软字”，如《佩文斋书画谱》、《御选古文渊鉴》等书即为此种字体。作为对称，将方体字称为“硬体字”，如《历朝闺雅》即以此种字体印成。还有一种仿宋体，笔力遒劲，结构秀丽。其后的乾隆帝喜好元代赵孟頫的字体，故赵体字风行一时。这种字体笔划圆润遒劲，清丽整齐。嘉庆以后，欧（阳询）体字又渐渐流行。

清初期刻本，字体仍是明代末期的风格，用字形长方、直粗横细的宋体字。康熙之后，盛行着两种字体。一种是软体字，也称写体。写刻上版多出于名家手笔，字体优美，刻印俱佳。这种版本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往往为藏书家所重视。但由于名家书写，成本较高，一般的作坊印书很少采用，多出自家刻。如清代有名的书画家郑板桥亲自手写的《板桥词抄》，由有名的刻版高手司徒文膏刻版，再现了郑板桥的书法艺术，很有欣赏价值。另一种是硬体字，也称仿宋字，这种字体与明仿宋不同的是横轻直重，撇长而尖，捺拙而肥，右折横笔粗肥，乾隆时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使用的就是宋体字。用它印刷的书，规格整齐，清秀易读，不能不认为是我国印刷字体的一大发展。这种横平竖直、横轻竖重、字体方正的宋体字，是汉字印刷的最理想字体。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天，现在的书籍正文仍使用宋体字。

南京的李光明庄刻书，用两种字体，多数为宋体方字，少数为写刻欧体楷书，如刻《益幼杂字》，字体书写秀劲。

第三节　印书用纸

造纸术发明之后，人类的探索仍在继续。探索的结果，一是不断发现新的造纸原料，二是不断改进制造工艺，纸张品种随之递增。古书纸张的生产受原材料和技术水平的制约，因而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纸张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原有的用麻、藤和檀、楮树皮造纸的技术，已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于是寻求更多新的造纸原料。竹纸的大量增产，便是适应当时社会需求的产物，因此晚明至清代，以竹纸为主。清代印书用纸品种最多，除用竹纸较为普遍外，还有开化纸、开化榜纸、各种棉纸、连史纸、粉连纸、竹连纸、玉版宣纸、棉连纸、料半纸、毛边纸、毛太纸、罗纹纸等等。

各地印书一般是采用各地自产的纸张，纸张品种与该地物产

密切相关，所以印书用纸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如产于四川的川连纸，被本省用来印行县志等出版物，别的地区很少采用。再如河南棉纸、山西棉纸，都以产地而得名，也用来刷印本地区的地方志。不过，有些好纸则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并与刻书机构的财力有直接关系，如内府采用的来自南方的开化纸等。在官、私、坊三大刻书系统中，书坊所刻各书，重在赢利，力求降低成本，采用的纸墨档次不如官、私刻本。

一、常用纸张品种

常见的纸张有：

宣纸，明代以前采用100%的青檀皮，经石灰处理、日光漂白及打浆、抄造而成。自清代起改用檀皮和稻草的混合浆料，其用料有全皮、半皮、七皮三草之不同。由于宣纸选择原料严格，胶汁使用得法，制造技术娴熟、高超，所以制成的成品纸质地柔韧、洁白平滑、细腻匀整，色泽经久不变，且不易蛀蚀，便于长期保存。我国唐宋以来的书画作品多采用宣纸，有“纸寿千年”的美称。

宣纸属皮棉纸类，品种繁多，有单宣、夹宣、二层夹、三层夹之分，规格有四尺、五尺、六尺、八尺、丈二、丈六等，共有六十多种。

罗纹纸，颜色有素白、浅黄两种，质地细薄柔软，有明显的横纹，韧性强，看上去与丝织的罗绸相似，故有罗纹纸之称。宋、元、明、清都有生产。清代罗纹纸印本，不时还能见到。如雍正年间武英殿本《律吕正义》、席启寓刻的《唐百家诗》等，都是用素白罗纹纸印的。

棉连纸，纸质白润如玉，细腻、柔软、匀密，富有绵韧性，无明显纹路。有一种质地极薄的叫“六吉棉连”，也称“汪六吉”，是棉连中的精品，较为少见。明末清初比较考究的印本，也采用棉连纸。

棉纸，南方称之为皮纸。以楮树皮等为原料做成，强度较

高。质地细柔，纤维较多，极有韧性。从纸的纵面顺撕，断裂处有参差不齐的短纤维，因而叫棉纸。明代前期印书多用棉纸。清初还有少数棉纸印书，以后就少见了。主要品种有河南棉纸，纤维细长，色泽白中带黄，厚薄很不均匀，质地较粗糙，但松软如棉，富有韧性。贵州棉纸，比河南棉纸厚，幅面也大。纸的颜色稍呈灰白，厚薄均匀，但棉性大，纤维粗，质地松软，经久耐用。用来印书则不太美观，所以未被广泛使用，清末贵州、云南有些书是采用这种纸印的。此外还有色泽灰白、稍厚、富有韧性的山西棉纸，质地薄而有韧性的浙江棉纸等，品种很多。

竹纸因为颜色略呈黄色，故又称“黄纸”，品种繁多。主要有毛边纸，亦称南毛边，颜色米黄，多产于福建。纸的正面光滑，背面粗涩，韧性较差。《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中说：“天下购善本书者，必望走隐湖毛氏（指明代藏书家毛晋）。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至今犹沿其名不绝。”由此可知，清代印书用纸很大一部分用的是毛边纸。

毛太纸，亦称南毛太纸，福建、浙江、江西都有出产。颜色浅黄，性能与毛边纸相仿，但纸幅较小，略薄。性质柔和，厚薄粗细稍有不匀，有明显的帘纹。因纸面清洁、光滑，清代中期以后用以印书的较多。毛太纸是修补旧书的必备纸张，补、镶、裱托竹纸书均很相宜，染色后也可以作为旧纸的代用品。

川连纸，产自四川。色泽略黄或白，质地与毛太纸相仿。这种纸较有韧性，但薄厚不匀，印出的书不够美观。多用于印制四川地区的出版物，如四川的一部分县志，就是用川连纸印的。

元书纸，产于浙江富阳、萧山等县，以富阳之大、小岭的出品为最佳。原料用石竹，色微黄，较毛边稍次。

连史纸，产于福建连城，故名。有大、小两种，分别称“大连史”、“小连史”。连史纸原料中有一定比例的韧皮纤维，故有人把它列入棉纸类。由于现今制造的大连史纸原料中竹子占的比例很大，所以也可列入竹纸类。这种纸洁白匀净，正面光滑，背面粗涩发滞，但没有草屑粘附。纸料细而耐久性强，与棉连相

似，唯韧性稍逊于棉连。托墨、写字易洇，清代乾隆以后用以印书者较多。

山贝纸和本槽纸，二者都是竹草纸，产于广东，山贝纸色黄，本槽纸色白，广东广雅书局“外聚珍本”丛书多用这两种纸印刷。

清代内府书籍用纸，抄本、刻本有所不同。印书采用的白纸有开化纸、开化榜纸、棉纸、连史纸等。其中开化纸，南方称之为“桃花纸”。原产于浙江省开化县，多为清代前期内府和武英殿刻印图书采用，印本美观大方。如开化纸《御选古文渊鉴》等书，纸质细腻，薄而不透，洁白绵韧，无帘纹，有白玉般润目之感，印制质量、效果最佳，用于宫内主要殿堂的陈设。嘉庆以后，产量减少，质量也较前降低，用以印书不多。江苏武进藏书家陶湘最喜爱收藏殿版开化纸印本书。还有些书籍如《昭代箫韶》等选用略呈黄色的竹纸；《御制盛京赋》汉文本为竹纸，而清文本则用连史纸，同函存放。同一种书籍也以白、黄两种纸张印制，装潢成不同规格，如白纸书配黄绫面、黄绫套；黄纸书配磁青杭细面、磁青杭细套。抄本用较厚的白纸书写，如《四库全书》使用的是榜纸。开化榜纸，从表面看与开化纸相像，但比开化纸厚，颜色也略显青色，质地稍逊于开化纸。清代嘉道年间有些书使用开化榜纸印制。还有太史连纸，较开化纸略黄，质地细匀，绵软而有韧性，清代前期曾用以排印大部头书《古今图书集成》。

二、纸张输入[1]

出版印刷业的主要原料是纸张。虽然江南造纸业在明清时期颇有发展，但是由于需求增长更快，因此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纸张从外地输入。对此，已有学者们进行很多研究，[2] 兹亦主要依据其研究进行归纳。

明清江南纸张来源地颇广，名目也颇多。[3] 但是从大宗贸易来看，明清江南纸张的主要来源地是皖南、浙东、江西与福建。

【1】此小节部分内容引自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416–417页。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89–90页。

【3】清代前中期通过浒墅关输入江南的外地纸张中，仅有名者就有光古、灰屏、黄倘、连史、元连、白鹿、毛长、对方、毛边、江连、黄表、桑皮、碑色、东坦等（见道光《浒墅关志》卷五小贩则例）。

其中特别是江西和福建，地位更为重要。

皖南的宣纸是著名的名纸，明清徽商将宣纸贩运到江南的记载颇见于史籍。此外也有皖南池州商人将纸运销江南的记载。[1]乾隆三十五年徽商在苏州修建徽郡会馆，皮纸帮是三个发起商帮之一，可见其生意不小。

江西向江南输出纸张的规模比皖南更大。明代松江名笺潭笺（谈笺），就是以江西荆川连纸加工而成的。[2] 浮梁的楮皮纸、南昌府的奉新火纸、瑞州府的新昌火纸与表心纸、高安县的青纸等，也运销江南。嘉庆元年江西旅苏各行业商人在苏州共同捐资重修江西会馆，其中就有南昌府纸货众商（捐银700两）、山塘花笺纸众商（捐银300两）、德兴县纸货众商（捐银75两）、桐城县纸商（捐银80两），在捐款的11个行业的12个商帮中，纸业商帮就占了4个，捐款总数（共计1 155两）仅次于麻货众帮（1 200两）。[3] 清代中期南京状元境的书坊20余家，“大半皆江右人”，[4]其纸张供应自然也主要来自江西。

福建在明清时期一直是江南主要的纸张供应者之一。三藩之乱时，福建纸输出受到影响，于是江南纸价骤涨，乱平后方逐渐平落，[5] 可见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初期福建纸之输入对江南纸张供应已有重大影响。康熙六年，旅苏的汀州上杭六串纸帮在苏州成立了汀州籍纸商会馆——汀州会馆。直至道光时，福建永安纸商仍活跃于福建与江南之间。[6]

由于江南工业对纸张的依赖日甚，为保证纸张供应，江南出版商还到江西、福建等纸产地去专门订购或包买纸张（即“压槽”）。明代后期江南著名出版商常熟毛氏汲古阁刻书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7] 福建著名的建阳竹纸（建阳扣），自康熙以来，被“吴中书坊每岁以值压槽，禁不外用，故闽人不得建阳扣”。[8]

三、书籍输出

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产品不仅畅销本地，而且还大量运售外地。明末毛晋所刻之书，远在数省之外的人都慕名来买，故有

【1】康熙《池州府志》，卷三物产，康熙五十年刻本。

【2】项元汴：《蕉窗九录》，民国九年上海涵芬楼《学海类编》本。

【3】《重建江西万寿宫会馆碑记》，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223页。

【4】《白下琐言》，卷二，光绪十六年刻本。

【5】《阅世编》，卷七食货六。

【6】《永安县续志》，卷九风俗志“商贾”。

【7】《书林清话》，卷七。

【8】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

“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说。[1] 到了清代，江南出版的畅销书的输出，成了一项重要的生意。因此江南的出版印刷业的外向化、商业化水平日益提高。

【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第四节 图书装订

清代的装订技术，基本上采用此期流行的线装形式（清代后期引进的西式装订法除外）。宫廷刻书兼或采用以前各代流行过的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以求书籍形式丰富多彩。

线装是用线将书页连同前后书皮装订在一起的装订形式。清代线装书的封皮，多用较厚的纸张，或几张纸裱贴在一起，或在纸上再裱以纺织品，有的还用细绢包角。订线有丝线或棉线，多为双线，订孔有四眼或六眼，书籍开本较大时，还要增加订孔。

为阅读方便，线装书一般不宜太厚。因此，较厚的书往往要分卷订为多册。把一部书的多册包装在一起，往往采用函套、书盒或夹板几种形式。函套是最常用的一种形式，它由厚纸板再裱上纺织品，将一部书包装在一起，并露出书的上下切口。书盒多为木板制成，将一部书装在盒内保存。夹板包装法则是上下为与书籍尺寸相同的木板，用丝带联连，将一部书夹在中间。

私坊刻书版框大小不尽一致，坊间刻书多小型版本，以便于销售、携带，价格低廉，书籍装帧以齐下栏为规矩。在装订工艺方面的发展，主要是装潢考究、工艺精细、牢固耐用。殿版书籍版框大小要求严格，装订整齐。装帧设计庄重、典雅，初期多以绸、绫等丝制品做书衣、函套。为保护书籍不受损坏，当时还以“毛装”的形式保存，即将印好的书页叠齐，下纸捻后不加裁切。用此法装订书籍，一是为表示书系新印殿本，二是为日后若有污损可再行切裁。

第五节　图书装潢

“装帧”是一个外来词语，中国古书中所使用的对等性词语则有“装订”和“装潢”等。从文献中对它们的使用来看，“装订”侧重于技术的方面，而“装潢”偏重于指书籍艺术性的方面。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对古籍装订时，必须同时考虑美观等艺术性的要求；而书籍的艺术性则主要通过装订体现出来。在古籍版本的鉴别和考证中，历来有这样一种倾向：古籍的装帧和装潢一向被视为“无关要义”的方面，它使得装帧这一与书俱来的、比字体墨色等带有更多时代痕迹的版本参考依据的作用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

清代内府书籍的装帧和装潢设计，由于帝王的雅好和直接参与，使用了最好的材料，设计主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一般官、私、坊间书籍浅淡简朴的装帧装潢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归纳起来，有以下特点：

（一）象征皇权的装潢色彩[1]

【1】此小节部分内容引自《古籍的装潢与版本》，作者不详。

在封建时代，帝王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历代的宫廷礼制都把维护帝王的至尊地位作为维护专制政体的头等大事。凡与帝王有关的衣、食、住、行等一切御用之物，无不体现出至高无上的尊严与神圣，以满足皇帝唯我独尊的心理。

色彩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往往为多种艺术形式所通用。内府书籍的书衣、书函等处所使用的色彩，不仅不同于漆器、陶瓷等器物，也与其他机构制作的书籍迥异。内府书籍所使用的色彩，主要有以下三种：黄色（明黄、浅黄、鹅黄等）、红色、深蓝色（又称瓷青、石青等）。以上三色的彩色度都很高，属于强纯度色。它们附着在书面上，鲜明、浓重、易见度高，有很强的装饰意味。而且每种色彩都与特定的书籍内容相连。

【2】《武英殿修书处档》，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从清代的档案[2]中可以了解到，内府书籍不仅内容是“钦定”的，连刷印部数、装潢材料、色彩等也都是“钦定”的。最

为典型的是一些呈文中“奉旨”用“黄绫面”的记载。饰以黄色的书籍，主要是记载本朝皇帝言行动止等内容的专书如《圣训》、《实录》、《本纪》、《玉牒》等，也用于“钦定”的儒家经解、则例、律令、方略、时宪书等等。一般而言，每种色彩只适用于一定的范围，表达相应的意义。但是，一种黄色能用于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如此宽泛，说明是色彩以外的另一种东西，即象征意义在起作用，是一种抽象的、无形的东西将其联系在一起。

古代的书面色彩象征什么，文献中并无直接记载，然而使用中又是那样有规律，说明不是从清代才开始的。某种色彩能作为象征，一定是实行既久，与传统密切相连，人们对它的意义都已有所了解；否则，不明其意，就达不到象征的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古人的用意，根据封建制度代代相承的特点，这里简略回顾一下黄、红二色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

中国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可谓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曾经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色彩的使用也未能例外，主要用它作为标识符号，表明社会阶层或等级身份。其实，就色彩本身而言，开始并不含什么尊卑意义。比如黄色，《易·坤卦·文言》说“天玄而地黄”，其最初的意义是指自然界中的土地之色。《论衡·验符》：“黄为土色，位在中央。”古以五色配五行五方，土居中，故以黄为中央之正色。对于正色，孔颖达疏引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黄是也。”正色、间色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对色彩进行人为的等级划分的开始。从此，自然界的各种色彩被赋予了贵贱、尊卑等不同意义。正色的等级高于间色，皇帝的建筑、衣冠、装帧、车辆等都必须涂正色。

然而，五种正色中，黄色又与其他色彩有所不同。古有“黄旗紫盖”的迷信说法，指天空中出现的一种云气——“天子气”，以为帝王应运而生的气象或征兆。还传说黄帝服黄衣、戴黄冕，后汉初期道教推崇黄老，故冠服尚黄；并传说“黄衣当王”，张

角等始服黄衣、戴黄巾。由于黄色与帝王联系渐多，于是有些帝王用物的名称转为天子之敬称，如南朝刘宋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云："五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汉制，唯皇帝得用黄屋，因特指帝王车。可见，黄色作为帝王的象征并非从清代才开始。自隋代起，"天子服专尚黄"，唐因隋制，高祖武德初，"遂禁士庶不得服"。并又由服饰推展到其他用物上，"臣下一切不得用黄"。自此，明黄色成为帝王的专用色彩。清代皇帝的朝服、朝带、龙袍、雨衣等均为明黄色，皇宫屋瓦的主色也是用黄色，其他御用器物用黄装饰的例子不胜枚举。

由于帝王的垄断，明黄色从普通的色彩渐渐成为帝王的代表色而被尊重，由一种习俗成为不可逾越的礼制。这种礼制实行既久，其象征意义便不言而喻了。

红色，古指浅红色，后泛指红色。本文所说的红色，古代称"赤"或"正红"。从古至今，无论朝野，对此色喜庆、欢悦的意义使用相同。如用它表示胜利、成功、幸运、幸福等。在婚嫁和传统节日等场合，多用此色装饰点缀以助兴。而红色作为正色之一，含有尊贵的意义。很多情况下，红色用于古代贵族官僚阶层。如杜甫的著名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因古代王侯贵族的住宅大门漆成红色以示尊贵，故以"朱门"指代贵族、豪富的邸第。在官员服制中，三品以上紫色，五品以上朱色，六品以下绿色。红紫为上，青绿居中，檀褐属下级。唐代"每朝会，朱紫满廷，而少衣绿者"，以"朱紫"转喻高官。此外，帝王有时用红色，清帝在"朝日"时穿用红色朝服。

因此，记载帝王言行的《圣训》、《实录》等书采用黄色和红色，主要是象征帝王至高无上和神功圣德，而一些法律、时宪等书饰以黄色，则显示着"钦定"之书的权威和尊严。

（二）象征帝后的龙凤纹饰

除了以色彩区别尊卑外，还在书籍装潢中选用特定的图案。由于中国古代有龙为君象的观念，汉代以后，龙成为天子的化身，成为皇帝权威的象征。中国文化中另一种具有影响的神话动

物——凤，作为鸟中之王也成为帝后的象征。因此，内府许多图书和各种御用器物一样，常常饰有龙凤图形。如绸缎书衣上织绣有水波藏龙、双龙戏珠等图案，书籍封面、边框等处绘有龙图，夹板、函匣上雕有龙纹。各种团龙舞凤随处可见，多彩多姿。

（三）装潢材质的等级差别

内府刻书有几种不同的用途，在刷印前有呈览本、缮录副本和付刻样本；刷印后则有陈设本、赏赐本和通行本之分，其刷印纸墨、装潢的要求亦各不相同，有明显的等级差异。一般都由武英殿奏请后遵旨承做。例如：

呈览本：凡属皇帝钦定、御纂的书籍，在刊刻、刷印之初，均先以上等材料精印一部，多以“杉木板、黄绫套、黄绫面”[1]装潢成帙呈览，称为呈览本、御览本或进呈样本，亦称黄册。

陈设本：殿版书印成后，例以若干部（一般为2部）送往盛京恭贮，并供紫禁城和各园苑、离宫陈设之用，通常为10至30部左右。陈设本的装潢一般与呈览本相同。如嘉庆四年（1799年）奉旨将《蒙古源流》“刷印装潢杉木板、黄绫套、黄绫面、页连四纸书10部”,[2] 分别陈设于盛京、万寿山、御书房、玉泉山、圆明园、香山、长春园、热河和绮春园等10处。[3]

赏赐本：赏赐对象为个人。一书刊成后，参与纂修此书的官员、朝廷要员、宗室王公等都有可能得到赐予，或赐给臣下表示恩宠。每种书赏赐数量在20至200部不等，如《钦定兰州纪略》和《明史本纪》赏赐数量为50部，《钦定盛京通志》和《钦定满洲源流考》为20部。[4]

通行本：以有偿的方式向社会发行，数量在300部左右。

不同用途的版本，在装潢上均有所区别：呈览本、陈设本为上，赏用本次之，通行本为下。如《满洲源流考》一书，奉旨“刷印装潢陈设杉木板、黄绫套、黄绫面、页连四纸书二十部，赏用纸合背黄绢套、黄笺纸面、页竹纸书二十部”；《钦定盛京通志》一书，陈设本用“杉木板、石青杭细套、石青杭细面、页连四纸”，赏用本则用“纸合背蓝布套、古色纸面、页竹纸”。[5]

【1】《武英殿修书处档·嘉庆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武英殿修书处档·嘉庆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武英殿修书处档·嘉庆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4】《武英殿修书处档·嘉庆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5】《武英殿修书处档·嘉庆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虽然颜色相同，但材料质地有高下之分。

（四）华贵富丽的装潢材料

书衣、书函等一般采用绫、锦、绢、缎等丝织品材料，[1] 属织物中最为贵重者，与纸质材料相比，显得华丽、厚实、凝重、丰满。函套上敷用的锦缎还织有团龙、云凤、寿字等图案，多至上百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书盒所使用的材料有金、银、铜、木、石、洒金笺纸等，应有尽有。仅制匣的木料就有紫檀、楠木、红木、黄杨、樟木、杉木等多种，[2] 均为上选硬质木材。其中尤以紫檀生长缓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木质坚硬，纹理纤细浮动，变化无穷，色调深沉、稳重、大方，且皆系从南洋采购而来，至为名贵。制成品全依原木天然本色，既坚固，又古雅美观，装潢材质本身的美感就已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

[1] 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内府本实物归纳。

[2] 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特藏归纳。

（五）丰富多彩的装帧形式

清内府书籍装帧以当时流行的线装形制为主，间或也有依照汉唐和宋元时期的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和蝴蝶装等多种形式的制作，以求形式的多样化。它们反映出数千年来中国书籍形制发展的历次重大变化，显现出各自革故鼎新的特点，令人追想神驰。其中，卷轴装、经折装和梵夹装多用于佛教写经，包背装、蝴蝶装和线装多用于经、史、子、集书籍。摆放在各宫殿条案、桌、几等处的书籍小册，有很多是置于其他材质的盘、盒之中，已成为赏玩的一类。

内府书籍的版式，根据皇帝不同场合的阅读需求和每书卷帙情况，设计成大、中、小多种规格。以大本、中本居多，大部头书籍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十三经注疏》和《二十四史》等，约长1尺，宽0.6尺左右，相当于今之大16开本，还有更为长大者。此外，还有袖珍小册，即“巾箱本”的制作。乾隆年间，以制版所剩小木块仿古人巾箱之意刻制的《古香斋袖珍本十种》，其大小约为普通书册的四分之一。还有的卷轴、经折和线装等微型小册，只有寸半左右，并配有合适的函套，小巧玲珑，易于携带。皇帝携之外出，随时披览，极为便适。

（六）典雅大方的装潢设计

无论是线装，还是包背装、蝴蝶装和经折装，均为长方形状，左上方沿书口垂直贴一款长形书签。如是线装则右侧钉有比例适宜、均衡对称的双行丝线。

在配色方面，像石青色杭绸书衣，颜色较暗，配以较明亮的米色绢签、包角和丝线。通过明暗对比，使暗沉滞重的色彩得到缓和，显得庄重而肃穆，古朴典雅之至。这一含蓄隽永、书卷气极浓的“经典”装式既缘于古代的传统，又有所升华。有的书衣、书签、丝线全用黄色，看上去，似觉眩目，调剂的办法是在书角处用蓝色包角，只加进少许深色调，就显得舒畅而明快。总之，书面色彩的处理极为简洁、洗炼。书面使用一种主色，带有强调、支配意味，使设计主旨突出，而通过与书签、书角、丝线等处的补助色的对比变化和搭配组合，使书籍外观和谐悦目。

对书页版面的处理，一般留有十分宽大的余地：版框之内，行格疏朗，字距相宜；版框外，继承了中国古籍历来天大于地的传统，还绰有余裕。展卷阅读时，会感受到一种从容舒展的气度，即便是书眉处写有批语和注解文字的书籍，在视觉上也毫无窘促的感觉。总之，各种书册整体设计简洁，格调高雅，并显出潇洒大方的气派。

（七）精致考究的制作工艺

以书册的制作来说，书口整齐，栏线划一，裁切、锥眼、订线、包角和书签的粘贴均达到很高的工艺要求，有的书签四周还镶以别色绫锦，非常精致。

各种护书用品如书函、书盒、书匣、夹板等制作非常精细，如在函套开合的左右两翼挖出如意、卍字等图形，关闭函套时，纹形对合，严丝合缝。木匣的制法，不用铁钉，只用卯榫交插，再以鳔胶粘牢，既坚牢又美观。盛装佛经的书盒，有金、银、铜、木等不同的材质，分别施以錾、雕、垒丝、镶嵌、镀金、雕漆、填漆、描金等工艺和装饰手法，构成精细纤巧和豪华富丽的装饰效果。既可用以存贮图书，又是高斋清赏的艺术佳品，令人

叹为观止。

（八）雍容舒缓的装潢节奏

以上特点，有的书籍仅具其一，有的兼具二三，而将上述各项特点集于一身的，也不乏其例，比如，清乾隆三十五年内府泥金藏文精写本《甘珠尔》即为其中的极品。此巨帙系专为庆祝乾隆帝的生母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而特制，共108夹（函），每夹200—450余叶不等，为梵夹装式。经叶以磁青纸双面书写，栏线外有泥金八宝缠莲纹饰，细如毫发，极为精致。经叶排列以藏文字母为序，按次叠放后，四周的泥金八宝图案立现，构思颇具匠心。

在经叶之外，有内、外护经板各一对，中裹黄缎金龙夹袱和黄布单袱各一块。外护经板表面绘有泥金纹饰，里面凹进，有彩绘佛像，冠以錾金欢门和八宝等纹样，上嵌珍珠、珊瑚珠、蓝绿松石共130余颗，再覆盖红、蓝、黄、绿、白五色缂丝夹帘各一。外护经板之外，用宽3.5厘米、长约25米的五色扁形丝带逐圈捆缚严整，最后配挂白哈达一条。这是在梵夹装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古代佛经最后的装帧形式。层层开解时，自会从舒缓、从容的节奏中，生发出肃穆、庄严之感。既显示了宗教典籍的尊贵，也充分显示出皇家书籍装潢的雍容大方的气派。

《甘珠尔》集皇家材质之精华，仅珠宝就用了14 000余颗。用料之考究，写绘之精细，装潢之华美，均无与伦比。

综上，我们已经看到内府书籍多种装帧和装潢风格的交织与融合：庄重而不古板，雍容而不失典雅，鲜明而又含蓄，繁富而又简洁，华丽与古朴共存……书籍装帧这一艺术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上述诸项，反映了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在中国古书中，有关书籍装帧艺术的理论虽然尚未形成，但是古典装帧艺术的发展已臻于成熟，其完整的设计理念和丰富内容已贯穿在实践当中。由于清代帝王的重视，加上皇室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力量，匠人们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段，全面吸收、

继承了明以前书籍装帧的优良传统，又经过独具匠心的艺术创新和提高，熔多种风格为一炉，从而形成了鲜明的装帧装潢风格，也将中国古典装帧艺术推向了它璀璨的巅峰。这种艺术风格已成为“殿本”和“内府抄本”等版本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人们所称道的“殿本”风格的一部分。这种风格是如此突出、鲜明，不仅与私、坊刻本迥异，且超卓于一般官刻本之上。装帧艺术与书籍的内容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统一在一个整体之中，以至于不看书籍内容，仅从装潢就可以断定是否为内府本。古人已经有意识地运用这一艺术形式传达出所要表达的观念和意图，所以，在此类版本中，装帧和装潢的确可以作为重要的鉴别依据。

第八章　清前期图书出版管理与流通

第一节　官府图书发行渠道与方式

清康、雍、乾三朝是皇室书籍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三位励精图治的皇帝文化修养深厚，博学多才，对“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也都有共识，因而在政局稳定之后，即接续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大兴文教事业。除前述大大加强和发展以武英殿修书处为中心的中央撰修图书活动外，还加强了对书籍流通的调控，对全国私坊书籍的出版也采取了一定的干预政策。档案文献中保存了部分清帝就书籍编纂、写刻、刷印及发行范围等事宜发布的史料。

一、图书的赏赐与颁行

自康熙朝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清代中央官刻图书是以武英殿修书处为主，颁发全国。修书处虽隶属于内务府，但图书的编刊、发行、流通渠道都是由皇上决定的。采取自上而下直接控制的流通方式。这些规定大都散见于皇帝谕旨、大臣奏折和《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则例》、《学政全书》等文献，如：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纂朱子全书》成书，颁发两京及直省刊版通行。[1]

【1】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颁发书籍》，文海出版社印行。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御纂周易折中》成书，颁发中外，听其重刻，以广诵习。[1]

雍正元年（1723年）奏准，圣祖仁皇帝《钦定孝经解义》一书，颁发直省，刊版通行。[2]

雍正八年（1730年）奏准，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书》、《诗》、《春秋》三经传说汇纂（指武英殿刻《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书），每省每书各发二部：一部令其重刊流布，一部以备校对。[3]

乾隆元年（1736年），奉上谕：从来经学盛行则人才多，人才多则俗化茂。稽诸史册，成效昭然。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尚书》、《诗》、《春秋》三经汇纂诸书，直省虽已镌版，但士子赴司具呈俟批，已不免守候；又一人所请止于一部，势难鸠工刷印，是以得书者寥寥。着直省抚藩招募坊贾，自备纸墨刷印，通行售卖，严禁胥吏阻抑需索，但使坊贾皆乐于刷印，则士子自易于购买，庶几家传户诵，足以大广厥传。[4]

又议准，各省督抚于省会书院，并有尊经阁之府州县，应将《十三经》、《二十一史》诸书购买颁发，交与各该学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习讲贯。启动用存公银两，报部查核。[5]

从以上几则谕旨不难看出，清王朝对于图书发行流通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他们深知“稽诸史册”的成效和对培养人才、发展学术、裨益教化的重要性，更懂得“稽古右文”、“昌明性理”对于钳制人民思想、巩固统治的关系。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上谕，要求各省把这些图书重刊流布，以广诵习，甚至不惜动用存公银两。

清代内府刻书都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这种目的往往是通过施教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为了扩大其影响，很注重图书的发行。除宫中陈设、存盘、赏赐和留存外，还有若干通行本颁发或售卖到全国各地。乾隆九年奏准，于武英殿修书处下设立通行书籍售卖处，专管通行书籍的发售，并设专人管理。[6] 殿版书的发行工作也在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控制之下，每一种书成，都要就印数和

【1】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颁发书籍》，文海出版社印行。

【2】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颁发书籍》，文海出版社印行。

【3】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颁发书籍》，文海出版社印行。

【4】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颁发书籍》，文海出版社印行。

【5】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颁发书籍》，文海出版社印行。

【6】陈垣《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载：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奏称：“武英殿通行书籍自乾隆九年奏准售卖。”

发行范围请旨。殿版书除用于宫内外重要殿堂陈设，恭送两部到盛京皇宫贮藏外，其外发和销售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颁发

颁发的品种和范围：

1. 中央各部、监、院及地方各级政府。主要将有关上谕和《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及各部则例等有关政书作为施政机关的参考和依据。雍正年间编刊的《上谕八旗》，将皇帝“教训旗人，并因事所降谕旨”汇编成册，编成后“造刻满汉文册，通行八旗发给”，作为办理旗务的指导。

2. 各级官员。主要将《御制人臣儆心录》、《钦定训饬州县条规》等作为廉政修身的必读之书。

3. 各府、州、县学、书院等教育机构。主要将一些“钦定”的经史读本和“御纂”的经义、史评之类的书籍，作为教育资料。乾隆元年国子监祭酒杨名时“请颁圣祖《御制周易折中》、《御纂性理精义》、钦定《尚书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各书十六部，储于太学，刊示诸生。得旨：‘杨名时所请书籍，着将武英殿所有者，各种发二十部，余照所请行。’”[1] 乾隆十六年（1751年）颁发给江南钟山、紫阳、敷文三大书院《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各一部。[2] 还有为了厘正文体，教育乡试士子，精选一些乡会试卷，刊刻颁行。如“康熙九年议覆，查乡会墨卷，每一科出，坊贾预先召集多人，造成浮泛不堪文字，假称新科墨卷房行，相沿成习，文体日坏。嗣后每年乡会试卷，礼部选其文字中程者，刊刻成帙，颁行天下，一应坊间私刻应严行禁止”。[3]

4. 各省著名寺庙。主要将译刻的佛教经籍供奉其中，供僧侣们研习之用。如乾隆四年刊印的汉文《大藏经》一百余部，奉旨颁发给各地的主要寺庙供奉。乾隆三十六年译刻的藏文、蒙文《楞严经》，奉旨颁发给京师、热河、盛京、新疆等地63所寺庙供奉。其中，热河的普宁寺、安远庙、布达拉庙、普仁寺、普乐寺、普善寺各颁一至二部。[4]

【1】《清高宗实录》，卷十五。

【2】《大清会典事例》。

【3】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厘正文体》，文海出版社印行。

【4】《武英殿修书处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二） 赏赐

赏赐对象为个人。每种书刊刻发印，通常在印数中包括颁赏本，被赏赐人员的名单都是经过奏批的。赏赐的对象包括宗室王公贵族，京师内外的文武大臣，参加纂修书籍的翰林，以及地方著名的学者、侍僧、外国使臣等，各书的赏赐数量不同，每种书在20至200部不等，如《钦定兰州纪略》和《明史本纪》赏赐数量为50部，《钦定盛京通志》和《钦定满洲源流考》为20部。《御选唐宋文醇》书成后，赏赐的官员有：张廷玉、徐本、孔广启、赵国麟、张照、许希孔、梁诗正、蒋溥、陈德华、史贻直、韩光基、陈世倌、杨嗣璟、王钧、吕耀增、张廷璐、吴嘉骐、凌如焕、王承尧、王安国、张廷瑑、陈守创、任兰枝、汪由敦、钱陈群、彭启丰、金德瑛、秦蕙田、庄有恭、任启运、刘藻、黄孙懋、杨超增、徐士林、朱定元、孙嘉淦、许荣、王恕、方显、王谟。[1]

乾隆三十九年上谕，进献藏书较多的江南藏书家，如进书为数至六七百种的"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着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进书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罃，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着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2]

（三）翻刻、刷印与售卖

翻刻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将殿版书颁发到省一级，即印行300部左右的通行本，以有偿的方式向社会发行，由省级机关组织重刻，再由地方官府印行或招募坊贾、个人纳款就版印刷；一是由书坊自行刊刻印刷。

翻刻最早始于顺治初年，康熙至光绪朝均有此类规定。如乾隆四年，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请将御刻经史诸书颁发各省，着各抚藩留心办理，将书版重加修整，俾士民等易于刷印，有愿翻印者听其自便，毋庸禁止。[3] 此类奏请及规定尚有很多，说明内府

【1】《军机处录副奏折》文教类，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

【3】《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董诰等议覆武英殿办书章程。

有意扩大殿版书的影响。有的利用武英殿等处存贮的原刻书版刷印流通。如汉文《大藏经》刊颁之后，仍不敷用，为此，内蒙、四川、江南等地寺庙的住持出资请用原版刷印，自乾隆中期起直至光绪年间，时有所请。再如《全唐诗》、《钦定全唐文》二书都是扬州诗局刊刷进呈内府，书版仍存诗局，官绅之士有愿自备纸墨刷印者，也准其自便。但私人书商、绅士等自愿出资翻刻内府颁发的书籍，虽早已允许，但因工费过大，实际愿意承刻者不多。

售卖流通始于乾隆初年，[1] 至乾隆九年奏准，于武英殿修书处下设立通行书籍售卖处，并设专人管理。[2] 售卖书的来源有二个：一是武英殿专为发卖刷印的通行本，印行300部左右，多者也有千余部的。乾隆三年（1738年），奏准于学术有益的一些书籍，如《御纂周易折中》、《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等等“外间士子，无不群思观览，照从前颁发《御选语录》等书之例，将武英殿各种书籍，交于崇文门监督存贮书局，准令士子购览，以广见闻”。[3]

二是武英殿存贮的赏颁或备用的余书与残书。“乾隆七年奏准，武英殿所贮书籍，凡各衙门官员欲买者，由本衙门给咨，赍银到日，即行给发。其非现任之员及军民人等愿买者，具呈翰林院给咨，赍银到日，一体给发。”[4]

清内府通过上述各种方式，将中央政府编刊的经、史、子、集书籍尽可能发行到全国各地，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从各种奏折可见，流通最广的是四书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音韵字书、通鉴纲目、“九通”、会典、则例、朱批谕旨、性理精义、列朝御制诗文集及其他诗文总集、别集，以及丛书、类书等。各阶层人士通过以上各种渠道接触到无缘得见的殿版书，便可以达到统治者所期望的“人人诵习，以广教泽”的目的。

不同的读者对象，灌输不同内容的书籍，如《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及各部《则例》等书，主要发至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作为施政参考；《御制人臣儆心录》、《钦定训饬州县

[1]《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王际华、英廉、金简奏折。

[2]《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3] 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颁发书籍》，文海出版社印行。

[4] 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颁发书籍》，文海出版社印行。

条规》等廉政修身的必读书，则主要针对各级地方官员；“钦定”的十三经、二十四史，以及经解、史评等普及读物，通常颁至各省府、州、县学与书院等教育机构。经过严格筛选而成的《四库全书》，除供御览外，还储于人文荟萃的江南三阁，以便士子就近观览。“钦颁”的书籍中，传统的经史著作占了绝大多数，尤以“正经”、“正史”流传最广，几乎传遍全国。

清帝认为，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而要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正经正史，严绝非圣之道。于是，编纂了大量以“资治”为目的的“钦定”书籍，而这一目的最终要通过教化民众来实现，所以重视图书的发行。每种书籍编印完成后，除宫中陈设、赏赐和留存外，还制印若干通行本，通过颁发或售卖等方式，鼓励各省坊贾或个人翻印。

被列为“御纂七经”的清康熙五十四年武英殿刻本《御纂周易折中》、雍正五年武英殿刻本《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乾隆十九年武英殿刻本《钦定三礼义疏》等书，先后多次被翻刻或翻印，产生了浙江书局刻本、江西书局刻本、户部刻本、崇文书局刻本、江南书局刻本、洪文书局石印本等众多版本。

一大批官修书籍的编纂、刊刻发行和广泛传播，对当时的文化起了导向作用。

对外方面，18世纪的清代，由康熙时期的对外开放过渡到雍正、乾隆时期的闭关自守，官方的书籍交流范围狭窄，数量不多，只有极少量书籍传至域外，流通的范围包括亚洲和欧洲地区。亚洲地区多是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泰国等周边国家。传播渠道多是以赏赐的名义，赏给那些出使清朝的外国使节，赏赐的图书也多为中国的传统经史类书和字书等。如雍正三年，赏安南国王《古文渊鉴》、《佩文韵府》共10部。[1]

而在欧洲地区，由传教士携回则是又一种传播方式。康熙帝的开放政策和对传教士的重用优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而法国耶稣会士的来华，不但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了西方。其中书籍是主要的载体，中

【1】吴兆清：《清内府活计档》，《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1期。

国官方书籍的西传，数量很少，见于记载的不多，主要集中在康熙朝。1693年康熙皇帝任命法国传教士白晋为“钦差”赴欧招募传教士时，随身带去康熙赠给路易十四的一批珍贵礼物，另有49册300余卷装潢精致的书籍，其中包括《广舆记》、《资治通鉴纲目》、《书经》、《性理大全》、《春秋》、《大清律》、《礼记》、《易经》、《本草纲目》、《算法统宗》、《五经七书》、《诗经》等等。过去学者一直认为这些著作是康熙本人送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但是据莫尼克·科恩研究揭示，它们并非康熙帝直接赠送的礼品，而是白晋自己搜集的，包装看起来像中国皇帝送的礼物，这批书目前仍然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康熙帝本人确也向路易十四赠送过中文书籍，但却是在1700年，康熙帝派洪若翰返回欧洲的时候赠送的，如《资治通鉴纲目》、《御选古文渊鉴》等书。[1] 数量虽然不多，但也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不可忽视的内容。

【1】莫尼克·科恩：《历史的一点：1697年白晋赠给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中文书》，《中国文化》第31卷第4期。

二、官府对私坊图书刊行的干预

清统治者在大力推行官修书籍的同时，也对私坊图书流通施加种种干预，这与少数民族统治有较大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了巩固统治，制造文字狱，比较典型的是康熙二年的浙江庄氏《明史辑略》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年间的吕留良诗文集案，等等。

除了文字狱外，又颁布了种种书坊禁律：

早在顺治九年就曾题准：“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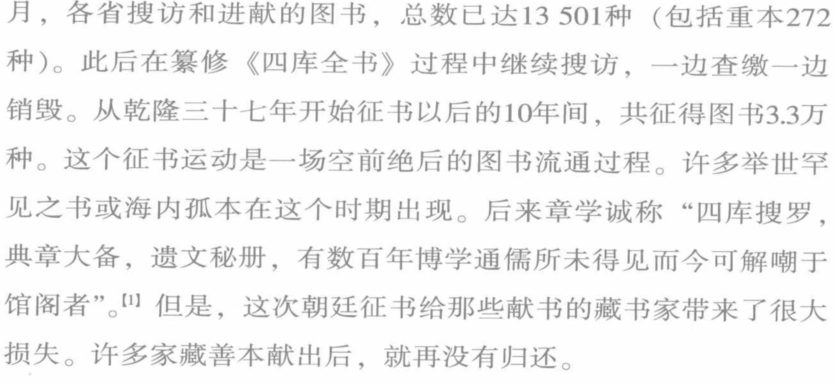
【2】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文海出版社印行。

康熙二年议准：“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提参，交与该部议罪。”康熙二十六年、康熙五十三年、乾隆三年及乾隆十九年等均有禁例，而且一次比一次严格和详细，“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饬所属官弁严行查禁，务将书版进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

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这项禁令一直延续到嘉庆以后。清朝统治者禁止通行的书籍，其中确有一些“淫词”，如《肉蒲团》等，但问题在于查禁的范围很宽，连白话小说如《水浒传》也在查禁之列。

除了干预民间图书流通外，清统治者还通过征书从源头上消灭一切不符合统治要求的书。其最大举措就是通过纂修《四库全书》掀起了征书、禁书、毁书运动。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就开始注重汉族的传统文化，顺治、康熙两朝都有采访遗书的诏令。但当时只是一般的征访遗书，除文字狱外，一般不对征访的书进行禁毁。乾隆六年曾命各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近世以来的儒学之作，随时进呈，但规模不大。到了乾隆中叶，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相对繁荣，清朝统治进入了全盛阶段。乾隆帝开始把文治放在了首位。为了笼络汉族的知识分子，同时也为了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乾隆帝开始把采访遗书提到了重要议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下诏采访遗书，但是因为此前文字狱叠起，民间对此心存疑惧，故收效甚微。次年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又下谕旨，针对民间的疑惧心理，进行安抚，鼓励献书。称“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文字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1] 这里针对藏书者的疑惧，把好话说到尽头，最后一句则是在劝说中含有威胁，软中带硬。在广泛搜求书籍中，采取了各种措施，一边高价收购，一边对不愿出售的藏书者采取借抄办法，保证归还：“民间所有藏书，无论刻本写本，皆官为借抄，仍将原本给还。”在恩威并施之下，各地终于转向积极献书，到了乾隆三十九年八

【1】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三《采访遗书》，文海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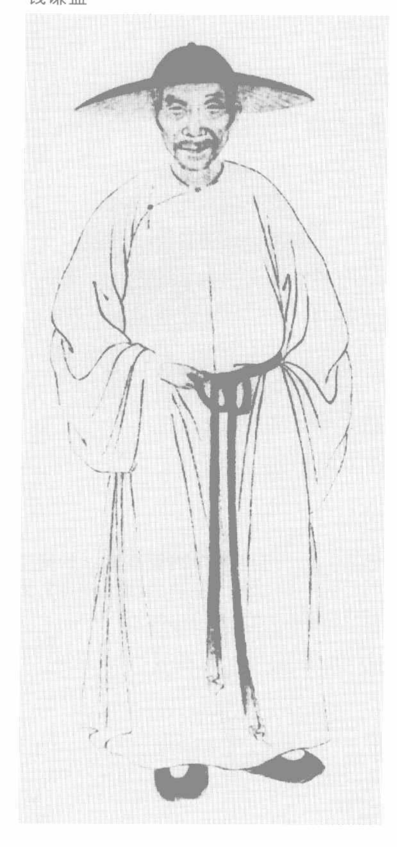
月，各省搜访和进献的图书，总数已达13 501种（包括重本272种）。此后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继续搜访，一边查缴一边销毁。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征书以后的10年间，共征得图书3.3万种。这个征书运动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图书流通过程。许多举世罕见之书或海内孤本在这个时期出现。后来章学诚称“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解嘲于馆阁者”。[1] 但是，这次朝廷征书给那些献书的藏书家带来了很大损失。许多家藏善本献出后，就再没有归还。

【1】《章氏遗书》，卷九“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轮续鉴书”。

更严重的是，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起，征访遗书变成了查缴禁书，许多图书在流通中横遭禁毁。因为在各省进献的众多图书中，不免有些内容不利于清朝统治，被视为“违碍悖逆”之书。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各省征书工作大体完成，乾隆帝就公开下达查缴“违碍”书籍的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应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责令督抚努力查缴，否则“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其咎”。这时，乾隆帝下令征书的目的就表露无遗了。他对社会上现存的书籍全面审查，寓禁于征。此后查缴过程中，禁毁范围不断扩大，又跟文字狱联系在一起，使得大量的书籍被毁。据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统计，清廷在19年间共禁毁书籍3 100多种，15.1万余部（包括复本），销毁版片8万块以上。其中全毁书达八成以上。



图58
钱谦益



清廷在查缴禁书的同时，又不断发出专项的禁书通令，要求全国禁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乾隆三十四年钱谦益诗文之禁(图58)，三十九年屈大均诗文之禁，四十二年王锡侯著作之禁，四十三年袁继咸《六柳堂集》之禁等等。所有这些都对图书的流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官府通过部署翻刻钦定、御纂诸书，发布书坊禁

令等方式，使得官修书籍有选择地定向传播，直接控制各地的刊行品种，对各地的出版活动起了导向作用，并且发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抑制其出版自由，帝王对学术的褒贬好恶也随之影响到民间。如清宫编纂的《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多是皇帝个人兴趣所致，如康熙皇帝喜爱天文、历法、数理等，他在位期间刊刻了不少此类书籍。“乾隆元年议准，圣祖仁皇帝《律书渊源》（注：正式书名为《律历渊源》）应颁发直省书院及所属各学，以为士子观览学习之用，并招募坊贾人等，刷印鬻卖。有情愿刊刻者，听。”[1] 从而也影响到了民间，使清朝天文、历算之学大盛，出现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成果。但传播的主体仍是流通更为广泛的经史教化之书，由此导致民间出版业也出现了同样的倾向。

【1】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四《颁发书籍》,文海出版社印行。

第二节　民间图书发行渠道与方式

清前期是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史上的勃兴时期。康熙、雍正和乾隆几位皇帝都提倡文治，“稽古右文”。他们重视儒家经典，鼓励出版有利于其统治的书籍，大力促进其流通。当时书籍出版规模之大，出版书籍数量之多，都超越了前代。由此，书籍的流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除了商业性市场销售流通之外，还有非商业性的传送流通。传送流通包括抄写、馈赠、携带和征献。

一、商业性市场流通

商业性市场流通是书商、坊主通过市场销售实现书籍转移的一种流通方式，这种方式是清前期民间书籍流通中最基本的一种流通方式。

北京有很多坊肆刻书、卖书。除了自己刻书、卖书外，书籍供不应求的时候，一些坊主还派人去南方书坊购买书籍。焕文堂、五柳居、文粹堂“皆每年购书自苏州，载船而来”,[2] 在市场

【2】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32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售卖。当时，书籍销售数量非常之大，盛况空前。坊肆所售书籍多为科举考试用书。朝廷举行会试期间，各地士子齐集京师，这是书籍销售的绝佳良机。书商们蜂拥而至，在市场里搭建书棚，调配货源，倾力销售书籍。质好价廉的书籍，适应了士子的需求，盛销一时。

坊肆书籍的销售盛况，刺激着北京坊肆出版业的发展。根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所载，到了清代中期，北京已有一百二十家印刷作坊。除了北京以外，南京、上海、顺德、广州、佛山、福州、泉州、厦门、聊城、济南、西安的坊肆也很集中。这些坊肆刻书、卖书，在书籍流通中日益显示出重要性，成为书籍流通的中心。

随着书籍市场的发展，江南出现了很多定期书市交易市场。福建建阳定期书市开张之日，“书坊、书屋比屋为之，天下书商皆集”。[1] 广东的顺德、广州和佛山的坊肆刻书也很发达，很多妇孺以此为业。坊肆的主人为了扩大书籍的流通渠道，广泛联系书坊，贩运书籍，他们有的通过肩挑、有的用船载书籍到各地出售，书籍的流通范围空前扩大。

【1】《建阳县志》，卷三。

当时，书籍市场商品性流通的发达还表现在刻工工价的等差、抄书价格和售卖字版几个方面：

1. 刻工的工价等差：杨绳信在《历代刻工工价初探》中记载了清代刻工工价的等差的依据：“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利，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刻工的工价等差是书籍市场成熟的标志，也是书籍流通的必然结果。

2. 抄书价格：叶德辉《书林清话》载，乾嘉时期抄书工价：“古人抄书工价不可考，惟乾嘉间略见一班。黄记明抄本《草莽私乘》一卷下云，此书载《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估值二钱。是书之值，几六十倍于汲古所估，旁观无不诧余为疑绝者。然余请下

一解曰：今抄胥以四五十文论字之百数，每页有贵至青蚨一二百文者。”[1] 这种情况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书籍市场的繁荣和书籍流通的盛况。

[1]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

3. 售卖字版：书商除了卖书，还卖雕版。雕版的买卖、转让增加了刻书的数量。由书籍买卖到字版买卖，表明了书籍市场走向成熟。通过买卖字版，字版刊印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进一步促进了书籍的流通。

二、非商业性的传送流通

（一）抄写

抄写流通是抄写者从藏书家手中借抄书籍以实现书籍转移的一种流通方式。这种流通方式具有时间的规定性：抄写者从藏书家手中借抄是有期限的，书籍从藏书家手中转移到抄写者手中，在规定的时间内抄写，抄写完成后，书籍又还回藏书家。书籍的流通经过借抄、还书、再借抄的流通过程。

抄书的原因：

1. 出版家、藏书家出于藏书的需要

我国土地辽阔，幅员广大，地域的差别造成有些地区水陆交通发达，有些地区落后。因此，落后地方的出版家、藏书家出于藏书的需要就要抄书。抄书加快了书籍的积累和流通。

2. 对书籍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

当时，印本书籍在某些地区供不应求，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需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借书籍抄写。借书抄写成了书籍流通的重要手段。

学者们孜孜不倦于治学和抄书。顾炎武博览群书，其一生抄书也多。他在《抄书自序》中说：“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他治学严谨，其书稿经常要抄写数遍。朱彝尊因抄书竟被罢官。他在《书椟铭》中记载了自己因为以抄书为乐事，不惜丢官的事情。他说：“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陆其清家庭生活困难“然喜借书，昼夜抄写，严冬乏碳，

[1] 杨立诚、金步瀛：《中国藏书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屈足腹下，冷暖交换，见者匿笑”。[1] 蒋衡不惜花费十多年的时间，投入全部精力抄写《十三经》。这一时期，以抄书而名闻一时的学者不胜枚举，他们借书抄写既是书籍的复制过程，又促进了书籍的流通。

（二）馈赠

馈赠书籍是读书者从馈赠者手中得到书籍以实现书籍转移的一种流通方式。这种流通方式往往建立在相互了解、友谊的基础之上，把书籍作为纪念物。

[2]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五《黄图纪略·琉璃厂》。

《燕行录》记载了朝鲜使团中正副使、书状官和随员光顾琉璃厂书市的情景。琉璃厂“厂外皆廛铺，货宝沸溢。书册铺最大者曰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楼、名盛堂，天下举人、海内知名之士多寓是中”。[2] 乾隆年间，朝鲜学者柳得恭随朝鲜李朝使团来到中国，他羡慕中国的文化，酷爱中国的文化典籍，曾多次光顾北京琉璃厂书市，认识了五柳居、聚瀛堂的主人。他写的《燕台再游录》中记载他雇车到聚瀛堂的情景：“卸笠据椅而坐，随意抽书看之，甚乐也。”这句话表明他对琉璃厂书市的怀旧之情。柳得恭在交往中和陈鳣及罗聘等人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他回国之时，陈鳣和罗聘把书籍作为赠品馈赠给他。他非常珍视这些书籍，并把这些书籍带回本土。

俞蛟在《朝鲜使臣记》里讲述了其朋友卢药林曾经在琉璃厂书肆与朝鲜使臣洪大荣、李命圭交游赠书的故事，这个故事一时传为佳话。由此可见中国学者传播中国文化的慷慨之举，促进了中朝友谊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的友谊外，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也是如此。日僧策彦周良酷爱中国的文化和古籍，他通晓汉语，对中国的古籍爱不释手，一到中国就多方收集中国的古籍。为了得到一本古籍，他经常不辞辛苦访朋问友。中国的学者为其精神所感动，把其需求的书籍作为礼品馈赠给他。

（三）携带

僧人携带汉文书籍出国，或将国外的汉籍带回中国，汉籍再

次得到流通。

高僧隐元是福建福清人，长年研究佛教经典，造诣颇深，探讨临济宗杨岐派的思想，推陈出新，提出了新的佛学思想。其声望很高，名传日本。日本长崎兴福寺长老多次恳请其来访。顺治十一年（1654年），隐元率弟子数十人携带汉文书籍应邀前往，在长崎、大阪、京都等地讲学，传授佛经，受到日本人民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款待。隐元在日本主持唐三寺事务，还建造了新的寺庙“黄檗山万福寺”。[1]

西方商人在经商中，对中国的书籍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中国的小说和戏曲。回国时把中国的书籍带回西方，促进了汉籍的流通。中国的小说、戏曲被译成外文，在西方广泛流传。元曲《赵氏孤儿》是法国人带到欧洲的，引起了欧洲人的广泛兴趣，并改写成剧本。中国小说《好逑传》也被译成英文、德文。

西方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熟悉中国的国情，了解到康熙帝“崇隆儒术，振兴文教”，[2] 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他们也研究、学习这些书籍，并以此来寻找和皇帝的通融点，希图得到皇帝的信任和赏识。

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和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翻译《大学》和《论语》的部分内容后，以《中国之智慧》译名出版。传教士殷铎泽等人又把《中庸》和《论语》译成拉丁文，以《中国的政治伦理学》为书名，刻印带回本土，使汉籍流向国外。

汉籍在日本广泛流通，在中土已经亡佚的汉籍在日本仍有传本。日本长崎的“唐人馆”和“唐人街”是华人居住的地方，很多华人喜欢购买汉籍以便收藏和阅读，汉文书籍在这些地方流通量很大。华人回国时，把国内亡佚的汉籍从日本收集回来，这些书籍重新进入流通领域。

（四）征调和进呈

1. 征调

征调流通是自上而下实现书籍转移的一种流通方式。

乾隆帝即位后，继续实行右文的文化政策，设立“校勘《永

【1】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3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3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乐大典》散篇办事处”，从事书籍的辑佚工作，为征集书籍做了充分的准备。乾隆六年（1741年）正月初四日，下诏征书称：“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钞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1]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又下诏征书，颁谕命令各省督抚“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2] 鉴于征书有限，乾隆特颁谕旨催促各省督抚征办，并云：《四库全书》欲“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乃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聊以塞责。其实系唐宋以来名家著作，或旧板仅存，或副稿略具，卓然可传者，竟不概见”,[3] 要求各督抚“实力速为妥办，陆续奏报，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4] 以此保证征集书籍工作的顺利进行。

【1】《康熙起居注》第一册，114页。

【2】《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六年》，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3】《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上谕》，《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中华书局，1965年。

【4】《高宗实录》，卷九十九，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年。

2. 进呈

进呈流通是自下而上实现书籍转移的一种流通方式。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特别声明：其一，呈献各书，待编完后可以发还；其二，书中有些违碍之处，也与藏书人无涉。第三，不分出版省份，只要符合要求，都应予以呈报。乾隆帝还限令各省督抚在半年之内办妥征书事宜。同时，采取奖励献书之政策。朝廷还规定对献书有功的藏书家进行表彰奖励，进书在百种以上者，奖给《佩文韵府》一部；进书500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是谕一下，各省督抚不遗余力，纷纷行动起来，各省藏书家踊跃献书，到三十九年八月，为朝廷呈献的各书已大量汇集北京。其中京官进呈九百八十三种，直隶总督进呈二百三十八种，奉天府尹进呈三种，两江总督进呈一千三百六十五种，安徽巡抚进呈五百二十三种，江西巡抚进呈八百五十九种，河南巡抚进呈一百十三种，山东巡抚进呈三百七十二种，山西巡抚进呈八十八种，湖南巡抚进呈四十六种，陕西巡抚进呈一百零五种，湖北巡抚进呈八十四种，广东巡抚进呈十二种，云南巡抚进呈四种，两淮监院进呈一千五百七十

五种。[1] 这样，到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全国各省进呈的书籍总数已达12 237种。[2]

【1】《高宗实录》，卷九二九，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年。

【2】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五。

三、朝廷对书籍流通的限制

（一）禁止

清廷对不利其统治的书籍的流通实行了干预政策。

顺治初年，禁止民间流传话本小说。俞正燮《癸巳存稿》载"顺治九年（1652年）题准，坊间书贾之琐语淫词，通行严禁"，一时收到了成效。

康熙帝即位后，认为"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3] 不利于统治，令行禁止。康熙二年规定："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提参，交与该部议罪。"[4] 这一举措初生成效，后来，坊刻小说泛滥，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重视，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年四月，对小说淫词，严查禁绝："将刻版板、书籍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系官革职，如系军民仗一百、流二千里，市卖者仗一百、徙三年，买书看者仗一百。"[5] 因此而获罪者不乏其人。

【3】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7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4】《康熙起居注》第二册，1595页，中华书局，1984年。

【5】素尔纳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卷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

乾隆帝认为，治理天下在于"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为此，他一即位就注意民间的情况，小说的影响很大，有碍其统治。乾隆三年议准：坊肆内一应小说淫词，严行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有违禁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买者，系官罚俸一年；若该管官员不行查出，一次者罚俸六月，二次者罚俸一年，三次者降一级调用。[6] 尽管乾隆帝采取了措施，出台了有关的法律条文，但是收效甚微，民间刻印小说贩卖依然如故。乾隆十八年（1753年）又严令查禁"淫书小说"："淫书陷溺人心，大伤风化，显与圣法相违，……著此等书、蓄此等书者，当服上刑。"[7] 以此恐吓人们。

【6】《乐善堂全集》，卷五，清乾隆刻本。

【7】《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二十，吏部，文禁。

统治者尤其惧怕《红楼梦》一书的反封建专制思想的传播，欲彻底销毁这部文学巨著，乃宣称："淫书以《红楼梦》为最，

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决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1] 我们从清朝查禁“淫书小说”的禁书书目来看，《红楼梦》、《西厢记》、《石点头》、《今古奇观》、《拍案惊奇》这些小说都被统治者列入“淫书小说”的禁书书目中。

【1】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3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二）销毁

乾隆帝大规模地禁毁书籍是从编撰《四库全书》、征集民间藏书开始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准备纂修《四库全书》。为此，他要全国藏书家献书，以便乘机在征集藏书时，把“违碍”的书籍大量销毁。他还粉饰一番说：“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古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 其实“稽古右文，以聿治理”[3] 只是一个方面，巩固其统治才是其征集书籍的目的。

【2】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3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3】《乾隆朝东华录》,卷八十二。

乾隆帝以访求遗书为名，劝说藏书家献书，但献书者寥寥无几。乾隆了解到藏书家不敢献书的原因后，于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的上谕中又谕告藏书家解除疑虑，响应号召。这样一来，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征集的遗书由各省纷纷送到北京，数量达万余种。但是，乾隆帝很快发现各省官员并没有把“违碍”之书呈送上来。为此，乾隆在上谕中严厉指出：“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词，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4] 乾隆帝不打自招，道出了征集书籍的天机。为了尽快地达到其销毁“违碍”书籍的目的，他还对各省官员及藏书之人进行威胁，施加压力：“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其咎。”[5]

【4】《乾隆朝东华录》,卷七十五。

【5】《高宗实录》,卷九六四。

在乾隆帝的督促下，各省督抚加大了查缴“违碍”书籍的力度，把查缴来的“违碍”书籍缮写出清单，具折奏进。军机大臣

把“违碍”书籍，按韵编号，交给翰林院审查，将“悖谬”之处写成黄签，贴在书眉上，由皇帝审查批准后，根据不同情况，把“违碍”书籍全部销毁，或部分抽毁。此后，乾隆帝还要求官员们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继续搜访，一边查缴一边销毁。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起，征访遗书变成了查缴禁书，许多书籍在流通中横遭销毁。乾隆帝禁毁书籍，严重阻遏了书籍的流通。

四、书籍流通的广泛影响

（一）导致了藏书公用思想的萌发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藏书与书籍公用的矛盾。书籍具有社会性，而藏书则具有私有性。中国宫廷的“秘阁”和私家的藏书楼都带有隐秘性和私有性。藏书都是私用，很少借给别人。把书借给别人是不孝子孙。著名的藏书家范钦为了防止藏书外借，教训子孙，曾经亲自书写禁牌：“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这是对家人一种最严厉的处罚。到了清初，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书籍流通的发达，藏书家的藏书思想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藏书公用的思想。在藏书公用思想的影响下，有些藏书家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别人，供别人之需。清初的藏书家曹溶在《流通古书约》中认为，很多书籍失传“非尽久远散佚也，不善藏者护惜所有，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也”。也就是说，书籍失传的原因不是时间久远的问题，而是私人“护惜所有”，秘不示人，使得这些书籍“稍有不慎，行踪永绝”，书籍只有行世“流通”，才能存世。所以他在《流通古书约》里提出了在流通中保存古书的主张，主张把别人所没有的书“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二月间，各赍所抄互换”，并希望有财力的藏书家把古籍刻印行世。他的藏书理论对书籍在社会上的流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藏书家周永年在《儒藏说》中提倡书籍流通、传借，变秘藏为“儒藏”。他率先垂范，聚书10多万卷，借给人们阅读、传抄。曹溶、周永年的“流通”、“儒藏”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映了书籍公用的思想萌芽。也说明随着书籍生产的发展，书籍流通

的数量和规模的增长，书籍的社会性为人们所认识，藏书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这是书籍流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促进了中国民间目录学的发展

清前期，为了适应书籍流通的需要，我国民间编撰书籍目录的数量远远超过前代。

钱曾一生致力于收藏书籍、编撰书籍目录，他在《述古堂自序》曾说："余二十年，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摒当家资，悉藏典藏中。"为了书籍典藏的需要，钱曾编撰了《也是园书目》、《述古堂书目》、《述古堂宋元本目录》等书目和《读书敏求记》。尤其是《读书敏求记》于所收善本条目之下，专门著述版本之优劣、缮刻之异同，以及授受之源流。开创了民间藏书题跋记目录体裁的范例，为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徐乾学编的《传是楼书目》、季振宜编的《季沧苇书目》、毛扆编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等，在书籍的著录和分类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开拓了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

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对私家藏书书目进行了全面总结。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的题跋目录、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周中孚《郑堂读书志》和《慈云楼藏书志》把题跋和书目结合起来，这是民间目录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民间私藏书目发展的主要标志是题跋目录体裁的出现和藏书志目录的创新。这是藏书家编撰目录的实践和经验积累的结果，也是民间目录学趋于成熟的标志。书籍的流通以及藏书的需要，促进了中国民间目录学的发展。

（三）促成中国多种民族语言书籍的翻译

清崇德初年（1636年），太宗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1] 以便提高其汉语水平和执政能力。

顺治帝福临登基后，在北京太和门西廊下设立翻译房，选拔精通汉满文字的官员，将一些汉文古籍译成满文出版，如《资治

【1】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7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图59)、《西厢记》和《金瓶梅》等。康熙时，已大量用满文翻译汉文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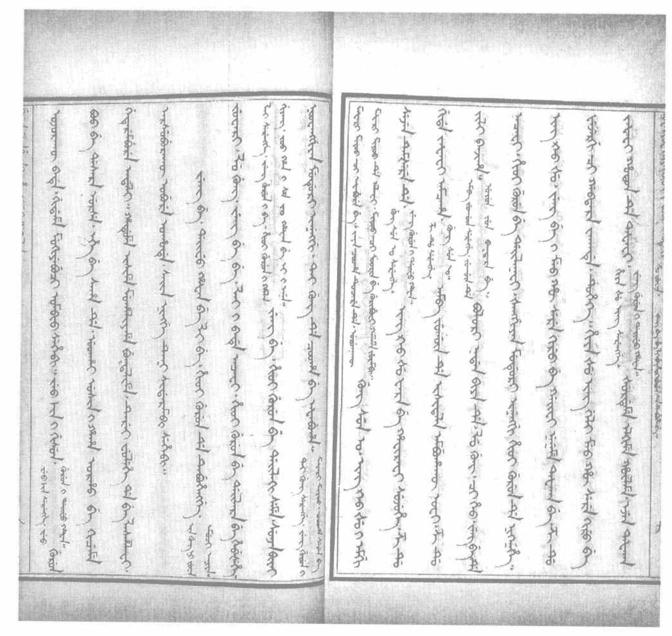


图59
清满文刻本《古文渊鉴》

康熙年间，御纂《清文鉴》编成，交付给诸臣翻译，并发朱笔稿本七函。乾隆十三年（1748年），会同馆兼有翻译满文的任务，一时学者研究《满洲蒙古文鉴》、《同文韵统》、《清汉对音字式》、《清文启蒙》，翻译《四书》、《五经》和稗官小说，“多有缮译成书者矣”。清朝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汉文书籍，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促进了汉文书籍在少数民族中的流通，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

（四）促进了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回归大陆后，第二年康熙帝颁布了“展海令”，容许民间商船自由出海贸易，于是大量商船前往日本。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扩大海上贸易，又开设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今连云港）等四处榷关，开始与外国互市贸易。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外学者的联系加强。

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对日贸易迅速发展，赴日商船成倍增加，中国向日本出口大量的丝、绸缎、书籍和绘画等。随着中国书籍在日本的广泛流通，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学者山井鼎（1690—1728）购买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在深入研究大量汉籍的基础上，校订《易》、《书》、《诗》、《左传》、《论语》和《孝经》等中国经书典籍。他还编撰出版了《七经孟子考文》等学术专著。

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化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学者。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儿（1596—

1650）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把其研究成果公诸学林。法国另一位思想家培尔（1647—1706）也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在《中国通讯》中发表自己对中国儒学研究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儒学思想具有无神论倾向，中国人的宗教是无神论的宗教。法国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编撰了《中国的实践哲学》一书，在书中提出了很多新观点。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研究大量中国典籍之后，根据其研究心得，撰写出《中国近况》一书。在这部书里，他盛赞中国的文化。英国的文学家和政论家约翰·弥尔顿（1608—1674）、丹尼尔·笛福（1660—1731）和威廉·坦帕尔（1628—1699）等人研究中国文化数十年，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中国书籍在国外的广泛流通，使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识更为直接、深入，为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第三节　图书的对外交流

清代的图书出口仍以日本为主要贸易对象，朝鲜次之。贸易形式已经从官方的“贡赐贸易”转化为民间的商贸往来，既有出口，也有进口。

日本开放长崎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随着清朝对海禁的放松，中国去往长崎贸易商船的日益频繁，其中书籍是重要的出口货物。日本在长崎设置了管理图书进口的检查官“书物目利”，其任务是检查中国商船载运的图书，鉴定图书品种，议定价格。珍贵的图书先由将军及幕府选购，对于禁书如兵书、天主教类书籍等则不允许进口。

中国商船运往长崎的图书数量比较多。据当年的“书物目利”向井富氏编撰的《商船载来书目》统计，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到嘉庆八年（1803年）110年间，有43艘中国商船输出图书到长崎，出口图书品种达4 781种，出口总册数不详。仅从品种

来看，已经远远超过明代。另据日本学者大庭修统计，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到咸丰五年（1855年）141年间，中国商船到达长崎港，共售出图书6 630种，56 844部。此外，尚有一些走私船的图书贸易难以统计。清代通过商船出口图书的主要地区是江苏和福建。江苏出口商品达80余种，其中书籍出口列为第1位。福建出口商品61种，书籍出口也列第1位。

中国图书运抵长崎，经“书物目利”检查通过，等于得到贸易许可，遂采取投标的形式出售。办法是由商船主和“书物目利”共同商定各种图书的售价，称“基价”。然后由主管贸易的长崎会所公布投标日期，允许日本书商看样书投标，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

中国商船运去的珍贵图书则不实行投标，而是按照议定的价格由日本官府购买，然后“收藏在枫山文库中，称为天皇文库御用，不久便翻刻官版”。[1] 通过这种方式输入、翻刻的中国图书，流传到日本学者、文人手中，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1】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67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除了进出口贸易，中日往来人员的就便购书也是图书交流的重要方式。随着中国商船去往长崎的增多，中国名僧应邀赴日的越来越多，他们去日本的时候也带去了大量的图书。日本人来华顺便购买图书、或者专门购买图书的也为数不少。叶德辉说：“明遗老龚半千贤，画名甚重。其一幅之值，贵者百金。日本人尤珍贵之，往往一幅值数百元番饼银价。”[2]

【2】叶德辉:《书林余话》,岳麓书社,1999年。

朝鲜贡使来北京，除进行“贡赐贸易”外，还有一项附带的任务就是购买图书。乾嘉时期，朝鲜使臣柳得恭经常到琉璃厂购书，结交了不少书友。他在《燕台再游录》中描述琉璃厂书店的情况，为我国出版界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清前期是华侨开发南洋的高潮时期，许多商人往返于祖国和南洋各国之间。佛山的书商抓住这个契机，开拓了东南亚华文图书市场，通过华侨商人、商船把图书销往东南亚，东南亚成为图书出口的又一个热点地区。

第九章　清代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

清朝建立后，使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北方和西北先后统一了蒙古各部；在西域先设伊犁将军，后设行省；在西藏派驻驻藏大臣，实行《钦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清代奠定了现在中国各族人民所共有的疆土，中国各民族完全统一于祖国版图之中。清代前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发展，出现了康乾盛世。清朝后期朝政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各族人民深受压迫、剥削，同时也使得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外来侵略。

第一节　四译馆及其编辑的《译语》

清代的四译馆即是继明代四夷馆而来，因“夷”字为清朝所忌讳，改为“译”字。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北京，明王朝灭亡，明四夷馆林大有等32名官员亦随之投诚，被留用成为四译馆的最早成员。清沿明制，四译馆职责与明代相同，下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各馆设正教序班、协教序班各一人作为教师，下有译字官生若干。四译馆隶属翰林院，由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馆务。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江蘩作为四译馆的提督，写道：“四译馆之所掌凡三十余国，

统以八馆，列为东西，爰择师儒分馆教习，而设少卿以董之。”[1]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与会同馆合并，改属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由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兼摄馆事，后又增设满稽察大臣二人，下设汉大使一人掌管馆舍，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裁撤。

[1] 江蘩：《四译馆考》，十卷，康熙刻本。

会同四译馆成立后，编撰了一批《译语》，计有耿马、镇康、猛卯、潞江、南甸、僰夷、车里、湾甸、芒市、猛麻、猛连、干崖、猛缅、庆远府属土州县司、太平府属土州县司、镇安府属土州县司、猓猡译语（共五册）、西番译语（一名川番译语共九册）、西番馆、苏禄番书、暹罗番书、缅甸番书、琉球土语、西天真实名经、暎咭唎国译语（英语）、弗喇安西雅语（法语）、额呼马尼雅话（德语）、伊达礼雅话（意大利语）、播呼都噶礼雅话（葡萄牙语）、拉氏诺话（拉丁语）。这批译语学术界称之为会同四译馆《华夷译语》，或称丁种《华夷译语》。这批译语与明代《华夷译语》相比，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杂字，没有来文。除一种外，均有民族文字。从内容上看，译语所涉及到的地域大多包括四川、云南、西藏一带共31种，另有琉球、暹罗、缅甸、印度和欧洲等外国语言共11种。[2] 会同四译馆编的《译语》为抄本，每册叶面双边，框高21厘米，宽14.8厘米，每半叶共四个词（字），每个字（词），上为民族文字，中为汉文字意，下为民族语言汉字对音，汉文字意字体较大，汉字对音字体较小。以《车里译语》为例，首页题“车里译语”，下署“普洱府属”，第一页为“天文门”，首为“天”，其上为傣文，其下为傣语汉字音译“法”；在“身体门”，“身”一词上为傣文，下为汉字音译“敦”，“头”上为傣文，下为译音“贺”，等等。

[2] 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二期。

个别译语有些特殊，如《僰夷译语》，首页下注“镇沅府属”，但其内容并非是分类词汇，而是一篇短文：“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逐字予以翻译。

《琉球语》则无原文字，在汉字（词）下只有琉球语的音译，

如“天”－“町”、“地”－“如”、“狮”－“施失”、“虎”－“土拉”等。

丁种本《华夷译语》主要收藏在故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有20世纪30年代复印的晒蓝本。国外也有部分收藏。这批译语在语言学、民族学和文献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节 满文书籍的出版

一、后金的兴起和满文的创制、使用

明代女真分为建州、海西、东海（野人）三大部落。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一个酋长后裔，其祖父、父亲在战争中被明军误杀，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为祖、父报仇的名义起兵，攻占了明朝支持的别部图伦城，从此开始了统一女真的大业。经过不断征战，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于赫图阿拉城建立“金国”（史称后金），被尊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随着后金国的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也基本形式了。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正式伐明，后金十年（1625年）迁都沈阳，翌年在攻打宁远城的战斗中，努尔哈赤伤重而亡。其子皇太极继位，是为清太宗，改元天聪。天聪九年（1634年）十月，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定族名为满洲，从此一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民族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拉开了演出长达280多年的一部大戏的序幕。

努尔哈赤不仅是一个马上取天下的开国皇帝，也是一个注意文治的君主。建州女真在扩张中，内部发布政令、记录公务，对外文书往来日益增多，而正在崛起中的满洲人苦于没有文字，只能依靠蒙语文来交际，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不利于满洲新兴政权的发展。于是努尔哈赤在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下令创制自己的文字，这个决定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对满族的发展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努尔哈赤不仅在创制满文的问题上对满洲文士额尔德尼、噶盖下达命令，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创制方法，史载颇详：

> 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儿得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则盖、厄儿得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1]

【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太祖即指努尔哈赤，厄儿得溺即额尔德尼，刚盖即噶盖。天命年间由额尔德尼和噶盖仍以蒙文为基础创制的满文被称为"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由于其本身的局限，只通行了三十余年，至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对这种文字加以改进。

> 上谕巴克什达海曰："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若至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2]

【2】《清太宗实录》，卷十一。

在《满文老档》中对此也有相似的记载：

> 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

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被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是以金国天聪六年春正月，达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点，以分晰之。将原字头，即照旧书于前。使后世智者观之，所分晰者，有补于万一则已。倘有谬误，旧字头正之。是日，缮写十二字头颁布之。[1]

【1】《满文老档》，1196页，中华书局，1990年。

这种被达海改进了的满文史称“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至此，满文形体终于确定，其后二百余年再无改变，今天所称之“满文”，一般都是指“新满文”而言。

有清一代，用新满文纂修、翻译了许多图书、档案。此外还有许多碑铭、印玺、钱币等亦用满文。清代尊满语为“国语”，满文又称清文，与外国行文或签约均使用满文。道光、咸丰以后，满文应用已不如前，但直至清末，满文作为官方的正式文字仍在继续使用，清朝灭亡后，才逐渐废弃。在现存的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中，除藏文外，满文图书的品种与数量是最多的。综观中国历史，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能保留下来这么丰富的民族文字图籍，是绝无仅有的。

满文图书从版本上讲可以分为刻本图书和抄本图书两大类，刻本图书又可分为官刻与坊刻两种。

二、满文官刻本

（一）满文出版物的滥觞

创制满文后，用老满文记录了大量上谕、公文、函件等档案文献，这就是后世称之为《满文老档》、《国史院档》等的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反映了满族在关外的社会生活，其中许多史料为汉文文献所不载，对研究满族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及语言文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在关外用满文撰写的文献属于官方档案，只有稿本、抄本传世。

关外时期，用满文翻译了很多汉籍。从努尔哈赤崛起建州之

初，随着与明王朝关系的发展，汉籍的满译便开始了。努尔哈赤时期，被称为满族圣人的达海便受命翻译汉籍，到皇太极执政时期，翻译规模变大，成立了专门机构，满文初名“笔帖赫包”，意为“书房”。后满文改名“笔帖赫衙门”，到乾隆年间修订《清太宗实录》时，嫌“书房”过于俚俗，方更名为“文馆”。

文馆主要有两个职能，一是记录当朝政事，二是翻译汉籍，译书仍由达海负责，另配有四名笔帖式作为助手。译成满文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礼部会典》及一部分大乘佛教典籍。[1]

【1】《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四十四。

据史料所载，清朝在入关前所译汉籍有十余部之多。这些书籍译出后，以何种形式流传，有无专门的刻书机构，因无史料记载，又无当时的刻本存世，所以难有确说。从存世的刻本图书看，在后金时期曾刻有汉文《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约刻于天命三四年，又刻有蒙文《军律》，为崇德三年刻本。既然后金已有汉、蒙文的刻本，说明当时官方已有刻书业，那么作为满族自己的文字，如果没有满文刻本，倒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昭梿在《啸亭续录》中提到皇太极将达海所译《三国志》和四书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既是“颁赐耆旧”，恐难以逐部抄写，由此可以推论，最有可能是刻版印刷。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一件崇德四年（1639年）的布告，内容是后金户部示谕官民禁绝烟草的告示，满汉文合璧，字迹端正，清晰流利，说明后金汗国时期已熟练地掌握了雕版印刷术。可以说关外时期是满文出版物的滥觞时期。

（二）满文官方出版物的发展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进入北京，从此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满文出版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顺治年间满文书籍已出现了少数坊刻本，如听松楼刻印的《诗经》等，但是以内府刻本为主。（图60）

清代官修图书承袭明制，仍由翰林院负责编撰。翰林院在顺治初年并入内三院，后独立。康熙年间，因图书编撰任务过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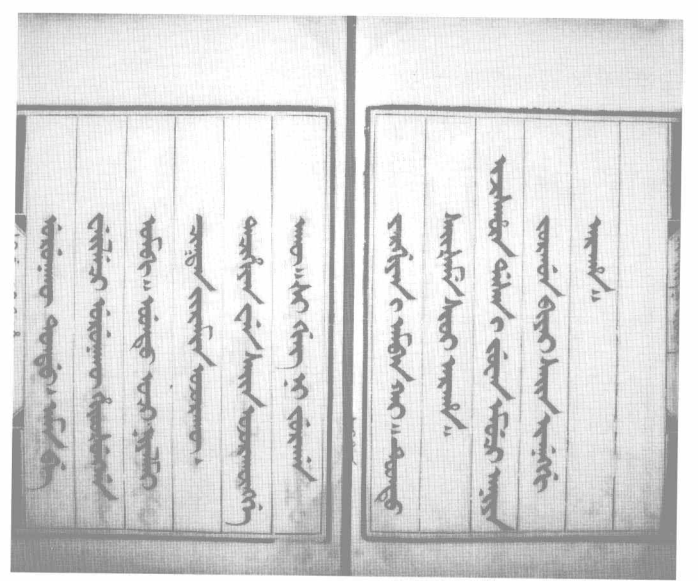


图60
清满文刻本《诗经》

翰林院编制扩大，达二百余人。翰林院职掌论撰文史，下设典簿、待诏两厅。典簿厅掌章奏、文移及人员管理，兼保管图书。待诏厅掌缮写、校勘等事。翰林院附属机构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国史馆等。翰林院官员除大量的汉族文人外还集中了一批满族官员和文人，参与满文或满汉文图书的编撰。如顺治年间满文《三国演义》的翻译，便是多尔衮谕令内三院翻译的，内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领衔，查布海等满族文臣重加翻译、缮写，汉族官员范文程、洪承畴等亦参与其事，于顺治七年（1650年）刊成。康熙年间成书的满文《日讲书经解义》、《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等书，乾隆时期成书的《西域同文志》等书以及一批实录、圣训、会典、例律类图书都是由翰林院负责编成的。清朝入关后，为了适应汉籍满译工作的需要，专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直到咸丰年间仍有此机构。[1] 翻书房将汉籍译为满文后，即付刻印。顺治年间，宫内刻书还是利用明朝的刻书机构经厂。从满文文字看，顺治年间刻本的字体刚劲古朴，字里行间尚有老满文残存风韵，与康熙刻本的字体有较明显的区别。

【1】[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

顺治三年（1646年）刊印了《辽史》、《金史》、《元史》，这是清入关后首次刊印的满文图书，也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满文刻本。这三部书分别为8、9、14册，书框高26.5厘米，宽19厘米，每叶8行，包背装。译者为内弘文院学士希福等人。

顺治三年还刊印了一部满文图书，即是《洪武宝训》（一名《洪武要训》），这是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奉敕译的。《洪武宝训》是入关后翻译的第一部汉籍。

顺治七年（1650年），又刊印了《三国演义》满译本。《三国演义》早在关外曾由达海译过，入关后，遵摄政王多尔衮谕旨，由大学士祁充格等组织重译。参加翻译的有查布海等七人，祁充格、范文程、刚林等满汉官员总校。全书24册，分装6函，每半页9行，框高29厘米，宽20.5厘米，包背装。清朝入关前后，两次翻译《三国演义》，并非因为其为文学名著，实以此书为兵略。（图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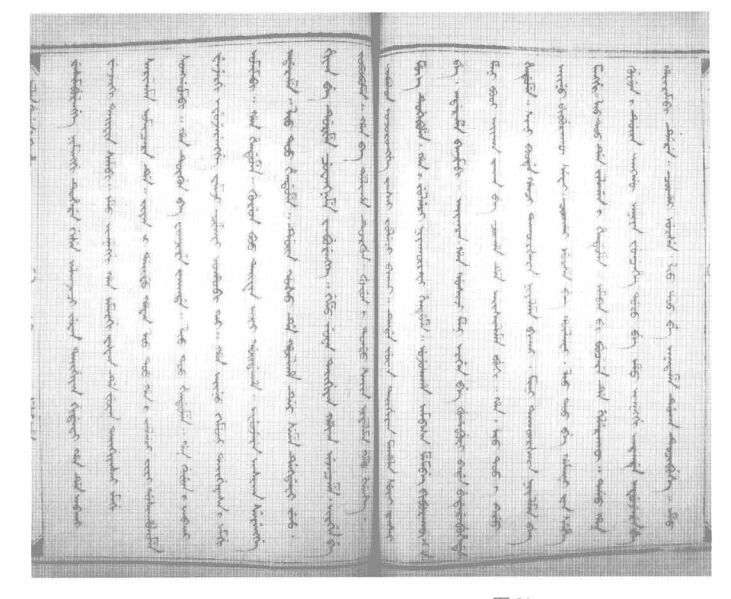


图61
清满文刻本《三国演义》

顺治八年（1652年），皇帝亲政。这个时期以皇帝的名义撰写、编纂了一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书籍，并往往以满汉两种文本同时刊印，如顺治十年（1653年）的《劝学文》，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御制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御纂内政辑要》、《太上感应篇》等。顺治一朝共刻18部满文图书。

（三）满文官方出版物的繁荣

公元1662年，玄烨以八岁冲龄继承帝位，是为康熙皇帝。他在位61年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强大封建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全面恢复和较大发展。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又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康熙皇帝本人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融满汉两种文化为一体，对西方科学技术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提倡经学、史学、文学，“留意典籍，编定群书”（《圣祖实录》语），除按例编修《实录》、《圣训》等书外，他还组织班子编纂经、史、文等方面的图书，促进了皇家刻书业的发展，满文官刻图书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康熙时代皇家刻书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是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立。武英殿修书处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隶属于内务府，专门编撰和刊印宫内各种图书。武英殿修书处规模大、分工细，下设监造处、校刊翰林处、档案房等，书版的刻印、校刊、装潢等各有所司，所印图书称为“殿版”。雍正、乾隆两朝还用铜、木活字排印了不少书，雍正朝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告成，乾隆朝木活字版称“聚珍本”。据统计，武英殿修书处从建立到清末，共整理、校注、辑佚、汇编古籍和编纂新书达700余种，其中半数印刷成书。[1] 满文的内府刻本也得以崭新的面貌问世。这时期满文的殿刻本变得更加规范，字体典雅，有些图书用开化纸大字印刷，纸张洁白细腻，字体墨色匀润，装帧精美考究，有一种特殊的宫廷特色。

【1】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3期。

康熙一朝大约刊印了20多部满文图书，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1. 经书　有清一代，自太宗、世祖起，均尊孔崇儒，到康熙时，更是把崇儒尊道作为文化国策。康熙帝亲政后，延请宿儒大臣进行日讲，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开始陆续刊印了《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等书，康熙帝亲自为之撰写序言。他本人提倡经学、理学，晚年命李光地编了《性理精义》十二卷，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译成满文刊印。这些图书开本都较大，四种“日讲”类书框一般都是高26、27厘米，宽18.3至18.7厘米，《性理精义》框高20.5厘米，宽16厘米，用纸都是白色开化纸，装帧大气考究。

2. 政书　清朝在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以后，各项行政法规制度逐渐建立健全，统治经验也日渐丰富。康熙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治法”，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令编撰《清会典》，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完成。全书一百六十二卷，所载内容自崇德元年（1636年）起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止。《清会典》是清朝行政法规的大纲，它的编纂反映了清政权的巩固和成熟，为以后的修典奠定了基础。

康熙时期修纂的重要满文政书还有康熙九年（1670年）的

《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刑部新定现行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太祖圣训》，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这些政书在当时有很强的实用性，并为康熙后各朝提供了典范。

3. 语言文学　这部分图书种类不多，但所编印的几部书规模宏大，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语言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御制清文鉴》。此书前后经35年方告完成，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满文分类辞典，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军事、礼乐、饮食、器物等共280类，12 000余条，附有总纲（即索引），为满文辞书中第一部纲领性巨著。版框高21.9厘米，宽15.8厘米，白口，四周双栏，书口依次有满文书名、卷次、篇名、汉文页码。半叶大字六行，小字行字不等。这部辞书开了清代编纂官修辞书的先河，乾隆时期编纂的各类清文鉴无不以此为楷模。

文学类图书的代表作品是《御制古文渊鉴》。这是一部古代散文汇集，全书包括自春秋讫唐宋文章共693篇，分64卷，由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徐乾学等奉敕编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武英殿刻本，有汉、满两种文本。汉文本用彩色套印，鲜明艳丽，体现了当时的最高印刷水平。满文本虽无彩色印刷，但印制也相当精美。框高24.2厘米，宽16.1厘米，白口，四周双栏，半叶大字8行，小字双行，书口依次为满文书名、卷次、选用书名、篇名及汉文页码。开化纸棉白细软，字体端庄，墨色鲜亮，装帧考究，是康熙时代皇家满文刻本的典范。就其内容而言，《古文渊鉴》是清代大规模翻译汉族古代散文的第一部集子，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后如道光年间译的《古文观止》，咸丰年间的《翻译古文》都受到这部书的影响，但它们的内容和规模远不及《古文渊鉴》。

康熙年间的满文刻本中，有一些书其官刻特征不很明显，但根据种种迹象，可以判断不是坊刻而是官刻，甚至是内府刻本。如“七本头”，这是包括《黄石公素书》、《菜根谭》、《孝经》、《御制三角形论》、《性理一则》、《醒世要言》、《潘氏总论》等七

种图书的一函丛书。这部书开本较小，用纸普通，也没有用“御制”作为总书名，但从内容看，《黄石公素书》是达海在关外所译，经和素校后刊印的，《御制三角形论》则是康熙皇帝本人的数学论文。

另外一种书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刻印的满文《金瓶梅》。此书向被列为“诲淫”之作，顺治、康熙两朝屡有上谕明令严禁“淫词小说”，在这种氛围下，《金瓶梅》居然能译成满文并刻版印行，在文网严密的当时，如果不得到特别允准是不可能的。关于这部小说的满文译者众说纷纭，有和素说、徐元梦说、康熙之弟说等几种。不论是何人，肯定都是达官贵族。由此可以推断，《金瓶梅》满译本最有可能是官刻本。

雍正年间，满文官刻图书继续发展，但这个时期，满文官刻本的种类与数量都显得较为单调、稀少。从种类上看，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政书，如雍正三年（1725年）刻本《大清律集解附例》、《吏部铨选官员则例》、《吏部处分则例》，雍正十年（1732年）刻本《大清会典》等。另一类是雍正帝的言论文章，如雍正二年（1724年）刻本《圣谕广训》，雍正二年、十年（1724、1732年）的《雍正上谕》，雍正二年的《朋党论》以及《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等。

（四）满文官刻图书的鼎盛

进入乾隆时代后，满文官刻图书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期。乾隆六十年中，内府所刻满文图书，无论从内容、数量和书品上看，都超过了前三朝，乾隆后历朝亦未有出其右者。据初步统计，乾隆一朝满文官刻图书约有20种左右。从内容上看，有以下特点：

1. 整理翻译儒家经典。《诗经》在顺治年间已经翻译，康雍时期，四书、《易经》、《书经》、《孝经》等一批儒家经典都译成了满文，或以“日讲解义”的形式刊布。乾隆帝即位后，认为有的译本如《诗经》因翻译过早，一些词语为《清文鉴》未收，不很规范；有的译本如《易经》，一些卦名彖象的翻译“对音乏旧，未尽翻意”，为了“嘉惠来学”，“不留余憾”，下令对一批儒家经

典重新翻译。于是，乾隆六年（1741年）的四书，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诗经》，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礼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春秋》等一批儒家经典译作相继问世。

2. 继续编纂刻印太宗、世祖、圣祖和世宗等历代皇帝的《圣训》。除世宗的《圣训》为乾隆五年编纂外，其余几位皇帝的《圣训》早已编就，于乾隆年间陆续刊印。

3. 加强政书的修纂。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清律例》的修订。《大清律》最初制定于顺治三年（1646年），当时清王朝刚定鼎北京，诸事待举，急需一部法律，但为时间所限，只能“详译明律，参以国制”来应急。康雍两朝，屡加修订，经过近百年的总结、完善，到乾隆五年（1740年）命大臣对清律详悉参订，重加编辑，并以满汉两种文本刊布。其后又陆续刊布了《大清律续纂条例》、《大清律续纂条例总类》。

《大清会典》是乾隆时期修订的另一部规模宏大的政书。《大清会典》最初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雍正年间又用了十年时间进行修纂，乾隆帝即位后，针对康雍两朝所修会典中的一些舛讹疏漏，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下令重修，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满文本刊布。

乾隆一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加强了立法，对各项规章制度广为编纂，不断修订。除上述两部大型律典外，一批则例也相继问世。如乾隆七年（1742年）的《八旗则例》、《吏部则例》，乾隆八年（1743年）的《兵部督捕则例》，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的《旗务则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国子监则例》等。一些则例不断修订，如《八旗则例》初刻于乾隆七年，后于二十九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五十年分别续修。这些则例不断修订，反映了乾隆时期的法规制度不断补充完善，是清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强化成熟的标志。

4. 重视史书的编修。乾隆帝在即位前就熟读史书，深知“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所以对史书的编修十分重视。从康熙年间开

始，每次用兵之后，都要成立专门机构，将有关军事行动的谕旨奏报编纂成集，是谓“方略”。乾隆一朝，用兵较大规模者有十次之多，乾隆帝因之自号“十全老人”，他仿照康熙帝纂修方略、纪略，译成满文的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平定准噶尔方略》，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平定金川方略》等。此外还于乾隆二十九年用满文刻印了《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开国方略》，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历史图书。

5. 关心满文工具书的编纂。乾隆帝为了加强满族的统治基础，针对当时八旗官员及其子弟久处太平，骄逸自安，汉化程度日益加深，对满洲旧俗逐渐淡忘的现实，特别提出了“骑射我朝根本”、“清语尤为本务”，规定将清语、骑射作为满洲举人会试、官员升黜和宗室王公承袭爵位的条件。乾隆帝亲自指导编纂了一系列满文、满文与其他语文相对照的工具书，同时对满文进行整理规范，为满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编成的《御制增订清文鉴》，这是在康熙朝编的《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增订的，比《清文鉴》增加新词4 700余条，比原书增加了约二分之一，并将全部辞条译成汉文。此书框高24.4厘米，宽18.3厘米，白口，四周双栏。半叶16行，行字不等。书口处依次为满文书名、卷次、汉文类别和页码。后来在《增订清文鉴》的基础上，又发展到《四体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后者仅有抄本）。又如《西域同文志》（乾隆十五年完成），把中国西北地区的地名和一部分人名用汉、满、蒙、藏、托忒蒙文、维等六种文字对照汇编，是研究清代西北地区地理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图62）

6. 注意满文佛经的翻译。有清一代，把崇奉喇嘛教列为国策，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蒙藏地区，保障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上谕开始翻译满文《大藏经》，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告成，历时十八年。乾隆帝将翻译满文《大藏经》与编纂《四库全书》等同，看作是其六旬后办的两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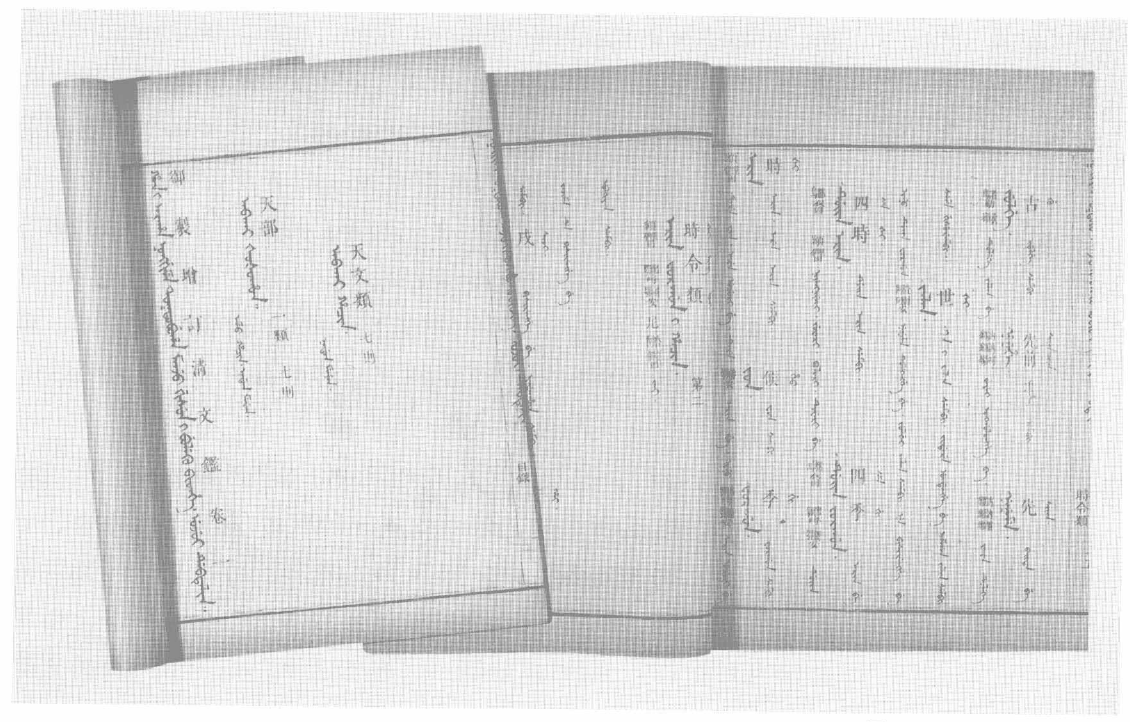


图62
清满汉合璧《御制增订清文鉴》

事。满文《大藏经》全部108函，梵夹装，朱印本。可惜这部经藏当时印刷不多，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北京故宫收藏的76函，另有32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据了解，西藏布达拉宫还藏有一部完帙。所幸这部《大藏经》的经版大部分还都保存完好，最近用来新刷了一批经藏出版。乾隆时期还翻译刻印了其他一些佛教经典，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刊印的《大藏全咒》及《皈依经》、《普贤行愿品经》等。乾隆帝本人也亲自译过一些佛经，如《吉祥偈》、《金刚经》等。可以说，满文佛经的刻本绝大多数都是乾隆朝翻译刊印的，这些佛经或是作为供奉，或是供皇家寺庙中喇嘛念诵，散入民间的很少。国图收藏的满文佛经刻本大多是民国前期从清东西陵皇室家庙中收集来的。

满文官刻图书在乾隆朝达到顶峰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原因。一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清王朝的统治日益巩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形成了所谓“盛世”景象，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其二是在乾隆时

期，封建中央集权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统治阶级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法律、政令的制订、修改反映了皇权的加强。当时在清政府统治机构中，满洲官员仍占主要地位，各类满文图书特别是实用性很强的政书有较大的需求量。再者是乾隆帝本人的作用。这位皇帝本身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特别对汉文化的了解与吸收都达到了相当深的程度，而他本人又有着十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理，在他“稽古右文”、提倡清语、骑射的政策指导下，满文图书的撰修、翻译、刻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图63）

（五）满文官刻图书的式微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降，国力衰微，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满文官刻图书也逐渐式微，最后变成一种官方的点缀。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60多年中，除依照惯例编纂刊印上一代皇帝的《圣训》外，只刻印了《理藩院则例》（嘉庆二十二年修，道光二十九年重订）、《回疆则例》（道光二十二年印本）等满文政书，续纂了《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分别刻于嘉庆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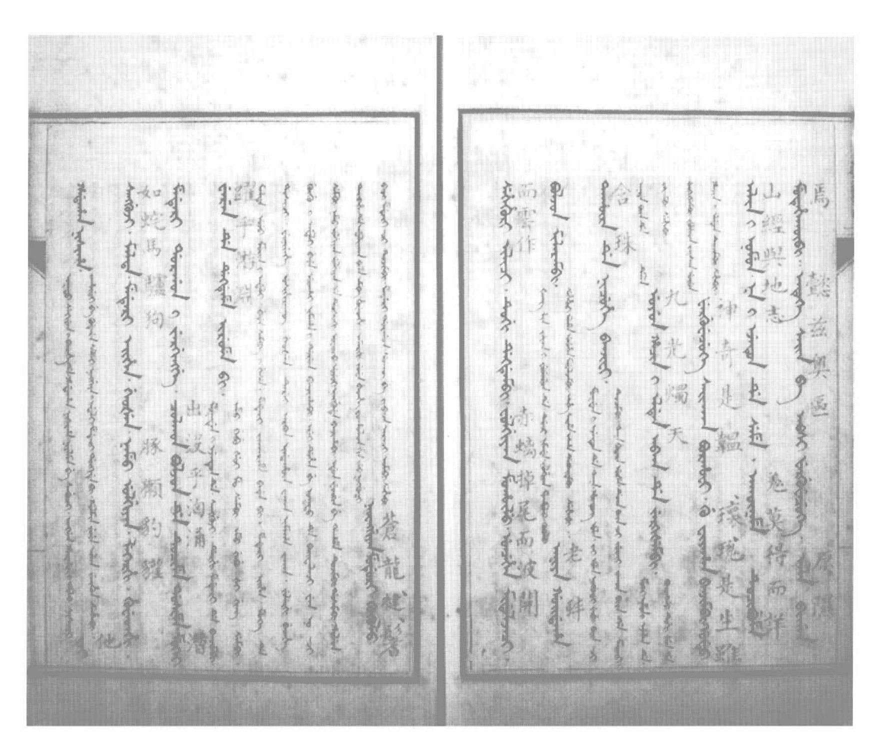


图63
清满文刻本《盛京赋》

道光二十九年、咸丰九年)，此外并无新书问世。到同光时期，官方所修满文图书，大多只以稿本、抄本留了下来。

满文官刻图书发展到顶峰后迅速跌入低谷，进入式微阶段，究其原因，除到了乾隆朝以后，政治腐败，内乱不止，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历史因素外，与当时满语文使用面急剧缩小也有直接的关系。

有清一代，满文官刻图书可以说是由皇家统揽刊印的，只是到清代中叶以后，在一些地方长官衙署才有刊印之举。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西安将军署刻印了《清文指要》，广州将军衙门和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在光绪年间也刻印了《清文总汇》、《清语辑要》等书，这些地方官署刊印的都是学习满文的教科书和工具书，以满足当地呈小聚居状态的八旗子弟学习满语文的需要。

从清同治年间开始，各地有官书局之设，刻印大批图书，是清末地方官刻的重要代表。满文书在官书局刻书中极为鲜见，现所知仅有《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光绪四年（1878年）江苏书局刻本。

皇家刊印的民族文字图书发行渠道与汉文版图书相当，主要是赏赐、颁发等形式。皇帝以图书为赐品赏给臣工，这在关外已有此习惯了。皇太极曾将译成满文的四书和《三国演义》“颁赐耆旧”。不但皇帝赐书，上级官员也有将图书作为礼品赏给下级的，如在乾隆年间，名将海兰察为奖励部下额勒登保，即以满文《三国演义》授之，勉其曰：“尔将才可造，须略识古兵法。”[1] 少数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殿版书，大量刊印、颁发，如雍正二年（1724年）武英殿刊印的《圣谕广训》，此书是康熙皇帝根据顺治帝发布的“六谕”推衍成为“圣谕十六条”，雍正帝上台后对“十六条”逐条解释，引申发挥，辑合而成。此书刊印后颁发至省州县各地，亦允许民间书坊翻刻。但此类情况很少，大部分满文官刻图书的发行是由皇室直接掌握的。

【1】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

三、满文坊刻本

民间刻本主要是指书坊和刻字铺印的书籍，另有一些私人的家刻本也属此列。清代的书坊虽遍及全国，并形成了北京、苏州、广州、佛山等几个刊印中心，但就满文图书而言，其刊印中心仅在北京一处。

北京作为金元明清四朝的首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明代北京的刻书业就很兴盛。但是现在有明确年款的最早的满文坊刻本却不是北京刻的，而是南京（金陵）听松楼刊印的《诗经》，成书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共6卷6册，满汉合璧，版框高22.8厘米，宽14.6厘米，每叶上半面是满文，9行，版框高13厘米，下半面是汉文，也是9行，版框高9.8厘米。扉页有牌记"新刻满汉字诗经"，满汉文分别左右，中间记"听松楼藏板"，首页为满文御制序。中缝汉字题"满汉诗经"。像这样满汉文分别上下刻印的图书仅见于清朝前期，以后都是间行刻印。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种刻本，满汉合璧，全书两册，内容都是格言。每叶两行，左为满文，右为汉文。第一册每行三字，第二册为四字。三字的如："仁为宅，义为路，忠为首，孝为先，俭为常，智为根"等，四字的如"动不可躁，静不可怠，非不可饰，过不可文，群不可党，量不可狭"等。根据刻书的风格判断是顺治年间的坊刻本。

顺治年间的坊刻本仅见此二种，而刻满文书的店铺仅知南京听松楼一家。

康熙年间，刊印满文书的书坊多了起来，除了南京的听松楼仍在刻印外，北京先后出现了10家刊印满文书的书坊，它们是宛羽斋、秘书阁、玉树堂、尚德堂、寄畅斋、天绘阁、文盛堂、四合堂、三义堂、尊古堂等。宛羽斋在前门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刊印了《大清全书》，天绘阁、尊古堂都在西河沿，清初这一带是书籍的刊印中心。南京的听松楼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刻印了《清书全集》，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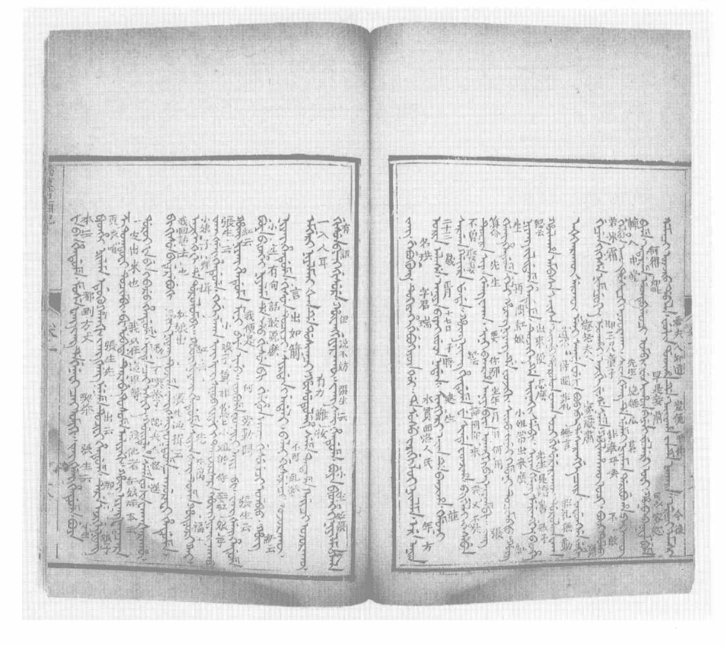
《同文广汇全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刻了《满汉类书全集》，另有满文本《孙吴子兵法》，没有明确年款。其余几家书坊各只有一种刊印。

到雍正年间，北京刊印满文图书知名的书坊达13家，它们是鸣皋阁、敬修堂、宏文阁、中和堂、文盛堂、三槐堂、鸿远堂、墨华堂、精一斋、老二酉堂、文瑞堂、英华堂、二槐堂等。其中老二酉堂是个老字号，在琉璃厂，这家书铺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刻了《满汉全字十二头》一书，这是一部学习满文的基础书，到乾隆年间老二酉堂还刻过满文书，后未见再有满文书问世。三槐堂是出版满文书较多的一家书坊，从雍正到光绪，绵延近200年，以三槐堂的名义刊印图书持续不绝。

乾隆六十年中，前后有十多家书坊刻过满文图书，留有堂号的除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文瑞堂、永魁堂、秋芳堂、清宜斋等，主要集中在乾隆四十年前。乾隆四十年后只有双峰阁、三槐堂、文盛堂等几家。

嘉庆年间满文坊刻本很少，有堂名的仅见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文盛堂重刻的《六部成语》。文盛堂是一家老字号，早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就刻印过满汉合璧的《西厢记》，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刻过《六部成语》。（图64）

图64
清满汉合璧刻本《西厢记》



道光年间刻印满文书的店铺依然不多，留有堂名的有炳蔚堂朱氏书坊、五云堂、三槐堂和聚珍堂等。前面说过，三槐堂的堂号最早出现在雍正年间，雍正二年(1724年）刊印过满汉合璧《圣谕广训》，雍正八年(1730年)

刻满汉合璧《满文启蒙》，后又刻《读史论略》。乾隆年间又刻有四书（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清汉对音字式》（乾隆三十七年即1772年）、《三字经注解》（乾隆六十年即1795年）。

道光年间的三槐堂在隆福寺对门，其于道光十年（1830年）刻的《圆音正考》一书，首有满洲乌扎拉氏文通序称“庚寅春，三槐堂书坊龚氏宜古，持《圆音正考》一册，欲付梓，请序于余，兼请校正其讹”云云。可见道光初年，三槐堂主人为龚姓。在此之前，道光二年(1822年）三槐堂已刻过《吏治辑要》，三年又予重刻。咸丰、光绪年间，三槐堂不断有满文书问世，是满文刻书时间较长、数量较多的书坊。

另一家刊印满文书较多的书肆是聚珍堂。聚珍堂亦在隆福寺，据记载其前身为天绘阁，则其历史可追溯到康熙年间。以聚珍堂名义刊印的满文书最早可见的是乾隆年间的满汉合璧四书，道光二十年（1840年）刻满汉合璧《音韵逢源》。这类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尽管招牌不变，但主人屡易。光绪二年（1876年）聚珍堂主人为刘英烈，原名王盛，字魁式，河北束鹿人。这家书铺一直经营了五十多年。聚珍堂在光绪年间满文图书刻印活动是比较活跃的一家。

光绪年间，满文书刊印事业似乎出现了“回光返照”，除三槐堂、聚珍堂两家老字号外，还有柳荫山房、尚友堂书坊、文渊堂、文宝堂、名德堂、护国寺肖氏等数家。这期间，石印技术传入我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北京石印馆刻了满汉蒙三体合璧《分类汉语入门》。这一时期在外地如湖北荆州积古斋、盛京西彩盛刻书铺也都有满文书刊印。外地满文书坊刻本仅见于顺治年间的南京听松楼和清末的荆州、盛京，中间几百年竟一无所见。

有确切纪年的最晚的满文书是宣统二年（1910年）由湖北荆防广化善堂刻印的《朱文公家训》。作为满文图书刻印中心的北京，到清末，印刷技术已改进为石印，最后的满文图书是宣统元年石印本《满蒙汉合璧教科书》。从内容上看已出现了“强国之

道，以兵为本”、“陆有炮台，海有战舰”这些具有“新学”的内容了。这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同时也标志着刊印满文图书的时代即将结束了。

坊刻图书与官刻图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因为它是将书籍作为商品，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而刊行的。围绕这样一个基本特点，坊刻满文图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普及读物

清代把崇儒重道作为国策，把儒家伦理思想作为维系自身统治、巩固封建政权的基本道德规范，因此从顺治帝开始，就十分重视这方面的教化。

清初顺治帝发布“六谕”，康熙帝推衍为“圣谕十六条”，到雍正帝登基，标榜自己“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将“十六条”逐条解释，引申发挥，辑成《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1724年）内府刊印，并敕令将此书刊印至直省州县，各地学官每月朔望向士庶宣讲，使之家喻户晓。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宣宗又对《圣谕广训》作了一番解释，并敕令作为书院家塾的必读书。既然统治者如此看重，所以《圣谕广训》自雍正年开始直至光绪朝，不断有坊刻本刊行，成为版本繁多，印量颇大的畅销书。

大约在嘉庆年间，出现了一部《吏治辑要》，由铁岭高鹗编著。此书将有关吏治的著述辑录在一起，对官员的政治标准、个人素质、法纪要求等都有论述，对官员从政颇有帮助。此书被在沈阳的内务府附生通瑞译成满文，蒙古领队大臣明叙作了校正，译本被通瑞的朋友、满洲二等侍卫梦芗见到后大为赞赏，认为“吾三韩当务之急，莫此若也。不必赘言适用而用无不适，不必赘言济用而用无不济者，正谓此耳，何必他求哉！”于是将此书付梓。[1] 道光二年（1822年）由北京的三槐堂出版发行，当年便销售一空，翌年又重刻，咸丰七年（1857年），此书被译成蒙文，到光绪年间，三槐堂、聚珍堂又同时刊印，可见此书在清末广受

[1]《吏治辑要》道光二年二槐堂刻本序言。

欢迎的程度。

2. 四书五经

清袭明制，以科举取士，汉族士子按省举行考试，同时设八旗官学，从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举行乡试、会试。在官学学习和考试的内容均是儒家经典，因此四书五经的翻译与出版就成为很大的社会需求。现在最早的坊刻本便是顺治十一年（1654年）听松楼刻印的《诗经》。四书是儒家的基本经典，因此很早便译成了满文，由坊间刊行。现在能看到最早的坊刻本是康熙三十年（1691年）玉树堂的满汉合璧四书刊本。乾隆帝登基后，对四书译本重新作了一次厘定，从乾隆二十年后直到光绪年间坊间大量刊印，像三槐堂、二酉堂、聚珍堂、保翠斋、宝名堂、名贵堂、文光堂、圣经博古堂等都有印本，可以说四书满汉合璧本在清代也是最畅销的坊刻书之一。《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的印量也较大。

3. 启蒙读物

《三字经》、《千字文》是汉族通行启蒙读物，流传长远。满族入关后也接受了这些读物，雍正二年（1724年）惟德、陶格将《三字经》译成满文，后经乾隆到道光，近百年中一再刊印，道光十二年（1832年）还译成蒙文。《千字文》也有三槐堂、文萃堂、敬修堂等书坊先后刊印过。

4. 文学作品

属于文学作品的坊刻本品种不多，但从译文和书品来看都属上乘之作。如《西厢记》有两个译本，一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由寄畅斋刻印的《精译六才子词》，由刘顺译校。此书只译了《西厢记》中的曲文部分，每页汉文列上，满文列下。两年后出现了一个全译本，由文盛堂刊印，满汉合璧，每半叶22行，行字不等，框高16.8厘米，宽12厘米，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书口上为汉文书名，下为汉文页码。可惜未著译者姓名。

《翻译词联诗赋》是文英堂刊印的，四卷，满汉合璧，刊印时间不详，从风格上看较晚。首卷为词，卷二为楹联，卷三是

诗，卷四为赋，此书流传不多。

小说有《聊斋志异》，这部短篇小说集成书于康熙年间，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到道光年间由盛京工部主事札克丹选书中129篇故事，译成满文，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刊印。印行后颇受欢迎，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北京二酉斋再次印刷，所用书版即是道光年间初刻的原版。此书框高19.4厘米，宽15.3厘米，半叶14行，满汉相间，行字不等，白口，四周双栏，双鱼尾，书口上为汉文篇名，中为书名，下为卷次、页码。

《三国演义》是清代翻译最早的一部小说，早在关外时期，已由满族的文圣达海开始翻译满文，可惜翻译未竟，达海英年早逝。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又令满族文臣重加翻译，顺治七年（1650年）译毕由内府刊印，全部为满文。半叶9行，行字不等，框高28.9厘米，宽20.8厘米，白口，四周双栏，双鱼尾，书口有满文书名、卷次及页码。《三国演义》满文本问世后，又出现了一种满汉合璧本，共四十八册，框高21.5厘米，宽15.5厘米，每半叶满汉文各7行，满文与顺治译本同，汉文列在满文之右。从汉文中“玄”、“禛”均已避讳，而“弘”字未避讳这一情况推断，此种满汉合璧本应是雍正年间所刻，从其刻工、纸张及装帧等情况看，应是民间坊刻本，但是未有刊印书肆的牌记和其他著录内容。

5. 满语文专业类图书

清代把提倡清语骑射作为国策，乾隆皇帝认为“骑射我朝根本”、“清语尤为本务”，把能否坚持清语、骑射，能否保持满洲旧俗看成是有关清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顺治朝开始即开设八旗官学，鼓励八旗子弟学习满文，并开设翻译科，使八旗子弟学习满文后能得到好的出身，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清代对满语文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始终未有间断。从官方来看，康熙朝编了《御制清文鉴》、《满蒙文鉴》，乾隆朝更有《御制增订清文鉴》、《三合切音清文鉴》、《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写本）等巨著推出，民间也出现了相当一批满语文的

研究著作和工具书。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由京都宛羽斋刊印了《大清全书》，这是有明确年款的最早的一部满语文专门研究著作，它包括了满语的语音、语法和满汉对照辞书。此书半叶5行，小字双行，框高26厘米，宽17.3厘米，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书口依次为满文书名，满文字头、页码。作者是汉族人，姓沈名启亮，字弘照，娄东人。作者处于清初时代，在满洲行伍中征战多年，学会了满语，并对此十分喜爱。后到京师在镶黄旗下设馆课徒，有机会就教于一些满族文儒，对满语的十二字头和一些基本语法第一次作了研究和总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编辑了一部12 000字左右的满汉对照辞书。满语学家李德启先生称此书保留了清初一些满语词汇，为后来辞书中所无，对研究满语发展历史具有独特的价值。[1] 此书出版三十年后，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北京三义堂重新刊印。

雍正二年（1724年）李延基编著了《清文汇书》。这是一部满汉对照词书，比《御制清文鉴》还多收了2 000多个词，是清代版本最多、流行最广的词书之一，这部书的影响也很大，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又有《清文补汇》问世，由宗室宜兴编著，共八卷。体例与《清文汇书》同，又补充词条7 300余条。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志宽、志培将两种词书合并名《清文总汇》。此书半叶8行，小字双行，框高18.5厘米，宽13.8厘米，四周双栏，下粗黑口，单鱼尾，书口依次为汉文书名、卷次、满文字头、汉文页码。

雍正八年（1730年）舞格编著了一部满文教科书，名《清文启蒙》，满汉合璧，四卷，以汉文解释满文语法，从语音十二字头开始到满语套词、虚字等，内容全面，在清代流行较广。乾隆年间有关学习满语文的专业图书刊印更多，较有影响的有《清文典要》（乾隆三年即1738）、《六部成语》（乾隆七年即1742年）、《翻译类编》（乾隆十四年即1749年）、《音汉清文鉴》（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清话问答四十条》（乾隆二十三年即1758

[1] 李德启：《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22页，民国二十六年出版。

年）等。清代后期出现的《清文虚字指南编》（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初学必读》（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等反映了晚清时期满语研究的新水平。（图65）

综观有清一代满文坊刻本图书，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1. 书肆自己刻版自己发行。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书肆往往在牌记上只注明堂号，或写明某家藏版，有的还注明书肆地址。如《御制翻译书经》就写明“京都琉璃厂瑞锦堂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四日”，有的书则盖章说明，如乾隆二年刻的《满汉经文成语》扉页钤有一章，上印文字“京都徐铺住顺城门外琉璃厂英华堂藏板”。

2. 多家书肆同版刊印。有的书虽然同时有几家书肆刊印，但仔细一看，可以发现用的是同一版，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一些满语文专业图书上，如宏文阁与文瑞堂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同时推出《音汉清文鉴》，这是一部满汉对照的辞书。又如《翻译类编》，这是一部满汉分类词典，共收约3 000个词，在乾隆十四年（1745年）由文渊堂、鸿远堂、永魁斋同时刊印，其中鸿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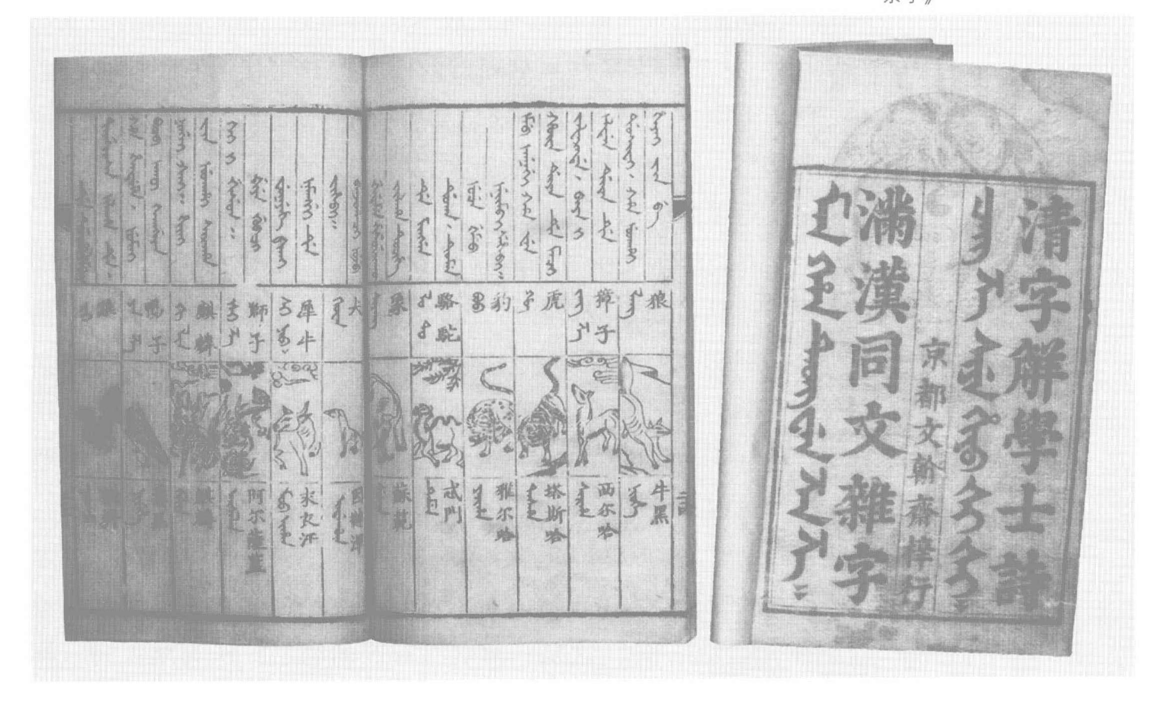


图65
清满汉合璧刻本《满汉同文杂字》

与永魁斋用的是同一刻版，这种现象反映了在当时的刻书业中已有一定规模的联手经营，尽管在市场占有额上受一定影响，但这样做的结果可以降低成本，出版的又是发行量较大的畅销书，总体还是合算的。

3. 在一些图书的牌记上标明“翻印必究”，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音汉清文鉴》、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一学三贯清文鉴》等，这种情况明代已有，到清代，书肆的版权意识更加强化，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在牌记上标明对盗版有追究的权利。

4. 有清一代刊印满文图书的书肆虽比较多，但就单个书肆而言，除少数几个如三槐堂、聚珍堂等以外，出书种数并不多，有的只有一两种，这说明刊印满文书在这些书刊出版业中只占附属地位，更没有形成专业的满文图书出版书坊。

5. 从内容看，坊刻与官刻本似乎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官刻本中常见的几类书如政书类、法律类和“御制”、“敕纂”类书籍及佛经等，坊刻本几乎从不涉及，在儒家经典、满语文专业等类图书中，坊刻本与官刻本也有比较明显的分工。儒家经典类只刊印“四书”这类儒家最基本最通俗的读物，其直接为科举服务的目的性十分明显。另一类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通俗读物，如《醒世要言》、《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等，虽有官刻本，坊刻本也很多，这里除统治者提倡外，也不难看出书商对利润的追求。

在有关满语文学习和研究的图书方面，清代官方编纂、刊印了很多作品，如《清文鉴》、《满蒙文鉴》、《增订清文鉴》、《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等。这些都是满文研究的权威性工具书，在学术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水平。这些图书也有很强的实用性，因而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书的坊刻本。可见以赢利为目的的书坊是不能翻刻这些“御制”图书的，这方面是官方的专利。坊间刊印的学习满语文的专业图书，大多是私人的专著，有些受欢迎的著作在各朝不断出版，如李延基编著的《清文汇书》，这是一部满汉对照的词书，从康熙年间京都

四合堂首刻以来，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约有六七家书肆刻版发行，是清代刻本最多、流传最广的一部工具书，到乾隆年间还出现了续编——《清文补汇》，乾嘉两朝直到光绪年间都有不同刻本问世。其他如《清文启蒙》、《六部成语》等都是清代坊间一再刻印的学习满文的专业书。

6. 清代满文坊刻本图书，绝大部分是满汉合璧，少数是满蒙汉三体合璧，全部为满文的极少。从写作方式上看，主要是两种，一是翻译，即是将汉文著作翻译成满文，其中大多为四书五经类儒家经典，也有一小部分文学作品。二是创作，这部分主要是学习满语文的专业图书，包括满语的语音、语法、翻译和辞书等。翻译作品将汉文化中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译成满文，使满族便于了解接受。这些汉文著作大多具有通俗性、普及性特点，译成满文后，阅读、接受的层面也更宽广。尽管书坊是出于赢利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7. 清代满文坊刻本还有一个特点是满文研究著作比较丰富，比较全面。在清廷提倡清文政策的推动下，有清一代，从官方到民间对满语文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视。康熙、乾隆两朝在皇帝的倡导、过问下，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学者编纂了一批重要的满文学习工具书，这些“御制”图书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对学习、研究满语文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更多的满文研究成果是通过私人来完成的，这些人有满族、蒙古族，也有汉族，有官员也有未登仕途的文人，从清初顺治、康熙朝到清末的光绪朝，人才辈出，由于他们对满语文的热爱、探求、研究，满语文研究著作不断涌现，硕果累累。众多的作品通过民间书坊刊印成书，流传至今。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满语文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轨迹，反映了清代近300年满语文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研究水平，对今天满文的学习、研究和教学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可以说在这些方面，满文坊刻本功不可没。

满文图书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满文在清代尊为“国书”，尤其在顺治、康熙年间，满文使用面很广，是

统治民族的独立语文，公文奏折多用满文，开科取士也按满汉分榜考试，并广开学校，教授满文。清初在北京的传教士、驻华使团等外国人也把学习满语文作为首要的任务。康熙年间，俄国政府还“申请遣人进京学习国书，俟通晓文理后换回，遇事即以清文兼俄罗斯及西洋话缮写驰递，庶有印证，以免舛误”。[1] 俄国传教团规定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和教徒必须学习满汉文，雍正六年（1728年）俄政府“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于满汉教各派一人教之”。[2] 顺治朝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康熙朝的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都是精通满文的饱学之士，他们可以用满语与皇帝对话，并将西方的一些著作如《几何原本》、《西洋药书》、《割体全录》等译成满文进献给皇帝。（图66）

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动词的变化、动词词尾的变化、连贯语的连接词等语法特点对西方人而言较容易接受，而汉语文对西方人则如“天书”一般。正是由于这一点，清初的传教士多是通过儒家经典的满译本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还将一些汉籍的满译本译成西方各国文字，如四书、《三字经》、《性理精义》、《辽史》等译成了德文，《通鉴纲目》、《三字经》、《圣谕广训》等译成了意大利文，《金史》、《易经》、《通鉴纲目》等译成了法文，《大清会典》、《八旗通志》、《理藩院则例》等译成了俄文等等。[3]

外国传教士充分认识到满文图书的重要价值，所以在中国大量收集满文图书运回国内。现在许多国外图书馆收藏有满文图书，藏量比较多的有俄、日、美、英、法、德、意等国，其中有一些满文书国内已没有了。

满文图书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历史上帮助了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西方的

【1】松筠：《绥服纪略》，收入《北徼汇编》。

【2】俞正燮：《俄罗斯事辑》，收入《北徼汇编》。

【3】田继周、滕绍箴等著：《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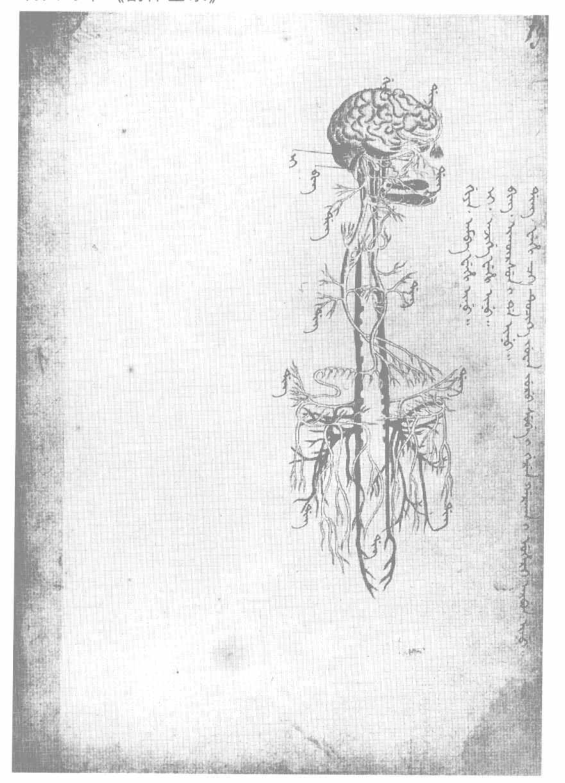


图66
满文写本《割体全录》

文化主要是一些科技知识又通过满文传到了中国，尽管接受的范围仅限在皇室和一部分上层官员的范围内，但满文图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起到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四、满文抄本图书

满文抄本图书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宫内抄本，其中当首推《四库全书》中的满文图书。《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征集全国私人藏书开始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前后共费11年时间。《四库全书》共收录3 503种图书，共36 304册，分装6 144函，其中带有满文的有14种图书：《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志》、《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御制清文鉴》、《钦定同文韵统》、《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清政府编纂的一些图书有的刻本与抄本并存，如列朝皇帝圣训，既有殿刻本，亦有抄本。抄本又分大红绫、小红绫、小黄绫三种规格，抄写字体工整，装帧精致。有的仅有抄本，如列朝皇帝实录，没有刊刻过，只有精抄本留世。这种抄本亦分大红绫、小红绫、小黄绫三种，每种只一套，现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著名的《五体清文鉴》也只有抄本存世。同治、光绪时期，官方所修满文图书只有稿本、抄本，再未刊刻过。

宫内抄本另一类是小说，这批小说都是从汉文翻译而来，全部用满文抄写。如《封神演义》、《连城璧》、《列国演义》、《南宋演义》等。有的汉文本已很难见到，但满文译本尚在，如《金粉惜》等。有的是稿本，如《水浒传》、《寒彻骨》等。有的还是当时的禁书，如《樵史演义》。这些小说都以抄本形式保存在故宫图书馆，大部分是孤本。

宫内抄本还有一类是装帧特殊的精品书，从其内容看，一是

佛经，如乾隆年间的《无量寿佛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另一类是歌谱，如《平定金川乐章》、《乾清宫普宴宗亲世德舞乐章》、《庆隆舞乐章》等。这些抄本都是在磁青纸上用泥金正楷精写，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装帧考究，都是乾隆时代的遗存，现都保存在北京故宫图书馆。

大多数抄本还是属于民间的，这部分数量众多，内容庞杂，有个人未刊的作品，如敷伦泰的《庭训录》（乾隆四十一年）、题了尘拙叟的《格言》（雍正元年）等。也有传抄的作品如《百二老人语录》等。再有是自己翻译的汉文诗词，如扎克丹译的《名士百花诗》、《醉墨斋》，还有题润斋主人重订的《十二重楼》等。较为常见的是个人为了学习满文而编纂、抄录的词语、话条等。

第三节　蒙古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一、清代蒙古族的概况

明末蒙古族经过长期的分裂割据，逐渐形成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卫拉特）蒙古三大部分。清王朝从兴起之初，对蒙古民族就十分重视，后金时代通过恩威并施的方针统一了漠南蒙古，康熙三十年（1691年）漠北蒙古各部王公与漠南蒙古各部会盟于多伦诺尔，康熙皇帝亲自宣布喀尔喀蒙古仿漠南蒙古，编设49旗，并授以印信，这标志着喀尔喀蒙古从此正式隶属清朝。

漠西蒙古以清初的准噶尔部最为强大，对清朝几度叛顺，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终于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统一了漠西蒙古。

清王朝对蒙古实行满蒙联盟的方针，通过联姻、分封、赏赐等手段笼络蒙古上层封建主，同时实行盟旗制度，加强了对蒙古群众的直接统治，在宗教方面，大力提倡黄教，蒙古各部终于终结了几百年来分裂战乱的黑暗时期，在和平、统一、稳定的环境

下，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蒙古的文化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在语言文字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品问世，在医学、天文、历法等方面吸收了汉、藏等民族的传统精华，创造了新的重要成果。蒙古族十分重视教育，设立了蒙古官学、书院、书斋，寺庙兴办经文学校，民间开办私塾，到清末蒙古各族还兴办新式学堂。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图书业的兴旺发达，清代蒙文图书的出版事业超过了历代的水平，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二、清代蒙古文图书出版概况

（一）佛教典籍

清统治者大力提倡藏传佛教，用宗教来巩固与蒙古各部的关系。乾隆帝在《喇嘛说》中写道："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1] 由于清政府将藏传佛教作为统治蒙古诸部的重要工具，所以清代蒙文官刻本中占大多数的是藏传佛教经典。以国家图书馆蒙文古籍藏书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刻本图书约有146种，其中佛教经典类有105种，占71.9%，其他类别图书如人物传记、辞书等与佛教也有密切关系，这虽是一个单位藏书的情况，但有相当的代表性。

【1】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57–58页、106–109页，民族出版社，1993年。

翻译出版《甘珠尔》、《丹珠尔》是清代蒙文图书出版事业的两大工程。《甘珠尔》的蒙译工作在阿拉坦汗和林丹汗时期已经完成，但只有抄本，到康熙年间，清政府又组织一批高僧学者进行校刊、汇编，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刊印。到乾隆时期，清高宗命章嘉呼图克图、大固什阿旺丹培等二百余名喇嘛学者费时8年，编成佛典巨著《丹珠尔》，共225卷，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刊印。（图67）在藏传佛教中，"甘珠尔"是佛祖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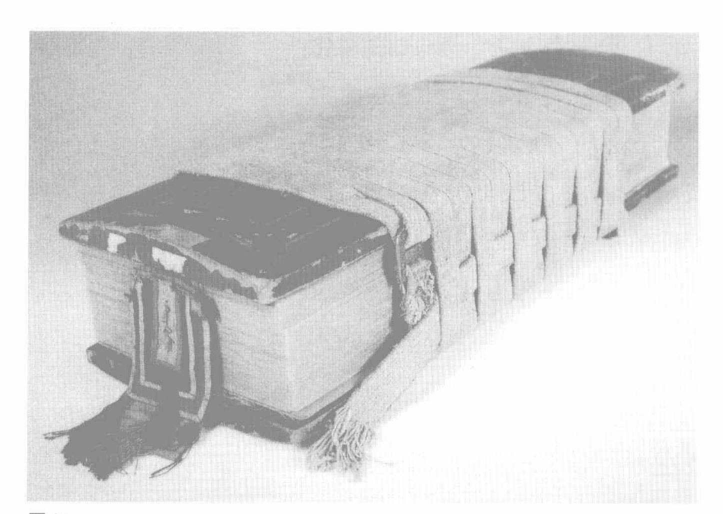


图67
清蒙文刻本《甘珠尔》

的话，分为戒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集、涅槃、密乘等七个部分。“丹珠尔”意为论部，是佛的弟子对经律的阐述、注疏、密宗仪轨和五明杂著等。分为四大类，即赞颂类、咒释类、经释类、目录类。“甘珠尔”和“丹珠尔”共同构成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在北京雕版刊印了《御制甘珠尔》，凡108函，梵夹装，朱印本，框高17公分，宽59公分。上下夹板用红漆刷印，再用羊毛制的带缠紧。后又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刊印了《御制丹珠尔》。这两部佛典不仅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而且对蒙语文的发展也颇具价值。除了《甘珠尔》、《丹珠尔》以外，还刻过许多佛经，这些佛经大多由藏文翻译而来，有一部分是蒙藏或满汉蒙藏合璧。(图68)

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皇帝命刊刻《如来大藏经》，“上为两宫禔福，下为百姓降祥”。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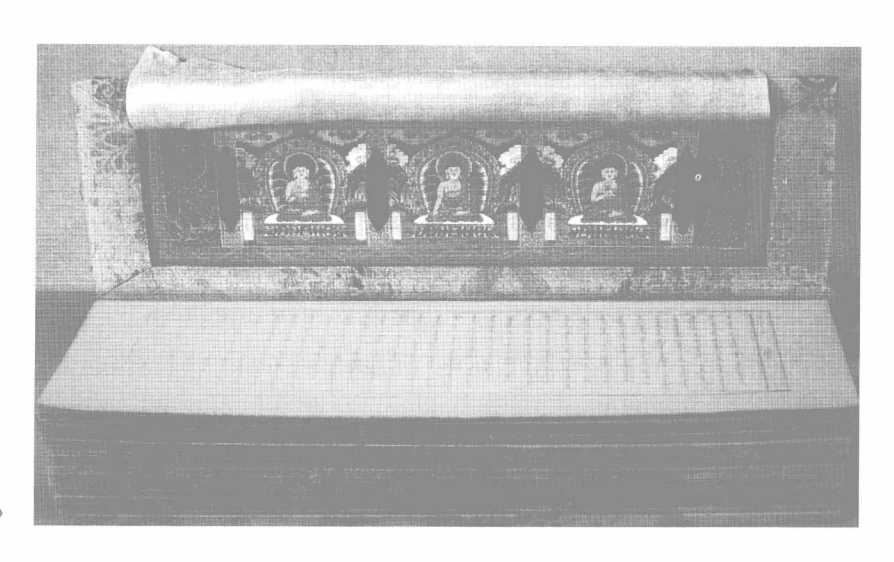


图68
清蒙文朱文刻本《丹珠尔》

了庞大的班子来动作此事，福全为“总理监修”，下面有监修官，由内阁侍读学士、宗人府右司掌印理事官，礼科、刑科和工科掌印给事中、都察院监察御史等十余人组成，下设对勘喇嘛四人，为首者是章嘉胡图克图，又设校阅经文喇嘛，由“总管京都喇嘛班弟查萨克大喇嘛”墨尔根绰尔济等三名高级僧官组成。作具体编译工作的称“对读经字喇嘛”，约有40余人。此部《大藏经》的序言与目录是满、汉、蒙、藏四体合璧，参与校阅翻译誊录的有十余人，具体分工是校阅序目录官有三名内阁侍读学士，翻译汉文目录官有二名内阁撰文中书，翻译蒙古文序目录官有二名内阁办事中书，满文誊录官为内阁办事中书、内阁撰文等3人，蒙文誊录官为内阁办事中书、内阁撰文3人，汉文誊录官为内阁办事中书2人，藏文誊录喇嘛3人。

通过这一名单可以看出清政府对编纂这部《大藏经》投入之多，机构规格之高，组织之严密，分工之明确。《如来大藏经》包括《密经》25卷、《大般若经》14卷、《第二般若经》4卷、《第三般若经》1卷、《诸般若经》1卷、《大宝积经》6卷、《华严经》6卷、《诸品经》、《律师戒行经》。这部大藏经历时17年，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月方告刊成。主持翻译的是藏文教习索诺绰尔济和副教习官石头。前者持“总管京教喇嘛班弟查萨克大喇嘛”衔，后者为食四品俸的僧官。

这部康熙早期刊印的《大藏经》，现国家图书馆藏有该《大藏经》的目录。从目录一函的情况来看，装帧形式为梵夹装，框高16.4厘米，宽67厘米，朱印，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雕印，每一种文字自成一组。叶右下角用汉字注明页码，以“上”“下”来分正反面。不论用何种民族文字雕版，页码都用汉字标注，这是北京版的一个特点。用纸与蒙文《甘珠尔》经相似，较厚，经300多年现状良好，在经的侧面绘有精美图案，但所用夹板较薄，不及《甘珠尔》护经板厚重。通过《如来大藏经》的出版情况可以了解清朝官方对组织翻译出版民族文字佛典的重视程度。

（二）辞书出版物

辞书是清代蒙文图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随着书面语言形成和规范化，蒙族学者编纂了许多蒙语语法图书和蒙语辞书，由于译经的需要和社会交往的扩大，还编纂了许多蒙文和藏、梵、满、汉等语言对照的辞书。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在《清文鉴》的基础上，加注蒙文，成为《满蒙文鉴》，由武英殿刊印，这是清代成书最早的蒙文官修辞书。后来还出版了《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乾隆三十六年殿刻本），《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乾隆抄本）、《西域同文志》（乾隆二十八年殿刻本）等。《蒙文启蒙》是一部蒙文早期语法著作，包括蒙古文字史、字法、语音类别三部分，雍正年间拉布金巴·丹赞达格巴根据现已失传的同名著作编写，是蒙文早期语法著作的典范作品。

《蒙文指要》、《蒙文总汇》是清代蒙古族学者赛尚阿编著的蒙文语法、词汇图书，前者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刊印，后者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经李鋐校订后由武英殿刊印。这两部图书在蒙语语法研究和词典编纂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后来的词典编纂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三）文学作品

蒙古文学在民间有着广泛深厚的基础，说书“好来宝”等讲唱形式在蒙古草原上广为流传，有许多作品开始是在民间传唱，后来才演变为书面文学的，卫拉特蒙古地区的《江格尔》就是这样，另外一部英雄史诗《格斯尔》也是如此。

《格斯尔的故事》是一部流传在我国蒙古族地区、蒙古国及俄国布利亚特蒙古地区的英雄史诗，原为藏族史诗《格萨尔》，16世纪由西藏、青海传入蒙古，与蒙古史诗相结合，形成了蒙古版的《格斯尔》。主人公格斯尔是一位由天神转世的英雄，他能呼风唤雨，神力无穷，他斩妖降魔，为民除害，深得民心，被百姓尊称为雄狮大王。《格斯尔的故事》涉及到蒙古族的语言文学、宗教、历史、生活习俗等方面，是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学的重要

文献。这部作品一般认为产生在11世纪，因流传的时间长，传播的地域广，所以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版本。蒙文版的《格斯尔的故事》主要有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北京刻本。这一版本为梵夹装，框高14厘米，宽46.5厘米，上下双栏，版框左侧有汉文“三国志”三字，书名页背后朱印佛象，末页朱印刘备、关公、张飞、诸葛亮图。另有多种抄本，其中有三个抄本是在国内发现的，即北京隆福寺本、乌素图召本和鄂尔多斯本，另有4个抄本在蒙古国发现。这些本子都是近代蒙古文，此外还有三种托忒蒙古文抄本。（图69）

16世纪后半叶，黄教传入蒙古，到清代传播更为兴盛，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深深打上了藏传佛教的印记。蒙古族高僧一般都精通蒙文、藏文，有的还懂梵文、满文、汉文。据不完全统计，有清一代用蒙文或藏文留有作品的高僧作家约有200余人，作品难以计数。[1] 这一时期传记、小说及翻译作品等数量之多，题材、体裁之广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顶峰。

【1】《蒙古族文学史》，第二卷，46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在故事创作方面，有些是从藏传佛教故事翻译而来，但在翻译过程中，经过了增删、修改使之适应于蒙古族的生活和文化环境，成为有强烈蒙古民族特色的作品，如《乌善拉达汗传》是从

图69
清蒙文刻本《格斯尔的故事》

佛经故事《圣者义成太子经》演变而来，由丹巴达尔杰译写，此人是锡盟苏尼特右旗人，曾在乾隆年间参与翻译《丹珠尔》。蒙文《乌善达拉汗传》的主要人物，基本故事情节和宣扬佛法的主题思想与原著是一致的，但在部分人物、情节等方面有所变化、删减，并增加了蒙古特有的抒情韵文，使蒙古僧俗群众更易接受。这部作品以抄本形式流传。

《绿度母传》也是在蒙古地区流传较广的佛教故事，有多种手抄本，并以说唱形式广为传播。这部作品渊源于藏传佛教故事，但其蒙古色彩更为浓厚。

《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奇》是短篇佛教劝世小说，有5种抄本传世。第一种是蒙古学者策·达木丁苏荣藏本，来源不详，竹笔抄本，年代最早，根据文字形态特点，属17世纪前所抄。第2~4种藏于俄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图书馆，编号分别为F244、F38F141、C4，F38，署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抄，其余均无抄写年代。

此书的情节来自中原和印藏，但属于蒙古文人自创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出现了人物、情节完全虚构的具有小说基本特征的传奇故事，这是蒙古族小说发展形成中的一个质的飞跃。

《恩德固日勒的故事》是根据佛教故事创作而成，于17世纪文人创作的纯韵文形式（诗歌）。有多种版本：（1）蒙古国国家图书馆藏本；（2）竹笔抄本，蒙古国作家杜固尔扎布寻访到；（3）–（6）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图书馆，藏本书号为C223、F68、F543、H444。在这部长篇叙事诗结尾，有一段跋文，记述了写作的缘由、作者的姓名及写作时间："遵照阿巴岱汗之孙、额列克·莫日根汗之子、属民百姓母亲般的都日格克其那颜策布登于阴金牛年的旨令，曾在五世达赖喇嘛面前受格隆戒的扎日里根·额日赫图·达赖，于阳水虎年创作写毕。"经考证，作者是蒙族高僧哈旺嘉措，1661年接受喀尔喀部那颜的旨令开始创作，1662年完成。[1]

[1]《蒙古族文学史》第二卷，65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一层楼》、《泣红亭》、《大元勃兴青史演义》三部书是蒙古

族著名作家尹湛纳希（1837—1892）的代表作。《一层楼》（约同治三年至四年即1864—1865年完成）、《泣红亭》（光绪三年即1877年完成）是两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在蒙古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两部是姐妹篇，反映了蒙古封建主的奢侈腐朽生活和广大农牧民的悲惨遭遇。这两部著作受《红楼梦》影响极大，不但吸收了汉族文学的精华，也丰富了蒙古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这两部章回小说最早都以蒙文手抄本的形式流传。

尹湛纳希在其父遗稿的基础上于同治六年（1867年）开始撰写《大元勃兴青史演义》，这是一部史论体著作，叙述了成吉思汗建国以来的历史故事，在蒙族文学中影响很大。

以尹湛纳希的这三部长篇小说为标志，蒙古族的真正的书面纯文学出现了，同时也标志着受印藏佛教文学影响时代的结束，在汉文化影响下进行文学创作的新时期开始了。

（四）史学作品

《蒙古黄金史》又名《大黄金史》，作者罗卜藏丹津利用《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纲》及现已佚文献编写，大约成书于清初，此书与《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被称为蒙古族三大历史著作，其唯一的手抄本藏于蒙古国国立图书馆，此书原是察哈尔一个贵族家藏本，为梵夹装。

《蒙古源流》原名《珍宝史纲》，是鄂尔多斯蒙古人萨冈彻洪台吉写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作者参照藏文、蒙文文献，结合自己的经历、见闻写成此书，对蒙古历史的发展、与佛教的关系、帝王的世系等都有详尽的叙述，是研究蒙古族历史，特别是明代以降的蒙古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对蒙古文学、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也极具价值。

《蒙古源流》一书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外喀尔喀蒙古亲王、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献给皇帝，乾隆帝敕令将此书重抄一遍，此抄本被称为内府抄本，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被译为满文和汉文，在翻译过程中作了一些修改，最后由乾隆皇帝改定书名，由武英殿刊印。成衮扎布的呈献本现已下落不明，但其

原家藏本现收藏在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有学者将此家藏本与内府抄本相校，发现后者少了吐蕃迎文成公主入藏、汉高祖至金末中土皇统简史、清顺治帝之死和康熙初年史事等三大段。[1]

【1】乌兰：《〈蒙古源流〉研究》，46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

（五）传记作品

《成吉思汗传》，全称名为《黄金史之成吉思汗传记》，竹笔黑墨抄本，经卷纸共97页，每页14行，行3—4字。1958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新宝力格苏木一个山洞中被发现。根据抄本的文字和版本特点，研究者认为此部作品成书时间可能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2]

【2】《蒙古族文学史》第二卷，60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乃吉托音传》，全称《圣者乃吉托音达赖曼殊室利传——开光显扬如意珍鬘》，作者帕日吉纳萨嗄拉，为蒙古僧人，生平不详。原书注明成书时间为“已未年”，据此推为康熙十八年(1679年)，[3] 最早在北京以木刻本问世。此书被认为是蒙古传记文学的典范，在蒙古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3】《蒙古族文学史》第二卷，60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六）翻译作品

清代蒙古僧人和文人翻译了许多藏文、汉文、满文的优秀图书，这些翻译作品丰富了蒙古族的文化宝库，许多翻译著作成为蒙古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通过藏文翻译的作品大多是与佛教有关的作品，规模最为宏伟的当然是《甘珠尔》和《丹珠尔》，这是佛教的经典，地位尊崇，因此特在前面单列一节。随着佛经的蒙译，许多西藏、印度的作品也译成蒙文，广为流传。如《萨迦格言》、《尸语故事》、《育民甘露》、《米拉日巴传》、《三十二个木偶的故事》等。一些医学著作也被译为蒙文，如《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蒙藏合璧医学》、《脉诀》、《药五经》等。这些印、藏文著作的翻译者都是谙熟藏文的僧人，有的还通梵文。

汉文著作的蒙译，在皇太极时代就开始了，崇德四年（1639年）奉皇太极之命，在大学士希福主持下，图登、乌力寨图、色楞、索诺木等将辽、金、元史译为蒙文，此为清代汉文译蒙之开

端，后又有《圣谕广训》、《四书》、《孝经集注》、《三字经笺注》、《黄石公素书》、《吏治辑要》等陆续译为蒙文。

清代早中期汉文书籍的蒙译者大多是官员或是官方色彩较浓的文人，所译的作品大多以儒家经典和正史为主。19世纪以后，汉籍蒙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以官方为主逐渐变成以民间为主，译者从以官方文人为主过渡到以闲散文人为主。这种变化使更多的汉文图书译成蒙文，汉文化对蒙古族的影响逐渐加大。

道光朝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之间交往的日益密切，出现了一批精通蒙汉语文的人才，他们将大量汉文名著典籍译成蒙文，其中像哈斯宝、尹湛纳希父子、贡桑诺尔布父子、都格尔扎布等都是译介汉文名著的佼佼者。据不完全统计，被译成蒙文的汉文著作约有八九十种，从四书五经到历史、文学名著以及通俗文学的演义话本，种类繁多，应有尽有。

哈斯宝是出身蒙古贵族家庭的一位著名文人，约生于乾隆晚期，卒于道光至光绪年间，他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翻译了《今古奇观》，以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在蒙古地区，但这个译本并不完全。《今古奇观》还有一个全译本，现收藏在蒙古国公共图书馆，集体翻译，共40卷，抄本。

哈斯宝根据《隋唐演义》和《梅妃传》编译成《唐宫逸史》、《唐宫逸史补》，各四卷，内蒙古图书馆藏有手抄本，为孤本。

《新译红楼梦》，哈斯宝节译，共40回，哈斯宝不仅翻译了《红楼梦》故事本身，还写了大量评论，包括序、回批、读法、总录等。显示了他不仅是翻译家，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对以后的蒙古族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水浒传》曾多次被译为蒙文，广为流传。现知有两个抄本：一是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本，这一抄本无译者、年代记录，百回本，有删节、改写，缺62–64回。此书1977年由内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出版；二是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藏本，原为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藏书；70回本，末有“全译第五才子书、大清朝宣统元年，仲夏月十三日吉日写毕。笔帖式喇嘛巴图尼格塔毕力格图、

臣宰桑齐格道日扎布霍尔查毕力格图等缮写，五品顶戴先生王生吾即乌力吉图、臣宰桑巴勒登策林毕力格图、朝格巴达拉胡贺策英胡等蒙译”。此本有黄布封面，这是八世哲布尊丹巴藏书的特有标志。此本亦为增删、改写本。

《唐朝薛礼平东辽传》，简称《东辽传》、《薛礼征东》。手抄本，在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社科院图书馆、民族图书馆等单位有藏本，蒙译年代、译者不详，十六卷。其底本是姑苏如莲居士《说唐薛家府传》，有增删改写。

《金瓶梅》为手抄本，现知有二种三部：（1）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本，仅存第66回；（2）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藏本，共二部，一部为黄缎封面，此为八世哲布尊丹巴所藏，一百回，据《八世哲布尊丹巴蒙文手抄图书》载，该译本完成于1910年，“40册，2 600页，手抄本，为警戒沈溺于色情，撰写于十一世纪的一种汉文学作品”。“由策达瓦、益达木等译自满文”。

另一部为红布封面，不足百回，残本，是同一译本的不同抄本，转译自满文译本。由满文译本转译汉文作品，是蒙译小说的一条重要途径。[1]

【1】《蒙古族文学史》第二卷，57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清代蒙文刊本书籍主要以木刻本为主，其中的官刻图书刻印主要有武英殿和天清番经局两处。武英殿是皇家刻书机构，许多官方编纂的蒙文非宗教类图书多在此刊印，如辞书、政书等。宗教类图书多在天清番经局刊印。天清番经局在嵩祝寺，这是乾隆国师章嘉活佛驻锡之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刊印了蒙文《大藏经》，后又开设天清番经局，在此刊印了许多蒙藏文图书，有很多经版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在。

清代蒙文图书的坊刻本也较多，其内容大多是以四书五经为主，此外还有《三字经》、《名贤集》等，主要是满足启蒙与科考之用。当时北京琉璃厂的保翠斋、三槐堂、文真堂和护国寺的萧氏都有蒙文图书刊行，外地的荆州驻防翻译总学等也有刻本。这些坊刻本大多是满汉蒙三体合璧，或蒙汉合璧。

清光绪年间，石印技术传入我国，从这时到民国时期，出现

了一些蒙文的石印本。石印本图书多为双语或三语（满蒙汉）的词汇集和教科书，如《成语词林》、《分类汉语入门》、《三合教科书》等。光绪年间北京专有石印馆从事石印图书，清末又有北京正蒙印书局也从事石印图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的崇正学堂还出版一份名叫《婴报》的报纸。清末的“新政”之风也吹到了遥远的蒙古草原。

在蒙古地区，一些规模较大的喇嘛庙不但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木刻印刷的基地。如察哈尔的查干乌拉庙，便是一个重要的蒙文图书木刻印刷地，由该寺的主持察哈尔格西创办了印经院，刻印了《萨迦格言》、《育民甘露》、《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全集》等多种文献。[1]

此外，大库伦、阿拉善延福寺、青海塔尔寺、五台山等处都有蒙文木刻印刷。北京的净住寺有专门的木刻印刷所，乾隆年间由毕力衮达赖主持刻版印刷了蒙文《甘珠尔》和《丹珠尔》经。位于京城中心的嵩祝寺是章嘉活佛的驻锡之地，这里出版过大量蒙文刻本图书。建于元代的白塔寺在元代便是一个蒙文图书的出版中心，在清代还设有木刻印刷坊所。[2]

蒙文刻本图书的装帧形式主要有梵夹装和线装两种，前者内容多为佛经，但也有一些世俗作品,如乾隆五十五年（1716年）北京版的文学名著《格斯尔的故事》即是梵夹装。梵夹装亦有二种不同形式，一种是上下用板相夹，考究的木板上还要上红漆，描金线，如《甘珠尔》便是这种形式，每函用羊毛织成的绳子捆好。这种姑称为精装本。另一种是简装本，同样是活页长条书，但上下木板用特别颜色的纸（一般是黄色稍硬）代替。封面纸上印书名，这种简装的梵夹本更为常见，线装形式的蒙文图书和汉文线装古籍一样，世俗文献大多用此形式。

从内容上看，蒙文翻译图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受印藏文化影响翻译创作的作品，另一类是汉文图书的翻译作品。前者的著译者多为喇嘛，其中有些是学问渊博的高僧大德。后者的著译者大多为闲散文人，也有一些笔帖式或有文化的喇嘛。这些在汉

【1】《蒙古族文学史》第二卷，57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2】《蒙古族通史》下卷，386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

文化影响下翻译、改编、创作的作品主要产生在19世纪，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蒙古地区汉籍蒙译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内蒙古的土默特左右旗。特别是土左旗的多罗达尔罕贝勒府和瑞应寺，都有一批蒙汉兼通的文人和喇嘛，他们善于编歌和译编故事，他们的翻译活动基本上是民间自发的，译作以手抄本流传，译文中汉文借词较多，译者大多不署名字。

另一个翻译中心是以库伦为中心的喀尔喀地区。从事翻译工作的多为一个集体，而主译者往往是来自内蒙古的蒙汉文兼通者，译者大多在书后署名。这里的翻译活动得到王公贵族和宗教领袖的支持。

三、托忒蒙古文书籍的出版

托忒蒙古文又称陶德蒙古文，这是顺治五年（1648年）卫拉特部高僧扎雅班第达（1599—1662）根据卫拉特部方言特点，对原有的蒙古文略加改动而成。以加圈点和改变字形的办法使一个字母只表示一个音，另外设附加符号使长短元音分明。识读时比原来的蒙文更为清晰，故称“托忒蒙文”，意为“清楚的”蒙文。这种文字在新疆卫拉特部一直沿用至今。

托忒蒙古文图书存量较多。据记载，扎雅班第达创制托忒蒙古文后，从顺治七年到康熙元年（1650—1662），与他的弟子翻译了二百多部作品，大多为藏传佛教经典，也有一些是世俗典籍，如《明鉴》、《四部医典》等。托忒蒙古文图书很多以抄本形式在卫拉特地区流传，民间也有一些刻本。清代蒙古学者、吉林将军富俊编有《蒙古托忒汇书》（嘉庆二年北京刻本），著名官修的《西域同文志》也包含了托忒蒙文等六种文字对照。一些佛经如《弥勒佛赞》、《渡母佛赞》、《般若波罗密千百颂》等也有托忒蒙文本。在一些碑铭上刻有托忒蒙文，如《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下马碑》等。（图70）



图70
清托忒蒙文抄本《西游记》

第四节　察合台文书籍的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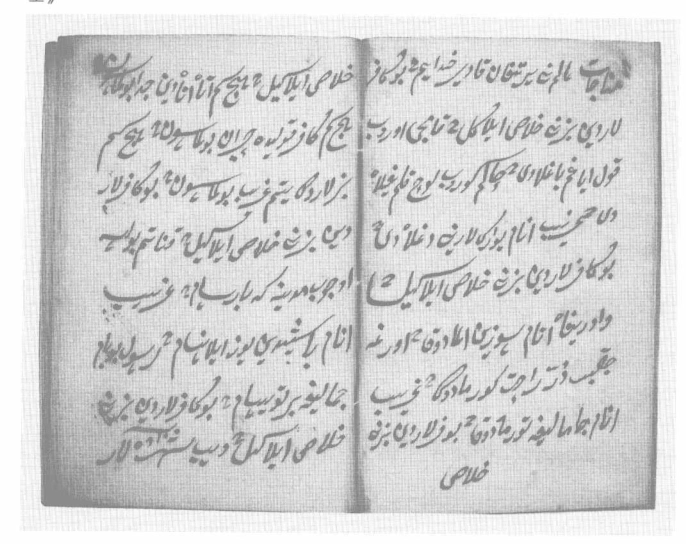
清代是新疆版图基本定型的时期，在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康熙朝开始，清王朝一直在为统一新疆而不断用兵，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至此天山南北重新纳入清朝版图。清统一新疆后，经济日益繁荣，各民族和睦相处，作为新疆最大的伊斯兰化的族体，维吾尔族迎来了一个空前发展时期，其文化日益发展。清代新疆原有的古老宗教都已衰亡，伊斯兰教已成为维吾尔全民族信仰的唯一宗教，因此这一时期维吾尔文化的伊斯兰色彩也更加浓厚。

清代维吾尔人继续使用察合台语作为统一的文学书面语。清王朝对察合台文十分重视，在一些与少数民族领袖人物有关的重

要场所使用多种民族文字，其中便有察合台文。如作为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的承德避暑山庄，其正门为“丽正门”，门楣使用满、汉、蒙、藏、察合台五种文字镌刻，北京大高殿等处下马碑也是上述五种文字并用。乾隆帝钦定的《西域同文志》用汉、满、蒙、托忒蒙文、藏和察合台等六种文字相对照，这部书有武英殿刻本，还收入四库全书中。乾隆后期编纂成的《五体清文鉴》是清代官修的一部重要辞书，其五体即为满、汉、蒙、藏与察合台五种文字。这部书当时并未正式刊刻出版，目前仅知抄写了三部，其中一部现在英国，其余两部，一部原放在宫内储藏图书的景阳宫，另一部则在乾隆皇帝每年接待少数民族王公的重华宫。想必当年维吾尔的王公、台吉在此觐见过皇帝。《五体清文鉴》直到1957年才被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

在新疆用察合台文写作的大量作品不断涌现，其内容涉及宗教、历史、文学、医学、农学、天文等各个领域。《西域图志》是乾隆皇帝下令编制的第一部新疆官修通志，其卷48载“回书有名‘陀犁克’者，如内地之史。字书名‘阿里卜’，回经名‘库里安’，医书名‘惕普奇塔’，农书名‘哩萨拉’，占候之书名‘鲁斯纳默’。余书凡数百种”。“回书”即察合台文书籍，可见当时察合台文书籍种类之多。用察合台文写作的文学作品更是名目繁多。（图71）

图71
清察合台文抄本《向喀力士》



维吾尔文人还将很多伊斯兰国家的作品译成了察合台文，如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1740—1849）将阿拉伯文《台白里史》译成察合台文，又自撰几章加入其中，更名为《斯坎德尔史和王冠书》。阿布杜拉·麦赫苏木将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译成察合台文，夏赫·伊吉兰译有波斯名著《诸王书》和

《果园》。印度作品《达拉布王传》和《凯米拉与笛木乃》也被马合木提·铁木尔译出。译成察合台文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著作还有《贝纳克提史》、《穆赫斯尼德》、《圣人列传》等。17—18世纪察合台文图书还有麻赫穆德·朱拉斯的《编年史》，诗人海尔克特的长诗《爱情与苦难》等。19—20世纪初的图书主要有《爱情长诗集》（尼扎里等著）、《凯旋记》（毛拉·沙克尔著）、《抒情诗集》（毛拉·比拉勒著）、《娜孜古木》、《安宁史》等。（图72）

察合台文图书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大多以抄本流传。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在塔什干、喀山等地有石印本、铅印本问世，在新疆流传的察合台文图书的封面多以羊皮制成，有些封面还压有花纹，不但美观而且经久耐用，成为察合台文图书的一大特色。

图72
察合台文《安宁史》

察合台文文献大多保存在俄国、中亚诸国、土耳其、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收集察合台文文献，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新疆、北京等地保存有相当数量的察合台文图书。

第五节　藏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明末清初，藏族地区为额鲁特蒙古的和硕特、准噶尔等部所钳制，后逐步作了重大改革和调整。清朝设置理藩院专理蒙古、西藏事物，采取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正式册封格鲁派两大活佛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定了达赖和班禅的名位。雍正六年（1728年）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会同地方办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军击退廓

尔喀人的入侵，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更加明确了治理西藏的政策。鸦片战争后英军入侵西藏部分地区，激起藏汉各族人民的坚决反抗。西藏地区直至在20世纪上半叶还保存着封建农奴制度。

一、藏文大藏经雕刊的高潮

清代由于满族统治者在藏、蒙地区大力发展藏传佛教，藏文大藏经多次雕版、印刷，地域广，版本多，印量大，使藏文大藏经雕印事业达到高潮。先后又有北京版、卓尼版、德格版、那塘新版，各种版本都有自己的特色。

（一）北京版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又名嵩祝寺版藏文大藏经、朱版藏文大藏经。清康熙皇帝下令在北京刻印《藏文大藏经》，据西藏夏鲁寺布顿写本在北京嵩祝寺刊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竣，称康熙版《藏文大藏经》，亦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先刻了《甘珠尔》106帙。乾隆初年曾作过修订。至雍正二年（1724年）续刻了《丹珠尔》，225帙。早期印本大部为硃刷，也称赤字版，也有黑字版传世。版片毁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役。该版藏经因系清王室官刻本，刻造、装帧颇为精良，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每夹扉画均为手工绘制，笔触细腻，设色鲜丽，大多出自藏族和蒙古族宗教画家手笔，世称华丽版。但藏文字体不如拉萨版和德格版。该版藏经曾流传到日本和欧洲。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曾据以编为151巨册（内含目录一册）影印百余部，分为两种精装本发行。[1]

【1】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55页，民族出版社，1993年。

（二）德格版

德格版藏文大藏经是清雍正八年（1730年）至乾隆二年（1737年）在四川德格县刻造。其中《甘珠尔》为理塘版的复刻，《丹珠尔》则据夏鲁寺写本并增补布敦目录所收典籍雕造。经版藏德格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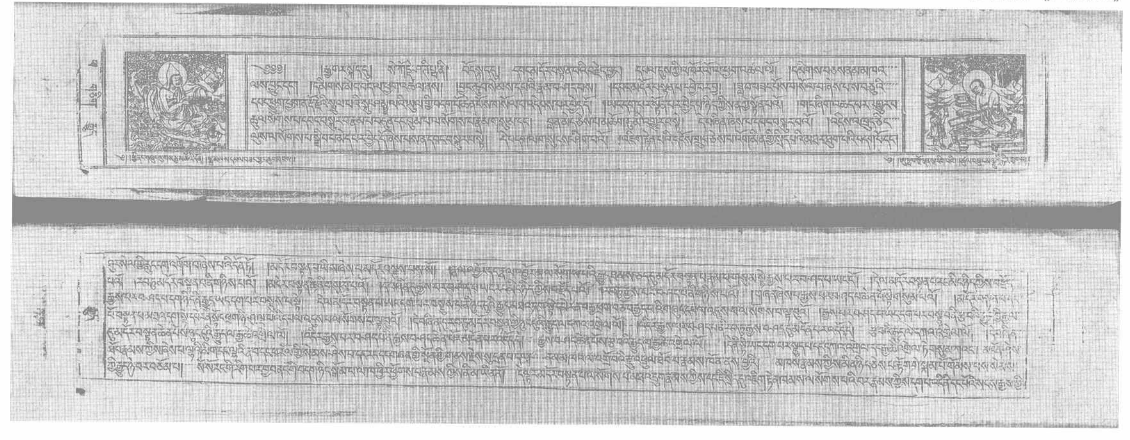
据统计，德格版藏文《大藏经》共收佛教经籍4 569种，除

佛教经、律、论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其中属于密教的经轨及论藏等，十之七八是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因此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德格版《大藏经》内容丰富，工艺考究，字体清晰朴实，校字精细，刻工优美，堪称善本，见称于世。特别是其书版别致，全部用细密而坚硬的木料制成，有一手柄，两面雕印，雕刻刀深而光洁，十分清晰。印刷有红版和黑版，红版用朱砂印刷，黑版用墨印刷。国家图书馆藏有德格版《大藏经》木刻本。（图73）

（三）那塘新版

在刊刻藏文《大藏经》的高潮中，西藏本土也不甘落后。18世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命第斯·桑杰嘉措主持在那塘寺印经院雕印《大藏经》，据那塘古版增入布敦目录典籍刻造，称为那塘新版。因资金和技术等原因，用了七年时间才刻完《甘珠尔》中的前28帙。不久仓央嘉措被废黜，第斯·桑杰嘉措也遇害，雕印《大藏经》停止。后七世达赖喇嘛令颇罗鼐·索南多杰在那塘寺印经院主持继续刻印。《甘珠尔》成于雍正八年（1730年），共102函；《丹珠尔》成于乾隆七年（1742年），共计225帙。此版版面长70.5厘米，宽15.7厘米，版略呈弧形，中间厚约3厘米，上下渐薄，至边缘约1厘米。左右两端各有2—2.5厘米不削薄，保留原厚度，便于把握操作。四周单栏，左右长57.5厘米，上下宽10.5厘米，栏内有文字7行。经版两面刻字，一面右侧有函号、页

图73
德格版《大藏经》



码，为首面。印本版面略小于经版，长约64厘米，宽约14厘米，函号、页码在左侧。字型美观，刻工细腻，该经以刻工精湛、校勘优良，被誉为最佳版本。该经版版片原藏那塘寺，在“文革”中大部分被毁损失散。但有几种刻本存世，有的刻本由于纸、墨质量较差，印面字迹不太清晰。国家图书馆藏有那塘版《大藏经》。（图74）

（四）卓尼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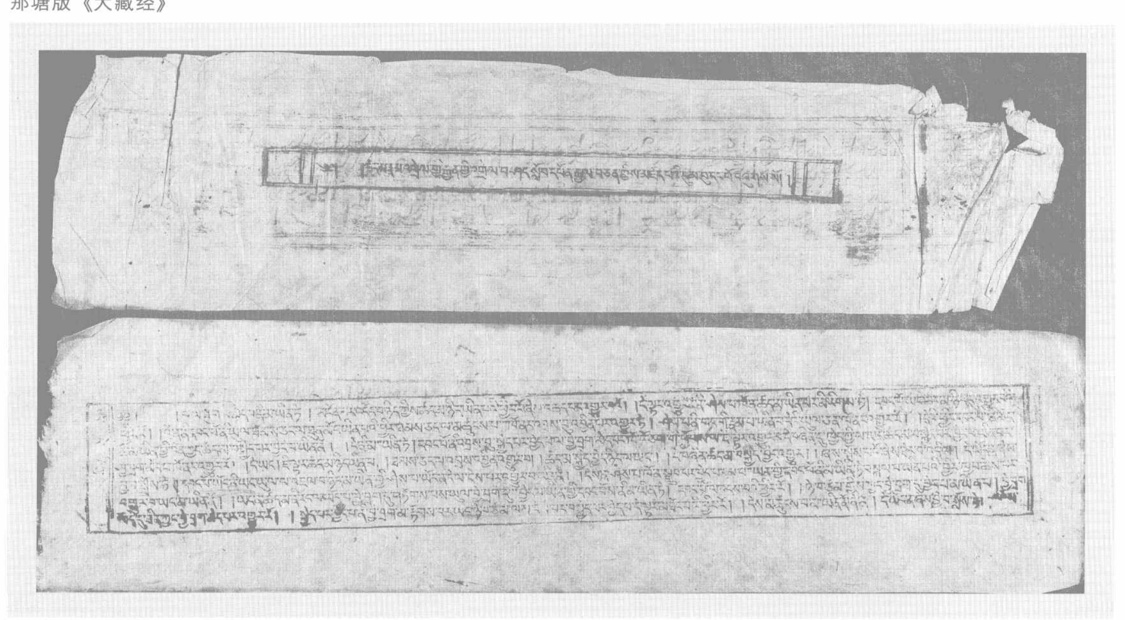
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乾隆十八年（1753）在甘南藏区东南部甘肃临潭县卓尼寺雕造新的藏文版《大藏经》，是为卓尼版，这又是一件在藏传佛教文化史和藏文印刷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盛举。现版片已经不存。[1]

【1】蔡伟、冯振杰、李劲：《藏文印刷史上的盛举——卓尼版〈大藏经〉的刊印》，《寻根》2000年6期。

（五）塔尔寺版

刻于青海塔尔寺。道光七年（1827年）塔尔寺创建印经院，刻印藏文典籍，首先刻印《甘珠尔》。所印书籍畅销藏区各地。每年农历正月、四月、六月、九月都要举行全寺性的“四大观经”法会。现原印经木版片已不存。寺中大经堂的两侧竖立着的高大书柜中，还储藏着全部藏文《大藏经》。

图74
那塘版《大藏经》



除藏文雕版佛经外，藏族地区还有大量藏文写经。书写藏文经典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流通方式，也是虔诚信奉佛教的一种功德。因此抄写的藏文佛经大多工整、细致，因藏文特殊的字体和以硬笔书写，有的竟与刻本佛经相彷佛。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藏文《大藏经》中有多种以金、银字书写。这种经以金、银泥字书写于磁青纸上。纸质厚实坚韧，金银字书写精工，字体优美，版面金光灿烂，高贵豪华。有一种泥金字写经长68.5厘米，上下宽22厘米，左右有双栏线，长60.9厘米，上下字宽13厘米，版面有文字7行，两面书写。一面左侧有函号、页码。

二、史学、文学、医学著作

1643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因顾始汗敦真却季嘉波的要求撰写《西藏王臣记》。五世达赖喇嘛在政治、宗教方面都有很大贡献。他曾应清顺治皇帝的邀请从拉萨到北京朝觐，密切了藏、蒙、满、汉各族的关系。他一生著述宏富，《西藏王臣记》是他27岁时的著作，详细记述了西藏有史以来直至当时顾始汗的历史，不仅有历代王朝的大事，还包括王嗣和大臣的事迹。不仅是重要史籍，也是文学佳作，被藏族尊为珍贵古籍。此书也被国外专家所重，现已有英、法、日、德、俄等多种外文版本。[1]

颇罗鼐是18世纪前期西藏地方政府中被清政府倚重、手握实权的人物。他的历史关系到西藏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撰写他的历史就把握住那个时代的历史。西藏著名学者夏仲·策仁旺杰（1697—1764）撰写了《颇罗鼐传》。策仁旺杰青年时期从名师学习五明之学和宁玛派经典，曾做地方官吏，后被颇罗鼐升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主管前藏事务达30多年。他勤于写作，除《颇罗鼐传》外，还有《旋努达美》、《佛本生记》、《噶伦传》、《藏梵字典》等。《颇罗鼐传》分12章，记述了颇罗鼐的先祖和家世，颇罗鼐错综复杂的一生，包括西藏内部统治者的矛盾、冲突，与蒙古族、清朝的关系，还记录了首刻《甘珠尔》印版及发展刻印技术的重要情况。此书有拉萨木刻本，395页。现已有

【1】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撰，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3年。

铅印本出版。[1]

19世纪初出版了一部令人瞩目的藏文史学著作《土观宗派源流》（全名《善说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晶镜史》），作者土观·罗桑却吉尼玛（1737—1802）也是一位特殊人物。他6岁时被认定为青海佑宁寺土观胡图克图阿旺却吉嘉措的转世灵童，成为第三世土观活佛，青年时期前往拉萨学经，返回青海任佑宁寺法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奉诏进京，任掌印喇嘛、御前常侍禅师，加强了黄教在甘肃、青海的地位。《土观宗派源流》成书于1801年，1802年刊印。书中叙述藏传佛教各教派历史，但偏重宣扬格鲁派和宗喀巴的事迹，书中对内地儒、释、道及蒙古、于阗等地的佛教源流和教义也有广泛涉及，对藏汉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2]

智观巴·丹巴饶杰作《安多政教史》，亦称《史书之海》，成书于同治四年（1865年）。书中着重记述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政教合一实体的形成、中央政府的历史作用、主要历史人物及作用、部分地区的宗教斗争，以及学经制度、寺院庄园等内容。史料真实可靠，叙述完备，是研究格鲁派的要集。以木刻本传世。[3]

有清一代，藏族学者不仅用藏文撰写了大量藏区地理论著，而且有两位到过北京的青海藏族格鲁派活佛用藏文写就了世界地理方面的论著，这比汉族学者要早很多年。其中第一部为青海佑宁寺三世松巴活佛，人称松巴堪布益希班觉（1704—1787）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著《世界总论》。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1683—1706）厌恶政治和枯燥的经文，他热爱世俗生活，创作了不少对情和爱充满激情的诗歌，他的行为引起西藏上层的不满，后被废黜，死时年仅23岁。他的诗歌感情真挚，生动自然，突破了格律诗的古板雕琢，充满了强烈的生活情趣，为广大藏族人民所喜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他的诗歌后人集录成册，拉萨梵夹式木刻本收入57首，后来也有的收入60多首。据传说有的木刻本收入一千多首。

五世达赖在最早的刻本医书《扎当居悉》的基础上，组织人

【1】夏仲·策仁旺杰：《颇罗鼐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

【2】夏仲·策仁旺杰：《颇罗鼐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

【3】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杰：《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

力参阅了大量医学书籍于1687年重新校对、修订，刊印了确切的《四部医典》，1689年在藏首次发行。1704年，全藏的名画家收集了各地药物标本，根据《四部医典》的内容，又重绘了79幅彩色医学挂图，约1 000张。这些挂图立意清楚，用笔精细，具有重要科学价值，保留到今。

三、德格印经院

为了满足藏文书籍的需要，藏族地区相继出现了若干印经中心，即印经院，其中以德格印经院为典型。

在藏语中，德格意为“善地”，是“四德十格”的缩写。这一地名来自于德格家族。在历史上，德格因宗教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繁盛，使它与西藏拉萨、甘肃夏河（拉卜楞寺所在地）一起组成了藏族的三大文化中心。德格印经院位于四川省德格县城东欧普龙山沟口，雍正七年（1729年）由德格第十二代德格土司曲吉·登巴泽仁（1689—1750）创建。他崇信佛教，熟悉文字，精通藏医，被清廷封为德尔格忒军民宣慰使。雍正初年，他请来多名高僧来德格讲经说法。佛教僧俗信众需要经书。为解决经书的供应问题，遂创建印经院。他请工伐木，建筑印经院的房舍，采集刻字所需的桦木，制作经版，并准备纸张、胶墨等用品。他还以优厚的待遇请来造诣高深的藏文书法家，使用著名藏文书法大师群布玉赤和绒波娃制定的40条藏文楷书标准对书写经文的人教授书法，然后择优选取65人书写模版。他还下力培养刻工，在受到培训的上千人中选择400人雕刻经版。经版刻完后邀请谙熟宗教文化的藏族学者和寺庙堪布担任校对。

印经的各种条件都已具备，登巴泽仁准备首先刻印《大藏经》中的《甘珠尔》，请曾留学印度的著名学者、德格八邦寺司徒却吉牛勒活佛整理佛藏《甘珠尔》，并编纂800多页的目录和说明。这样每一个环节都很完备，很顺利地完成了刻印，当时共印刷103部，使举世闻名的《大藏经·甘珠尔》有了最完善的版本。在刻印完成《甘珠尔》后，又刻印了《萨迦言论集》（《萨迦甘

布》）15册、《四部医典》4册、《丹珠尔》20册，以及其他著作多种。于乾隆二年（1737年）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登巴泽仁也成为主持藏文刻印事业的出版家。

登巴泽仁去世后，其次子彭措登巴与其兄弟一起继承父业，扩建印经院，发展藏文书籍的出版事业。其刻印出版的重点是《丹珠尔》。在原刻印《丹珠尔》20册的基础上，广为搜罗，增加了780种，达4 290多种，还编写了长达500页的目录和序言。这部宏篇巨著由80名藏文书法高手、500名技艺高超的雕刻工匠，历经8年写刻完成。这是德格印经院在印刷出版方面的又一重大成就。

除《大藏经》外，德格印经院还刻印了很多其他佛教经典，以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医学、文学等各方面书籍，多达4 500余种。

德格印经院后多次修缮扩建，成为藏区规模最大的印刷中心，全称“德格吉祥智慧院”。全院占地面积3 000平方米，古建筑占地面积1 637平方米，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布局呈四合院式。内有大经堂、念经堂、藏经库、藏版库、储纸库、晒经楼、洗版台、裁纸齐书室等。德格印经院所印书籍以藏版丰富、镌刻精细、印刷考究、管理严格、质地优良闻名于世，而且因所藏各类印版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为国内外所重。该院藏有各种藏文典籍的书版多达二十余万块，所印书籍流传很广。

德格印经院在写刻、印刷、用材诸多方面很有特点。比如书写好纸模后要经过4次认真的校对，校对时所有校对人员皆正襟危坐，手持纸模，按文字口诵，琅琅出声，以达校对精力集中，严格准确。又如雕版所用木材，需用料考究，一般是砍伐秋后刚落叶的红桦树，用斧头劈成经书版块，用木屑沤火升烟，将经版熏干，再放入羊粪中沤一冬天，来年春天取出用水煮，再烘干，然后刨平两面。这样的经版质地坚硬，镌刻文字清晰，线条细致，不易变形，符合规格，便于雕刻。刻完经版还要经过4次校对，合格者放在酥油中浸泡一天，使其更为坚硬。取出后晒干，用一种名为“苏巴”的草根熬的水洗净晾干，经版制作完成。经

版规格有六七种，一般长达60—70厘米，宽10—18厘米，厚2—3厘米。大者长110厘米，宽70多厘米，厚3厘米。印经时两人相对而坐，中间竖放书版，一人用擦版蘸墨均匀涂于书版上，另一人迅速放上印纸，用特制的小滚筒滚刷，就完成了一页的印刷。一般的书用墨印刷，但作为佛祖释迦牟尼言论的《甘珠尔》，用朱砂调和的红色墨汁印刷，以示尊崇。印好的书页晒干，再交巴本（院长）等人最后检视校阅，不合格者重印。质量合格者整理成卷册，在裁纸齐书室理齐、磨平，书的四周边缘上好红色，捆扎以后，即为书籍成品，可以流通。[1]

所印书籍除供藏、川、滇、甘、青诸地藏区使用外，还发行到印度、尼泊尔、不丹、日本及东南亚各地。由于气候原因，为保证印书质量，每年印经时间定在藏历3月15日至9月20日。开印的第一天要举行隆重的"功德会"，向保护神和各藏经室献哈达和蓝丝巾，企求印经顺利。印经期间允许僧人前来朝拜经版。德格印经院和布达拉宫印经院、那塘印经院并称三大藏文印经院。[2]

另甘肃省的拉不楞寺也建有印经院，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殿的前面，原属蒙古河南亲王府，系3层楼，四壁放置木架，架上摆放着很多长方形的藏文木刻版，现存约7万余块。另有藏经楼，内藏6万多册经书。

【1】邢林：《雪域东部神秘的喇嘛教》，54–63页，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

【2】四川民族出版社编：《德格印经院》，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

第六节　纳西东巴文和哥巴文书籍的出版

纳西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是古羌人的一部，居住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高山大川构成了雄奇优美的自然景观。居民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等地，其中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最为集中，其余散布于维西、中甸、德钦、宁蒗、永胜等县，四川的盐源、盐边、木里等县也有少量分布，在汉文史籍中记载为"摩沙"、"磨些"、"末些"、"么些"。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定名为纳西族。纳西族使用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

语支。由于和汉族交往较多，很多人能使用汉语文。

纳西族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有灿烂的文化。纳西族大约在宋、元时期创制、使用东巴文，并形成了大量的书籍。纳西族东巴文书籍一般不记载形成时间，多难以断代，并且往往随着掌握东巴文书籍的东巴的去世而不断销毁，所以尽管目前能见到的文献很多，但较早的文献却不多见，因此把纳西族的出版归拢在清代叙述。清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东巴，如咸丰、同治年间的大东巴阿鲁昧（东昧），自道光至光绪年间的东巴世家和永公（东翁），清末民国时期的的大东巴和绍文、和文裕、和华贵、和世俊、桑尼才、和凤书等数十人。[1] 这一时期东巴文化处于昌盛阶段，东巴文书籍也呈现繁荣景象。

【1】卜金荣主编:《纳西东巴文化要籍及传承概览》,143-157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

一、纳西族和东巴文的创制

（一）纳西族和东巴文化

据史籍记载，公元3世纪越嶲郡定笮县（今四川盐源县）已有纳西族的先民“摩沙夷”居住。后迁徙到西南方今云南丽江一带。唐代一部分纳西族先民进入洱海东部，建立越析诏，成为当时六诏之一。后为南诏所统治。

过去纳西族只信仰原始宗教，后逐渐发展为信仰东巴教。东巴教是纳西族先民的一种宗教，产生于7世纪左右。“东巴”是纳西语，意为“智者”，也就巫师和祭司。随着与吐蕃、南诏、中原的持久交往，藏族本教、藏传佛教及中原道教相继传入纳西族地区，与尚处于原始状态的纳西族原始宗教巫教接近、碰撞。在面临多种文化的选择中，纳西族原始巫教吸收、融合了外来宗教，掺糅发展，终于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东巴教。东巴集宗教、语言、文字、绘画、舞蹈、工艺、医术等知识于一身，是纳西族古老东巴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继承者。

宋朝时期，附近的大理国未能像南诏国那样对纳西族进行有效的控制，西部的藏族随着吐蕃的瓦解已是四分五裂，而宋朝因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的崛起和抗衡而焦头烂额，无暇顾及，这使

势力不大的纳西族得到了一个发展的良好机会。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和宏扬。这一时期，在纳西族文化上最为显明的特征是东巴教的形成和长足发展，东巴教及其文化空前繁荣，是东巴文化崛起的重要历史阶段。最能表现纳西族文化特点的民族文字——东巴文大约也是此时创制的。

元代在大一统的局面下，纳西族先民首领麦良被任命为茶罕章管民官。后于其地置丽江路，设军民总管府，麦良的子孙世袭总管。这时纳西族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居首要地位，与中原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已经开始设立汉学。

纳西族更大的发展是在明代，纳西族木氏家族世袭丽江知府，大规模地传播汉族的先进技术与文化，接受并宣扬藏传佛教，同时传承并发展了本民族传统文化，并使之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三种文化并存，互相融合，纳西族东巴文、汉文、藏文书籍都大量出现。

明清以降，由于与汉文化的交流日渐增多，道教文化对纳西族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丰富作用，使它的农耕文化色彩不断显彰。当然，其主体乃是纳西族先民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以及对自然、社会、人类的认识。

清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土司统治瓦解，学校教育兴起，东巴教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被削弱，东巴文化不断萎缩。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势力先后进入纳西族地区，纳西族文献惨遭掠夺，大量文献流失海外。

纳西族以农业为主，20世纪中期云南宁蒗等地的纳西族还保存着早期对偶婚特点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的残余，早已引起学界的重视。

纳西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纳西东巴文化。东巴文化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东巴文化与东巴教密不可分，因保存于东巴教而得名。东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她不仅包含宗教、哲学、历史、文学、民俗、医学、天文、历法、地理、生产知识等多种学科

的内容，而且是一座纳西族古代文学艺术的辉煌宝库。其中包括卷帙浩繁的以东巴文写成的神话、宗教、史诗、古歌、民谣、经词等作品；也包括有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舞谱和内涵丰富的数十种古典舞蹈，东巴舞蹈是东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堪称天籁之声的东巴音乐和多种形制、音色的乐器。“纳西古乐”是“活的音乐化石”，专家认为“唐宋音乐在纳西族兄弟中得到如此保存”，是中国“音乐史上最大的奇迹之一”。纳西族有古老拙朴的木牌画、竹笔画、纸牌画、布卷画和形形色色的面塑、泥塑、木雕等艺术形式。丽江古城古朴自然，风景秀丽，保存良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纳西族每年“三朵节”、“骡马会”等节日都要举行盛大的民族体育竞赛和物资交流活动。有上千年历史的、蔚为奇观的东巴文化，越来越引起世人关注。

（二）纳西东巴文

纳西文大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称为纳西东巴文。东巴文是在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流行的象形文字，记录的是纳西语的西部方言，一般用来抄写纳西族的经书。根据东巴经的说法，东巴文字是由东巴教祖“丁巴什罗”创造出来的，因此推测东巴文也在同一时期出现。有的专家认为，东巴文的产生不晚于11世纪。

纳西东巴文是处在图画记事和表意文字中间发展阶段的象形文字符号系统，是人类文字从图画向符号过渡阶段，在象形符号中已具有了表形、表音、指事、假借等文字特征，已和最原始的图画文字有显著区别。东巴文约有2 000多个字符，其形体与原始单线条的图画十分接近，如果没有“上下文”，人们面对一个孤立的形体有时甚至无法判断它究竟是“画”还是“字”。不同的人“写”起这些“字”来会带有其个人的特点，这使得象形文字千变万化，即使是同一个“字”，其写法也很不统一。象形文字一般不能忠实地再现语言中的每一个词，而仅仅是为阅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文意的概况，组织句子的虚词要靠读者根据本人的说话习惯临时添加进去，这使得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人读来往往在

细节上产生差异。

东巴文是人类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范例，是闻名于世的古文字资料，是世界上至今仍在使用的唯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是人类记录语言的初始性文字，是“文字的活化石”，通过其字源和字意，可以了解纳西族原始社会的不少情况。纳西文虽然不能为群众社会生活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但它在文字发展史上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展现了文字远古阶段的面貌。

作为东巴文化的物质载体，东巴经按仪式或道场的不同可分为10类，有祭山神龙王经、除秽经、祭风经、消灾经、开丧经、超荐经、祖师什罗超荐经、大退口舌是非经、求寿经、零杂经等，共600多种。也有人分为24类。东巴经是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集纳西古文化之大成，是研究古代纳西族的资料宝库，涉及纳西族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初期封建社会的历史，记载有天文、气象、时令、历法、地理、历史、风土、动物、植物、疾病、医药、金属、武器、农业、畜牧、狩猎、手工业、服饰、饮食起居、家庭形态、婚姻制度、宗教信仰，乃至绘画、音乐、舞蹈、杂剧等等广博的内容。其内容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内容。对东巴文的研究不仅有文字学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人类思维和人类社会研究也有启迪意义。国内外学者认为，东巴经是研究纳西族古代的哲学思想、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宗教民俗、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及中国西南藏彝走廊宗教文化流变、民族关系史以及中华远古文化源流的珍贵资料。东巴文化是一座内容丰富的纳西族古代文化宝库。[1]

【1】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纳西象形文字以其独特的形态、希见的结构和特殊的社会人文含义著称于世。世界上与之可比的类似书写体系只有中国的甲骨文、埃及的古象形文、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但这些古文字早已消亡。

二、东巴文典籍

东巴文典籍一般都是以东巴经书形式流传。东巴经内容广

博，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成书和流传也很有特点，类别也是多种多样。

丽江纳西族东巴文经书《人类迁徙记》，又名《创世纪》，纳西语名“崇邦统”，被称为纳西族的史诗，内容有人类的起源、血缘家庭、父子联名、刀耕火种、陪嫁奴隶、迁徙路线和民族关系等，歌颂了纳西族祖先崇仁丽恩的英雄事迹和英雄气概。现存文献有相传为古纳西叶氏族支木氏土司之发祥地白沙著名大东巴久知老的墨迹，书长28厘米，宽9厘米，共13页26面，纸张为当地特产厚棉纸，书的左端四孔线订，中部约占五分之三为装饰画。现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图书馆藏有东巴文、汉文对照的《创世纪》。（图75）

东巴文经书《牧奴悲剧纪略》，纳西语名“鲁般鲁饶”，属祭风类。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内容反映古代纳西族社会农、牧主和牧奴的矛盾，牧奴不堪重负集体逃跑，向往幸福生活而未能实现。下册描写牧女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悲剧。书长29厘米，宽9厘米。上册67页134面，下册42页83面。用本地特制厚棉纸书写，以矿物质颜料作色而成。两册都于左端装订，首页在靠近装订线处有宽约5厘米的图画，上册为一戴斗笠的男人，下册是一长发梳髻的女人。叶面色彩艳丽，字迹清晰。现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此书有现代整理本。[1] （图76）

[1] 牛相奎、赵净修整理：《鲁般鲁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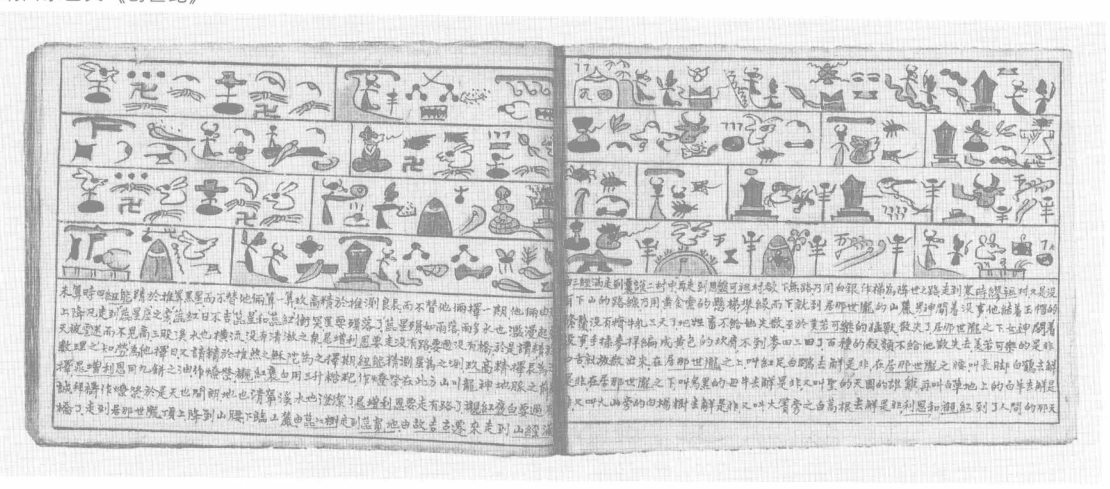


图75
纳西东巴文《创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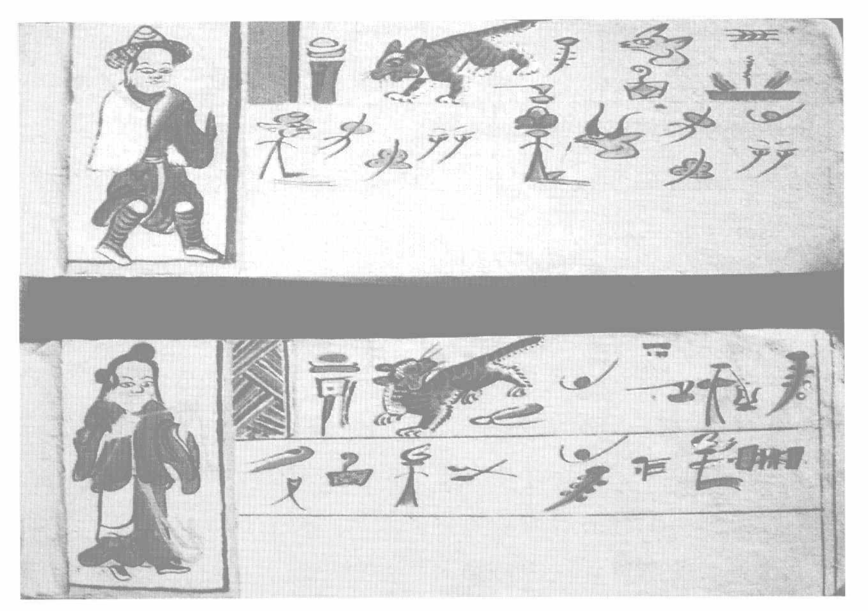


图76
纳西东巴文《牧奴悲剧纪略》

纳西族和藏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除信仰东巴教外，也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在东巴文经书上。《白地古本经书》是一部特殊的经书，东巴文中夹写藏文，十分稀见，内容是东巴教作消灾道场时，要诅咒仇敌，象征劫毁仇庄、请护法神优玛天将助战。相传为神明大东巴阿明什罗的墨迹。阿明什罗是北宋时期白地纳西族叶氏族大东巴，对传播东巴文化卓有贡献。经书长24厘米，宽10厘米，横写本，共13页26面，用竹制蘸水笔和自制墨汁写在本地特制的厚绵纸上。在东巴文经书中夹写藏文的书籍仅发现此一例，十分珍贵。现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东巴文经书《扉画经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内容系祭山神、龙王经类普尺阿鲁传略，扉画为普尺阿鲁头戴插雉尾官帽在骑马行进；中册系祭山神、龙王经类多萨欧吐传略，扉画为头戴法帽、身穿法衣，手持净水壶和板铃的东巴；下册为祭风经类迎卡冉神经，扉画为四头武神张弓射箭，镇压鬼怪。书长29厘米，宽9厘米。用本地特制厚棉纸书写，以矿物质颜料作色而成。三册都于左端装订。现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纳西族是性格开朗、能歌善舞的民族，东巴经中有一部令人惊叹的舞蹈教程即《蹉姆专书》，这是一部纳西族古典舞谱，共两册，分跳神舞蹈规程（《舞蹈教材》）和东巴舞蹈来历（《舞蹈来历》）。现存为光绪年间写本，书的长宽和其他东巴文经典相近，纸张也是当地特产的白棉纸。其内容包括古老的动物舞、神舞、战争舞、法杖舞、花灯舞等，用东巴文字详细记录了60多种舞蹈的数百种跳法，不仅将纳西族古代乐舞的类别和跳法综合成体系，而且对舞蹈的姿势、动律、场位、路线、造型及配乐之法，都作了比较科学的描述。专家们都认为它是用古文字系统记录下来的最早舞谱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人类原始舞蹈起源和早期舞谱形成极难得的经典。据有关专家考证，它的产生比著名的西班牙“拉班舞谱”还要早许多世纪。今存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博物馆。

【1】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206–222页,383–3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在文学方面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创作的韵文体东巴文学（包括诗歌、谚语和神话故事等），语言精炼优美，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特别是各类神话故事，情节曲折，神奇浪漫。

图77
纳西文木牌画



东巴画有木牌画、竹笔画、纸牌画、神像轴画、巨型布卷画之分。画技各有特色，或线条粗犷、造型古拙，或色彩艳丽、笔法细巧。用东巴文字写成的《东巴画谱》被誉为稀世艺术珍品。《神路图》更是少见的绘画艺术珍品，是东巴绘画的代表作，它长约17米，宽约24公分，上绘三界以及360多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有人称它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直幅长卷之最”。[1]（图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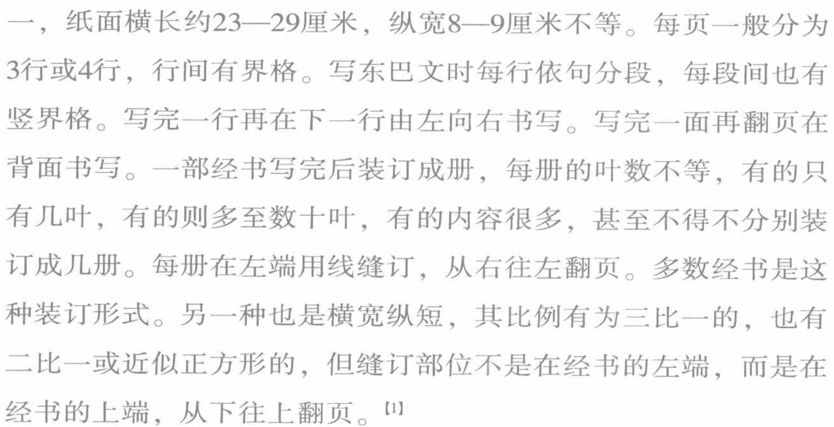
三、东巴经的版式、收藏与传播



图78
纳西人造纸

东巴经的用纸由丽江山地生长的一种叫山棉皮的植物精制而成。纳西族自制的白色土纸，纸质厚韧，两面书写，不怕虫蛀，历经千年也不会坏。(图78)

经书本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横宽纵短，比例约为三比一，纸面横长约23—29厘米，纵宽8—9厘米不等。每页一般分为3行或4行，行间有界格。写东巴文时每行依句分段，每段间也有竖界格。写完一行再在下一行由左向右书写。写完一面再翻页在背面书写。一部经书写完后装订成册，每册的叶数不等，有的只有几叶，有的则多至数十叶，有的内容很多，甚至不得不分别装订成几册。每册在左端用线缝订，从右往左翻页。多数经书是这种装订形式。另一种也是横宽纵短，其比例有为三比一的，也有二比一或近似正方形的，但缝订部位不是在经书的左端，而是在经书的上端，从下往上翻页。[1]



纳西东巴经书一般对封面、首页和正文分别装饰。在封面上打出长方形图框，框内书写经书所属仪式和本书名称，有的横写，有的竖写。框外多以墨色或彩色绘制八宝图案。书的首页多绘制与书籍内容有关的彩色图画。有些书包括正文在内的所有页面以彩色书写，使页面色彩鲜艳，美观漂亮。[2] 东巴文经大多不记写作年代，多数难以确定其具体编写或抄写时间。缮写东巴经的工具有竹笔，以7毫米左右的细毛竹熏干，截成15—20厘米长，一端横切，一端斜削，以便蘸墨书写。墨汁是用锅底油或松明油，拌入少许胶水和猪胆汁而成。毛笔也是用来书写东巴文的工具，是汉文化传入纳西族以后才开始使用的。也有个别使用铜笔的。铜笔的形制与竹笔相近。

【1】卜金荣主编:《纳西东巴文化要籍及传承概览》，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

【2】《民族古文字概览》，161-162页。

东巴经书的抄写与增补，完全是由东巴们自己进行，所以东巴经书都由东巴们收藏在自己家中。每一经书多用木板制成的书夹分上下合紧，再用麻绳或皮绳捆扎，置于经台或楼上，或放置在灶台上方的搁板上，令烟熏蒸，防止受潮。[1]

[1] 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四、哥巴文和玛丽玛萨文、阮可文书籍

（一）哥巴文的创制和文献出版

纳西族还有一种文字是哥巴文。哥巴文是音节文字。音节文字是表音文字的一种，一个文字符号记录一个音节。它不同于记录比音节更小的语音单位的因素文字，也不同于汉字那样的表意文字。汉字虽然也记录一个音节，但同一音节因意义不同，可能用不同的汉字。音节文字则是同一个符号可以记录意义不同但语音相同的音节。哥巴文是在以云南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居住区流行的文字，记录的是纳西语。“哥巴”在纳西语中意为“弟子”，推测这种文字最初为“东巴”的弟子们所使用，其产生年代晚于东巴文。现存最早的哥巴文实物是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丽江上桥头的摩崖。哥巴文基本符号除少量象形标志之外，有不少都是借用和简化的汉字和东巴字。哥巴文在纳西族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一种文字，它字体不固定，往往一音数字，不标注音调，处于尚不完备的形态。其文字学价值显得不如东巴文引人注目。历来对哥巴文的研究多作为研究东巴文或纳西语的附属工作。哥巴文经书的数量也远不及东巴文。[2]

[2] 和志武：《东巴文和哥巴文》，《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223-224页，3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哥巴文经书，如《开坛点鬼名经》，属祭风经类，系清光绪年间写本，长27厘米，宽9厘米，共15叶30面，用毛笔以粗线条写成。这是由丽江文笔村大东巴依据东巴文本转写成哥巴文本的。现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请阴阳神虔祝经》也是哥巴文的经书，20世纪初由云南省丽江长水乡东巴和泗泉依据东巴文转写。用自制白粉颜料和毛笔写在自制黑颜料染成的厚棉纸上，这是一种特殊的制作方法。共14页28面，长28厘米，宽9厘米。现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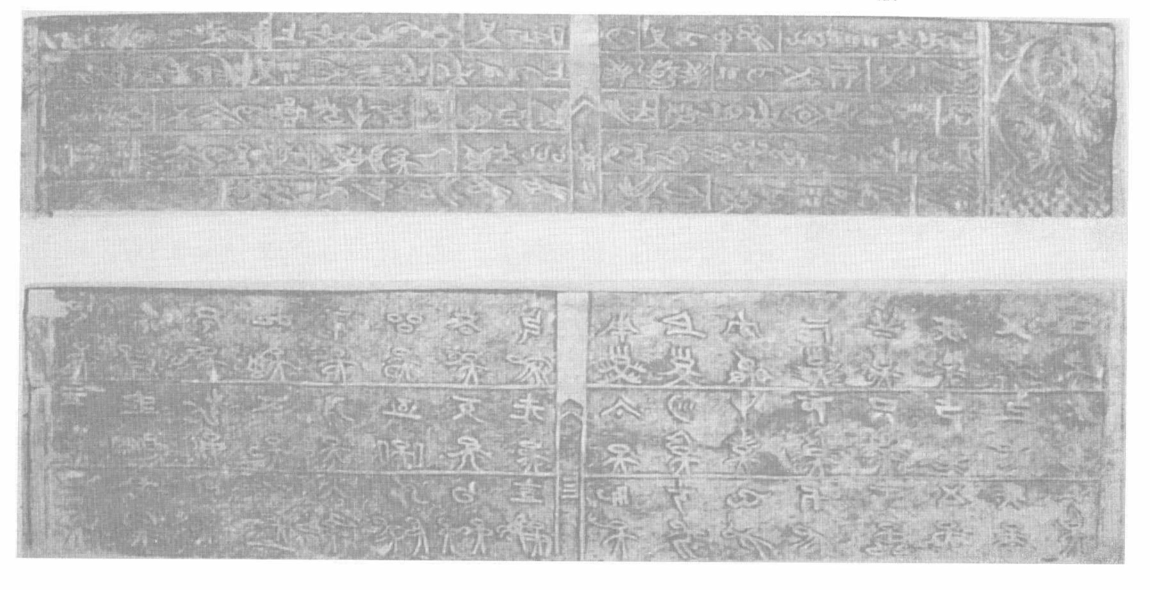
究所。

目前已发现东巴文和哥巴文对照字汇刻版。此版制作于20世纪初，系云南省丽江长水乡东巴和泗泉制作。今仅存两块雕版，梨木制成。一块两面，为序言，版右端刻东巴坐像，每面5行共15句。中间仿线装书，留有版心，有黑鱼尾。内容为刻制此套木刻版的原由，希望统一规范文字。另一块版内容系关于人类、人体的字词，长54厘米，宽15厘米，厚2厘米，两面雕刻文字，每面中有版心，有黑鱼尾，下部用汉字记页码，一面为“三”，一面为“四”。版面两种文字对照分上下3行，版心左右各48字，一面96字，两面192字。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独套东巴文字汇木刻版，具有重要版本价值。今存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博物馆。（图79）

（二）玛丽玛萨文和阮可文

纳西族还有玛丽玛萨文，是居住在云南省维西县拉普等地的纳西族一个支系玛丽玛萨人使用的文字。传说这一支纳西人是从四川木里、盐源一带迁徙来的，“玛丽玛萨”即“木里么些”。迁到维西仅200年左右。原无文字，其象形文字是向维西当地东巴学习的，共有105个单字，一个单字代表一个音节，类似哥巴文，

图79
东巴文、哥巴文对照字汇刻版



皆自东巴文中派生而出。玛丽玛萨文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东巴文和哥巴文，它不是记录宗教的经文，而是记录社会生活、生产内容，有很强的世俗性。

阮可文是居住在四川省木里县、云南省中甸县的纳西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也有部分独立的文字，因使用者为纳西族阮可人而得名，流传于木里县俄亚、中甸县白地、洛克、东坝等地，其字形与东巴文大致相同，主要记录宗教经典。用阮可文记录的《阮可超荐经》有33本之多。

第七节　彝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清代彝族社会有了新的发展。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彝族，其社会状况与当地汉区地主经济接近；云南的东北部、贵州的西部地区基本上属于土司统治下的领主经济；而四川大凉山、川滇交界的小凉山腹地依然保持着奴隶制社会结构。随着清朝改土归流政策和发展经济措施的实行，不同的彝区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彝区的文化也有较大的进步，汉族和彝族交往加强，文化交流增加。云南、四川建立学习汉族文化的义学数百所。彝文书籍更加丰富，流传也很广泛。

一、综合类典籍《西南彝志》的形成

彝文书籍众多，至清代有人把很多书籍整理、汇编在一起，形成综合类典籍。《西南彝志》就是这样一部较全面地记载西南地区彝族历史的彝文文献，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彝语名称为“哎哺啥额”。全书有彝文37万多字，400多个标题。原抄本是贵州大方县陈朝光家祖传收藏本，现存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

《西南彝志》编纂者，是古罗甸水西热卧土目家的一位慕史（歌师），姓氏无考。他搜集了彝族各支系中历代的许多文史典

[1] 本书由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已故著名的彝文经师罗国义和王兴友二先生在1966年译成彝汉文对照本初稿共二十六卷。现经毕节彝文翻译组整理，由贵州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

籍，经过整理编纂成这部彝族历史文献巨著。成书年代不详，从书中一些记载推测，可能在康熙三年（1664年）吴三桂平定水西之后，雍正七年（1729年）改土归流之前。编者完成此书时，年已75岁。又据清光绪年间的《水城厅采访册》记载：彝族水西宣慰后裔安家元系“厅属文生，号白西，……少颖异嗜学，游庠后，目不窥园，旁搜博览，辑《西南彝志》数十卷”。[1] 不知两种记载是否为同一人一事。

【1】转引自陈大进：《试谈彝文古籍的时间下限》，《贵州少数民族研究》（一），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西南彝志》既是史书，也是一部天文历法书，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人类起源的认识，认为天、地、人的产生都是清浊二气分化演变的结果。记述了人类经历了人兽不分以及男不知娶、女不知嫁、知母不知父的历史时期，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原始人群一幅幅生活图景。书中记录了彝族先民对季节气候的认识和彝族的历法。书中还记述了彝族从希慕遮到笃慕的31世和笃慕之后“六祖”以下的各主要家支世系，各家支间的互相关系，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及彝族的分布状况。同时记述了古代彝族的狩猎、耕牧、手工业的经济情况，以及宗教、哲学思想等，较全面系统地呈现了古代彝族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

《西南彝志》线装成册，分大、中、小卷。大卷4册，长56厘米，宽32厘米；中卷2册，长46厘米，宽30厘米；小卷4册，长42厘米，宽22厘米。各卷行、字数不同。小卷每页10或11行，每行约40字。全书多用五言的诗体形式写成。对于研究彝族的社会历史、天文历法和文学都有重要的价值。[2]

【2】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179-2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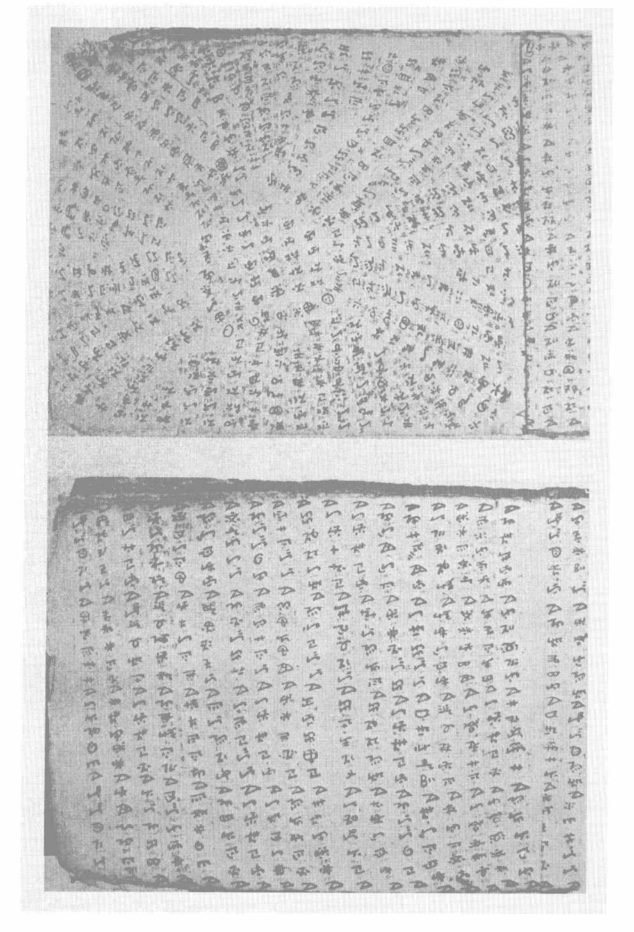
二、史书的继续编写

有一种难得的史书是《彝族农民起义史册》，作者为百衣巴，写于云南省新平县杨武成花庙。成书年代不详。据书中内容推测约为清咸丰年间作品。内容包括序言和正文两部分。序言书写形式非常特殊，按八卦形式记述，各行文字从中间向四外辐射，内容为：“子年不下雪，丑年不种地，寅年薪米贵，卯年苛税重，辰年地方乱，石屏宝秀举黑旗，直打青龙攻澂江，官兵死伤布山

野，富户携眷逃进城……杜鹃花开红满坡，彝家翻身幸福长，写作此书留纪念，愿一代传一代。”正文则记录农民起义的原因、地点、起义的经过和所占领的城镇。全书为构皮棉纸手抄本，外包白土布。长31厘米，宽26厘米，每页约20行，自左至右竖行书写。每行20字，分四句，每句五言。每句上下用三角符号隔开，这也是此书版本形式的一个特点。共72页，约30 000字。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80）

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彝文典籍中，还有历史类书籍，如《呗耄史》、《家谱》、《德勒氏族史》、《尼糯氏族史》等，都是研究彝族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史料。此外还有《德布氏史略》、《德施氏史略》、《德慕氏史略》等。

图80
彝文《彝族农民起义史册》



又如军事类名著《阿者乌撒兵马记》记载了彝族古代战争史实和战略战术及其军事思想，是研究彝族古代军事战争的重要文献资料。再如教育类中的《彝汉教育经典》，汇集了49位彝汉导师的语录，古人的教育思想和真知灼见，直至现在仍然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其他历算类的《择年月吉凶书》、《择吉日书》等和宗教类的《作斋经》、《作祭经》、《作斋供牲经》、《献酒经》、《驱邪经》、《百解经》、《福禄经》等也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三、文学类典籍整理

彝族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不仅在民间传唱，还记录在典籍中。比如为国内外所熟知的《阿诗玛》就是在彝族地区流行的叙述长诗。叙述撒尼彝族姑娘阿诗玛为追求自由

幸福生活，反对强迫婚姻，同阿黑一起不畏强暴，向封建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有一种《阿诗玛》版本成书于清同治年间，后代又复抄。无作者姓名。用平棉纸书写，外包麻布，书长23厘米，宽21厘米，每面8行，每行两句，每句五言，共1 000余行，书写工整。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此外有《妈妈的女儿》，也是诗歌体文献，以抒情的方式诉说了妈妈的女儿从呱呱落地来到人世开始，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在繁重的劳动磨练中长大成人，后来被迫嫁到婆家，终日痛苦哀叹，过着凄凉悲苦生活。全诗共有1 000余行，由序歌、出生、成长、议婚、订婚、接亲、出嫁、哀怨、怀亲等十节组成。

再如文学类中的《古代说唱书》，其内容极为丰富，在彝族中影响极大，其中的一些唱段，至今在彝族民间广为传唱，是研究彝族传统文学和诗歌艺术的珍贵文献资料。

四、医书和字汇书的编写

彝族编著医药书籍早有传统，在明代彝文医书的基础上，清代又有彝文医书问世。发现于四川的一部彝文医药书，作者为阿初八、李正伯巴等7人，写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初五日。以棉纸书写，长20厘米，宽18厘米，每页约20行，共5 039字，记录病症80例和200余种动植物药名、药方。书中所列病症是彝族山区的常见病、多发病。该书已残。现存四川攀枝花地区。

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彝文文献中有《作斋献药供牲经》、《献药经》等，记载了动物、植物、矿物药的名称，还指明治疗何种病，对彝族地区开发传统医药具有借鉴价值。

彝族文字古老，流传久远，多有变异。因此记录和解释文字的专门著作应运而生。有一种流传于云南省武定、禄劝等县和贵州省毕节等地的《字汇全集》，是清咸丰年间作品，作者陈正玺、陈正宗。书为平棉纸手抄本，线捻装订，高27.5厘米，宽16厘米。



图81
彝文《字汇全集》

四周单栏，版心约高24.5厘米，宽13厘米。每面6—8行不等，有时行间有红界格，字词间有或红或黑的隔线，有的字下有小字注释，有的字旁有朱圈。共282页。其中一页写“大清咸丰八九十年　月　日弟子陈正玺、宗刊立”。据此是否此书曾刊印或准备刊印，需做进一步调查研究。今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81）

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彝文典籍中，除明代木刻本之外，其余的都是清代的写本及传抄本。这批古彝文典籍的开本规格各异，版面大者如《择日书》，高35厘米，阔27厘米；版面居中者如《作祭经》，高20厘米，阔18厘米；版面小者如《献药经》，高10厘米，阔6厘米。各册页数多寡不一，多者如《彝汉教典》，有239页；少者如《祭献福禄神经》，仅有10页。行文款式大多数保持彝文的行文传统，为从上往下，从左至右的直书式，只有一小部分受汉文影响，改为从上往下，从右至左的直书式。装帧形制与汉文线装书基本一致。

第八节　方块壮字书籍的编辑和流行

一、壮族的历史和文化

壮族世居广西、云南一带，源于古越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古代中原王朝在当地实行羁縻制度或郡县制，元、明、清时期实行土司制与府县制，后实行改土归流。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有1 700多万，是中

国唯一人口超过1 000万的少数民族，其中90%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少部分居住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不同地区的壮族有“布壮”、“布土”、“布越”、“布依”等十几个不同的自称。解放初期，壮族统称“僮族”，后来改用现在的名称。壮族地区，山多水多，风景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就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

壮族喜欢依山傍水而居，自古以来善种稻米。壮族地区是全国有名的产蔗和产糖区。美丽的壮乡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四季水果飘香，所产的龙眼、荔枝、菠萝、沙田柚、芒果、香蕉等闻名全国。壮乡到处是江河溪流，左江、右江、邕江、红水河、柳江、郁江等大河流滋润着壮乡大地，奔腾于山谷间的红水河流量是黄河三倍，蕴藏着巨大的水能资源。

壮族有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文化。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与汉族和邻近其他民族互相交流、吸收，更加丰富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古代壮族先民由自然崇拜发展到祖先崇拜和多神信仰。壮族普遍崇拜祖先，每户正堂屋的神壁上都供奉“天地国亲师之位”和祖先神位。部分地区信奉道教。壮族人民能歌善舞，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刘三姐》就出自壮乡。

二、方块壮字

壮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在广大的壮族农村地区，人们以壮语为主要交际工具，有半数以上的人兼通汉语。

历史上壮族先民曾经历过“刻木为契”的时代。据《旧唐书·南蛮传》载：“东谢蛮，其地在黔州之西数百里……俗无文字，刻木为契。”[1] 历史上，壮族民间曾经模仿汉字创制过壮族文字，俗称“土字”或“土俗字”，现在一般叫“方块壮字”或“古壮字”。由于壮语存在各种方言与土语，各地壮语语音差别较大，这些方块壮字在各地的读音也不同，这些壮字也出自多人之手，

【1】《旧唐书》，卷197《南蛮传》。

往往有互相不识对方文字的情况。虽然用方块壮字书写的壮语经书很多，能看懂的人却很少，甚至掌握经书的“布摩”也只能读懂出自同一师爷的师兄、师弟的经书，读不懂其他布摩的经书。因此，方块壮字未能成为壮族规范通用的文字。壮族多用汉文进行书面交流。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帮助壮族创制了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壮族开始有了自己的正式通用的文字。

从有关文献分析，方块壮字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从汉字演化而成的，是唐、宋时期利用汉字形声及偏旁，模仿汉字“六书”中的一些方法构造而成的。用方块壮字记录了不少文献，形成了有特点的重要古籍。这些古籍多半用来记录民歌、故事、传说，记录壮族的创世神话等。有的道士用于书写经文；民间则用于记载壮族的生产技术、历法和医药，以及记账、写契约等。自古至今，它一直在壮族民间流行，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壮族人民用以传情达意、陈理记事的工具。古壮文在保存壮族文化遗产方面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古壮字字典》收入民间普遍使用的古壮字4 800多个，另有音同义同写法不同的异体字8 000多个。[1]

【1】广西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编：《古壮字字典》，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

方块壮字借用汉字造字是在与汉族密切接触、交往，广泛深入地学习吸收汉字文化的过程中发生的，有的直接借用汉字，有的利用汉字重新组合，或对汉字加以改造，也有类似象形、会意、形声等字类。

用方块壮字写的歌本、故事书中，一半以上直接用汉字来表达，构造比较复杂。通常由两个汉字组成。所用汉字有繁体字，也有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大部分方块壮字是按照汉字的形声字造字法创造的，如用一个汉字的读音来表达壮语相同或相近的读音，用另一个汉字或汉字的偏旁所表示的意义来表达壮语词的意义。有的字比较特殊，以一个汉字表示形符，另一个汉字表示声符，但表声符的并不按照汉字的读音，而是按照它所表示的壮语词的读音来读。有的由两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组成，两个汉字都表声，是双声造字法。有的由两个都表示形符的汉字组成，

是会意字。有的采取反切的方法，其中一个汉字或汉字的偏旁取其壮语读音的声母，另一个汉字取其壮语读音的韵母。方块壮字中一部分属于借用汉字一类，因为其特点是只取汉字的形和音，不取义或只取形和义不取音。取音时也并非照搬汉字原音，而是折合成壮语相近似的读法，也就是说，部分借用汉字的方块壮字按壮语来读。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仿照汉字的造字法来创造的，这类方块壮字与汉字不同，属形貌借用的范畴。

唐朝澄州壮族首领韦敬办撰写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城碑》，是用汉字刻写的，其中夹杂了一些变体字和土俗字，是至今保存下来最古老的壮族方块字。后来宋朝的庄绰在他的《鸡肋编》中也举例谈到了方块壮字。宋人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周去非著《岭外代答》以及一些方志上对壮族的土俗字都有记载。[1]

【1】张元生：《方块壮字》，《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梁庭望：《壮字及其文献新探》，《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古壮字文献选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壮文作为一种仍在民间通行的文字，在中国文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造字规律和借用汉字的方式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对汉字的共同认识，其中对音读和训读的处理办法可以加深我们对整个汉字系统文字的理解。

三、方块壮字古籍

古壮字书籍以当地纱纸抄写。所谓纱纸是壮族地区的特产，以灌木纱皮树树皮制成，质地洁白柔韧，防潮、防蛀，可存放数百年而不变质。

古壮字记录的书籍范围很广，如壮族远古创世神话《摩则杜》，共36篇，全是五言律诗。内容反映壮族先民对客观世界朴素、天真的解释。包括“分天地”、“分阴阳”、“分生殖器”、“只让人讲话”、“两兄弟厮杀”、“洪水漫天地”等。又如探索大自然奥秘的《陆驮公公》、《妈勒访天边》、《找太阳》等；解释天象的《开天辟地歌》、《太阳和月亮的传说》；解释万物来源和人类起源的《盘古歌》、《人类来源的传说》、《人的故事》、《牛的故事》、《物种来源的传说》；反映人类征服大自然、战胜天灾的《卜伯》、

《特康射太阳》；有神话故事和古典长诗，如《唱舜儿》等，还有长达10 000行的《嘹歌》。家喻户晓的《刘三姐》，民间保存有多种版本，其歌词能世代流传，与古壮字歌本的保存和流传有很大关系。

方块壮字古籍中的麽经《布洛陀》，有多种写本流传。布洛陀是壮族传说中的创世神，流传于民间的《布洛陀》经诗展示了壮族原生态文化的丰富内涵。记录了壮族麽教仪式、经文、教义，反映了壮族的世界观、宇宙观、道德观、人生观，寄托了壮族人民对生活的意愿和追求。各种抄本多为线订。一种抄本每面7行，每行2句，每句5言或7言，每句下有朱色小圆圈。字体浑厚有力、清晰整齐。此书对研究壮族文化，特别是壮族宗教问题有重要学术价值。（图82）

古壮字书籍中有诗歌，其中有一种名为《毛洪》，是七言叙事诗。作者及写作年代不详，抄于清咸丰之前。内容叙述某朝尚书张某与翰林毛某为儿女订婚，后因毛家家破人亡，张家悔婚，欲将其女另嫁肖某，张女抗婚，执意要嫁原订婚的幼时之友毛洪，然肖家花轿已到，她无奈登轿，在轿内自尽身亡。这一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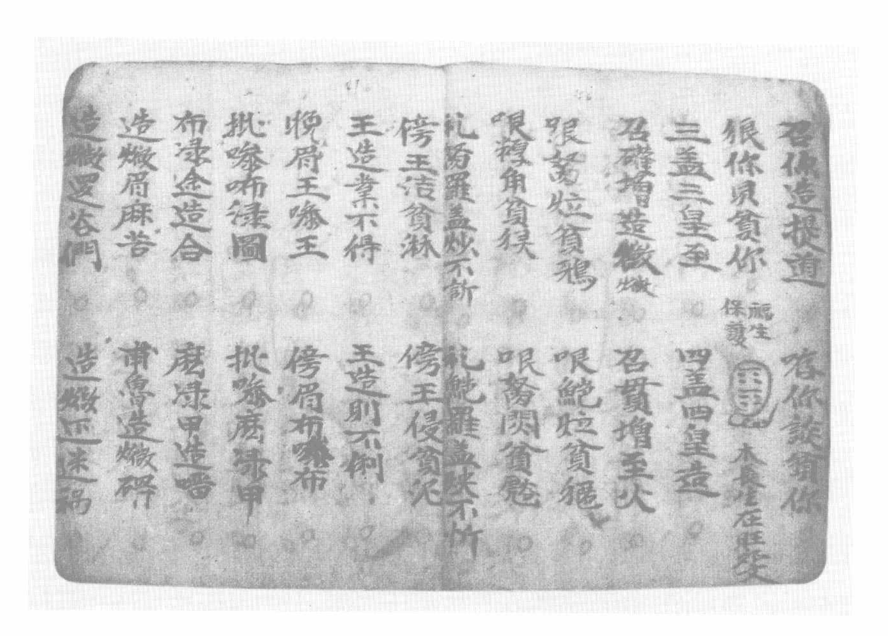


图82
方块壮字《布洛陀》

对研究古代壮族民间的社会风情、婚姻习俗和伦理观念有重要价值。该书宽19厘米，高22.7厘米，厚约1厘米。全书共36页，878行，册页线装，每页8行，行2句，每句7言，句间稍有空白，字写得很满，几乎无天头地脚。

又有古壮字书籍《董永》和《舜儿》合订本，也是七言叙事诗。作者及写作年代不详，民间流行单行本，后为道教所用，合订为一册。抄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之前。其中包括《董永唱故事诗歌》44页，内容叙述董永与天仙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又包括《舜儿唱故事诗歌》30页，内容叙述舜帝少年时代，父亲到交趾经商，后母及弟弟几次加害于他。舜儿脱险后，在舅舅的帮助下逃至广西大明山创业。该书宽12.5厘米，高21厘米，厚约1厘米。册页线装，订4眼，封面有书名2行："董永唱"、"舜儿唱"。正文每页6行，行2句，每句7言，句间稍有空白，有天头地脚。[1]

方块壮字用来传抄宗教经典，主要使用者是布摩。壮族老人去世后，都要请布摩念唱超度经文。这类经文大都用方块壮字传抄。例如有一部叫《喝泰》的超度经文，超度时首先念"朵迪"。传说中朵迪能够沟通阴间和阳间，能找到死者到处漂游的亡灵。为此，布摩要通过焚清香，摇铜铃，不时呼唤将朵迪请来，又通过朵迪将死者的灵魂找回来。接着要念《报德经》、《悼念经》、《忆恩经》、《寻路经》和《送祖经》等。书的内容是对逝者和祖宗的沉痛哀悼和深切的缅怀之心。

此外，还保留了一些用方块壮字镌刻的碑石，如位于广西上林县、刻于唐神功元年（697年）的《智城洞碑》，刻于唐永淳元年（683年）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等。

由于中原汉文化的广泛传播，有不少少数民族都曾尝试着利用汉字或汉字的变体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其文字形式类似方块壮字，而比方块壮字更为简约，甚至没有形成体系，这些字仅偶然用于民间，如布依族[2]、侗族[3]、苗族[4]、瑶族[5]、哈尼族[6]等都有借用汉字、字形构造类似方块壮字的文字。

【1】《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217–2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吴启禄：《布依族古籍中的方块布依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3】赵丽明：《汉字侗文与方块侗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4】赵丽明、刘自齐：《湘西方块苗文》，《民族语文》1990年第1期。
魏文栋：《解开城步苗文之谜》，《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2期。

【5】黄贵权：《瑶族的书面语及其文字初探》，《民族学》1990年第2期。

【6】李永燧、王尔松编著：《哈尼语简志》，152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

第九节　其他少数民族书籍的编写和流传

一、傣文书籍的编写和流传

清代以来多称傣族为“摆夷”。傣族地区也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主要在澜沧江以西地区改流，而澜沧江以东地区仍然属车里宣慰司统治，至清末甚至民国时期依旧保存着土司制度，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封建领主制度。在清代编写了不少傣文书籍。

（一）佛教文献

有清一代，傣文继续使用，傣文书籍仍有不少问世。其中用贝叶抄写的佛经仍是傣文书籍的大宗。

贝叶经《本生经》中最末一个佛本生故事扩写本傣文称为《维先多罗本生经》，记佛祖释迦牟尼修成正果的故事，在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中流传极广，当地佛寺在每年佛事活动、佛诞日讽诵，对傣族风俗习惯、宗教礼仪和日常生活影响很大，颇受信徒们的崇奉和喜爱。信徒们一般都把它作为佛教规范来遵循。《本生经》的大部分故事已被傣族诗人、歌手改编为脍炙人口和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叙事长诗。有西双版纳贝叶本，纸质折叠本和德宏傣文手写本。贝叶本又有13分册、16分册、22分册详略不同的版本。13分册本横宽55.5厘米，高5.2厘米，共有贝叶131张，两面刻写。在贝叶中间距左边17厘米、右边15.5厘米处打二孔穿线。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德宏傣文手写本，装成1册，横宽30厘米，高56厘米，共有240多页。有一种傣文贝叶经《八万四千卷》，傣文为“别闷西板酣”，内容是叙述傣文八万四千卷经文的由来，是傣文大藏经纲领性的经典。共5册，每册以线捆缚。横宽46厘米，高4厘米，共有贝叶73张，两面刻写，146页，空白10页。在距两端14.5厘米处打二孔穿线。该本字体工整，贝叶边缘涂金粉红漆，精美庄重。现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又有贝叶经《维耐必达克》，又译作“毗奈耶藏”，是南传大藏经律藏的摘录本。横宽46厘米，高5厘米，共有贝叶15张，两面刻写，30页。在贝叶中间处打孔穿线。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有一种傣文贝叶经《游世界记》，傣文为“当难列普罗克”，记述的是佛祖释迦牟尼周游世界的传说故事，其中有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地名来历和风土人情，是傣族有代表性的佛典。共22册，横宽52厘米，高5厘米，共有贝叶217张，两面刻写，434页，空白36页。在贝叶中间打二孔穿线。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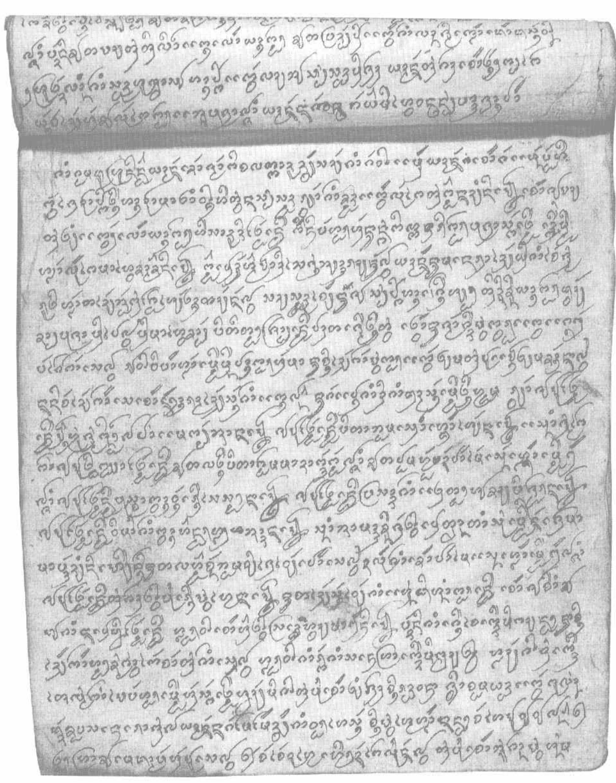
（二）世俗书籍

在傣族佛寺的藏经、藏书中，还有文学、历史、天文、历法、法律、心理学以及医药、自然、生产知识，也有体育、武术等方面的内容。

傣族有丰富的文学作品。西双版纳傣文《秀萨》是一部通过主人公秀萨的生平经历，讲述许多寓言故事，从而宣扬教义的作品。此书既有贝叶经本，也有棉纸手抄本。贝叶经本共11分册，每叶横宽48厘米，高5厘米，共有贝叶130张，两面刻写，260页。内有空白16页。今藏中央民族大学。

有一种西双版纳傣文《千瓣莲花》，傣文称作“波荒板戛”，贝叶经本。记叙主人公青年勇士贡玛拉为保卫莲花公主与国王作战的故事。共6分册，每叶横宽47.5厘米，高5.7厘米，共有贝叶59张，两面刻写，118页页。内有空白页。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傣文的民间叙事长诗很有特色。家喻户晓的《召树屯》，有的称《孔雀公主》。内容讲勐板加王子召树屯（意为勇敢的王子）出猎时在金湖与孔雀神女公主喃木诺娜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傣族人民的古代生活与思想感情。该书版本很多。其中一种唱词为册页本，棉纸，以0.2—0.3厘米的捻线装订，有订


图83
傣文《召树屯》

孔7个，在中间订孔拴缚长绳，可吊挂存放。高30.8厘米，宽24.1厘米。有封面，上有题目，正文17页，每页18或19行。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图83）

文学方面还有类似长篇小说《乌沙麻罗》等经书44部，包括类似中、短篇小说的经书若干部；有叙事长诗《嘎西贺》（十头魔王）、《沾巴西敦》（四棵缅桂花树）、《吾莱》（花蛇公主）等五百多部；有诗歌论著《哇雷麻约甘哈傣》等。傣族有众多的民间歌谣、情诗、谚语、俗语、格言、谜语等。

傣族还有语文学著作，西双版纳傣文有《傣文典大全》，傣语称"戛拉乍散"。书中分析傣文字母的发音方法、发音部位及拼写规则、韵律等。棉纸抄本，页面长26厘米，宽32厘米，每页15行，共38页，内空1页。线订，9孔。封面完好，中写书名。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

历史方面有《法过宾缅过革》（开天辟地）、《帕麻道毫勐》（破仙葫芦开创人类）、《尼旦坦帕召》（佛经的历史）、《裴兰嘎》（大火烧天地）、《戏西戏左召》（四十四代召开片领）等。

傣族通过自己对天象的观察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有关知识，对天体及其运行有一整套的认识。西双版纳傣文《纳哈答勒》是有关天文分野方面的专著。内容是有关四大部洲和天穹分野的学说，以及日食、月食和人生祸福的推算方法，反映了傣族的宇宙观念和宗教思想。作者姓名和写作年代不详。根据其语言、纸质等情况判断，其抄写时间在一百多年以上，成书年代当更为久远。该书系构皮纸蕨笔手抄本，页面长35厘米，宽26.5厘米，每

【1】《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149-178页；《民族古文献概览》，278-289页。
李拂一译：《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云南大学，1947年。

页17行。抄写工整、清晰。封面、封底皆损缺，现存160页。今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天文、历法方面还有《巴嘎登》、《加勒》、《勒法》等。

傣族不仅有法典，还有断案故事集。西双版纳傣文有《甘特莱的缘由》，傣语称“蒙腊戛甘特莱”。书中体现出甘特莱在断案时，重视现实生活的积极态度。棉纸抄本，页面高40厘米，宽24厘米，每页约23行，共23页。内分8卷52节，每节解决1个疑案。现存中央民族大学。也有小的版本，有的甚至长宽不足10厘米，携带方便，是傣文的袖珍本。

还有一部断案故事集，也是西双版纳傣文书写，名为《谆腊菩提》。棉纸抄本，页面高36厘米，宽24厘米，每页约23行，共17页。内分27节，27个篇名列于全书之首，各节篇名连贯衔接，首尾压韵，颇具特色。现存中央民族大学。

法律方面还有《腊扎干旦兰广蚌》（政治法律和管理制度）、《腊扎干巴迈列谢赏》（犯罪罚款和奖赏法）等。

傣文法律法规、天文、历法、医药卫生、生产生活知识、伦理道德教科书等，都是传抄在棉纸本里，其中也有少量的折叠本记载佛教经典。德宏瑞丽一带还有缅式巴利文经册，折叠装，厚者装木盒，更加珍贵。

二、方块白文书籍的编写和流传

（一）白族的历史和文化

白族历史上称“僰人”，又称“民家”，居住在云南西北部，有人口约160万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部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白族自治州。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稳定的白族群体。大理历史悠久，素有“文献之邦”的雅称。汉、晋时期，白族先民被称为“昆明”。唐代称为“河蛮”、“松外蛮”、“白蛮”。早在西汉武帝时，大理就设置了叶榆县。唐代的南诏国、宋代的大理国，都在这里设都，一度曾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白族风俗尚白，历史上曾有“白人”、“白王”、“白史”之称。新中国成

立后，根据白族人民的意愿，1956年正式定名为白族。

白族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白族主要从事农业。他们聚居的区域已成为我国西南边陲的主要产粮区之一。白族兼营渔业、畜牧业及手工业。驰名中外的大理苍山终年白雪皑皑，洱海碧波荡漾，素有“东方端士”、“鱼米之乡”的美誉。

白族有光辉灿烂的文化。建筑、医学、史学、教育、文学、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刻、天文、历法、气象、医学等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大理古塔星罗棋布，遍及山乡城野，以大理三塔的古建最为著名。大理崇圣寺三塔，剑川石宝山石窟造像，《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大理画卷》等都显示了白族人民悠久的历史和在建筑、雕刻、绘画等方面的卓越才能。

白族的宗教信仰以本主神崇拜为主，也有部分人信奉佛教或道教、基督教等。“三月街”是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和街期。历史上盛行火葬，明代以后逐渐改为土葬。白族还有火把节、本主节，并有渔潭会、绕三灵等盛大街期和传统集会。

（二）方块白文及其文献

白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也有专家认为白语是单独的一个语支。由于汉族和白族的交往，白族人长期学习汉族先进文化，所以白语含有大量汉语词，为汉、藏缅语混合语言类型，有南部、中部和北部3种方言。绝大部分白族人使用本民族语言，多数白族通晓汉语，并作为与其他民族交际的工具。历史上使用汉文、方块白文。

白族人民从唐代开始曾经使用过以汉字为基础的方块白文，以记录白语。白文流行于云南大理一带，是白族使用的一种土俗文字。为了和新创制的拉丁字母白文相区别，人们通常称之为“方块白文”。方块白文借源于汉字，一部分是借用汉字的形和音，不取义；一部分是借用汉字的形和义，不取音。这些类似形声字或会意字。还有一部分是取汉字的某些部件按汉字的造字法而创造的新字。有时全用汉字的形、义，实际上是汉字白读。

古代用白文书写的书籍如《白古通记》等已经失传，现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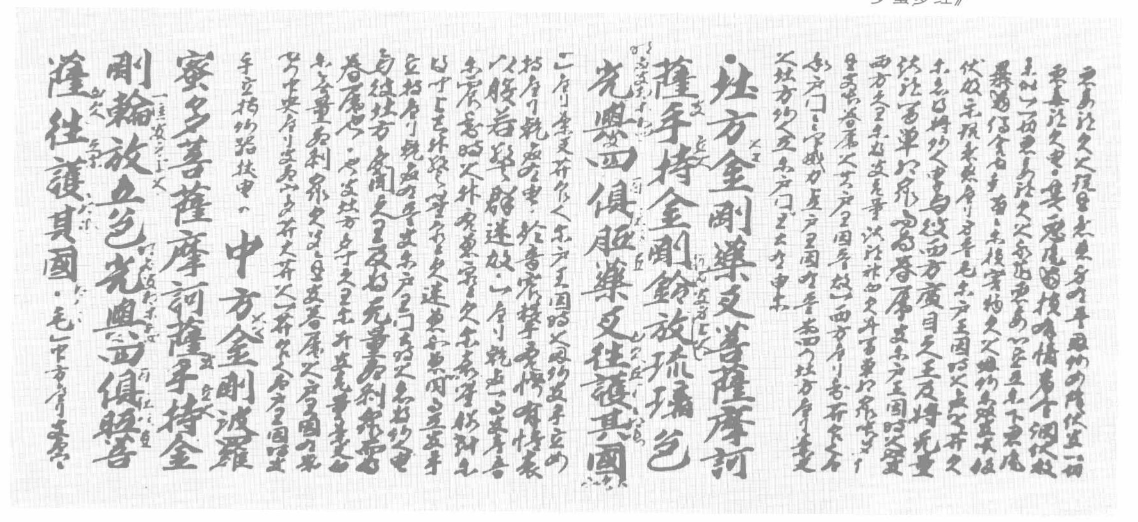
的白文有古籍、石刻碑文和铜器铭文，时间约在10至15世纪。方块白文是记录、传播白族历史文化的工具，但它的使用并不广泛。[1]

1956年在大理市仪凤县发现了古本佛经3 000多卷册，其中有南昭大理国时期的写本佛经共20卷。有的经卷夹写方块白文，有的在汉文经文的右侧写注白文，在卷尾还有白文注疏。最有代表性的是写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嘱果品第八》。此经卷轴装，正文有汉字1 800多个，旁注方块白文1 700个，白文疏记4 300字。旁注和疏记白文字体小。在书写汉文正文时似乎并未专门留出旁注白文的空挡，旁注白文是在正常的两行汉文正文中间见空夹写的，有的地方甚至还与原汉字笔画交叉、叠压。由于古代的白语和现在的白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而上述白文经典中自创字比较多，文字又是行书、草书相杂，所以不易辨识。尽管释读有了一定进展，初步总结出用白文记录白语的一些主要方法，但仍需进一步研究。（图84）

此白文写经，文字墨色浓黑，字体流畅，全篇前后书法统一，可见书写者十分熟悉白文，白文已有固定的书写体系，证明白文当时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其纸质洁白细腻、厚韧光滑，类似宋代的藏经纸。

【1】石钟健：《论白族的白文》，《西南民族文化丛刊》。
徐琳、赵衍荪：《白文〈山花碑〉释读》，《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
杨应新：《方块白文辨析》，《民族语文》1990年第5期。

图84
方块白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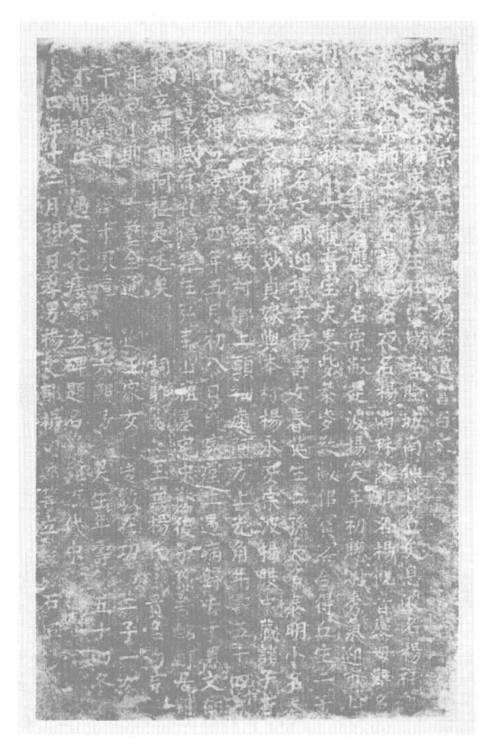


图 85
方块白文《故善士杨宗墓志碑》

【1】《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240–246页；《民族古文献概览》，196–202页。

此外，民间尚保留一些曲本、唱词等，如曲本有大本曲、本子曲。大本曲又有三十六大曲，七十二小曲，实际上还远不止这些。曲本系用普通纸张裁订书写。

留存于世的古白文还有一些金石铭刻，如12世纪的刻于铜像背部的《段政兴资发愿文》，14世纪的《段信苴宝摩崖》，15世纪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故善士杨宗墓志碑》、《故善士赵公墓志》、《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碑》等。[1]（图85）

三、水书书籍的编写和流传

水族主要聚居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都匀、独山以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凯里、黎平、榕江、从江等县，少数散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水族远祖是古代“百越”的一支。有的专家认为水族是秦代从北部迁到黔桂地区的。唐、宋时与壮侗各民族一起被统称为“獠”。北宋时在水族地区设“抚水州”。“水”族之称，最早见于明代史籍。清代多称其为“水苗家”、“水家”等。新中国成立后，水族被正式定名。宋代社会基层组织“洞”或“寨”还保留着浓厚的农村公社的色彩，后设土官羁縻，明代改土归流。

水族约有34万多人，多依山傍水而居，其地森林密布，山水如画，适于农、林业的发展，是贵州高原的鱼米花果之乡。水族在民歌中常以“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水族以种植水稻为主，“九阡酒”是水族传统佳酿。水族多居住“干栏”式楼房，尚铜鼓，信仰多神，天文学和历法有较高发展。

水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水语支。水族有自己的历法，水历与夏历基本一致，以月相变化的周期定月份，一年分十二个月，但以小季种植的月份为岁首（阳历九月），以大季收割的月

分为年终（阳历八月）。这与秦历以十月为岁首颇为接近，两者或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1]

水族先民曾创制过自己的文字，所记录的是水语。水书称为“泐虽”，“泐”为文字，“虽”即水家，汉文称为“水书”。其形状类似于甲骨文和金文，流行在贵州三都县、荔波县一带水族地区。由于这套符号数量不多，主要用于占卜，难以记录水语中的每一个词，所以通常称之为“水书”而不称之为“水文”。现存水书只有400~500多个单字，且多用于宗教巫术活动。

水书可以分成改制汉字和自创符号两类，笔画简单，形体古朴。有人因其中部分字形和中原的甲骨文相近，推测其创造年代可能与甲骨文同时。这种推测虽无可靠的证据，但水书具有悠久的历史还是符合实际的。可能在秦汉之际，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水文有了一定的发展。后来由于战争、迁徙等各种原因，它的发展又受到了限制，还不能完全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多为民间占卜、择日所用。尽管如此，水书毕竟是水族人民固有的文化，是研究水族社会历史和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水书结构大体可分为象形、会意、指事和假借四种。象形字占的比重大，一般攫取事物的典型特征，然后运用简单的构图来表示，如“虎”字在简化的头型上突出双耳，“豹”字则在虎字基础上延长颈部和突出双目表示。水书的发展因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均系誊写抄录，因此出现字形的变异，产生了古体、今体和异体的字形。其中借用汉字的方式有“反书”一种，很有特点，即把现成的汉字颠倒过来书写，这种罕见的现象可以丰富人们关于汉字系统文字的知识。水书自上而下竖行直书，自右而左排行。

现存的水书文献资料不多。水书古籍的分类，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吉、凶两类，吉祥类有代旺、鸠高、鸠笨等四十多个条目；凶祝类有棱顶、鸠火、花消、都居等近六百个条目。若按形式来划分，可以分为阅览本、朗读本、遁掌本、时象本、方位本、星宿本等。朗读本是学习水书的基础读本，阅览本是水书的

【1】石尚昭、吴支贤：《水族文字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王国宇：《水族古文字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日〕西田龙雄：《水文字历的译释》，《言语》1980年第8期。

主体部分，是择定各种日期的主要依据。这些古籍记载了水族的历法、农事、征伐等方面内容，与水族社会的发展关系密切。

在水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水书的影响相当广泛，其中受制约最大的要算丧葬、婚嫁和营造三方面。如丧葬方面，从入殓、停棺、出殡、下土安葬和“开控”（祭悼）活动，每一细小的环节都要按水书条文去趋吉避凶。因此，过去有些人家请来择日的水书先生至少要六个，多者达十来个。此外，如日常生活中驯牛、吃新米等细小活动也受水书的制约。可见水书对水族人民思想意识和生产生活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水书没有统一规范，没有进入学校，全靠民间口传手抄，但其内容基本一致，差异不大。由此推断，水书的定形当在水族主要氏族部落尚未解体的历史时期，所以在此后出现的战乱与流离，人们尽管分居各地，还依然保留着它的基本面目。

有一种水书《历法》，写于清嘉庆年间。内有四季的时令和节气，以夏历九月为正月，谓之“端月”，以十二支纪年。月份以数字表示，年、日、时辰用干支表示。该书高31厘米，宽22厘米，每页10行，各行字数不一，共16页。从右至左直排，以竹签蘸墨书写于白皮纸。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图86）

水族有关于战争的古籍《论攻守》，写于清嘉庆年间，内容为作战阵法，以竹签作笔书写在白纸上，高14.4厘米，宽24.9厘米，每页行次不等，有的每页11行，有的每页多达19行，共10页20面。书中还有特殊的符号，鱼形表示守方，方框为指挥位置，三角形表示山头阵地，圆圈加三画表示进攻之敌退败情形。有的圆圈、三角等符号涂以朱色。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水族自古有发达的农业，并信占卜。水书有《农事占卜》，写于清代，以竹签作笔书写在白纸上。高23.5厘米，宽13厘米，每页3—6行，各行字数不一，共11页。以竹签蘸墨书写于白皮纸上。第一行意为“庚午年丁巳日播种，吉”。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另有占卜古籍《卜辞》，写于清嘉庆年间，内容为安葬择吉。以竹签作笔书写在白纸上。高14.6厘米，宽47厘米，每页行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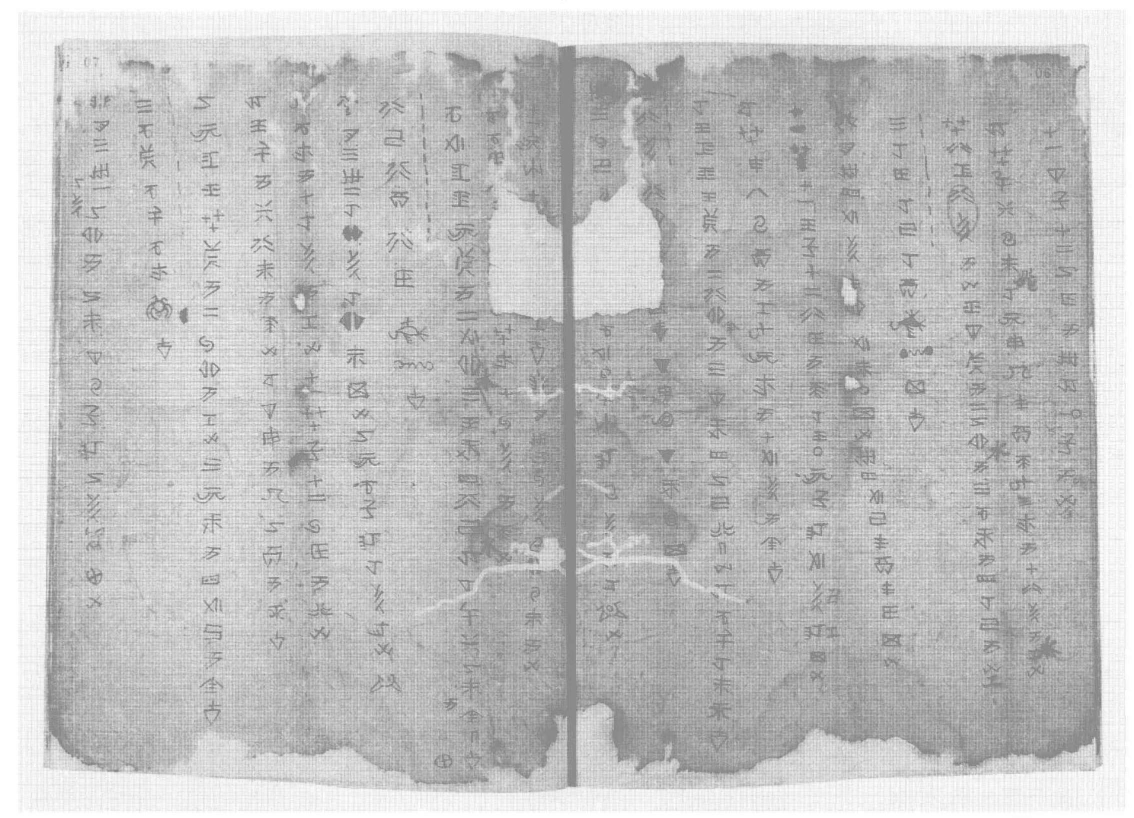


图86
水书《历法》

等，20多行，最多30行，少者12行。每行8—13字不等。共9面页，1、2页单面书写，3、4页双面书写，5页后单面书写。各行字数不一。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水族双方发生争端时，选择吉日良辰，当事双方各派谈判代表，约定时间、地点，排好座次方位，讲道理，辩是非。水书中记录了这种关于论理、谈判的书籍，书名为《都讲》，写于清嘉庆年间。以竹签作笔书写在白纸上。高38厘米，宽25厘米，各行字数不一，共20页。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据专家介绍，水书至少在汉代已存在，在水书文献中有中原不同时期的汉字。[1]

贵州省荔波县水各村乡发现一本水书，共38页，是水书先生蒙建川家传之物，布面，线装，书高32厘米，宽26.5厘米，上下单栏，各页框高宽不等，高有28.7、29.5、27、29厘米多种，宽有

【1】王品魁译注、贵州省民委古籍办、黔南州民委、三都县委编:《水书》(正七卷、壬辰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21.7、23、22.6等多种。各页版心或有或无，有版心者画上下双鱼尾。墨色深厚，书写工整。今藏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1] 贵州水族研究专家根据当地文化氛围和附近的碑文（拉下碑、水车碑），认为是明弘治年间的水书木刻本。[2] 然而我们对此书的版本认真考察研究后认为，它不是刻本，而是用硬笔书写得比较规整的抄本。（图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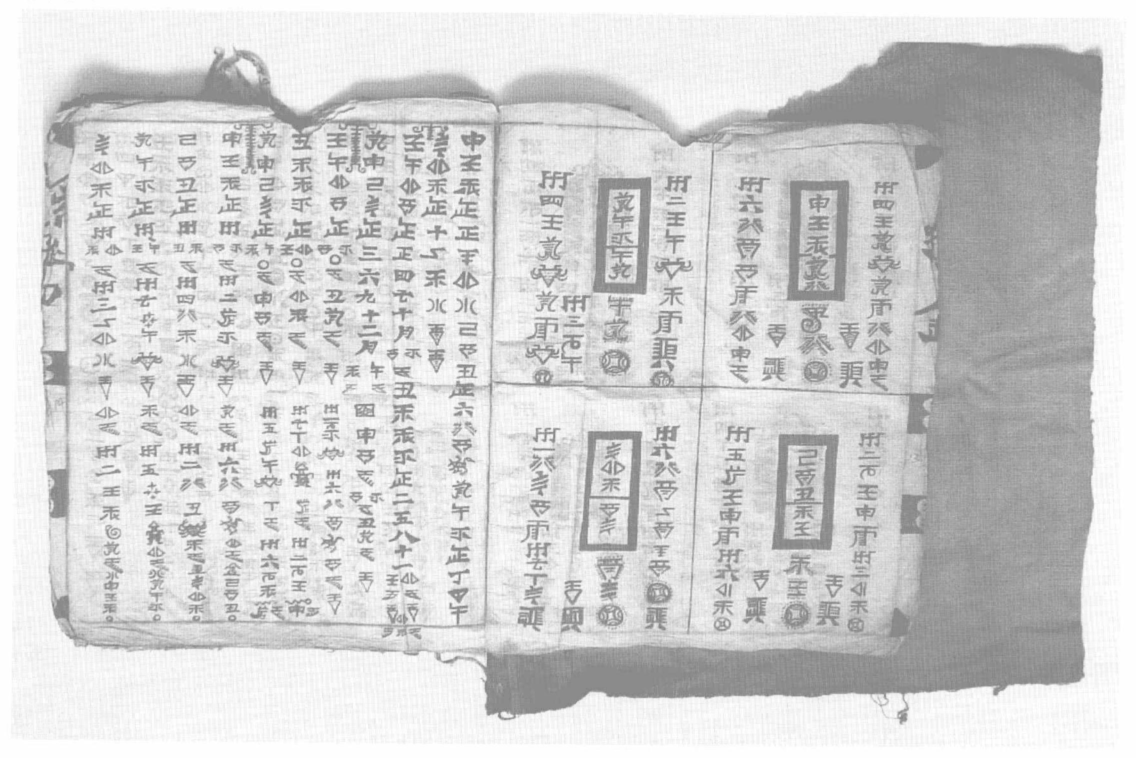
【1】以上资料系笔者在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的支持和帮助下对原书实际考察记录。

【2】潘朝霖、韦宗林主编：《中国水族文化研究》，255~3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四、尔苏沙巴文古籍

尔苏人是藏族的一部，称为"扎拉玛"，分布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越西、冕宁、木里，雅安地区的汉源、石棉，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等地区。尔苏人是土著民族，以农为主，善种桑、麻，养蚕、丝织是尔苏人的主要副业。尔苏人精于建筑，能将不规则的石块砌垒成雄伟壮观的城堡——邛笼和碉楼。信仰万物有灵，经师被称为"沙巴"。沙巴经常被请去占卜祸福，

图87
写本水书



驱鬼祛灾。尔苏人有自己的语言尔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当地使用象形文字尔苏沙巴文记录沙巴使用的占卜书。

尔苏沙巴文起源何时，由谁创制，无确切记载。但可以推断它有很悠久的历史，尔苏沙巴文是一种处在初级阶段的象形文字，只有200个左右的单体字，文字形体与其所代表的事物有明显的一致性，可以从单字体推知它所代表的事物；有少量的衍生字和会意字；用不同的颜色表达不同的附加意义，常在文字中配用白、黑、红、蓝、绿、黄色来表示不同的字义，这似乎突出地表明了文字的图画性质。尔苏沙巴文无固定的笔顺和书写格式，但有时为了说明时间顺序，根据内容需要，在一个复杂的图形中将单字按左下、左上、右上、右下、中间的顺序排列。这种文字不能准确地反映尔苏人的语言。当一组字组成复杂图形时，文字本身不能完整地表示复杂的意义，要靠沙巴们加以发挥和引申。单字体和语言里的词和音节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往往一个字读两个音节或三个音节，有的字需要用一段话才能解释清楚。尔苏沙巴文表达功能系统还很不完备。它是由图画脱胎出来，刚刚跨入文字行列的原始图画文字。[1]

尔苏语由于尔苏人的分散居住而有很大差异，沙巴们也彼此无来往，但各地的尔苏文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写法、读法、释义都大体相同。据说曾流行过数十种经书，已发现的书籍仅有数种。

尔苏沙巴文的历书《虐曼史答》，内容是解释天象，预测人间祸福，有石棉本和甘洛本。石棉本高11厘米，宽28厘米，页面上部装订。每页上下横分3栏，左右竖分5栏，共15个长方格，格中写图画文字。甘洛本页数及书写款式同石棉本，只是单体字略多。(图88)

尔苏沙巴文占卜书《史帕卓兹》，是沙巴占卦用的经书。高14厘米，宽26厘米，共4页，单面书写，可拼合成一整幅画面。画面分内外3层，内层为蛙形，中层为12兽形，外层为沙巴文，共129字。

尔苏沙巴文经书《昌巴尔刷答》，是沙巴占卦用的经书。内

【1】孙宏开:《试论尔苏沙巴文字的性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王元鹿:《尔苏沙巴文字的特征及其在比较文字学上的认识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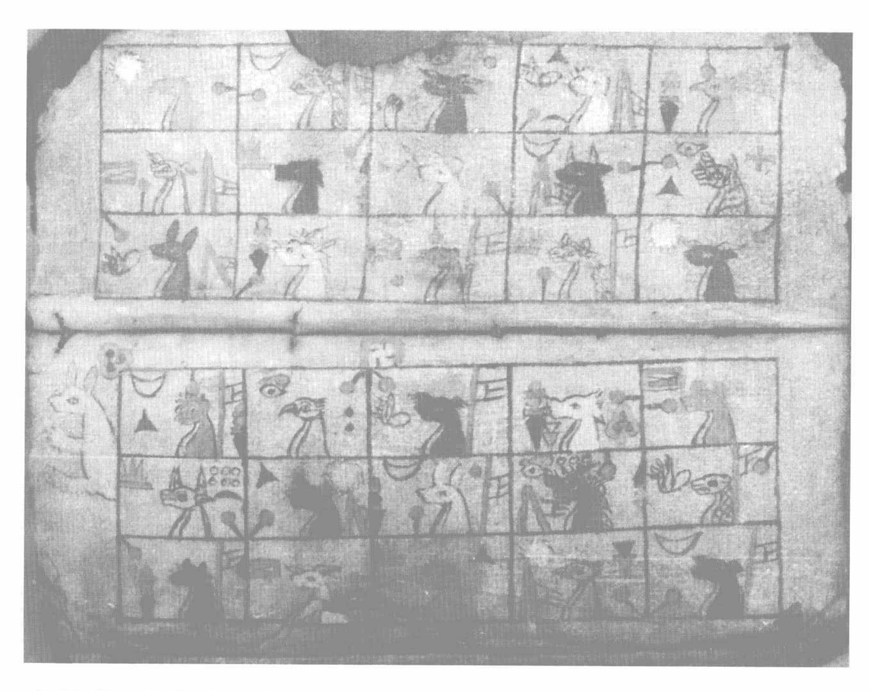


图88
尔苏沙巴文《虐曼史答》

容是沙巴们解释人们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种种原因。高14厘米，宽26厘米，共5页，8面。分上下两栏，每栏由数十个单体字组成，共有318字，同形字约占五分之四。

尔苏沙巴文经书《记数、方位和卜卦历书》，内容是记数方法和方位判断方法，主要用于占卜。高11厘米，宽28厘米，共8页16面。每页上下横分3栏，左右竖分5栏或6栏，共15或18个长方格，格中写图画文字。

第十节　清代少数民族图书出版小结

清代是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少数民族文字的应用和出版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撑。特别是统治民族满族创制了自己民族的文字满文，用满文（或满文与其他文字合璧）出版了品种繁多、印刷精良的图书。满文图书在现存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数量仅次于藏文古籍，其内容之丰富，装帧之多样，版

成熟的地步。

由于清王朝的满族统治者与蒙古贵族的特殊关系，蒙文图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发展时期。清代蒙古族涌现出一批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的许多作品都用蒙文写作。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中盛行，有关佛学的典籍更是占了蒙文古籍的大半。在清代还出现了托忒蒙古文，从此在蒙古文图书中又多出一个新支。

清代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一直注意对西域的收复和开发。先后平定了几次叛乱，终于将天山南北纳入清朝版图，从此“新疆”这一地域名词出现了。新疆的统一，促进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密切了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察合台文图书也迎来一个新的繁荣期。

清代由于藏、蒙地区和内地联系的加强，政府大力发展藏传佛教，藏文图书的出版在清代依然处于兴盛时期。特别是多种藏文《大藏经》的雕刊形成高潮，北京和藏族地区都发展了藏文《大藏经》的印刷。以德格印经院为代表的专门印经场所的建成和完善，使藏文图书的雕印和出版达到了新的水平。

清代南方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编撰、流通依旧保持着原有的规模和水平，有特色的书籍不断问世。纳西东巴文创制较早，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处在图画记事和表意文字中间发展阶段的象形文字符号系统，是人类文字从图画向符号过渡的阶段，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是人类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范例。用纳西东巴文撰写的书籍内容丰富，极具特色。可惜早期版本少见，而清代的纳西东巴文文献保存较多。尔苏沙巴文也是一种处在初级阶段的象形文字，但字数很少，存世的书籍仅是有限的几种。

彝文书籍整理、汇编成综合类典籍成就显著。傣文的贝叶书籍和纸本书籍都有新的创获。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水书都是很早就创制的文字，但缺乏规范，使用受到一定限制。方块壮字字数很多，文献也较多；水书字数较少，存留文献也不多；方块白文的书籍所见不多。这些书籍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增加，这几种文字都走上了消亡的道路。

附录一　出版大事记

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

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仿蒙古文创制满文，是为“老满文”，亦称无圈点满文。它通行30多年，还留下一批文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被后世称为“满文老档”的编年体史书。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

后金设文馆，命巴克什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籍为满文，库尔缠等记注政事。文馆初名“笔帖赫包”，意为“书房”，后改为“笔帖赫衙门”，乾隆时更名为“文馆”。

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

皇太极命达海对老满文加以改进，被改进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

天聪六年七月，达海逝世。由他译成满文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礼部会典》及一部分大乘佛教典籍。

崇德四年（1639年）

希福等奉皇太极之命将辽、金、元史译为蒙古文。后金户部刻印示谕官民禁绝烟草的告示。

清初，蒙古文《蒙古黄金史》（又名《大黄金史》）成书。

顺治元年（1644年）

清军进入北京，改明四夷馆为四译馆，职能不变。

同年十月，世祖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年号顺治。

同年，创设国子监，招收学生学习“国书”（满文）和汉文。

顺治二年（1645年）

在河南中举者的试卷中发现有人将“皇叔父”多尔衮误写为“王叔父”，被指为不敬之罪，将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革职，交与刑部议罪。这是清王朝第一起文字狱案。此后，文字狱不断发生。

同年，诏设明史馆，命内大院大学士冯铨等纂修《明史》。

同年，严衍（1575—1645）编辑成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补正》294卷。

顺治三年（1646年）

修成并刊版《大清律》，次年颁行全国。这是清朝第一部成文法典，也是内府最早的刻书之一。后经多次修订和补正。

同年，清廷刻印《满文洪武要训》，为现存最早的满文印本。由内国史大学士刚林奉敕翻译。

同年，著名学者、编辑家曹学佺（1574—1646）卒。

同年，文学家、编辑家冯梦龙（1574—1646）卒。他辑有话本“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内府刊印满文《辽史》、《金史》、《元史》，为清入关后首批由内廷刊印的满文图书。

顺治四年（1647年）

僧人函可随身携带其所撰记载南明弘光政权兴亡及抗清事迹的史稿《再变纪》离开南京时被清兵查获，函可被解送北京。次年定罪流放辽阳（今沈阳）。这一案件开清代禁止南明史籍流传的先例。

顺治五年（1648年）

扎雅班第达创制托忒蒙古文。

朝廷下令禁止印卖“淫词小说”。

顺治七年（1651年）在摄政王多尔衮谕令下，刊印满文《三国志演义》。

顺治八年（1652年）

皇帝亲政后刊印了一批以其名义编撰的满文或满汉合璧图书，顺治一朝约刻18部满文图书。

顺治十一年（1654年）

内府刊印满文《诗经》，同年南京听松楼刊印满汉合璧《诗经》。此为现在所见最早的满文坊刻本。

顺治七年至康熙元年

扎雅班第达及其弟子翻译二百多部作品为满文，多为藏传佛教经典。

顺治十四年（1657年）

史学家谈迁（1593—1657）撰成编年体史书《国榷》，108卷。此书在清代无刻本，仅存蒋氏衍芬草堂和四明卢氏抱经楼两种抄本。

顺治十五年（1658年）

谷应泰（1620—1690）撰成断代纪事本末体史书《明史纪事本末》80卷，刻于谷氏筑益堂。后有江西书局、广雅书局翻刻本。

顺治十六年（1659年）

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毛晋（1599—1659）卒。一生共刻书600余种，四部俱备。

同年，顾祖禹始撰地理志书《读史方舆纪要》，历时20年，数易其稿，临终前方撰成此书，130卷，附《舆图要览》4卷，为研究历史地理必读之书。此书撰成后，康熙间无锡华氏曾刻印其中历代州域形势部分5卷。嘉庆十六年（1812年），将此书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合刊。道光、光绪时均有刻本。

顺治十八年（1661年）

郑成功（1624—1662）出军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五月攻克台南赤嵌城，命户官刻版颁行《命令八条》，次年又刻印《五梅花操法》。这是台湾地区出版最早的汉文印刷品。

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1661—1663年）

因庄廷铣刻《明史辑略》，朝廷大兴文字狱。

康熙元年（1662年）

蒙古文《蒙古源流》（原名《珍宝史纲》）成书。

蒙古文《恩德固日勒的故事》抄成。（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

康熙三年（1664年）

内府刊印满文《纲鉴会纂》，明王世贞编，清达海等译。

著名诗人、藏书家钱谦益（1582—1664）卒。他编有《绛云楼书目》。

康熙三年至雍正年间（1664年—1729年）

《西南彝志》编纂成。

康熙五年（1666年）

史学家李清（1602—1683）编撰野史《三垣笔记》6卷，记崇祯十年（1637年）讫隆武二年（1645年）时事、朝章、典故、人物等方面内容，另《附识》3卷录传闻之事。

康熙九年（1670年）

始设起居注馆，置记注官满4人、汉8人，以日讲官兼摄。

康熙十年（1671年）

同年，文学家、编辑家朱彝尊（1629—1709）始编词集《词综》，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编成刊印，30卷。

同年，史学家、编辑家马骕撰成《绎史》160卷刊行。

内府刊印满文《大清律集解附例》。

计六奇（1622—1687）撰成杂史类史书《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记明末政治斗争和农民起义事迹及南明朝政、抗清故事和朝野轶闻，清政府列为禁书。

康熙十一年（1672年）

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所撰世界地理书《坤舆图说》在北京刊印。该书记述世界五大洲各国山川民风物产，后被收入《四库全书》。

康熙十二年（1673年）

纳兰性德（1654—1685）根据徐乾学旧藏辑刊经学丛书《通志堂经解》，凡146种、1 860卷。

同年戏曲家、刻书家李渔（1610—1680）移居金陵，在建立书室的同时，开设书坊，坊名芥子园，以所刻五色套版印刷的王概等《芥子园画传》最为著名。

康熙十五年（1676年）

黄宗羲（1610—1695）撰成《明儒学案》62卷，开创学案体史书之先河。

康熙十六年（1677年）

内府刻印《日讲四书解义》26卷。这是已知最早的内府刻书。

同年，内府刊印满文《日讲四书解义》，自此开始一批经书“日讲解义”陆续出版。

康熙十八年（1679年）

命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总裁官，重开明史馆，纂修《明史》。

北京版木刻本蒙古文《乃吉托音传》刊印。

康熙十九年（1680年）

设修书处于武英殿左右廊房，掌管刊印装潢书籍。这是清中央政府最早设置的刻书机构，也是武英殿正式刻书之始。据统计，内府和武英殿所刻在500种以上。

康熙二十年（1681年）

曹溶（1613—1685）辑汇丛书《学海类编》，后经其门人陶樾增订为正、续两集，共431种、810卷，主要选辑唐宋至清初有关经学、杂史、各代遗著散帙，是一部汇辑丛残为主的丛书，不收已刊之作，颇有史料价值。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著名思想家、编撰家顾炎武（1613—1682）卒。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敕刊藏文佛经《大藏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刊成《甘珠尔》即经部，又名《如来大藏经》。雍正即位后续刻《丹珠尔》即论部。乾隆二年（1737年）加以修补。通称“北京版”，保存了许多印度已失传的佛教著作。

宛羽斋满文《大清全书》刊印。此为有年款的最早的满文研究著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命修《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成。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命张英（1637—1708）等辑编类书《渊鉴类函》450卷，总目4卷，分为45部。

满文《古文渊鉴》刊印，此书无论刊刻、用纸、装帧均为一流，是康熙时代皇家满文刻本的典范。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下诏广泛征求典籍，并规定由各省督抚征集后送至礼部汇集，如无版刻者，雇人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自行呈送者，交礼部汇缴。

同年，礼部奉诏开馆纂修《大清一统志》。

同年，常熟钱氏吹藜阁以铜活字排印钱陆灿的《文苑英华律赋选》4卷。

同年，《平定三逆方略》编成。此为有年款最早的“方略”图书，为以后的“方略”系列图书提供了范例。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

在明代刻印《四部医典》的基础上，五世达赖组织人力，参阅了大量医学书籍，于1687年新校对、修订、刊印《四部医典》，两年后在西藏首次发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

武英殿刊印《大清会典》162卷。这是清代第一部以会典为名的行政法规。其后屡经增修。

同年，诏开三朝国史馆，修纂天命（太祖努尔哈赤）、天聪（太宗皇太极）、顺治三朝历史。

同年，高士奇（1645—1703）编成以事件为中心的史书《左传纪事本末》53卷。

康熙三十年（1691年）

命译臣将《通鉴纲目》译成满文，康熙皇帝制序。此后又由傅达礼等译《大学衍义》、《春秋》、《易经》、《孝经》等数百种。这些满文译著基本上都是用满文书写刊印的，由此可见清统治者对于汉籍传译的重视。

同年，藏书家、目录学家黄虞稷（1629—1691）卒。

大约同年，徐乾学（1631—1694）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编成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后编》184卷，全书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讫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作为《资治通鉴》续编，依其体例，排比正史，参考诸书，作考异以明史事去取，又采前人议论，分附于各条史事之下，其自出议论，则标“臣乾学曰”，以示区别。

阮旻锡（1627—?）撰成编年体史书《海上见闻录》2卷，记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郑经父子抗清和经营台湾的史事，为治南明史者所重视。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

史学家万斯同（1638—1702）编刊《历代年表》59卷，将东汉至五代间正史所缺之表予以补齐，共68种。

同年，朱彝尊开始修撰经学目录《经义考》。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写成初稿。在其逝世后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始刻成全书300卷。

同年，思想家、编撰家王夫之（1619—1692）卒。著有《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等100余种，后人纂修为《船山遗书》。

同年，任命法国传教士白晋（1635—1730）为钦差，出使法国，并以康熙帝名义赠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49册中文书籍。

同年，顾嗣立（1665—1722）编成元代诗歌选集《元诗选》初集，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共编成初、二、三集，由顾氏秀野草堂刊出。

大约同年，江日升编撰章回历史小说《台湾外纪》30卷。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

编辑家、藏书家徐乾学（1631—1694）卒。曾奉敕编纂《清会典》、《明史》，撰有《传是楼宋元本书目》。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

福建建阳县丞葛受箕受顾炎武弟子潘耒（1646—1708）委托，主持在麻沙刊印顾氏遗稿《日知录》32卷，这是《日知录》最早的版本。

同年，著名思想家、史学家、编撰家黄宗羲（1610—1695）卒。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

张潮（1650—?）编辑《昭代丛书》，乾隆中杨复吉等续编，道光中沈懋德重辑，共10集561种。

大约同年，书法家林佶（生卒年不详）为著名诗人王士祯《渔洋山人精华录》、《古夫于亭稿》等4部著作手书付雕。此后，家刻请名家写样刻版成为风尚。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著名学者、编撰家朱彝尊及其表弟查慎行（1650—1727）同游福建，并在建阳麻沙停留，见证了建阳刻书业仍然很繁盛。

康熙四十年（1701年）左右

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编纂天文、历算著作《历算全书》62卷，后被收入《四库全书》。

同年，六世达赖喇嘛下令在西藏日喀则那塘寺创建印书院，雍正八年（1730年）正式修建，历时20年建成，曾刊刻藏文大藏经《般若波罗蜜多经》13部，《甘珠尔》108函，《丹珠尔》215函，是为“那塘版”。

同年，词臣陈梦雷（1651—1741）编撰大型类书《古今图书汇编》，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编成，赐名《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初年命户部尚书蒋廷锡校勘重编。

同年，朱彝尊及其门人共同编纂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100卷，选录明朝及明亡不仕的遗民诗人共3 400余人的作品。

同年，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1629—1701）卒。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江南织造兼理两淮盐课通政使曹寅（1658—1712）奉旨与彭定求等编纂《全唐诗》，同时开局校刊，称扬州书局。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全唐诗》900卷编竣，次年由扬州书局刊印。该书收集较全，校勘较精，文献价值较高，为历代最大的诗歌总集。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

陈元龙（1654—1736）等奉敕编成《御定历代赋汇》140卷、《逸句》2卷、《补遗》22卷，由扬州书局雕版印行。

同年，北京琉璃厂万古斋两色套印《大清律集解附例》30卷，为内府刻本之外的坊刻套印本。

同年，汪灏、张逸少等奉敕编纂大型植物书《佩文斋广群芳谱》100卷。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

傅达礼等奉敕纂《清文鉴》告成，为满文分类辞典。后几经重修，成满、汉、蒙、藏、维5种语言对照之《五体清文鉴》。

同年，武英殿刊印满文《御制清文鉴》，此书历时35年编成，开了清代编纂官修辞书的先河。

同年，满文《金瓶梅》刊印。此书在文禁森严的情况下能刻版刊印实为奇迹。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

编辑家、目录学家朱彝尊（1629—1709）卒。编有我国现存最大一部经籍目录《经义考》30卷。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

文盛堂《西厢记》刊印。

康熙五十年（1711年）

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奉命在中国学者官员的协助下测量中国舆图，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测绘完毕，次年合成《皇舆全览图》，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由利巴雕刻成铜版图，为最早的西洋铜版中国地图。

同年，吴乘权等辑《纲鉴易知录》107卷成书，为简略编年体通史。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所著《南山集》被处斩，受牵连入狱者100多人。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文学家蒲松龄（1640—1715）卒。著有《聊斋志异》等。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

张玉书（1642—1711）、陈廷敬（？—1712）等奉敕撰成《康熙字典》。

同年，甘肃卓尼土司摩索贡布（1686—1742）创建藏文印书院，世称卓尼印书院。

同年，蒙古文北京版《格斯尔的故事》刊印。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

沈德潜（1673—1769）编成《唐诗别裁集》20卷。

同年，《满蒙文鉴》刊印。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

理学家、编撰家李光地（1642—1718）卒。曾奉敕主纂《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

山东泰安徐志定用磁版印成张尔岐的《周易说略》与《蒿庵闲话》二书，自称"泰山磁板"。

张廷玉等奉敕编《骈字类编》，至雍正四年（1726年）成书，由内府刻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

法国传教士傅圣泽（1665—1741）离开北京回国，随身携带他在华购得的77箱近4 000册中文书籍。后将3 980种汉籍全部捐赠给皇家图书馆，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数量最多、选择最精的一批汉籍，为法国汉学研究准备了条件。

同年，蒙古文《御制甘珠尔》刊印。

康熙六十年（1721年）

康熙帝命儒臣吴襄等编纂类书《子史精华》，至雍正五年（1727年）编成160卷。

同年，德格版藏文《大藏经》在四川省德格县刻造，至乾隆二年（1737年）完成。《清文启蒙》刊印，为清代影响较大的满文教科书。那塘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完成，共102函。

康熙六十年至乾隆十八年（1721—1753年）

在甘南藏区东南部甘肃临潭县卓尼寺雕造新的藏文版《大藏经》，为卓尼版，刻制刊印《甘珠尔》108函，《丹珠尔》309函。《清文汇书》刊印，为清代版本最多、流行最广的词书之一。

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年）

梅文鼎自撰数学著述《梅氏丛书》28种刊行。

雍正二年（1724年）

颁刻《圣谕广训》1卷，后又相继由内府编刻了《御制朋党论》、《庭训格言》等。

雍正三年（1725年）

镌刻呼和浩特五塔寺蒙古文天文图。

雍正四年（1726年）

开始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中国铜活字印书规模最大的一次。

雍正六年（1728年）

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发。至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等，合成一书，名《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研读。这是帝王利用刻书制造文字狱的创例。

雍正七年（1729年）

下诏改康熙十二年（1673年）创设的武英殿造办处为武英殿修书处，成为清代图书官刻机构。修书处所刊书称为“武英殿本”，简称“殿本”。

同年，由德格第十二代土司曲吉·登巴泽仁创建德格印经院。

雍正八年（1730年）

来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科技翻译家白晋（1656—1730）卒于北京。

雍正十年（1732年）

编辑家蒋廷锡（1669—1732）卒，曾充《清圣祖实录》、《大清一统志》总裁等。

雍正十三年（1735年）

敕刊佛经汉文《大藏经》开雕，至乾隆三年（1739年）竣工，俗称《清龙藏》，次年敕印100部。中国自宋元以来，刻印过10多种汉文《大藏经》，均已散佚，独《清龙藏》存。

同年，纂修《明史》成定稿。

雍正年间

《蒙文启蒙》编成。

乾隆元年（1736年）

鄂尔泰（1677—1745）等奉敕撰成农书《授时通考》78卷，为古代农学之集大成著作，由武英殿刻行。

乾隆年间（1736—1795年）

成都书铺经营繁盛，有“经元八大家”之称。其繁盛之势一直保持到清末。

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年）

福建长汀四堡（今属连城）刻书业繁盛，先后有书坊123家，以邹、马两大姓为主，刻书总数达400多种。

吴县黄丕烈、长洲周锡瓒、元和顾之逵、吴县袁廷梼，并称为“四大藏书家”。

乾隆三年（1738年）

《八旗通志》书成，初集共250卷。

乾隆四年（1739年）

武英殿奉旨校刻《十三经注疏》361卷。这是清朝首次刊布的十三经定本，作为读经范本。

同年，武英殿奉旨校刻正史。

同年，医学家吴谦（生卒年不详）等奉敕编纂大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15种90卷。乾隆七年（1742年）由武英殿初刊。

乾隆五年（1740年）

继康熙、雍正两朝修订《大清律集解附例》之后，修成《大清律例》47卷，内有禁止坊肆印卖淫词小说的条款。

同年，《大清一统志》成书。

同年，内府刊印魏象乾（生卒年不详）的译学著作《翻清说》，为不同文字互译的珍贵论著。

乾隆六年（1741年）

编撰家陈梦雷（1650—1741）卒。

同年，《满文老档》草本整理成册。该书据“老档原本”37册整理而成，为研究满族早期历史之重要资料。

同年，乾隆帝批准鄂尔泰、徐元梦的奏请，下旨将满文老档逐页托裱装订，并将满文老档中的老满文部分检出，按满文12字头排列，附有圈点的新满文，成《无圈点字书》。满文《四书》殿刻本刊印，自此一批儒家经典满文重译本陆续刊印。

乾隆七年（1742年）

那塘版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完成，共225帙。

乾隆九年（1744年）

诏编内廷所藏秘籍书目，名《钦定天禄琳琅书目》10卷。

乾隆十二年（1747年）

诏令梁诗正等编次内府所藏魏、晋至明代法书，聚集众工，模勒上石，称为《三希堂石渠堂籍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为法帖之巨制。

同年，校刻《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告成。

同年，命校刊《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并由三通馆臣张廷玉、齐召南等奉敕编撰《续文献通考》，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定稿250卷。有武英殿本。

同年，乾隆帝命刻巾箱本丛书《古香斋袖珍十种》，为乾隆年间最早刻印的丛书。

乾隆十三年（1748年）

四译馆与会同馆合并，更名会同四译馆。

乾隆十四年（1749年）

蒙古文《御制丹珠尔》刊印。

乾隆十八年（1753年）

谕令禁止将《水浒传》、《西厢记》等汉文小说译成满文。

同年，刻书家黄晟（生卒年不详）翻刻《太平广记》袖珍本。

同年，总管景德镇陶务唐英（1682—1755）撰成制陶工艺书《陶人心语》。

乾隆十九年（1754年）

小说家吴敬梓（1701—1754）卒。著有《儒林外史》等。

乾隆二十年（1755年）

敕译刊印满文四书，称《翻译四书》六卷。后又相继敕译《五经》，合称《满汉文合璧五经四书》。

同年，胡中藻以其著《坚磨生诗抄》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一语有诋毁朝廷之义，以悖逆罪下狱弃市。

同年，史学家、编撰家全祖望（1705—1755）卒。撰有《读易别录》3卷，著录有关著作201种。

大约同年，长汀四堡书坊主人邹圣脉（1692—1762）增补编成童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4卷，流行甚广，刻本很多。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卢见曾辑刻《雅雨堂丛书》128卷，所收皆当时罕秘之本。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彭家屏私藏《明季野史》案发，赐自尽。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

经学家、考据学家惠栋（1697—1758）卒。著有《古文尚书考》等。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徽州一鸥草堂刊印吴钺辑《惠山听松庵竹垆图咏》4集。一鸥草堂为清代徽州名肆，也是徽州地区较早的知名书坊。

同年，著名经学家、算学家江永（1681—1762）卒。著有《江氏数学翼梅》等。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

官修《皇清职贡图》9卷成。

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与其夫人合编唐诗选集《唐诗三百首》18卷。

《钦定西域同文志》刊印，其中包括汉文、满文、蒙古文、托忒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等六种文字。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文学家曹雪芹（约1715—1764）卒。

同年，医学家徐大椿（1693—1771）自编自刻医学丛书《徐氏医书六种》。

乾隆三十年（1765年）

蒋良骐（1723—1789）纂辑清史资料系年长编《东华录》32卷。

同年，医学家赵学敏（约1719—1805）撰成药学著作《本草纲目拾遗》10卷。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蒙古源流》由外喀尔喀蒙古亲王献给皇帝，并被重抄。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三通馆臣嵇璜、刘墉等奉敕编撰典制政书《续通典》、《清朝通典》，前者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成书150卷；后者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撰成100卷。

同年，三通馆臣奉敕撰修《清朝文献通考》，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撰成300卷。

同年，三通馆臣奉敕修撰《清朝通志》，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成书126卷。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敕修《历代通鉴辑览》116卷编辑完成，因由乾隆帝亲自审核定稿，并详加批注，故又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

李文藻撰《琉璃厂书肆记》记述作者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北京琉璃厂访书、购书情况，对当时琉璃厂各书肆情况均有介绍，是反映明清时期琉璃厂书肆经营情况的珍贵资料。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

何文焕编辑诗话丛书《历代诗话》27种。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刊印。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正月，乾隆帝以编撰《四库全书》的名义，下诏各省征集图书。

杭世骏（1696—1772）卒。曾校勘武英殿“十三经”、“二十四史”，纂修《三礼义疏》。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设《四库全书》馆，撰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

同年，开始全国性的禁书运动，将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进行销毁以至毁版。根据陈乃乾《禁书总目》考证，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止，全国被禁毁数字为：全毁书2 454种，抽毁书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

同年十月，乾隆帝采纳金简的建议，谕令武英殿刻制枣木活字，印刷古籍。次年，刻成枣木字253 500个，赐名“聚珍版”，开始印制《武英殿聚珍版书》，先后印成丛书134种、2 300多卷。

同时，金简撰《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是反映当时活字刻制工艺水平的重要文献。

同年，敕刊《清文翻译全藏经》，至嘉庆三年（1798年）刊成。故宫博物院等图书馆有藏本。

同年，编《御制增订清文鉴》，这是在《御制清文鉴》基础上进行改编增订的，比原书增加了约二分之一，并将全部辞条译为汉文。此后又发展到四体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一月

谕令抄写老档，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前后4次共抄

录7部。

乾隆四十年（1775年）

乾隆帝诏令将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三部政书由武英殿刊行，合称“三通”。

同年，《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书成，此为官修目录记载版本之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以汇辑《四库全书》，令销删“抵触本朝”书籍。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

江西举人王锡侯刻《字贯》，被举报获罪处斩，株连到江西巡抚、两江总督等两江主要官员。

同年，著名思想家、考据家戴震（1723—1777）卒。著有《孟子字义疏证》等。

同年，《蒙古源流》被译为满文和汉文，由武英殿刊印。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

古文家姚鼐（1732—1815）编成古文读物《古文辞类纂》74卷。

同年，苏州著名书坊书业堂刻印小说《说呼全传》12卷40回。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编撰家纪昀（1724—1805）等奉敕编撰《历代职官表》63卷。

《三合便览》刊印。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由总纂官纪昀呈送乾隆帝钦定，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由武英殿刊成。

同年十二月，《四库全书》首部抄本完成。此书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式设立四库全书馆，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七部抄本最后完成历时14年。是清代一大文化工程，全书共收图书3 503余部，其中包括满文或满文与其他文字合璧的四书五经及《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志》和《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四库全书》第一份抄录完成，共36 304册、6 144函，约912 970万字，分为四部44类66子目，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的一部丛书。

编辑家李调元（1734—1802）编刻大型丛书《函海》和《全五代诗》。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耶稣会士冯秉正之《通鉴纲目》在巴黎出版。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先将《四库全书》抄写4份，分藏于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

乾隆五十年（1785年）前后

著名学者毕沅（1730—1797）校刻《经训堂丛书》21种162卷。

乾隆五十年至嘉庆十四年（1785—1809年）

编辑家、刻书家孙星衍（1753—1818）辑刻《岱南阁丛书》19种164卷。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嘉木祥·晋美旺布在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创办藏文印书院，世称拉卜楞寺书院。曾刊刻藏文书籍22万余部，现存书版7万余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察干乌拉庙在大喇嘛察哈尔格布希·罗布藏楚勒特木主持下，建立藏文印书馆，世称察干乌拉庙印书馆。刻印有《宗喀巴圣传十一章》等藏文佛教经典。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颁《严饬江苏、江西、浙江三省抚查缴禁书谕旨》。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命重排石鼓文10章，刻石鼓于太学及热河文庙，是为“乾隆石鼓文”。

毕沅主持编纂成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220卷。

同年，《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告成，自乾隆三十八年（1733

年）开始，历时18年，终将满文大藏经译毕刊印。

乾隆年间，《御制四体清文鉴》刊印，其中包括满、汉、藏和蒙古文。五体清文鉴抄成，其中包括满、汉、藏、维吾尔和蒙古文。满、蒙、藏、嘉戎、维五体字书编成。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

北京萃文书屋程伟元用木活字排印《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为最早印行的《红楼梦》版本。

同年，诏派和珅、王杰校勘，蒋衡以楷书写十三经，刊于石版。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毕工，立于北京国子监内。后称《清石经》或《乾隆石经》。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

清内府用满汉两种文字刊印《书经》，此类书称“满汉合璧本”。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

武英殿刊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浙江翻刻。

嘉庆元年（1796年）

著名校勘家卢文弨（1717—1796）卒。有抱经堂汇刻书《经典释义考证》等20余种。

同年，编纂家、辑佚家邵晋涵（1743—1796）卒。曾撰《尔雅正义》，与修《续三通》等书，辑编《旧五代史》。

嘉庆二年（1797年）

史学家、考据家王鸣盛（1722—1797）卒。著有《十七史考异》等。

同年，著名文学家袁枚（1716—1797）卒。著有《小仓山房集》等。

同年，《蒙古托忒汇书》编成。

嘉庆四年（1799年）

顾修（生卒年不详）编刻丛书目录《汇刻书目》10卷，为我国第一部丛书目录。

同年，阮元（1764—1849）主编的历代科学家传记《畴人传》46

卷撰成刊行。为我国第一部自然科学史略专著。

嘉庆六年（1801年）

九月，命续修《大清会典》。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完成。

同年，北京文成堂刻印《满汉同文新出对像蒙古杂字》，乃便利北方商人学习蒙古语的字书。

同年，北京琉璃厂文梓堂刊印《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收集会话词语，蒙汉图文对照，巾箱本，刻印精雅，携带方便。

同年，史学家、方志学家、校雠学家章学诚（1738—1801）卒。著有《校雠通义》等。

同年，云南景洪市大勐笼立傣文《西双版纳大勐笼傣文碑》。

嘉庆七年（1802年）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论述藏传佛教各教派历史的《土观宗派源流》成书。

嘉庆九年（1804年）

考据家、编纂家钱大昕（1728—1804）卒。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

同年，著名医学家陈修园（1753—1823）的医学著作《南雅堂医书全集》出版。

嘉庆十年（1805年）

王昶（1725—1806）编纂成大型金石学著作《金石萃编》160卷，共收历代碑刻、铭文和其他铭刻1 500余种。

四月，禁西洋人刻书传教。

同年，校勘家张海鹏辑刻丛书《学津讨原》20集，192种，1 048卷。

同年，编纂家、目录学家纪昀（1724—1805）卒。曾为四库全书馆总纂，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嘉庆十一年（1806年）

吴门汪昌序以木活字印刷《太平御览》1 000卷。

嘉庆十二年（1807年）

武隆阿在台湾镇总兵官任上铸造汉文铜活字，印成《圣谕广训

注》等书。这是清代台湾地区首次出现铜活字印书。

同年，英国耶稣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来到澳门，刊印汉文《圣经》，开始雕刻汉文字模，备铸汉文铅字，为地方当局禁毁。

嘉庆十三年（1808年）

董诰（1740—1818）奉敕设立全唐文馆，组织阮元、孙星衍等人编辑《全唐文》。嘉庆十九年（1814年）书成，共1 000卷。

嘉庆十四年（1809年）

徐松（1781—1848）开始辑《宋会要》

同年，史学家、编纂家洪亮吉（1746—1809）卒。

同年，成都龙燮堂万育木活字印《天下郡国利病书》129卷。

嘉庆十五年（1810年）

松江沈慈、沈恕的古倪园写刻唐《鱼玄机诗》、《薛涛诗》，宋《杨太后宫词》及元傅若金妻孙蕙兰《绿窗遗稿》，世称《四妇人集》，为写刻精品。

嘉庆十七年（1812年）

阮元主持撰刻训诂书总集《经籍纂诂》106卷，为阅读、研究古籍的必备工具书。

同年，藏书家孙星衍（1753—1818）辑刻《平津馆丛书》43种，254卷。

嘉庆十八年（1813年）

林春溥（1775—1862）自编自刻丛书《竹柏山房家刻》，至咸丰四年（1854年）竣工。

同年，以杭州藏书家鲍廷博（1728—1814）广刊秘籍，老而不倦，赏给举人衔。鲍氏建有“知不足斋”，藏书万卷，刊有《知不足斋丛书》。

嘉庆十九年（1814年）

史学家、考据家赵翼（1727—1814）卒。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

同年，藏书家、编辑校勘家鲍廷博（1728—1814）卒。

嘉庆二十年（1815年）

藏书家、编刻家张海鹏编刻丛书《墨海金壶》117种、727卷。此书从《永乐大典》中选取有关经史实学、名家论著、久已不传的古书，荟萃而成。

同年，经学家、文字学家段玉裁（1735—1815）卒。撰有《说文解字注》等。

同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由他的助手米怜担任院长。英华书院附设印刷所，出版中文《圣经》和中西文书刊。同年八月，该院出版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马礼逊、米怜、麦都思和中国教徒梁发编印。至1821年停刊，共出80多期。为第一家用金属活字印刷之中文新闻纸。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

考据家崔述（1740—1816）卒。著有《考信录》。

同年，编校家、刻书家张海鹏（1755—1816）卒。

同年，哈斯宝用蒙古文翻译《今古奇观》。此外还译编过《红楼梦》、《唐宫逸史》、《唐宫逸史补》等。

嘉庆年间，水书《历法》、《论攻守》、《都讲》等书完成，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越秀山麓创建官办书院学海堂，组织讲学并刻书。

同年，阮元重刊《十三经注疏》并加校勘，附有《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同年，陈履和将著名学者崔述的遗著汇刻为《崔东壁遗书》。至道光四年（1824）刻成19种54卷。

同年，北京琉璃厂著名书坊五柳居主人陶正祥（1752—1817）卒。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

藏书家、编校家孙星衍（1753—1818）卒。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等。

同年，考据家翁方纲（1733—1818）卒。著有《两汉金石记》等。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

语言学家王引之（1766—1834）编刻训诂书《经传释词》10卷。

同年，藏书家、目录家张金吾（1787—1829）爱日精庐木活字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

同年，马礼逊在梁发等配合下印成第一部铅活字印刷汉文书《新旧约圣经》。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嘉庆重修一统志》560卷成书。该志自康熙时即开始敕修，乾隆八年（1743年）修成342卷，后增为500卷。该编始于嘉庆年间，取材下限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故名。

同年，航海家谢清高（1765—1821）口述，杨炳南笔录，编撰海外游记《海录》。这是近代较早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专著。

同年，李兆洛（1769—1841）编成《骈体文钞》31卷，选录秦至隋末散文774篇。道光元年（1821年）刻印问世。

同年，藏书家、目录家张金吾（1787—1829）辑刊解题书目《爱日精庐藏书志》4卷，以活字本刊行。此后又加增益，重新编次，编成36卷，续志4卷。

道光初年（1821—1825年）

台湾府六品衔职员卢崇玉在台南创立松云轩刻印坊。这是台湾第一家印刷机构。松云轩刻印坊主要刊印善书、神佛像、诗文集。

道光二年（1822年）

张金吾编成金代散文总集《金文最》120卷。此书采录金代散文近2 000篇，分为41类，集金人文章之大成。至光绪八年（1882）始由广州粤雅堂刊行。

同年，《吏治辑要》刊印，此为清代后期流行较广的书籍。

道光二年至道光十七年（1822—1837年）

李兆洛编成《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为第一部专供查检地名之辞典。

道光三年（1823年）

留云居士用木活字印《明季稗史》16种共24卷。

同年，京师琉璃厂半松居士用木活字印刷《南疆绎史》24卷、《摭遗》18卷、《恤谥考》8卷、《明季南略》18卷、《明季北略》24卷。

道光五年（1825年）

福州侯官人林春祺捐资兴工刻造铜活字。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完工，历时20年，共镌刻大小铜字40余万个。

同年，藏书家、校勘家、刻书家黄丕烈（1763—1825）卒。有《百宋一廛书录》，刊行《士礼居丛书》，为收藏家所重。

道光六年（1826年）

贺长龄（1785—1848）、魏源（1794—1857）等辑成《皇朝经世文编》120卷。

道光七年（1827年）

藏族僧人赛多堪钦·益西嘉措和当才堪钦在青海湟中塔尔寺创办藏文印书院，主要刻印宗喀巴大师等僧人的著作，也刻印了不少佛教经典和高僧著作。

同年，英文周刊《广东纪录报》创刊于广州，创办人为怡合洋行经理、英国人马西森。

道光八年（1828年）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于巴达维亚用中文石印印刷出版。

道光九年（1829年）

阮元辑刊经学丛书《皇清经解》1 400卷，又名《学海堂经解》，收录顾炎武、全祖望、惠栋等74人188种经学著作，集中反映了清代经学的成就和水平。

同年，藏书家、编校家、目录学家张金吾（1787—1829）卒。编有《爱日精庐藏书志》40卷，为收书较多之家藏善本书目录。

同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至广州，后在上海主编《中国日报》，为美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

道光十年（1830年）

李瑶（生卒年不详）雇工用泥活字排印《南疆绎史恤谥考》8卷，

共刷印100部。道光十二年（1832）又在杭州排印《校补金石例四种》17卷。

同年，经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江藩（1761—1830）卒。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

道光十一年（1831年）

三月，重修《康熙字典》成。

同年，伍崇曜（1810—1863）主持编刻、谭莹校辑地方性丛书《岭南遗书》第一集。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共刊六集，收书59种，340卷。

道光十二年（1832年）

著名考据家、小学家王念孙（1744—1832）卒。撰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等。

同年，编纂家梁章钜（1775—1849）在福州编刊自撰诗作《退庵诗存》25卷。此后又刊印自撰《浪迹丛谈》等，为清代督抚中著述最多者之一。

同年，刻印家、牧师梁发（1789—?）在广州刊印《劝世良言》。

同年，美国公理会运送一部印刷机和一套英文活字至广州。5月，在广州创办*Chinese Repository*，这是鸦片战争前影响最大的英文杂志。

道光十三年（1833年）

来华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杂志。

同年，中英文对照杂志《澳门杂文篇》在澳门创刊，为周刊，马礼逊主办，共出版4期。

道光十四年（1834年）

在广州的一些英美传教士及商人成立中国益知学会，出版翻译书籍，成为当时较有影响的翻译出版机构。

二月，朝廷禁坊肆刊刻售赁淫书小说。

同年，美国教会在华觅得华文木刻一套，送波士顿用浇铅法制成华文活字，输入中国以备印刷书报。

同年，涿州卢坤刻印《杜工部集》，将王世贞、王慎中、王士祯、邵长蘅、宋荦等5人的评语分别用紫、蓝、朱、绿、黄色套印上版，加上正文所用的墨色，共有6种颜色，这是古代印刷史上用色最多的套印书籍。

同年，经学家陈寿祺（1771—1834）卒。

道光十五年（1835年）

严可均（1762—1843）独自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为研究古代文化之重要参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刻印全书。

同年，李锡龄（1794—1844）惜阴轩辑刻《惜阴轩丛书》34种303卷，续编1种21卷。

道光十六年（1836年）

庄仲方辑选《南宋文范》70卷，次年，以活字印成。

同年，著名藏书家瞿绍基（1772—1836）卒。瞿绍基广购宋元刻本及金石，历时10年，积书10万卷，筑“恬裕室”贮之，与聊城杨以增并称为“南瞿北杨”。

同年，藏书家汪远孙（1794—1836）卒。汪远孙为藏书家汪诚之子，尽发先世藏书读之，购别墅于水磨头，名“借闲小筑”，因自号“借闲漫士”。其藏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又有子目。

道光十八年（1838年）

黄宗羲、全祖望等编的《宋元学案》100卷，由王梓成、冯云濠整理校补完成。

同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7）在广州主编中文刊物《各国消息》月刊，为现存最早在中国印制的石印品。

同年，英国人台约尔在新加坡制造汉字铅字，并建屋曰“华英书院”。后美国人谷玄继其业，刻字模数种。此套活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运至香港，颇为风行，被称为“香港字”。

同年，裨治文编成《亚美利哥合省国志略》，为第一部介绍美国之书。

道光十九年（1839年）

著名校勘家、目录学家顾广圻（1766—1839）卒，有藏书楼名“思适斋”。

道光二十年（1840年）

彝族阿初八、李正伯巴等7人编著完成彝文医药书籍。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聊斋志异》满汉合璧刊印。《蒙文指要》刊印。

咸丰七年（1857年）

《吏治辑要》译成蒙古文刊印。

咸丰十年（1860年）

抄本彝文《字汇全集》完成。

咸丰年间

百衣巴撰成彝文《彝族农民起义史册》。

同治四年（1865年）

宣讲伦理道德的彝文《色尾处莫》木刻版雕印完成。

同治年间

尹湛纳希创作《一层楼》、《大元勃兴青史演义》。

光绪三年（1877年）

尹湛纳希写成蒙古文《泣红亭》。

光绪十七年（1891年）

《蒙文总汇》、《蒙文汇书》刊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前

古壮字书籍《董永》和《舜儿》合订抄本完成。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裁撤会同四译馆。留有一批汉文与各种民族文字或外国语文对照的《译语》。

宣统元年（1909年）

《水浒传》蒙译本抄毕，今藏蒙古国家图书馆。

宣统二年（1910年）

《金瓶梅》蒙译本抄成，今藏蒙古国家图书馆。

附录二　参考书目

一、史料类

【1】[清]江蘩:《四译馆考》,康熙刻本。

【2】[清]高鹗著、通瑞译:《吏治辑要》(满文版),道光二年二槐堂刻本。

【3】[清]松筠:《绥服纪略》,见何秋涛《北徼汇编》,同治四年。

【4】[清]俞正燮:《俄罗斯事辑》,见何秋涛《北徼汇编》,同治四年。

【5】[清]孙从添:《藏书纪要》,士礼居丛书本。

【6】[清]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万有文库本。

【7】丁文江编:《爨文丛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8】李德启:《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1937年。

【9】李拂一译:《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云南大学,1947年。

【10】傅懋勣:《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昌华中大学发行,1948年。

【11】[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

【12】[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1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

【14】[清]昭梿:《啸亭续录》,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

【15】梁敏编:《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年。

【16】喻翠容:《布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年。

【17】[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杰:《安多政教史》(藏文版),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

【18】[清]陈康祺:《燕下乡脞录》,《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

【19】刘璐编著:《景颇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 年。
【20】王辅世主编:《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 年。
【2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 年。
【22】李永燧、王尔松编著:《哈尼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23】李淑兰、仲谦编著:《锡伯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年。
【24】国史馆:《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 年。
【25】[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杰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 年。
【26】广西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编:《古壮字字典》,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 年。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 年。
【28】王品魁译注,贵州省民委古籍办、黔南州民委、三都县委编:《水书》(正七卷、壬辰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
【2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 年。
【30】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 年。
【31】李霖灿编著:《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年。
【32】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

二、文集类

【33】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 年。
【34】喜饶嘉措:《喜饶嘉措佛学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54 年。
【35】蒋复璁等:《中国书籍考论集》,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 年。
【36】李文琦等:《中国书籍演变论集》,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 年。
【37】乔衍琯、张锦郎编:《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75 年。
【38】乔衍琯、张锦郎编:《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续编》,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
【39】喜饶嘉措:《喜饶嘉措文集》一、二、三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4 年。
【40】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叙录》,内蒙古图书馆,1987 年。
【41】张树栋编:《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 年。
【42】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43】唐景福:《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 年。
【44】格桑曲批译,周季文校:《根敦群培文集精要》,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 年。

三、著作类

【45】李书华:《中国印刷术起源》,香港新亚书院,1960年。

【46】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1962年。

【47】王冶秋:《琉璃厂史话》,三联书店,1963年。

【48】史梅岑:《中国印刷发展史》,商务印书馆,1966年。

【49】高越天:《中国书纲》,维新书局,1971年。

【50】昌彼得:《中国图书史略》,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

【51】秀川编写:《中国印刷史话》,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7年。

【52】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

【53】新疆社科院民族所:《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54】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55】李更旺:《中国书籍史》,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油印,1981年。

【56】四川民族出版社编:《德格印经院》,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

【57】吴晗:《江苏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

【58】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59】夏仲·策仁旺杰:《颇罗鼐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

【60】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书店,1983年。

【61】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撰,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

【62】傅懋勣:《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83年。

【63】陈彬和:《中国书史》,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64】牛相奎、赵净修整理:《鲁般鲁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65】包尔汗:《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66】魏隐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

【67】施廷镛撰,张秀民校:《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68】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

【69】杨绳信:《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70】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

【71】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7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73】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74】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75】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
【76】刘少泉:《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四川大学图情系油印,1990年。
【77】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中国书店,1990年。
【78】梁庭望:《古壮字文献选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79】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1993年。
【80】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
【81】赛福鼎:《赛福鼎回忆录》,华夏出版社,1993年。
【82】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312页。
【83】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84】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编著:《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85】陈力:《中国图书史》,文津出版社,1996年。
【86】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87】田继周、滕绍箴等著:《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88】张绍勋:《中国印刷史话》,商务印书馆,1997年。
【89】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90】魏隐儒:《古籍版本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91】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1997年。
【92】彭斐章主编:《中外图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93】邢林:《雪域东部神秘的喇嘛教》,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
【94】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
【95】卜金荣主编:《纳西东巴文化要籍及传承概览》,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
【96】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97】《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
【98】荣苏赫、赵永铣、梁一儒、扎拉嘎主编:《蒙古族文学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99】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
【100】杨福泉:《绿雪歌者——李霖灿与东巴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1】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2】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3】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4】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 年。

【105】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年。

【106】肖东发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07】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 年。

【108】黄镇伟:《坊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09】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10】王澄:《扬州刻书考》,广陵书社,2003 年。

【111】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广陵书社,2003 年。

【112】潘朝霖、韦宗林主编:《中国水族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13】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14】方维保等:《徽州古刻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15】徐学林:《徽州刻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16】顾志兴:《浙江藏书史》,杭州出版社,2006 年。

四、论文类

【117】石钟健:《论白族的白文》,《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六辑,1957 年。

【118】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故宫博物院刊》,1980(3)。

【119】〔日〕西田龙雄:《水文字历的译释》,《言语》1980(8)。

【120】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2(2)。

【121】张元生:《方块壮字》,《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22】和志武:《东巴文和哥巴文》,《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123】赵丽明、刘自齐:《湘西方块苗文》,《民族语文》1990(1)。

【124】黄贵权:《瑶族的书面语及其文字初探》,《民族学》1990(2)。

【125】徐琳、赵衍荪:《白文〈山花碑〉释读》,《民族语文》1990(3)。

【126】杨应新:《方块白文辨析》,《民族语文》1990(5)。

【127】王元鹿:《尔苏沙巴文字的特征及其在比较文字学上的认识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6)。

【128】吴启禄:《布依族古籍中的方块布依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 3 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29】赵丽明:《汉字侗文与方块侗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 3 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30】梁庭望:《壮字及其文献新探》,《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 3 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
【131】王国宇:《水族古文字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 2 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32】石尚昭、吴支贤:《水族文字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 2 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33】孙宏开:《试论尔苏沙巴文字的性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 2 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34】魏文栋:《解开城步苗文之谜》,《贵州文史丛刊》1993(2)。
【135】马学良:《译文访古录追记》,《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巴蜀书社,1997 年。
【136】曹达诺夫·扎义尔:《新疆三区革命有关情况的回忆》,《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 8 月。
【137】蔡伟、冯振杰、李劲:《藏文印刷史上的盛举——卓尼版〈大藏经〉的刊印》,《寻根》2000(6)。
【138】周德仓:《〈藏文白话报〉的在藏发现及新闻史学价值》,《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3)。

后 记

历经数个寒暑，这部由几位作者合作完成的首部《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上）终于付梓了。既为首次，就带有开垦的艰辛。尽管清代早已过去一个世纪，但由于许多史料尚未及开发，因此远不能“盖棺定论”。新整理的史料源源问世，研究不断拓宽与加深，既往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所以，探索与认识的循环递进伴随了此项课题的全过程。

随着课题的结项，成果中未及认识的、认识未深甚至错误的，均不得不暂告一段落。但是，人的认识永无止境，并不因课题的结束而中止。每当新认识产生，便会对印成之书感到遗憾，也就更加理解古代修书为什么还要续修，通过续修正可弥补书籍的诸多缺憾。所以，希望此卷将来也有修订的机会。

本卷分工如下：

朱赛虹（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第二、三、六、七章，第八章第一节；

曹凤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小引、第一、四、五章，第八章第二、三节；

史金波、黄润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第九章；

刘兰肖（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大事记；

全书统稿工作由朱赛虹、刘兰肖共同完成。

在此书付梓之际，谨向数年来对此项课题提供各种帮助的专家、学者、领导及各位朋友深表谢忱！

著　者

2008年10月10日


ISBN 978-7-5068-1788-2

9 787506 817882 >

定价：54.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出版通史　6　清代卷　上
作者=朱赛虹
页数=406
SS号=12243664
出版日期=2008.12